

黃花岡



HUANG HUA GANG MAGAZINE

2004 年第 4 期 (總第 11 期)



天下第一謗書《李宗仁回憶錄》批判

依中國文化傳統析論三民主義……

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續)

中國共產黨是蘇俄製造的侵華工具

赤裸裸的歷史見證

從張伯駒的一生看……

今日中國政治革命的導向

無法告別的革命

愛國民主運動與護國護法

大陸生活回憶錄

歷史文化

季刊



《黃花崗》讀者子日先生在大陸遙祝雜誌同仁中秋好！



參加過八年抗戰的國民革命軍前中將羅澄先生告訴黃花崗雜誌主編說：你們做的就是歷史和文化上“正本清源、繼往開來”的大事業，你們做得很好！



本刊新聘編委、前中共《新華社》、越共《越南之聲》通訊社著名記者莊思明先生專赴香港於街頭聲援王炳章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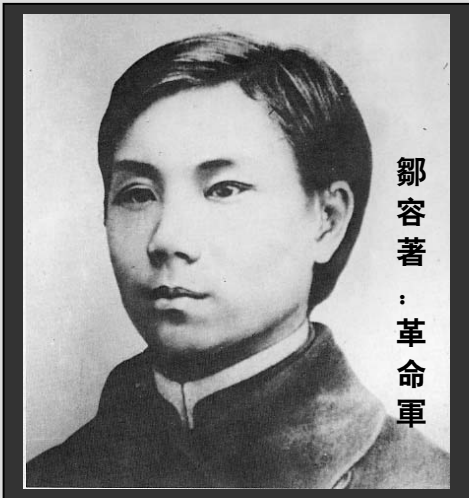
本刊新聘僑界顧問、北美遺族學校校友會會長向厚祿博士在紐約蔣宋美齡逝世一週年追思會上灑淚追念蔣夫人對國家民族的卓越貢獻。



香港人民大膽的民主要求和高漲的民主熱情



曾親身參加救援上海八百壯士的周梅青老人



鄒容著
：革命軍

Huang Hua Gang Magazine

(ISSN 1534-2662)

Issue No. 11

Published

November 27, 2004

Huang Hua Gang Magazine is published by
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Inc.
New York
USA

website: <http://www.huanghuagang.org>
or <http://www.huanghuagang.com>
eMail: hgang2001@hotmail.com

Subscription Hot Line: 718-898-9100

Postmaster

Please send address change to:

P. O. Box 425
New York, NY 10163

Copyright:

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訂閱本刊請來電：718-898-9100

或來信：

《黃花崗》雜誌社
P. O. Box 425
New York, NY 10163
USA

黃花崗

歷史文化季刊

2004 年第 4 期 總第 11 期

主辦者 中國現代史研究中心

出版者 黃花崗雜誌社

主編 辛灝年(兼)

副主編 李剛 博士

主編助理 丁毅 博士、曉黑 博士

主編顧問兼編審 吳學燦、李勇

美術編輯 恆淨

名譽社長 鄭文英

社長 馬佩華

副社長 姚鑫華、易丹軒、賴可正

名譽董事長 周祥(已故)

董事長 周光亞

副董事長 周美娟、路人、孫雲(兼)

第二屆編委會名譽主任 孫國棟教授、丘宏達教授

編委：

余大周	猶健	陳維	秦晉	黃偉	王樹	胡志	張玉	樊星	丁呂	易牧	林晨	陸耘	高優	傅中	李悅	胡西	張謙	毅吳	倩林	才君	黑雲	寧仲	康水	胡峰	章靜	王友	琴伯	阿修	吳學	莊思	葉寧	蔡萌	沈雪	許秋	趙蘇	宋子	明勇	李平	郭平	張育	賴可	謝影	宋雁	昂藏	趙增	辛明	李剛	郭自	孫杰	魏紫	朱玉	高慶	謝明	余建	高陽	陳志	易丹	楊柳	魏玲	岳穆	高沉	賢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刊顧問：向厚祿、趙增義、黃玉振、黃其柱、張學海
曾華漢、麥青芬、陳慶國、周勻之、張國威

中國現代史研究中心秘書長兼黃花崗雜誌發言人：郭平 博士

本刊法律顧問：海明威律師事務所 律師：葉寧

黃花崗 雜誌 第 11 期 (增刊) 2004 年 第 4 期

Huang Hua Gang Magazine November 27, 2004

讀者反饋黃花崗	黃花崗精神光芒萬丈長	鄭貽春	4
新聞發佈會			
新聞追蹤	蚌埠工人集會示威活動全景	張林	43
	安仁坊暴力撤遷欺上瞞下有恃無恐	尚馬	47
首次頒獎會發言續刊	黃花崗的精神——也談國父自有後來人	羊子	50
國民革命與中華民國 專欄	天下第一謗書——《李宗仁回憶錄》批判	黎望樹	5
	參加淞滬抗日戰爭回憶錄	薛寅軒	37
	我憤怒了！——92 歲要飯人...	網上文選	41
共產革命與馬列中國 專欄			
中共專制統治	大陸生活回憶錄	清水君	54
中共文革研究	陳寅恪之死	羅思義	62
	中共文革和紅衛兵——記實美術作品連載之二	陳永生	65
中華文明與世界文化 專欄	依中國文化傳統析論三民主義、共產主義與中國現代化	丘宏達	69
	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續二)	牟宗三等	72
中國知識分子反思 專欄	從張伯駒的一生看中國共產黨……	辛明	84
	王若望自傳(第三部連載之四)	王若望	89
理論研究 專欄			
	今日中國政治革命的導向	陳繼強	94
	愛國民主運動與護國護法	陸耘	97
	無法告別的革命	曉黑	103
	金融風暴負擔轉嫁	曾仁全	104
	中國是市場經濟國家嗎？	連晨	105

中國國際關係研究 專欄**中俄關係記實
歷史追蹤**

- 中國共產黨是蘇俄製造的侵華工具 艾華民 108
 蘇軍暴虐瀋陽記實 詢名 120
 赤裸裸的歷史見證——歷史上的兩個中蘇友好條約 痴情老人 122

時代與文學 專欄**小說
文學史人物評論
文藝評論
詩歌**

- 放下武器（長篇小說節選） 許春樵 125
 主攻魯迅 徐沛 130
 柳如是，你在哪里？ 劉國凱 132
 紅色正在餐巾上走動 楊春光 128
 王炳章——真正的勇者 鄭元 52
 歸來吧，清水君 辛明 53
 自體《滿江紅》一首 張育明 124
 詩選 鄭文英 61
 觀看曇花勁放有感 沈源 107
 孫世揚先生詩選（下期預告）
 德國諺語 135

中華自由論壇 專欄

- 五十五年共產統治何功之有？ 鄭貽春 136
 黑暗的社會腐敗的黨 汪達林 137
 從中國政治思想看兩岸現況及未來 郭自生 139
 大道無術，方為正道 郭平 141
 『救星石』的秘密 子日 142

《黃花崗》雜誌 公告欄

- 本刊董事會第 11 次財務公告 143
 榮譽訂戶和感謝捐款人 37
 本刊啓事 132
 黃花崗雜誌、《誰是新中國》訂單 144
 編後 144

黃花崗精神光芒萬丈長

大陸 鄭貽春

網上文章

《黃花崗》雜誌把第一屆「黃花崗精神獎」授予被中共綁架並判處無期徒刑的王炳章博士。筆者認為，這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其價值是無可估量的，其重要性是十分巨大的。

作為全球著名的文化期刊，《黃花崗》雜誌能夠秉持正義、堅守公道，排除各種無聊之干擾，大義凜然地獎勵首舉海外民運義旗、反抗共產極權專制的民主英雄王炳章。這毫無疑義地告訴人們：反抗共產統治，就必須義無反顧地支援蒙冤受難的自由勇士；追求中華民族的自由解放，就必須徹底揭露、批判並譴責中共對王炳章等民運志士的殘酷迫害！正是站在這樣十分鮮明的立場上，《黃花崗》雜誌才能亮出獎勵旗幟，才能做出可喜可慶可賀之壯舉！把第一屆「黃花崗精神獎」授予被共產法庭判處無期徒刑的王炳章。這，無疑是對抗暴英雄王炳章的極大鼓舞，無疑是對王炳章親友們的極大鼓舞，無疑是對仍然系獄並要把共產法西斯牢底坐穿的所有思想犯、良心犯、政治犯的極大鼓舞，無疑是對以推進中國大陸民主化為職志的廣大民主鬥士的極大鼓舞！

《黃花崗》雜誌能夠鐵肩擔道義，頒獎給現代民運先驅，誠為感人至深也！可見，《黃花崗》雜誌正如其名稱所昭示的那樣，當之無愧地傳承了反抗封建王朝專制統治並為此獻出寶貴生命的黃花崗烈士的優良傳統。大約一百年前，位於大陸廣東省的黃花崗因其反抗清廷統治的悲壯起義而永載史冊，並成為追求民主自由的不朽象徵。現已出版了十期、並在海內外具有資深影響的《黃花崗》雜誌，以此冠其名，以此勵自我，自有其深意存焉！如今，《黃花崗》雜誌用

獎勵民主鬥士的黃花崗精神昭示於人，實為振臂一呼、追隨者眾、敢為天下先、值得褒獎之盛舉！呼民主而破專制，呼自由而滅極權，呼人類文明普世價值而與腐朽沒落的共產統治作堅定而決絕的抗爭。請問，什麼叫做黃花崗精神？這，就是要把社會主義王朝徹底掃進歷史垃圾堆的大無畏氣概；什麼叫做大無畏氣概？這，就是反對共產專制復辟、追求民主自由的黃花崗精神！《黃花崗》雜誌主編、歷史學家辛灝年先生曾經寫出了一本影響極為廣泛的史學著作《誰是新中國》。該書對中共於上個世紀上半葉假革命之名而大行專制復辟之實的歷史進行了詳實而細緻的考證，並無可辯駁地指出：孫中山先生於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所創建的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就是新中國，而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於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但不是新中國，而且由於其比以往歷史上的封建王朝更加殘暴、更加腐敗、更加無能、更加官僚、更加沒落，而成為實際上專制復辟的舊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不但不是中國歷史的進步，反而把中華民族的歷史拉向了全面而徹底的倒退。也就是說，中共建立的所謂「人民共和國」實際上是對於中國人民所有權利的洗劫與剝奪，是對於人類文明的徹底反動。辛灝年先生的分析是言之有據的、剖析是細緻的，結論無疑是深刻的、精闢的。正是對於苦難深重的中華民族的蒼桑歷史與莫大悲劇懷抱著憂國憂民的深沈情懷，辛灝年先生殫精竭慮地做出長而久之的思索，並在其洋洋大觀的歷史敘述中找準近代中國的脈動，復歸事實發生的本來面目，沈湎於浩浩典籍，爬疏往昔之軌跡，終於拂去謊言瀰漫的厚重塵灰，且震聾發聵地抒寫出中華民族長鳴不息之浩歎！故此，辛灝年先生對民主革命家王炳章博士大聲疾呼的鼎力支持，也就自然而然地完全可以理解了。

毋庸置疑，王炳章的確是一個徹底反抗共產暴政的英雄豪傑！王炳章的理念、正氣，以及他的行為，無不充分地表明他與極權專制決絕抗爭的無可動搖的決心、毅力以及奮勇當先、捨身取義的非凡膽略。正像一隻雄鷹哪怕再有缺點，也仍然是振翅高飛、翱翔藍天的雄鷹一樣，王炳章或許有的方面不是那麼十全（下接第 64 頁右下）

李宗仁回憶錄

李宗仁回憶錄

批判



黎望樹

編者按：中國大陸學者黎望樹教授剛剛完成的這部著述，是中國大陸學界二十年歷史反思的又一個重要碩果。它對被《李宗仁回憶錄》一書所竄改的民國歷史、污辱的歷史領袖、和刻意要顛倒黑白地予以或貶或褒的政治人物，全部用斑斑駁駁的事實，也就是揭開塵封之後的歷史真實，進行了重新的指證；在對“是誰捍衛了孫中山先生創建的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誰才是中國艱難共和歷程的中流砥柱？又是誰才真正地領導了中華民國的偉大衛國戰爭？和誰才是共和的背叛者和國家民族的罪人？”等一系列重大歷史問題的事實性辨析上，作出了重要的貢獻。由於該文涉及到中華民國政界和海外學界的諸多重要政治人物和知名學者專家，所以，本刊一方面全文發表“批判”一文，一方面歡迎“反批判”，祇要是事實有根據的反駁，本刊都會予以刊載，以利於展開對大中華民國歷史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和辨識，為在全中國範圍內推倒歷史謊言、推動中國現代歷史反思運動進一步向縱深發展，作出我們平凡但卻是應有的貢獻。

目錄：

- 一、《李宗仁回憶錄》出籠的時代背景
- 二、詆毀中華民國領袖與政府的利器
- 三、口是心非老奸巨滑吃裏扒外翻雲覆雨的小人
- 四、李、白與共軍相約夾擊中央軍
- 五、利祿薰心 既不能命又不受命
- 六、白崇禧遵中共指示不戰而退
- 七、西南大撤退白崇禧毫無作為
- 八、信口雌黃 損人害己
- 九、李宗仁、白崇禧吮吸兵血，開賭販毒
- 十、日酋坦承抗日力量以黃埔軍人為核心
- 十一、西安事變破壞了整個抗日部署
- 十二、真正奉行不抵抗的是美英法蘇
- 十三、李、白開門揖盜引狼入室
- 十四、多宗「抗日反蔣」事件都由胡漢民操控
- 十五、胡漢民派陳友仁赴日要求出兵東北
- 十六、兩萬滇軍的血肉之軀鑄成了李宗仁的榮耀
- 十七、湯恩伯監視嚴密使李宗仁無隙投共

- 十八、白先勇直斥李宗仁偏頗謬誤
 - 十九、對胡宗南將軍的惡意誹謗
 - 二十、對胡璉、宋希濂的惡意誣蔑
 - 二一、對顧維鈞惡意中傷以怨報德
 - 二二、捧吳化文貶邱清泉 旨在擾亂軍心士氣
 - 二三、歪曲史實 指鹿為馬
 - 二四、顛倒是非 混淆黑白
 - 二五、頌揚暴君苛政 同情亂臣賊子
 - 二六、心狠手辣槍斃王公度 草菅人命殺馬君武妾
 - 二七、與內奸衛立煌同惡相濟
 - 二八、包庇叛徒 歌頌軍閥
 - 二九、與大貪污犯毛邦初狼狽為奸
 - 三十、剿共虛晃一招 造假本事一流
 - 三一、白崇禧冒領戰功 李宗仁五子登科
 - 三二、扶植重用共謀劉斐郭汝瑰韓練成
 - 三三、投共是因為不甘寂寞
 - 三四、十二萬美金出賣人格與靈魂
 - 三五、反覆無常縱橫捭闔見利忘義的軍閥政客
 - 三六、首繹兩端左右逢源學風妄誕永遠有理
 - 三七、夏志清、宋淇、蘇雪林對唐德剛…（本刊略）
- 註釋

正文：

一、《李宗仁回憶錄》出籠的時代背景

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的六十萬言《李宗仁回憶錄》，其最早版本是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推出的，海外版則是香港南粵出版社——中共官營的三聯書店附屬機構——推出的。李氏口授本書的主旨「是想乘機寫一部控訴書，或鳴冤白謗書」（注1）。大陸版印行於一九八〇年，正是葉劍英所說的「迫害兩億人，致死兩千萬人」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落幕不久。十年浩劫中，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候補中委就有 71% 被定為「叛徒」「特務」「裏通外國」和「反黨份子」，中共中央、國家機關副部長以上和地方副省長以上的高幹被立案審查的約佔 75%（還不包括挨批挨鬥者）；第八屆中央政治局委員與候補委員的 76%、中央軍委主席的 86%、三屆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 70%、國務院副總理的 87% 和中央各部委主

要負責人、各省市黨委書記的 75%，都受到殘酷迫害。綿延十年的武鬥使國民經濟遭受損失達五千億元人民幣(2)(一九四九——一九七九年全國基建總投資才六千億元)，工農業生產瀕臨崩潰的邊緣，民不聊生，民怨沸騰，年輕一代的知識份子開始探索「中國向何處去？」之類的嚴肅課題。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空軍最先進的米格十九機長范園焱毅然駕機投奔自由，降落於台南空軍基地。而一般民眾偷聽〈美國之音〉與〈自由中國之聲〉廣播者已逾億。為了收拾人心、挽狂瀾於既倒，中共新當權派軟硬兼施，意欲抵銷在台灣、中華民國政府對大陸億萬同胞的感召力，軟的一手是以全國人大常委會名義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宣佈和平統一方針，不再提「解放台灣」的口號；硬的一手是大量印行《金陵春夢》等詆毀中華民國領袖的謗書，其中《李宗仁回憶錄》正是起了一般小說、傳記作品所不能起的作用——藉一名過氣政客的自傳，和他在自傳中對蔣介石喋喋不休的誣罵，更以一貫的強制性宣傳，來強迫大陸讀者接受李氏的偏頗和偽善言辭，進而迫使大陸人民放棄對台灣國民黨反攻大陸的冀望。

李傳的海外版印行於一九八六年三月。其時，大陸民眾已經經歷了鎮壓西單民主牆、「清除精神污染」和「嚴打」等政治運動，城鄉間瀰漫著對共產主義的三信——信心、信念、信任——危機，各級官吏普遍貪污腐化，人民普遍喪失理想，目光短淺，追求物質享受，崇尚「一切向錢看」，因精神空虛而行為失檢，道德水準更是急遽下降……自一九八二至八六年，空軍機師接連發生了吳榮根、孫天勤、王學成、蕭天潤、陳寶忠等駕米格十九、米格廿一、米格十七、轟五機、米格十九等投奔台灣的事件，台灣方面則揭櫫「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政治口號。所以，中共才迫不及待地要在海外重印李傳，藉李宗仁這個退職總統之口，渲染國民黨蔣介石「專制獨裁、政治腐化」，企圖重新鼓吹「祇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

二、詆毀中華民國領袖與政府的利器

《李宗仁回憶錄》究竟賣了多少本？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陳存恭先生親聆，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五日唐德剛在台演講時，示意引言人說銷行一

百萬本，陳氏認為「無論如何，至少銷行了數十萬本」(3)。

中國大陸經歷了腥風血雨的十年浩劫，舞台上只剩下八齣「革命樣板戲」，文學作品只印風派作家浩然的《艷陽天》與《金光大道》，在百花凋零、一潭死水之際，突然冒出一本投合小市民口味的插料打諢厚書，講的盡是聞所未聞的近代史典故，竟一時洛陽紙貴；就以大陸兩千多個縣 68.78 萬家學校來計，售出幾十萬冊本是稀鬆平常的事，作為一件統戰工具，李宗仁是名利雙收的。奇怪的是，在號稱「復興基地」的台灣，由於長期戒嚴所形成的壓抑、逆反情緒作祟，復經李敖一再炒作，《李宗仁回憶錄》也創下不俗的銷售記錄，例如堂堂中華民國行政院新聞局的一等秘書、駐荷蘭代表郭冠英先生便公開宣稱「看了(此書)我一直對李宗仁有份好感，這是教科書及社會宣傳中諸多的捧蔣介石的文牘所不能比的」，這位簡任官未讀完全書就斷言「寫的是真的，讀來合情合理，較易取信於人……讓人看了愛不釋手，看了讓人對中國近代史有大致的瞭解……」(4)一般來說，在台灣，讀書甚少、對近代史涉獵不深的人，對此書會頂禮膜拜視若神明，然而具有真才實學、博覽群書的歷史學家則不約而同認為中共傾銷《李傳》，只是「為詆毀我領袖及政府之利器」、「反襯托出李宗仁的偏激與無知」。(5)

陳存恭論文發表於十八年前，當時大陸上許多檔案資料尚未解密，故四萬餘言的論文偏重於抗戰爆發前新桂系崛起的年代，對李宗仁的人品作了一針見血的評價，云「李宗仁回憶錄每對國民革命軍的領導者蔣中正先生予以人身攻擊，謂其用權術、為政不以德等等，而自誇『忠厚坦誠』，然而從李、黃在廣西崛起的過程，即可發現他們多次動用權術。李氏為了整飭軍紀，在沒有充份證據下處死一名罪不至於死的士兵，只因此士兵是李的同鄉，拿來殺雞儆猴，這是他承認自己用權術的一次。在政治立場和戰略計劃方面，他表面上曾服從過粵軍陳炯明，嗣即服從再起的陸榮廷，他誘勸陸放過黃紹竑而北上與沈鴻英爭桂林，他欺騙從南寧來訪的林俊廷，最後聯合不得人望的沈鴻英偷襲南寧，再聯合粵軍討沈鴻英，這些都不能不說是詐術的運用。至於黃紹竑部，先接受沈鴻英號令而移軍於梧州附近，趁沈軍失利而奪取梧州，再

以鴻門宴擒殺馮葆初，偷襲同屬大本營的陳天太，亦無一不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備』詐術的運用。」(6)

在李宗仁縱橫捭闔的廿世紀上半葉，割據中國南北的大小軍閥何止六、七十人，為何李氏得天獨厚要勞動哥倫比亞大學派遣專人耗時七年去製作口述歷史？那是因為他在國難深重的年代當了四百零一天中華民國代總統(其中一百零二日擅自離職脫離崗位)，然而李傳僅以 8.9%的篇幅記述這位大總統的「政績」，即使加上副總統任上二百四十九日，也僅佔 12.1%的篇幅，倒反而是吹噓自己護國、護法、統一廣西、北伐、抗戰等等功績佔了 72.6%的篇幅。在李宗仁代攝總統職之前，國軍在遼西會戰、徐蚌會戰、平津會戰打了幾場威武不屈的硬仗，有九十萬忠勇官兵殺身成仁，但在李宗仁執政一年中，共軍長驅直入，如入無人之境，江南幾無激烈戰事。這就是李宗仁諱言那一年經歷的根本原因。

三、口是心非老奸巨滑吃裏扒外翻雲覆雨的小人

唐德剛說李宗仁是「忠誠厚道的前輩」「溫柔敦厚的好人」(7)然而從李宗仁口授的這部回憶錄中可知，李宗仁是一個口是心非、老奸巨滑、吃裏扒外、翻雲覆雨的小人。諸如，他嘵嘵不休反覆強調「他(蔣介石)要我出來，不過暫作他的擋箭牌，好讓他從容佈置，佈置好了，他就要促使我早日垮台……用盡方法，破壞我的計劃，使我不能以半壁河山與中共分庭抗禮」「蔣先生是故意促成我早日垮台，愈快愈好。他唯恐我能守住長江，與中共周旋。時日延長，美國政府可能改變對華態度而大量助我……他斷不能坐視我取他而代之」「在蔣先生幕後控制之下，守江謀和的計劃無法實施。結果，開門揖盜，天塹長江，一夕而失。凡此種種，均係蔣先生有意出此，讓我早日垮台」「共軍之所以能席捲江南，奄有全國，並非他們有天大的本領能使我軍一敗塗地，實因蔣先生自毀長城開門揖盜之所致。此次江南之敗，似非由於他指揮低能之所致，細研全局，我深覺他是故意如此部署，以促使我早日垮台」「綜計此次西南保衛戰，尤其是全局關鍵所在的華中戰區的失敗，實係蔣先生一手造成。蔣先生深恐白崇禧在華中站穩了，美國乘勢改變政策對我大量援助，則他將永無重攬政權之望了。所

以他要使我的政權早日垮台，好讓他在台灣重起爐灶，運用美援，建立一個小朝廷，以終餘年」。(8)

李宗仁是不是如他自己所誇耀的——「在南京勵精圖治，作防堵共軍渡江的有效措施」——「守住長江，與中共周旋，坐擁半壁河山」——「我當時的心境是頭可斷，血可流，而志不可辱」(9)呢？從四十八年後公開的絕密檔案可知：「一九四九年一月廿日，李宗仁通過劉仲容(總統府外事局專員)轉告中共駐滬負責情報聯絡工作的吳克堅，說明他已派人去武漢，要白崇禧將武漢讓給中共，並聯合湖南省主席程潛一同動作反蔣。若程潛不肯聯合，則白可向長沙進攻；如程潛同意聯合，則桂系軍隊可以放心配合中共軍隊進攻南京」(10)。蔣介石下野後六天——一月廿七日「李宗仁、白崇禧的私人代表劉仲華、黃啓漢在北平頤和園向中共代表葉劍英轉達李、白的秘密口信，表示願以和平方式加快勝利進程。首先實現局部和平，及與中共並肩作戰，切實八項條件下裏應外合，推動全面和平。」(11)

李宗仁生前萬萬想不到，在他死後廿八年中共和的機要部門爲了「創收」，竟把「大內檔案」輯印成書，把他見不得人的卑劣勾當與鬼蜮伎倆全部抖了出來。在口授自傳稿時，李猶振振有詞云：「上海公眾組織和教育界中的知名人士組成一個人民代表團坐飛機往北平，華中剿匪總部參議劉仲華和立法委員(按；此處李氏故意不提黃啓漢名字)被邀同往。此事經我同意，後來報界傳這兩人是我私人代表，並非事實」(12)。又說「外傳黃紹竑飛漢去港是銜我之命，全非事實」(13)然而黃啓漢在回憶錄中坦承啓身前夕「我到南京見李宗仁，晚上他約我和劉仲華在他房間談話，他說，當前最迫切的事情就是要和共產黨取得聯繫，他已經叫空軍派定了一架飛機，明天就把我和劉仲華送去北平。李宗仁就是要我和劉仲華(有廿六年中共黨齡)趁著北平和平解放，去求見中共中央的領導同志，表示求和誠意」，這是第一次，於一九四九年一月廿三日飛平，廿九日上午由傅作義安排搭乘國軍空軍最後一架撤離北平的飛機回南京。

四、李、白與共軍相約夾擊中央軍

「到南京後，我立即去見李宗仁，向他匯報在北平見到葉劍英以及談話的詳細內容。李很高興，說總算很快就搭上了關係」。隨上海和平代表團北上第二次，那時劉仲華奉令暫留北平，二月十三日專機北上時攜去劉仲華的妻子及三個兒女，行前兩天「李宗仁來到上海，和我在霞飛路黃紹竑家談話，要我帶給毛澤東一封信，並要口頭轉達六點意見：(1)希望能實現全面和平，倘有局部人反對，再合力以政治軍事力量對付之……(5)對蔣介石本人，如認爲他留在國內於和談有礙，可提出使之出國……李宗仁要我這幾條



意見用筆記下來，再三囑咐務必轉達無誤。李還要他的機要科編了一本專用電報密碼給我……我把南京傅厚崗李宗仁官邸的秘密電台呼號以及電報密碼本全部交給北平軍管會交際處長王拓轉交到李克農

處，由李指定一個電台爲我收發和翻譯李宗仁和我來往的電報……代表團南返時，我叫劉仲華向李宗仁謊稱我已得到傅作義的支持，在北平建立了一個電台……我遵照李宗仁的意旨，留在北平繼續擔任聯絡工作。四月三日，周恩來在六國飯店單獨接見我，希望李宗仁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要離開南京，能夠爭取更多的國民黨軍政人員同留在南京更好。考慮到李的安全，他可以調桂系部隊一個師進駐南京保護，萬一受蔣軍攻擊，只要守住一天，解放軍就可以到來支援了。三日下午我回到南京，立即向李宗仁報告周恩來的話，他聚精會神地聽著，不時流露一絲微笑，認爲

對八項原則(包括第一條懲辦戰犯)為談判基礎的問題，完全可以接受。接著，他叫人找秘書黃雪，當面交代起草電稿打給毛澤東，再次表示誠懇求和」。(14)

至於黃紹竑飛漢去港係啲何人之命，可見於劉仲容的回憶錄：「李宗仁一上台就發表文告表示願意接受中共提出的八條為基礎進行和談。為了試探中共對李宗仁態度的反應，李與白分頭進行活動。白崇禧一方面派黃紹竑前往香港，想勸李濟深回來充當國共之間的調停人，一方面派我前往北方同中共當局接洽和談問題……一九四九年二月，我先去上海找中共地下組織接頭，路過南京見了李宗仁，向他說了前往上海的使命。事先他已接到白的電報，李完全同意白的打算。」(15)可見白崇禧派黃紹竑赴港本是執行李宗仁的指令。

一九四九年四月廿日李宗仁出席行政院會議時未在〈國內和平協議〉上簽字，是迫於全體與會者均不同意。事實上當時南京衛戍部隊全係黃埔系軍隊，桂系全無行動自由。李、白私下與共方密使往來時，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上將曾公開宣稱：「如李代總統要舉行所謂的和平會議，請到北平、天津去，不要在南京、上海開會！」又說「如李代總統要向共黨投降，安全的責任我們是不能負擔的」(16)。這些堅毅的表示使李宗仁在南京覓不到投共的間隙。

蔣介石是否「自毀長城，開門揖盜」讓共軍席捲江南呢？請看周宏濤回憶：「閻錫山組閣之前，先到台灣晉見蔣介石。蔣介石指示：軍事方面，東區沿海以舟山、台灣、瓊州、長山四群島為基地，向沿海各省發展；西區以甘肅、青海、四川、西康、雲南、西藏為基地，向中原發展。財金分為三區，以重慶接濟西南、西北各省；以廣州接濟華南各省；以台灣接濟東南各省。上海、青島等沿海重要港口，對內外正式宣佈為作戰地帶，陸海空交通實施封鎖。政治方面，加重地方政府權責，中央應劃區督導與輔助，不宜集中。非常委員會方面，東區、西區各設分會，東在台灣，西在重慶。以及肅清政府統治區域內黨政軍社各部份共匪之第五縱隊」，「江靜輪駛返定海，新任浙江省主席周岳及段軍長自甬縣坐機帆船來見，蔣介石對防務方面指示頗多，以求保住浙東」(十一月九日)蔣介石決定趕赴重慶，堅守大陸最後一片國土——西南各省」(十一月廿八日夜)爆炸聲不斷，黃少谷數次

請蔣介石離渝，但蔣介石認為，多留一天就有十天的效果，而堅持要在重慶留到最後一刻……飛機離地的一刻，已可見得有共軍持槍向我們射擊」(一九五〇年四月廿七日清晨)我突然接到命令要隨蔣介石飛往舟山群島，這趟秘密行程極為危險，有遭中共軍機襲擊的可能」(17)。周宏濤追隨蔣介石左右十五年，歷任侍從秘書、總統府機要室主任、國民黨中央副秘書長等要職，在中華民國最動盪的時期，他在蔣介石身邊親眼見證了蔣介石的榮耀與苦楚。基於侍從室人員守分守密的紀律約束，他從未論述過中樞機密，直至他臨終前幾個月，深感應該為歷史留下見證，才口述了這部回憶錄，其內容主要取材於幾十年的日記，真實性是無可置疑的。從上述記載可見，在危急存亡之秋，蔣介石仍然竭力希望保有大陸部份江山，並非李宗仁所說他於下野之前就已打算放棄大陸。此後閻錫山確實遵照指示，全力保衛華南並且下令封鎖淪陷區的港口，派空軍轟炸各個港口，多艘不顧禁令停靠的外籍輪船因此受損；在外交戰線，向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提出控蘇案，終於獲得通過。這一切盡皆彰明昭著記於史冊，絕非一部私人口授傳記所能抹煞的。

五、利祿薰心 既不能命又不受命

李宗仁口授自傳時稱：「說我們桂系有意要逼蔣出國，這全非事實」，又說亥敬電「只是向蔣先生作極溫和的建議」，埋怨京滬港新聞界「故意以猜測之詞，寫出許多聳人聽聞的新聞」。(18)事實上，就在他的《回憶錄》裏，李宗仁自供一九四九年五月，他派閻錫山赴滬向蔣提出六條方案，作為他離桂飛穗主政的先決條件，其中第六條係「希望蔣先生暫時出國赴歐美訪問，免礙軍政改革」(19)，無異自擱巴掌。

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珍本和手稿圖書館所藏張發奎檔案微卷中有一份標明「極機密」的文件，係一九四九年四月廿九日至五月一日，張發奎飛桂林時與李宗仁、甘介侯、韋永成等會談兩次的記錄，最後訂定甲乙兩案，甲案要蔣出洋，乙案要蔣交權。前者六條中最重要的一條是「對x(指蔣)表示一明確的態度，務使其將全部資本交出，包括政權、軍權、財權及一切金銀、外匯、物資、軍械等，最好能促其出國」。另一份密件是五月二日李宗仁與白崇禧、居正、閻錫山

等在桂林夜談的《談話記錄》，不僅要索取全部權力，而且要求蔣介石「去國愈快，離國愈遠為最好」，這份密件油印僅數份，寄交陸軍總司令張發奎一份、行政院院長何應欽兩份、派專機送蔣介石一份，可以視為對蔣介石的一紙通牒。(20)對此，白崇禧表示完全支持，他說：「同老蔣攤牌，本來就是我一貫主張。」(21)

李宗仁的親信、國民黨中常委程思遠則有如下回憶：「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初，我正在武漢，白崇禧對我說，不久以前，梅貽琦、晏陽初、盧作孚聯袂從寧、滬經漢口入川，根據他們反映，寧滬和談空氣高漲，盼武漢方面有所行動。白打算把西南各省民意機關首腦邀來漢口，共同發起一項呼籲和平的運動，目的在逼蔣下台。」(22)

周宏濤回憶說，一九四八年國民大會選舉總統前，蔣介石原打算提名無黨籍的胡適出任總統，但馬上遭到白崇禧的壓力，表示如果蔣介石不願擔任總統，那就由李宗仁來幹好了，蔣介石乃不得已放棄提名胡適。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廿八日，閻錫山晉見蔣介石，轉告李宗仁主和並要求蔣介石下野之意，閻氏轉交的寫著和談條款的用紙，是以「副總統用箋」繕寫的，這已表明了李宗仁在促使蔣介石下野過程中所扮演的積極角色。日後白崇禧致蔣電有「此項因職主和對於黨國所受之精神物質之損失，實非如此輕易可以卸責也」等語(23)，總算是天良發現。

時隔十六年多，白崇禧接受中研院近史所陳存恭教授訪問時坦言「我認為李代總統指揮不靈，提議總統復職。我再徵求李意見，李同意了。我們打電報給總統，派吳忠信專機去見總統，總統答應了，到重慶來了。總統到重慶時，李不同我講，竟飛昆明去了。這人既不能命又不受命，利祿薰心，避不見總統。我曾打電報要他回來，他回電說視察未完，不肯到重慶來，此事就擱淺了，而大陸軍事逆境，終於無法挽回」(24)。

六、白崇禧遵中共指示不戰而退

李宗仁說「白崇禧是內戰局勢逆轉以後，態度最堅決、信心最堅強的將領」(25)。這也是欺人之談。解密檔案顯示，白崇禧在通電逼宮後十九天便「派黃紹

竑從武漢乘專機秘密飛香港，將他致李濟深信函託民革駐港負責人黃琪翔轉予中共駐港負責人潘漢年轉達毛澤東，講白崇禧『反蔣早具決心』，請中共中央轉知中共華中局與白達成軍事諒解，並商定以後共同作戰計劃。黃對潘說『白已決心和平，與蔣系已成敵對，但桂系軍力在華中只及蔣系的三份之一，程潛雖可聯合，但若得不到中共的配合，仍無成功的可能。』蔣介石下野後一週，白派代表李書城往鄭州見共方中原野戰軍負責人，基本同意毛澤東所提八項條件，只是感到宣佈戰犯太多，他本人不應包括在內。他仍願意聯合共軍對蔣系作戰，希望中共同意不改編他的軍隊，並能讓他參加聯合政府。三月卅日中共中央軍委電示



白崇禧(左)和李宗仁

二野劉、鄧並告陳毅：我們決定聯合李、白反對蔣黨，決定要白讓出花園口以北地區……如守軍南撤，則不要攻擊或追擊……待東北(四野)主力到達後，再通知白崇禧連同漢口、漢陽等地一齊有秩序地讓給我們。四月十日白崇禧電共方稱安慶桂軍撤退暫有困難，請中共暫留該地勿攻，以待和平解決云云。是日中共中央電劉伯承、張際春、李達並告總前委，令前線停止對安慶的攻擊，彼此暫維現狀。」(26)從後來白崇禧不戰而退的記錄來看，他基本上是按照中共指示喪師失地的。

李宗仁在徐蚌會戰前力主白崇禧統一指揮黃淮平原戰區，反對分割成華中、華東兩個剿匪總部，這也是他過高地估計了白崇禧的能力。早在一九四七年，國軍在華北節節取勝時，白崇禧調動華中剿總十二個整編師加上保安團隊共計卅多萬人馬，在大別山清剿共軍三個多月，卻不曾見到一個連以上的共軍，但是

所有通往大別山區之外的大路竟全被撤往黃泛區的共軍破壞得寸步難行。一九四八年七月，徐蚌會戰的第一炮還未打響，而鄂北的重鎮老河口、襄陽、樊城卻接連被共軍攻佔，坐鎮襄陽的第十五綏靖區司令康澤一再呼救，無奈白崇禧派去救援的整編第七師的行軍速度卻比烏龜都慢，以致於襄陽城破時康澤被共軍陳賡部生擒，導致襄陽北面的南陽、新野陷於孤立。同時也使共軍在渡長江前就能早早地進佔荊門，進而控制宜昌；更使後來國軍西撤的退路被共軍先期佈置好了障礙與封鎖線。總之一九四八年下半年華中剿總轄下平漢線上所發生的敗績，要比津浦線上所發生的敗績提早了一百天。而襄陽失陷後，孤立了四個月的華中剿總副司令張軫竟獻城投共。白崇禧接獲參謀總長顧祝同的密電，命令將張及師以上軍官扣押解送廣州審訊，白氏卻故意放縱張軫乘隙逃離武昌，讓他拉走三個師兩萬餘人叛逃。此舉打亂了華中剿總保衛武漢的部署。而華中先敗的惡果或多或少影響了徐蚌會戰的失利(27)。據白的副手、華中剿匪總部副總司令宋希濂回憶，黃維兵團被圍困在雙堆集時，中樞急調宋部第二十、廿八軍從鄂西北開往武漢待船東下增援，白崇禧則下令運輸司令部不准運兵。國防部三令五申白才讓第二十軍調走，但又竭力阻撓第二軍東下，還派警衛團將輪船看守起來，顧祝同、蔣介石的電話都被他頂回去，且命令第二軍返回沙市。結果，黃維部十多萬人與杜聿明所率兩個兵團全部被殲。宋希濂認為，抗戰勝利後李、白力主戡亂、反對和談，是爲了讓中央軍與共軍打得精疲力竭，兩敗俱傷，桂系便可從中取利；不讓張淦兵團與宋希濂兵團東下解圍，就是希望中央僅剩的主力部隊在徐蚌地區被消滅，到那時蔣介石非下台不可，李宗仁便可取而代之(28)。

七、西南大撤退白崇禧毫無作為

徐州剿總前進指揮部中將副參謀長文強在回憶中也述及，杜聿明西撤前曾向蔣介石獻三策，其上策係把白崇禧在武漢控制著的十幾個軍調到徐州戰場，來一個主力作戰，定能打垮共軍，可惜白氏按兵不動，結果是全軍覆沒，而白崇禧也沒有保住武漢。(29)

回顧西南大撤退的往事，白崇禧這個華中軍政長官也是有愧職守的。據華中戰區一位汽車兵團主管回

憶：「桂林爲廣西省會，又爲白長官之故鄉；且白長官所統率的部隊，除黃杰兵團外，其餘如夏威夷兵團、張淦兵團，都是廣西系統的基幹部隊，在天時、地利、人和上，大家都希望白長官能有所作為，在湘桂線上能與共軍來一場大決戰，藉以挽救西南之危局。豈知白將軍徒有小諸葛之虛名，雖擁有數十萬大軍，卻始終舉棋不定，毫無作為。在駐節桂林一個多月的時間內，不但對軍事部署上毫無積極的準備，且在撤退上亦乏消極的整備，故於共軍攻佔廣西全州時，又匆匆從桂林向柳州撤退，處處居被動挨打狀態。當時白長官對許多配屬的部隊似乎採取不聞不問的作風，不但撤退時得不到命令，連他的企圖也搞不清楚，因之，我們這些汽車部隊、通訊部隊、工兵部隊、炮兵部隊、憲兵部隊等部隊長只好憑自己個人的關係，與長官公署的有關幕僚單位主動協調聯絡，而決定行止」，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晚上，長官公署向南寧撤退前並未通知下屬單位就撤除了電訊總機，倉猝出發，但見「沿途人山人海，公路上人潮洶湧，故車行甚緩，駛到遷江渡口已日落西山，前面車輛長龍估計達二千五百輛之多，延綿數公里。碼頭上僅有渡船兩艘，每次只能裝載大卡車兩輛過江，一次來回需時十分鐘，每天最多裝運二百輛，我們兵團的車輛要輪到上船渡江，恐怕要輪半個月。我於失望之餘感慨萬千，深覺高級將領們平時作威作福，不作未雨綢繆，既欲撤退，爲何連後方交通幹線的渡橋也不預先搭建呢？像遷江這樣僅有幾十公尺寬的江面，搭一座可載汽車通行的便橋，乃是輕而易舉的事，假若預作準備，至少可以爭取十天時間……本兵團的汽車陸續渡過四百五十輛，尚有七十輛停在岸邊待渡時，共軍追兵已步步逼近，相距僅二三千公尺，步槍聲已清晰可聞。在此危急情勢下，只得決定將未及過渡的車輛澆灌汽油予以焚毀，頓時濃煙蔽天，未過渡的部隊爭先搶渡，幸渡口尚有一條用汽油空桶搭成的人行便橋可以通行。我於放火燒車之後，跟著後衛部隊剛步過橋頭，便橋即被擠斷了，以後許多駕駛兵及部隊便紛紛游水過江，凡不善游水的都要陷身敵後了」「到南寧才知長官公署已於昨日全部遠飛海南島，連一個指揮所也沒有留置。於是幾十萬大軍沒有指揮中樞，猶如群龍之無首，只能各自逃生。距南寧三公里又相隔一流江水，江邊亦早已擺著長龍，與遷江渡口一樣只

能竟日在渡口苦候。俟共軍逼近南寧，城郭的飛機已開始破壞，遙見火光衝天，我兵團車輛已過江的僅三十餘輛。無可奈何之下，只好率已過江的車輛向欽州方向前進，但車行數十公里後，前面又橫隔一條小江，僅一艘渡船；等到午夜忽然槍聲大作，大家趁夜色急忙躲到山坳裏，等槍聲停息回來，才知剛才放槍的是廣西土共，已把車上的所有物資洗劫一空。我回到渡口即決定將所有車輛都棄置於此，遂即乘夜渡江，黎明前又聞遠處槍炮聲，於是又急行軍飛奔，同行百餘人大都被衝散，下午三時將到達離欽州不遠的小董鎮時，我身邊只剩下一名營長和兩位排長了。捱到深夜才易服裝扮難民入鎮……」(30)一個汽車兵團在短短半個月就損失全部五百多輛美製卡車，人員只剩下四員，由此可以想見白崇禧幾十萬大軍覆滅的慘況，這一切都能歸咎於蔣介石嗎？

八、信口雌黃 損人害己

李宗仁的所謂「厲精圖治」又怎麼回事呢？據一位參與密勿的桂系高官回憶，「在每次『御前會議』之時，他更顯得十分萎靡，任由與會人員說來說去，他只有呆在那發愣！有時勉強抖擻一下精神，插進幾句話，也常不得要領，有時甚至走到旁邊沙發上躺一會，又茫然地回到座位上，然後問大家究竟有什麼決定？」「最令人不解者則是政府播遷到廣州之後，軍費的開支還是按照正規官兵五百五十萬員額計算，許多部隊早已整個潰散，但空額番號猶存，聯勤總部照常向國庫支領糧餉。後經財政部與聯勤總部多次會商，才算減少了五十萬名額，仍按官兵五百萬員發付。這一舉措曠古未聞，且破了歷朝軍隊中『吃空子』的紀錄。這麼多的糧餉究竟去了哪裏？大部份進了少數人的私囊。經手人員從國庫的前門把一箱箱剛印好的金圓券抬出來時，若非馬上在路邊換成美鈔銀元，便是抬進小銀行、錢莊，變成金條。中共特別收買了一大批人專做這一類政治找換生意，使金融更見混亂，金圓券貶值更爲迅速。還有一種舞弊弄錢的方法是，經理人員與糧商勾結開設糧店供應軍糧，僅購進少數食米作爲籌碼，用大卡車由前門裝進軍營，再於夜間從後門悄悄運返糧店，這間糧店便變成了聚寶盆，因而財源滾滾。即使上峰派員清查也是徒然。更

駭人聽聞的是中共直接或透過土匪向軍械庫購買槍彈，大批固所歡迎，少致三五枝也有交易，結果國軍的武器便如此源源不斷流到共軍手中。那時有幾處軍械庫的爆炸，就是管庫人員消滅證據最毒的手段。有人將這些事情向李宗仁報告，照例他總是那麼狠狠地咒罵幾句，結果也只有深深嘆一口氣，表示絕望。他對人說，不是他不想幹，而是沒人替他去徹底執行命令。」爲什麼令行不止呢？「士兵們衣不蔽體，食不果腹，一張軍氈之外別無長物。一日兩餐，飯是砂石鼠糞加上碎米，下飯之物只有連根青菜一碗，辣椒一碟，用面盆盛了一盆醬油水，加上兩片菜葉一把辣椒」(31)，用這樣的軍隊，焉能有效「防堵」共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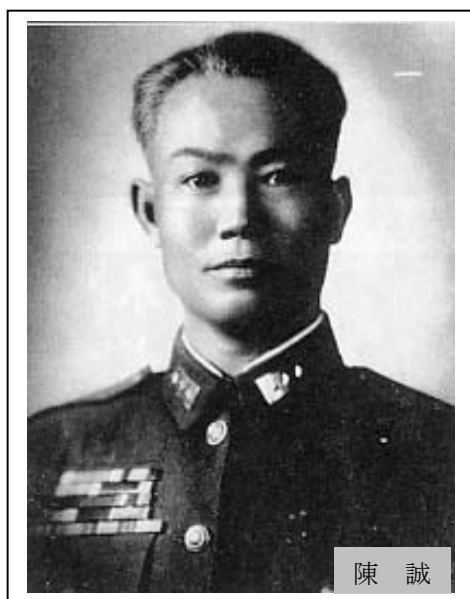
左傳有云：「禍福無門，唯人所召」。李宗仁逼宮前曾致函美國總統杜魯門，稱國府處於當日的窘境，是由於行政不良，而非美援不足。於是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美國國務院發表《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白皮書，引用李宗仁這位中國軍政大員的自供，把中國代議政制的失敗完全歸咎於中華民國政府與蔣介石，旨在推卸一切因馬歇爾偏袒中共而貽誤戡亂戰事所應負的巨大責任。這本白皮書對中國局勢的影響是立杆見影的，不單美國眾議院否決了對華援助款，導致美援就此中斷，最令人沮喪的是國軍將領固守廣州的決心也爲之動搖。(32)李宗仁的信口雌黃、深文周納，以損人開始，而以害己告終。

上述事實足證李宗仁奸同鬼蜮、行若狐鼠，所以對他那洋洋灑灑六十萬言的口述自傳自可見微知著、洞燭其奸。例如李氏把桂系治理二十年的廣西吹噓成「三民主義的模範省」，行政效率爲全國各省之冠、教育與經建齊頭並進，全省一片新興氣象云云。事實真相又如何呢？

九、李宗仁、白崇禧吮吸兵血，開賭販毒

二〇〇二年九月，北京文史出版社推出一部精裝三千五百萬言的《文史資料存稿選編》，其中第十八輯選載了李、白舊屬七十六人所撰回憶錄六十八篇，無情地戳穿了李宗仁的連篇鬼話。國防部保密局廣西站玉林組組長潘澄清在〈側記廣西兩件貪污案〉(33)一文揭露，一九四六年梧州專員歐仰羲勾結米商走私大米一百萬斤，事被梧州專署保安副司令梁仲西查獲，於

是梁、歐同流合污，將大米充公，由省府及梧州專署官兵瓜分淨盡。這種無法無天、強奪民財的行徑，因歐仰義與省府主席黃旭初是同學拜把關係，黃氏非但不予追究，還調升歐為廣西田糧處長要職。共軍入邕前，歐仰義挾帶公款黃金數千兩乘飛機逃亡香港。玉林專員羅活販賣鴉片，儲藏於玉林城內九曲巷。一九四八年冬，玉林禁煙處處長陳偉民派查緝官兵十餘人前往搜查。羅活聞訊命令參謀主任陳國名率兩連保安隊趕至，在所有制高點與交通要道都架起機關槍。陳偉民的後台是李宗仁，羅活的死黨是白崇禧，結果此案不了了之，三千兩煙土被羅活運走，羅活從少將升任中將。廣西桂林市長韋瑞霖所撰〈新桂系在廣西大開煙賭〉(34)一文中披露，大陸淪陷前，新桂系頭目大開煙賭加緊搜刮。黃旭初乘機設立禁煙督辦公署，並在大小城鎮設立分署、分卡，其主管多半是黃旭初、韋雲淞的親友，名義上禁煙，實際是開煙縱煙，鼓勵農民種植鴉片，強迫徵購徵稅，每斤煙土收購價五元大洋，運至外省與港澳可賺十幾倍，一年內銷售煙土三百六十箱，所得俱充私囊，成為一九四九年後黃旭初、



韋雲淞、民政廳廳長李新俊等人 在香港做寓公的化銷。一九四九年夏，黃旭初還示意財政廳廳長韋贇唐以徵收娛樂捐名義開賭，南寧、梧州、柳州、桂林四大城市每月可收賭捐三萬大洋，小縣也有三千元，開賭五個月收入不菲。韋贇唐還把廣西財庫的金銀外幣攜至香港私吞，黃旭初對他無可奈何，因有把柄被對方抓著。華中軍政長官公署桂北縱隊參謀長陽光宇所撰〈新桂系崩在武漢的搜括〉(35)一文揭示，白崇禧利用金圓券急劇貶值的機會，以私人名義向中央銀行透支幾千億金圓券，用以兌換黃金，三個月一期，到期仍以金圓券歸還，從中套取了大量黃金。據金圓券的推手、當年的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部長王雲五回憶，金圓券發行後「共約收到美金四——五億元之間……當時上海收兌者均送中央；平津、廣州各(上繳)一部份；武漢，則為當地軍人扣留，並未解繳。」(36)白崇

禧日後赴台盡情淫樂、耗卅五萬元褻玩民社黨主席傅榮之妻，還服食春藥同西門町易怡整型醫院一名張姓妙齡護士玩「援交」遊戲以至脫陽而死(37)，靠的都是這類民脂民膏。李、白還以籌餉為名，提取武漢、上海商人存放的大批棉紗、直貢呢、汽油、酒精運往廣西換取黃金。僅華中剿總經理委員會主任唐紀一人就攜黃金三千兩逃往香港。李、白吮吸兵血的另一手段是，新桂系各軍的軍需處長向中央領得軍餉後，都要到剿總經理委員會集中辦公，由唐紀扣除三至四成才能轉發各部隊。名義上是截留充足公積金，實際上進了李、白的私囊。李宗仁誇耀白崇禧清廉，是惡人互相抬轎。李宗仁本人將國庫公帑數百萬大洋偷至美國，迄今未予歸還。(38)像這樣對下級官兵敲骨吸髓的軍閥，能指望廣大士兵為他倆拼死作戰嗎？

十、日酋坦承抗日力量以黃埔軍人為核心

李宗仁對政敵的恣意醜化，表現在拾中共之餘唾誣指蔣介石「應付失策，抱不抵抗主義」「挾寇自重，對日寇持不抵抗主義」(39)。設若蔣介石「抱不抵抗主義」，八

年抗戰中，國軍怎會死傷官兵三百廿一萬六千多員？陣亡將官二百零六員，包括集團軍總司令兩員、軍長八、副軍長二、師長十九，以上三十一員全係國民黨黨員，都是中央軍嫡系，全部殉國二百零六名將官也全係國民黨黨員。從四萬多次戰鬥中規模最大的廿二次戰役來看，其中打得最激烈的是淞滬會戰、台兒莊大戰、武漢會戰、長沙三次會戰、常德之戰、衡陽戰役、入緬之戰，中共的八路軍、新四軍均無一兵一卒參加；廿二次會戰中，八路軍只參加了太原會戰，也只是打側面，並未擔任主攻，故損失甚小。

從敵方檔案看，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於一九三九年曾說：「看來敵軍抗日力量的中心不在於四億中國民眾，也不是以各類雜牌軍混合而成的二百萬軍隊，乃是以蔣介石為核心、以黃埔軍校青年軍官階層為主體的中央軍。在歷次會戰中，它不僅是主要的戰

鬥原動力，同時還嚴厲監督著逐漸喪失戰鬥力意志而徘徊猶豫的地方雜牌軍，使之不致離去而步調一致，因此不可忽視其威力。黃埔軍校教育之徹底，由此可見……有此軍隊存在，要想和平解決事變，無異是緣木求魚」。(40)

李宗仁一再侈言蔣介石「聽任敵人蠶食」「一味拖延」，然他無視以下鐵的事實：九·一八以後四個多月的淞滬抗戰，斃敵近萬，迫使日寇三易主帥；一九三三年三月長城抗戰、一九三五年的內蒙百靈廟大捷，都是蔣介石親臨前線指揮的。李宗仁屢次以《塘沽協定》、《淞滬停戰協定》來羞辱蔣介石，卻不論及當年中日雙方力量的對比，猶如一名羽量級拳手與一名重量級拳師對陣。敵人是頭等強國，有配備近二百萬噸兵船的海軍，有配備兩千七百架全天候飛機的空軍，有四百五十萬訓練精良、裝備充足的陸軍，而我們這個衰老的大國，海軍僅五萬噸兵船，空軍僅三百架舊式飛機，陸軍僅有二百萬未受教育的士兵與不懂現代戰術的指揮官。雙方裝備之懸殊更為驚人：日軍一個師有五千多匹馬、五百輛汽車，步槍每人一枝，但國軍每師只有三千八百枝步槍，既無坦克，又無陸空協同，多數師沒有大炮。我們的士兵往往在戰場上遭遇到敵軍坦克時，才曉得天下竟有這種新式武器。也正是塘沽協定與淞滬停戰協定的屈辱，換來了八年的時間，使中國練成十個師的精兵，組建了一支小型空軍，儲備了應付突襲的彈藥軍火。就以上述力量，國軍在八·一三滬戰、南京保衛戰、武漢空戰同日寇硬拼，斃傷日軍近卅萬。據日軍防衛廳發表的戰史叢書，八年內日軍損失四十多萬人，其中半數以上是抗戰頭兩年諸役造成的。譬如南京之役日軍第十八聯隊共傷亡四千二百人(包括增補人員)，而該單位定額僅三千五百人。

十一、西安事變破壞了整個抗日部署

早在卅年代初期，蔣介石就一再指示參謀本部次長賀耀祖加快國防建設，至全面抗戰爆發前的一九三七年二月，全國各地已築成機關槍掩體、小炮掩體、觀察所、掩蔽部等各類工事三千三百七十四個。

一九三四年在國民黨四屆四中全會上，蔣介石指示國民經濟中心逐漸西移，建設不受海上敵國出入口

的封鎖，還陸續下令建築武漢、青島、濟南等地的要塞工程；同年將航空署改為航空委員會，提出「航空救國」的口號，購買飛機、興建飛機製造廠、建設機場、實施防空訓練。這一切表明蔣介石以勾踐臥薪嚐膽精神激勵自己，進行抗戰準備，同時建設西南基地，對外廣交朋友聯絡盟國。這些都為後來的抗戰勝利打下了基礎。

「以當時中國的實力，面對日本那樣兇狠狡詐的強盜，不可能有什麼錦囊妙計，能夠在短時間內，使中國立刻擺脫屈辱揚眉吐氣。它只能是一個漫長而艱苦的過程。在劫難逃的中華民族，只有經過煉獄般的磨難，才有可能重獲生機。為了整合內部力量、調整對外關係、加緊國防建設，有一些暫時的妥協、作出一些局部的犧牲，儘量避免正面的、直接的交鋒，特別是避免大規模的軍事衝突，不給無事都要生非的日本強盜以擴大侵略的口實，都是無可厚非的。抗戰初期失陷的地區還遠遠大於早些時候準備在錦州和天津所作的退讓，也說明了這一點。當國者也不可能一碰就炸，動不動就破斧沉舟，在準備很不充份的情況下輕易決策，舉一國之生命財產投入戰爭之中，而沒有絲毫的遲疑、猶豫。如果是這樣，反而是不可想像的。」(41)

九·一八後中國政府對強敵暫時的妥協，包含了弱國面對強國時的無奈與不得已，它是一種政策，也是一種謀略。蔣介石一邊呼籲全國忍耐，一邊暗中制訂了抗戰到底的戰略目標——調精兵第五軍至上海參加一·二八抗戰，調十三軍入綏遠收復百靈廟，調關麟徵部參加長城抗戰，還計劃反攻商都和察北，以肅清綏遠敵軍，進而鞏固整個西北之門戶。不幸西安事變將整個計劃破壞無遺，一切國防大計、經濟建設等均因此變亂而延緩或停頓，卻使得日人提前了全面侵略中國的時間表。西安事變之前，鑒於濟南慘案之痛，中樞曾有訓練卅六個師的計劃，冀以此新軍作為抗日基本力量。當時訓練計劃由德國顧問協助進行，裝備彈藥也向德國採購。西安事變爆發時，整訓的軍隊只完成了三份之一不到，訂購的軍事設備大部份未運回，甚至連預備囤積起來打半年仗的糧秣彈藥也只儲下不足三份之一數量。假如抗戰的爆發再延遲五年，徵召的新兵已經練成，工業建設與備戰工作初具規模，到那時才開始全面抗戰，斷不至於損失公私財

產一千多億美元(一九三七年幣值)、十億畝土地破壞六億畝、沿海地區工業全部毀滅。

十二、真正奉行不抵抗的是美英法蘇

備戰工作未曾就緒便輕易開戰的後果是：抗戰頭兩年陸軍精銳犧牲殆盡，雛型的空軍損失逾半，海軍艦艇幾乎全部在馬當自沉以封閉長江。是故每次戰役國軍損失都兩三倍於日軍。長城抗戰時，國軍士兵往往沒見到敵軍的影蹤，就整排整連地葬送於日軍凜冽的炮火之中，就這樣，蔣介石還是派兵入熱河與日寇決一死戰。承德失守後，他急電宋哲元、萬福麟部反攻，將原來儲備軍官的教導總隊全部投入戰場，行前向他們訓話，囑他們個個抱必死的決心，不許貪生退卻。馬當要塞失守前，檢閱守軍的德籍顧問即有報告云：「機槍迫擊炮全係廢鐵，步槍堪用者不及半數」。一九三八年史迪威任美國駐華使館陸軍武官，曾親睹江西德安之役，有一個步兵團，全團只有輕機槍四挺(應配備一百餘挺)，每挺僅配備子彈二百發，十分鐘內即射完。但這個團仍向日軍攻擊，激戰五晝夜後全團一千五百人戰死六百負傷五百，剩餘四百人奉命退卻。在某些戰場，國軍陣亡人數是日軍的二十多倍。據日軍大本營一名大佐估計，國軍總數一度低至九十萬人，以後全賴吸收各地保安團隊以及徵調農民，故素質每況愈下，即使後期維持兵員三百萬也只擁有步槍一百萬枝，即以最基本的輕兵器彈藥來說，每月使用原料三百噸也全賴美援空運，而那時大後方全年產鋼僅一萬三千噸。(42)衡陽巷戰時，國軍是用舊式的刀矛來對抗日寇的機槍大炮，事緣苦戰兩三年後，庫存彈藥耗盡。一九四〇年六月法國維希政府封閉滇越鐵路，七月英國封閉滇緬公路，我國對外交通完全斷絕；九月法國讓六萬日軍假道越北進攻滇桂，德意簽訂同盟，蘇日互不侵犯，造成歐陸各國均支持日本而僅中國孤軍抗日的窘境。那時美國運廢鐵支持日本的軍火工業，然而國軍有錢買不到武器，買到了又運不回來，真正奉行不抵抗主義的正是現實勢利的美英法蘇等國。在長沙會戰、衡陽之戰中，國軍官兵士氣高昂，可是當日軍違反日內瓦公約施放毒氣彈時，即使國軍士兵個個勇如「蘭保」都無濟於事。敵軍若非使用糜爛性毒氣，絕不可能強渡耒河。戰後，

在衡陽地區撿拾的國軍頭骨達五萬餘顆，這還能說蔣介石「消極不抵抗」嗎？

十三、李、白開門揖盜引狼入室

在當時的高級將領中，親日賣國者的確大有人在，李宗仁、白崇禧本身就是開門揖盜、引狼入室的禍首。一九二九年一月李宗仁悍然違反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決議(不准以政治分會名義任免該特定區域內之人員)，以武漢政治分會主席名義，免除湖南省政府主席魯滌平職，還派兵入湘(李宗仁本人出席的編遣會議通過決議：非得編遣委員會命令不得擅自調動軍隊)，白崇禧則在河北陰謀響應，李氏坦承「白崇禧被迫離津，秘密乘一日輪南下。然中央對白崇禧志在必得，乃密令上海衛戍司令熊式輝待該日輪抵滬時將白逮捕；如該日輪拒絕搜查，則令海軍炮艦將其擊沉。這一消息為白之舊部、上海市市長張定璠所悉，乃將此事洩漏予余妻郭德潔。她遂商諸桂系第四集團軍駐滬辦事處同人，同往日本輪船公司交涉，由王季文搭乘另一南下日輪，在吳淞口外以信號使白氏的船停航，健生乃得換上此一日輪逕駛香港。王君則乘白氏的輪回滬」(43)。

日本帝國此一富有遠見的政治投資自然是收到實效的。據廣州市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鍾卓安教授所撰二十五萬言《陳濟棠》一書揭露，早在一九二九年「日本軍部便通過親日派的蕭振瀛、王乃昌與李宗仁、白崇禧取得聯繫。一九三一年陳濟棠聯桂反蔣後，李宗仁即派王乃昌到香港與日本駐港總領事原田等來往，日本駐廣州領事清水、武官和知中佐也經常出入位於廣州東山馬棚崗的李宗仁官邸，且赴南寧見白崇禧。而後，雙方接觸日益頻繁。」連李宗仁在回憶錄中都承認：「九·一八以後兩三年內，日本軍政商學各界要員來我私邸訪問的，多至百餘人……都是後來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中的要角」(44)。桂系方面既派人到日本學習飛行技術和購買軍火，也聘請日本軍官前來廣西軍官學校、民團幹部學校、航空學校等軍事教育機構出任教官、助教和顧問等。：「陳濟棠利用李、白的渠道，同樣向日本購買軍火和接觸官員，還派中校以上軍官多人和廣州警務人員多名，分別到日本、台灣進行軍事和警政考察。一九三五年

初，日本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南下廣州與李宗仁、陳濟棠密商兩廣出兵倒蔣，日本則出兵華北以牽制蔣介石兵力，使他無力南顧兩廣兵事，從而使陳、李兵力能順利由湖南經武漢而東下南京。按日本的意圖，如果南京中央政府易手於親日的兩廣實力派，日本則可輕易佔據黃河以此。據李宗仁的參謀長張任民回憶，李宗仁當時默認了日本這一陰謀，土肥原因此從廣州到了廣西，並在與白崇禧商妥協議後，滿意而去。土肥原一走，白崇禧便積極準備以『抗日救國』為名的反蔣軍事行動。『六·一』事變後，陳濟棠又請來一百多名日本軍官，住在廣州新亞酒店和沙面某旅館，請他們分赴東江、北江地區和廣州天河機場視察軍事，還擬派他們出任廣東陸海空三軍顧問，以協助指揮反蔣戰爭，甚至派陳中孚、潘宜之赴日本，要求日軍進佔華北、騷擾閩南，藉以牽制南京政府。顯然，西南的抗日反蔣運動之『抗日』是假，反蔣是真。為了推翻中央，他們甚至不惜『聯日』的本相，在此昭然若揭……日本駐華領事館武官喜多誠一少將對報界談話中，都居然承認桂省軍隊內有日本教練，也不否認對桂出售軍火……因此可以說，正是日本人的支持與慫恿，增強了陳濟棠他們的反蔣勇氣，甚至敢於在自己的旗幟上塗寫『抗日』的字樣。」(45)

十四、多宗「抗日反蔣」事件都由胡漢民操控

廣東省興寧縣政協文史委員會一九九〇年推出的《李潔之文存》也證實了兩廣軍閥勾結日寇背叛國家的卑劣行徑。李文提及桂系軍閥李宗仁、白崇禧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就勾結日寇，一九三二年秋，日本軍部曾派日輪兩艘滿載軍火、飛機駛入黃埔交給桂系接收；廣東軍閥陳濟棠則於翌年接受日本軍部贈給的村田槍、毛瑟槍一千枝，子彈二十萬發，還有幾門山炮。凡此都說明，李、白、陳與日本軍閥勾結由來已久，所謂「抗日救國」云乎哉，實係掩耳盜鈴。李潔之還揭露，一九三六年陳濟棠叛亂前，先派其兄陳維周與日本駐穗領事聯絡，經日方表示支持後，才揭櫫「反蔣抗日」大纛。六月二日，李、陳以「抗日」名義公開發動叛亂後，陳濟棠禮聘日本軍官百人分派到陸海軍充任顧問，其中卅人飭由廣東空軍司令黃光銳派員帶領到天河、白雲兩機場視察設備情況，引起空

軍官兵極大憤慨，遂種下了日後黃光銳率部起義歸順中央的因由。(46)

李潔之早年曾任孫中山大元帥府警衛團連長，歷任虎門要

塞司令，廣州警察局長、四戰區中將兵站總監等職，一九四九年在興梅地區保安司令任上降共。一九五七年因言論獲罪戴上右派帽子。四人幫覆滅後平反復出，當過五年廣東省政協副主席(1983—1988)。他是經歷辛亥、反袁、護法、北伐、抗日、戡亂諸役的「活字典」，其回憶錄是可信的。

李、白、陳等武人利用「抗日」作為打擊蔣介石的口號，「日本軍閥看到中國唯一能統馭大局的領袖都被迫下野，看到中國政局動蕩、團結無望，便在北方放膽進攻錦州，又在南方製造事端，掀起淞滬之戰，這便是胡漢民、陳濟棠、李宗仁等人的傑作。」(47)

李宗仁除了渲染「陳濟棠聯絡廣西發動請纓北上抗日」(48)，還製造了蔣介石對胡漢民「因一言不合，即加以監禁」的謠言，進而抨擊蔣介石「獨裁，目無綱紀。」(49)

從哈佛燕京學社圖書館保藏的胡漢民晚年往來未刊函電可知，九·一八事變後，胡漢民曾廣泛聯絡各方力量，秘密組織「新國民黨」，積極謀劃以軍事行動推翻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卅年代的許多所謂抗日反蔣事件，如察哈爾「抗日」同盟軍、閩變、孫殿英西進、陳濟棠兩廣事變等，背後都與胡漢民有關(50)。一九三二年九月，胡氏派曹四勿赴泰山，發展馮玉祥加入新國民黨，並提供經費一百萬。馮部吉鴻昌、方振武攻打中央控制的冀東，胡漢民即以廣東後



援會名義撥給方部軍費五萬元；一九三四年二月，孫殿英欲西進會同西北軍與紅軍摧毀回教馬家軍，胡氏即電妻兄、西南政務委員會秘書長陳融撥付廿萬元。閩變發動之前，李濟深派其弟濟汶持函會晤胡漢民，要求「督促西南各省同時響應，共同討賊，并對閩中各事隨時加以指導」，可見卅年代地方軍閥反叛中央的行徑，胡漢民無役不與，且都是核心人物。閩變失敗後，日方不斷派人到香港聯絡胡漢民，表示願意提供武器、金錢以支持胡漢民當總統。一九三三年八月，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派唐寶鏗赴粵，表示願意提供軍械並借款五千萬圓供粵方出兵「討伐」中央政府(51)，只因胡漢民死得太快，他沒有親眼見到兩廣軍閥「討伐」中央政府的一幕。他生前所屬意的閩變頭目陳銘樞是得到日方援助的；他死後十九天，陳濟棠發動兩廣事變，那確實是拿日本人的槍炮來屠殺自己同胞的聯日叛國行徑。

一九三一年胡漢民在湯山被軟禁二百二十八日，表面上因為他反對製憲、反對還政於民、反對指定與圈選民代制度、以立法院院長身份多方阻撓與刁難重要法案的審議，以致妨礙了中國向著現代民主和法治前進，但其直接原因與內幕秘辛是外界並不知曉的。

「原來那時當局和德國擬定密約，條約中有兩大條款：

- 第一、用德國教官訓練中國徒手兵二百萬。
- 第二、德國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條約所限，不能製軍火，乃供給機器及技術人員在中國製造槍炮，製成後兩國分配應用。

此項盟約，照例要中國政府五院院長簽署始能生效。遂先徵立法院長胡漢民意見，哪知胡不同意，當局恐事洩，立將胡軟禁湯山。

十五、胡漢民派陳友仁赴日要求出兵東北

為免此事攻敗垂成，總望胡回心轉意，當局擬派一個與胡接近的人，和胡商量，後來點將點到了劉紀文。那知劉見到胡以後，胡便將中德密約和盤託出，詳告與劉，並且叫劉將此中秘密，轉告黨國要人，從速在西南另組政府；並派劉紀文、陳友仁赴日本見首相犬養毅，要其出兵東北。以為如此一來，坐鎮北平的張學良，勢必回師東北，援救家鄉；而馮閻之二、

三集團軍，無張學良監視，即可直搗南京。同時兩廣一、四集團軍，即由衡陽進攻武漢，實行推倒南京政府。

當局知道此項陰謀，乃先為預備，所以西南出兵到了衡陽，看見馮(玉祥)閻(錫山)毫無動靜，亦即回師。西南政府見計劃不行，再請日首相犬養毅撤兵回日，以平民憤；那知被日本少壯派反對，要實行田中奏摺計劃。犬養要維持撤兵信用，雙方堅持不下，遂被少壯派刺殺。

後來胡以中央派赴歐洲考察名義出國，民廿四年返國，中央迭電胡要其回寧。當胡到香港的時候，陳濟棠即親自赴港，迎胡到粵，不惜卑辭厚禮，請胡主持西南軍政大計，一切當俯首聽命。胡不能過卻，那知到粵以後，陳一切均陽奉陰違，中央雖迭電邀胡赴京，胡已身不由主。陳某更以胡游說日本出兵之秘密相要挾，說如胡赴京即公佈此一秘密。胡進退失據，抑鬱憤惋，終致腦沖血以死。(52)

李宗仁的第二副手黃旭初也證實了胡漢民乞求日本帝國援助來顛覆中央政府的陰謀，一九五三年黃氏在日本走訪七十歲的日本經濟復興協會會長十河信二氏時，這位抗戰前奉日本特務機關之命在北平出任興中公司社長的老牌特務承認：「胡漢民先生在廣州西南政務委員會期間，曾親擬〈中日合作安定東亞意見書〉，自己簽名後，交我攜歸日本報告當局。其時岡田首相甚表贊同，而藏相高橋是清則表反對。其理由為：若借款五千萬予中國，幫助華北與西南，一恐引起英美不快，二恐款難得歸還，事遂不成。」(53)

李宗仁在口述自傳中一再吹噓他轄下五戰區「情報的迅速正確，抗戰初期可說是獨一無二」，自詡「大公無私，量材器使」，還借蔣介石之口讚他自己「居然能指揮雜牌部隊」，借龐炳勛之口說他自己「德威兩重」，又說「一般訪客對我的大膽和鎮定都佩服得五體投地」，猶稱「我在台兒莊打了一個舉世聞名的勝仗……使長期抗戰重露一線曙光」……(54)真是貪天之功為己有，不知人間有羞恥二字！李談他「親自指揮全線出擊」贏得抗戰以來這一空前勝利，卻隻字不提究竟是誰的熱血鑄就了這一光榮勝利。倒是日軍大本營的戰史記錄表明，在李宗仁蜷縮於危城徐州、坐以待斃時，「中國唯一的鐵軍」——盧漢所率的滇軍第六十軍急行軍從武漢增援徐州，解了李將

軍之圍，據盧漢回憶：「我軍在昆明出發時原有十二個團，官兵共四萬餘人，經此(禹王山)戰役，傷亡已過大半，僅剩二萬餘人，中上級軍官傷亡亦大，計旅長陣亡一人，負傷一人；團長陣亡四人，負傷三人。經過整編，僅餘五個團(55)」。

五月十五日，李宗仁命滇軍守徐州掩護魯南兵團撤退，叫已血戰廿七天犧牲慘重的六十軍固守隴海、津浦東西南北四面鐵路俱已切斷的孤城徐州，而李宗仁本人早已離徐州，扔下了六十軍，既無反攻布置，又無友軍協助，只是讓盧漢守不住徐州就打遊擊。盧漢極為氣忿，最後經孫連仲同意才隨大部隊後撤。

十六、兩萬滇軍的血肉之軀鑄成了李宗仁的榮耀

滇軍的德式裝備是當時中國最精良的，可惜因李宗仁的無能指揮，命機械化部隊去搶攻禹王山，以致喪失機動能力，造成不應有的慘重傷亡，讓雲南人民用血汗換來的最新式武器丟失近半。一九二五年孫中山病危時，唐繼堯通電就任副元帥，自滇、黔兩省派三路大軍假道廣西前往廣州視事，其前鋒龍雲部與李宗仁的桂軍曾有一場惡戰，事隔十三年，盧漢不念夙仇，十萬火急趕到台兒莊救李，但李宗仁以怨報德，竟將盧漢部推向刀口，借日寇的凜冽炮火來消滅滇軍，致使龍雲和盧漢怒不可遏，種下了一九四九年冬盧漢投共、拆李宗仁台腳的因由，此是後事。李宗仁信口開河，是謂軍閥本性。然而唐德剛自稱「用可靠的史籍、檔案和當時的報章雜誌的記載考據出確信不疑的歷史背景」(56)，實際上卻連蔣介石在三次特電嘉獎慰問六十軍的電報中，以及蔣在給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孫連仲嘉獎電中，曾一再稱他們「以血肉之軀，前仆後繼，不以傷亡慘重稍形氣餒，不惟使台兒莊固若磐石，抑且使抗戰大局轉危為安」等統統一筆抹煞，對六十軍的赫赫功勳三緘其口，真是有虧史德！

李宗仁非但貪功冒功，還要誣陷赴湯蹈火、出生入死的下屬。他說湯恩伯軍團「只消極地掩護友軍退卻和遲滯敵人的南進而已」，「三令五申之後，湯軍團仍在姑婆山區逡巡不進。最後，我訓誡湯軍團長說，如再不聽軍令，致誤戎機，當照韓復榘的前例嚴辦，湯軍團才全師南下，然此時台兒莊的守軍已傷亡殆盡。」(57)中共官營的電影公司根據李宗仁這番調

言，拍了一部《血戰台兒莊》，其旁白云：「湯恩伯軍團長在台兒莊戰危時，一個團的兵力都不願派出支援，旨在保存實力。」為此，在台兒莊戰役任國軍第九十二師五五二團團長的李以勳(後官至一二一軍中將軍長)根據抗戰日記撰文直斥其謬曰：「查二十軍團所指揮的八十五軍、五十二軍和獨立一一〇師張軫部，傷亡近萬，東與阪垣五師團阪本旅團作戰，西與磯谷師團的瀨谷旅團作戰，腹背受敵兩面作戰，而湯恩伯最後爲了顧全大局，終以全力向西側擊進攻台兒莊之敵而迫使敵軍潰退，致使台兒莊大戰勝利。第二集團軍孫連仲部建立主功，湯軍團協攻之功是不可沒的；說湯軍團長避戰是不公平的。湯恩伯出身於日本士官學校，在國軍中是一員戰將，他在南口大戰中立過殊勳，所率的十三軍是能征慣戰的部隊。」李宗仁卻說：「臨沂、滕縣兩役都是台兒莊大捷前最光輝的序幕戰。但是這兩項艱苦的血戰卻都是由一向被中央歧視的『雜牌部隊』打出來的。這些『雜牌部隊』在其他場合往往畏縮不前，但是到了五戰區卻一個個都成了生龍活虎」，藉吹噓雜牌部隊而炫耀自己，電影《血戰台兒莊》也照單全收，李以勳則抨擊該影片「還有一個偏見，認爲臨沂之戰是地方雜牌系軍隊打的，台兒莊之役也是地方系主力打的，顯示了中央系軍隊作戰不力，這一說法及觀念也不公正。地方系善守，中央系善攻，各有優缺。台兒莊大戰兩系軍隊傷亡均慘重，能說中央軍戰力差嗎？如此說法對不起傷亡官兵，也是對不起戰士英魂的。」(58)

十七、湯恩伯監視嚴密使李宗仁無隙投共

李宗仁在共軍渡江前早萌叛志，只因京滬杭警衛總司令湯恩伯將軍監視嚴密，使其無隙可乘，所以趁口述自傳時對湯將軍傾倒大批誣衊不實之詞，說湯徵調民工、視民命如草芥、屢打敗仗、暴戾嗜殺等等，進而指責蔣介石將「國人皆曰可殺者」倚爲心腹。中共百般醜化湯恩伯，是念念不忘第五次圍剿湯將軍指揮八十九師等喋血驛前，鑿兵白水、貫橋五晝夜，掃穴犁庭，使共軍全線崩潰，屍骨積山，流血成河，彭德懷僅以身免，被共軍盤踞八年的江西瑞金亦告收復，朱、毛被迫奪路西竄。一九三六年朱、毛由川入陝，進犯山西，湯將軍指揮三個師在晉東南渡河，直

拊敵背，連破共軍於大寧，逼其逃回陝北。湯又率十三軍渡河追擊，綏德、瓦窯堡連戰皆捷，打得共軍僅剩五千殘部，後因奉命增援傅作義部收復百靈廟，致使剿共軍事功虧一簣。湯自中原大戰光復歸德嶄露頭角，收平閩變時是底定福州的先鋒。抗戰初期由綏東挺進南口，迎頭堵擊日寇的大股入侵，苦戰十晝夜，終以劣勢裝備、少數兵力，摧折強寇的西進兇鋒，殺傷敵軍近萬，這是華北抗戰爆發後第一次大戰役。中共與李宗仁恣意攻擊湯恩伯失守鄭州、許昌，那是日軍以廿萬精銳猛攻，湯氏步步設防，節節抵抗，不分晝夜連續十數日與士兵一起行軍作戰，終於阻敵於盧氏、魯山一帶，戰後日軍戰史也不得不承認，此役本欲消滅湯集團主力，其結果則完全失敗。在極其艱難的環境下，他仍大力收容流亡學生，設立戰區中學，供應全部衣食，慰勞傷患遺屬，還組織軍眷勞動，縫製被服支前，受惠者有口皆碑。抗戰後期光復南丹反攻桂林柳州，皆載於史冊。戡亂後期，大陸民心士氣動搖，然湯氏於國家危疑震撼之際力排眾議，在滬寧豎起堅決鮮明的反共旗幟，並設立短期軍幹訓練班；在北起吳淞、南至虹橋的廿多公里戰線上修築了鋼骨水泥碉堡三千八百個，半永久性掩體碉堡一萬多座，在京滬杭警備總司令任上，以正在整補的兩三個軍以及由東北、徐蚌戰場潰退南下的殘部抵禦共軍八個軍的圍攻，取得了擊斃共軍七千六百多人、傷兩萬四千六百人之戰績(59)。俟搶運重要物資金錢的任務順利完成，才從容佈置撤退，以七萬噸船舶將八萬大軍運抵舟山。同年十月督師在金門古寧頭大敗共軍，更為復興基地奠定了半個多世紀的安定。一九五四年他去日本就醫，連醫藥費都要到處張羅，死後幾乎無以為殮，這一切足以粉碎李宗仁與中共對他的共同誹謗。

十八、白先勇直斥李宗仁偏頗謬誤

中共切齒痛恨陳誠、胡宗南、湯恩伯三人，因這三員勇將始終忠於黨國，從不動搖。於是，李宗仁鸚鵡學舌，也強聒不捨。譬如他一再重復陳誠「將收復區的偽軍及有功抗日的游擊隊一律解散，於是共軍乘虛而入」「仰承上峰意旨，竟下令遣散四十萬偽軍，林彪乃乘機延攬，廣大的東北原野遂為共軍所有」。(60)事實上，抗戰勝利後，國共在重慶達成的〈雙十會

談協定〉要求政府整編全國軍隊，政治協商會議又規定全國軍隊從三百五十四個師縮編為六十個師，整編工作由軍調處執行部監督。由於馬歇爾偏袒中共，共軍乘機擴充成九十萬人，而國軍則被裁撤七十多萬人，在美方壓力下，中樞絕無財力收編東北的四、五十萬偽滿軍隊。當時國家處境艱危，凡有血性的中國人都不應苛責蔣介石與陳誠。何況，東北偽滿軍隊並非一律解散的。據王鐵漢將軍稱：「日本投降時，偽滿軍隊共二十四個師，一半投共；後來中央改變政策，其餘十二個師乃歸國軍收編，終以中央派副師長、政治部主任前去，以致不快，又有四個師投共，所剩由中央軍分散收編」。(61)據曾任軍委會政治部副官組組長、國防部軍官總隊少將總隊長的劉志回憶，「當時東北情勢，混亂的程度遠非局外人所可想像，即使在軍事和政治上的因素來說，對這批數量龐大而又極度複雜的偽軍，如果要陳誠斷然決定加以收編的話，那是辦不到的事」。(62)查陳誠係保定軍校炮科畢業，早年擔任孫中山大元帥府警衛連連長，隨國父出征西江時，親冒矢石，胸部中彈。後來兩次東征皆身先士卒，克復梅縣、惠州等城；一九二七年龍潭大戰時，他扶病攻佔外圍據點，剿共時率十八軍用坑道戰術解贛州之圍，擊潰朱、毛、彭圍城部眾十餘萬，後連破匪巢瑞金、寧都、會昌等地；抗戰初期主持淞滬作戰，率第十五集團軍緊守陣地，苦撐三個月，粉碎日寇三個月亡華之迷夢。凡此種種，均證明陳誠絕非仰承上峰意旨的倖進之徒。

李宗仁還說，四平街會戰後「林彪敗退，白崇禧主張乘勢窮追，縱不能生擒林彪，也須將共軍主力摧毀……結果乃聯銜電蔣請示，不意所得覆電竟是『暫緩追擊』，共軍因此能從容北撤……蔣先生不是不想殲滅共軍，而是討厭這主意出自白崇禧，縱可打一全勝的仗，他也寧可不要」。(63)然而，李宗仁對「暫緩追擊」令的認識竟不如他的世姪、白崇禧之子白先勇通透。白先勇不是號令三軍的統帥，只不過一介文人，但他在五萬言歷史隨筆中坦言「馬歇爾對蔣中正所施的壓力的確很大，三番四次威脅要退出調停切斷美援」「蔣於五月廿五日給宋子文的函中承認他之所以來瀋陽，就是要避開馬歇爾的糾纏。但馬歇爾並沒有放鬆，一直電蔣催逼他下令國軍在廿四小時以內停止前進追擊」「蔣於十月毅然下令進軍重鎮張家口。

因此觸怒馬歇爾，切斷了對國軍的美援八個月」「馬歇爾八上廬山，壓迫政府下停戰令。杜聿明於哈爾濱停頓攻勢整編軍隊，予共軍以喘息與反攻機會，大局逐漸予我不利」，更有甚者馬歇爾「竟呈送蔣備忘錄一份，擬以美軍裝備供給共軍十個師。馬認為這樣，美國軍官得以訓練中共部隊，以利國共兩軍之整編」而實際上馬歇爾所為，盡皆長共軍志氣而滅國軍威風。對於李宗仁前述言論，白先勇直斥其「有偏頗，論述細節也有錯誤的地方」。(64)

曾任東北行營交通處長、哈爾濱警備司令的金典戎則毫不諱言「那時東北情況，和後來韓戰的情勢完全相同，即軍事上的行動必須完全受政治上的控制」。(65)

十九、對胡宗南將軍的惡意誹謗

對於蔣介石另一愛將胡宗南，李氏誣稱「精銳部隊六十萬」「馬(鴻逵、步芳)軍渡過涇河後，胡宗南因蔣的密令，不肯出兵接應，駐紮西安的空軍亦不見影，致馬軍為共軍所乘，損失極大」「胡宗南部精兵四十萬人，一槍未發，便土崩瓦解。」其實，戍守陝甘的胡宗南部先後因奉令援救許昌、太原、徐蚌而抽調過半，其時補充兵源已斷，糧倉接濟無著，早已不是什麼六十萬、四十萬大軍了。他奉命入川拱衛陪都時，宋希濂兵團已潰退，川軍劉文輝、鄧錫侯、王纘緒、向傳義、鄧漢祥先後叛變，四出攻擊胡部，藉向共軍邀功，且國軍羅廣文十五兵團相繼叛變。在此險惡環境下，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他派第一軍馳援重慶，血戰四晝夜以一個團兵力奮力保護蔣介石飛往成都督師。當時李宗仁撻挑失職，胡命令屬下五個軍集中成都平原決戰，另派一個師空運西昌作保衛後方準備。然而抵成都附近未及設防佈陣，四面叛軍與共軍幾同虎豹豺狼，分別纏戰與伏擊，此時五個軍各自為戰，通訊設施多被破壞，無法一一取得聯絡。鄧錫侯又勾結共方密謀劫持蔣介石，幸胡早已空運兩個師擔任成都城防，以六萬官兵抵抗圍攻成都之六十萬共軍，旋轉進西昌組織西南人民反共救國軍，堅守西康四個月，至彈盡糧絕傷亡殆盡才於一九五〇年三月杪乘飛機撤台，堪稱無愧於黨國，絕不是

什麼「一槍未發便土崩瓦解」。事實上胡宗南與彭德懷在陝西打了若干次硬仗，是互有勝負的，胡部與馬家軍曾合力包圍咸陽，大有奪回西安之勢。共軍西進時，屢次向秦嶺山脈胡宗南防線仰攻，盡皆損失慘重。此時馬家軍與胡部因被共軍分途迎擊，彼此失卻聯繫，國軍空軍又分散各地，不能集中使用，所以胡、馬都陷於孤軍苦戰的窘境，絕不存在胡部不肯出兵接應的問題。後來共軍廿萬人圍攻馬步芳守蘭州的六、七萬疲兵，蘭州失守乃是大勢所趨。

胡宗南是一員勇將。黃埔學生軍第一次東征時，



他在團長何應欽麾下任機槍連排長，棉湖一役攜兩挺機槍奮勇佔領陳炯明軍後方高地，封鎖陳軍主力退路，使之潰不成軍；第二次東征時，他率第六連衝上河婆最高山橫峰的敵陣，一舉殲滅洪兆麟部五千官兵，屍橫遍野。事後蔣介石利用繳獲武器編成三個師，成為北伐的基本部隊，自此胡

宗南嶄露頭角，深為蔣介石所倚重。北伐時長沙南昌杭州上海均由胡團擔任攻堅先鋒，每戰必克。抗戰時大敗日軍於靈寶，挽救了中原危局；一九四四年日寇進犯貴陽、西南告急時，蔣介石曾抽調胡部兩個軍空運貴陽增援，始解陪都之威脅，所以胡宗南是黃埔學生中唯一在去台灣前就獲上將銜的將領。李宗仁在他死後多年猶出言誹謗，實在於心有愧！

二十、對胡璉、宋希濂的恣意誣蔑

另兩位名將胡璉、宋希濂在李宗仁口中也不得超生：「(蔣介石)竟密令防守湘西之宋希濂兵團西撤鄂西，扼守贛南之胡璉軍南撤汕頭，置戰區司令長官之命令於不顧……結果等於開門揖盜，共軍遂得乘虛而

入，可為反攻基地之西南，因之瓦解」。(66)事實是，共軍林彪部率眾南下沿粵漢鐵路進逼廣東時，胡璉將軍曾親往廣州向國防部請纓保衛廣州，還作了在大庾、宜章間隘道掩襲林彪後部之作戰計劃，然而國防部因十二兵團另有重任，未安排他參加保衛廣州之戰。(67)後來胡璉以十二兵團主力肅請閩西、粵東土共與叛軍，集結潮汕地區，還擴編了一個第十九軍，不久就投入金門古寧頭之戰，為保衛復興基地台灣立下了不朽的功勳。

李宗仁的前述論調也的確矇蔽了不少孤臣孽子的心竅。元老外交家顧維鈞博士一九七〇年到香港專門拜訪了閩錫山內閣的陸軍總司令張發奎上將，問道：「據傳委員長命令宋希濂將軍率部撤離防線，從而破壞了阻止共軍向廣州挺進的最後屏障，使得當時的總司令白崇禧大為不滿」。張將軍毫不猶豫地解答了這一問題：「長沙——廈門——汕頭——潮州這道防線之所以失守以及隨後廣州的陷落，其真正原因在於程潛將軍投向了共產黨。他是當時的湖南省主席，也是湖南部隊的總司令。他投共後，部署在這條防線上的白崇禧將軍所部湖南部隊紛紛跟著投共，防線左翼因而崩潰。並且使得右翼宋希濂將軍統轄下的委員長嫡系部隊不可能再守住剩餘的防線」。(68)張發奎會晤顧維鈞時對蔣介石作了十分嚴厲的抨擊，但在所謂「破壞屏障」問題上，並未對蔣介石落井下石。

李宗仁說：「宋希濂部十餘萬人彈械充足……竟不聽命令，擅自將全軍撤至鄂川邊境的恩施，致使常德、芷江一線門戶洞開……」(69)實際上，川湘鄂邊區綏靖公署主任宋希濂指揮的六個軍，除陳克非的第二軍較有戰鬥力外，大多殘破不堪，或者是新編成的，戰鬥力脆弱。當時白崇禧的算盤是保有兩廣地盤，等待美援到來；然而蔣介石的戰略部署是以保衛四川為核心的，從李宗仁治下兩廣的亂象(70)估計兩廣難保，唯保有西南地區，將來才能與台灣及沿海島嶼相配合發動反攻。蔣介石認為西南地區形勢險要，物產豐富，尤其四川人力物力均很充足，所以一九四九年三月廿三日在奉化召見關麟徵、宋希濂時就指示宋希濂從湘西退守鄂西一帶山地，司令部設在恩施為宜，因那裏有機場，陳明仁兵團將來退到芷江、阮陵一帶可以協同鞏固川東門口。從後來戰事發展來看，蔣介石的戰略眼光比李、白偏安兩廣要英明得多，李宗仁不

譴責陳明仁的叛變，卻責怪蔣介石，那是無理取鬧。白崇禧在宋希濂部下安插心腹趙援為一二四軍軍長，擅自拉走隊伍，對士氣影響不小。鄂西係山地，糧食產量有限，就地徵發已到羅掘俱窮境地，深秋天氣寒冷，士兵穿著軍衣，吃不飽，穿不暖，自然也影響士氣。到「兩航」叛變發生，空運能力驟減，恩施機場失去效用，那是始料所不及的。

二一、對顧維鈞惡意中傷以怨報德

在李宗仁口中，文臣武將尸位素餐、一無所能，就連外交官顧維鈞都看不順眼：「顧大使仍以蔣先生的意旨為依歸，對我虛與委蛇，來往電報完全漫無邊際，不得要領」「我派甘介侯來美的最初動機，是由於駐美大使顧維鈞玩忽法統。顧大使當初對政府完全採敷衍態度，一切活動完全受命於蔣先生。」

這顯然是賊喊捉賊。據顧維鈞回憶，一九四九年三月二日，中國政府採購代表團代理團長韓上校向他報告：「當天早上他的一位美國陸軍部朋友給他看了美國駐南京大使館武官發來的電報，稱『李總統要求此後全部軍援物資暫停發運，至內閣改組後為止』」，而中國駐美大使館對這樣的大事竟一無所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決定同意李宗仁代總統的要求。裝載軍援物資的塞米諾爾號輪船不再駛往台北，而將開回關



顧維鈞

島待命。其他物資的發運都暫時中止」。(71)究竟誰在「玩忽法統」、甚至出賣國家的根本利益，不是照然若揭了嗎？李宗仁透過司徒雷登直接要求華府停止對華軍援，嗷嗷待哺的前線官兵又透過國防部與行政院

呼籲美國增加軍援與經援，駐美大使事前未接通知，事後卻要負責補救。然而顧大使並未放棄自己的職責，他竭力遊說艾奇遜向中國撥款五千萬美元以抑制通漲，他安排甘介侯會見杜魯門、艾奇遜、馬歇爾以及魏德邁，拜訪國防部長約翰遜求援，向聯合國提出控蘇案等等。顧維鈞對李宗仁有精闢的評論：「鑒於他擔任代總統是爲了和共產黨進行和平談判，而今和談失敗，共軍已橫渡長江，他已沒有理由作爲政府的首腦而存在。至於說到權力，實際上，他絲毫也沒有掌握過任何實權。」(72)

從李宗仁回憶錄所敘的事件逐一剖析，多數是歪曲史實，指鹿爲馬。譬如，他說「高樹勛的部隊原從石友三的副軍長處劫奪而來，中央不但未論功行賞，且處處伺機消滅他，樹勛已積憤在心……軍次河北邯鄲時，一經共軍圍攻，高樹勛立刻投降，馬法五因士無鬥志而被俘。」(73)事實上高樹勛早在一九三八年就同中共有所勾結，一九四二年取代石友三任第三十九集團軍總司令時，就向共方勸誘代表唐哲民承諾反水，一九四五年十月他率萬餘人投共，純粹是怕打硬仗怕死，同一九三一年剿共失利棄職避居天津租界、一九三三年反叛中央事敗匿居天津出於同一原因，毛病出在個人節操，而非中央虧負了他。正是他，在邯鄲扣留卅軍軍長池峰城、四十軍軍長馬法五及河北民軍總指揮喬明禮，將三個軍包圍脅持投共而不是什麼「因士無鬥志而被俘」。

鮮爲外界所知的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廿五日與九月九日，葉劍英以「送一批幹部去太行山麓」爲名，巧妙地借用美軍駐延安觀察組的運輸機，把鄧小平、鄧華、林彪、劉伯承、陳毅、薄一波、滕代遠、陳賡、蕭勁光、楊得志、李天佑、江華、聶鶴亭、陳錫聯、陳再道、王近山、張際春、宋時輪、傅秋濤、鄧光明、聶榮臻、蕭克、羅瑞卿、劉瀾濤、鄭維山等高級將領從延安送到晉東南黎城以及雁北靈丘，然後轉赴各預定戰區，使中共完成了本應多次艱難跋涉至少需時兩個月才能完成的重要戰略性輸送任務，趕在國軍先遣人員之前進入各戰略要地部署突襲，連續發動

上黨、邯鄲戰役，爲席捲全國奠定了基礎。馬法五被俘就是在邯鄲戰役。李宗仁不譴責美國人的天真幼稚所造成的嚴重後果，反而責怪中央不對高樹勛「論功行賞」，堪稱全無心肝。(74)

二二、捧吳化文貶邱清泉 旨在擾亂軍心士氣



戰死疆場的邱清泉將軍

李宗仁說，吳化文投共是因爲「苦守數月，迭向王耀武乞援，無奈王耀武又實行中央借刀殺人的故伎，不予支援，吳化文憤而投共」。(75)其實吳化文早在一九四三年投靠日僞時就對部屬說過：「將來日本打勝了，我們當然有前途；如果蔣介石打勝

了，他一定會同共產黨打，那時他如果不要我們，咱就投共產黨去！」可見他早有投共意願。其妻林世英、妻舅林世昌全係潛伏共諜，倒反而是王耀武保舉他陞任整編第九十六軍軍長。李宗仁對吳化文持同情態度，然而就是這個吳化文，抵抗共軍無力，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將奉命空降支援濟南守軍——第七十四軍的一個步兵團全部繳械，向共方獻功。此舉使有十一萬重兵把守、地勢險要、易守難攻的山城濟南，西部門戶大開，王耀武所稱「固若金湯」的防禦體系土崩瓦解。濟南失陷後，山東全局糜爛。於是華北、華東共區連成一片，直接導致了徐蚌會戰的敗局。

黃伯韜戰死，李宗仁又有文章做：「黃伯韜突圍不成，乃向邱清泉乞援。清泉竟拒不赴援……邱清泉的抗命是蔣先生授意的。」(76)

邱清泉擅打硬仗，戡亂時於蘇皖魯豫地區，歷大小數十戰，所向披靡，尤能以少數兵力擊潰五六倍的

共軍。鉅野之戰，以兩個師擊潰劉伯承七個縱隊；魯西金鄉之戰，以不足一師之眾擊潰陳毅六個縱隊。所以共軍聞悉邱兵團兼程東下，先由陳毅派四個縱隊趕往碾莊與徐州之間之大廟、鼓山附近，佔領群山地帶構築堅固的防禦工事，以逸待勞等候邱兵團，阻止邱黃兩兵團會師碾莊。同時，劉伯承派出主力，越過津浦路，與陳毅部遙相呼應，佯裝進攻徐州機場，讓邱兵團不敢輕易東進，俾使包圍碾莊的陳毅部得以從容部署，先解決黃伯韜兵團。雙方在群山地區展開一場拉鋸戰難解難分之際，正是黃伯韜兵團彈盡援絕之時。共軍消滅黃兵團後，不欲與邱兵團硬拼，乃自動後撤。此時徐州南部之劉伯承部又集結主力沿津浦線西側進窺徐州。於是，撲了個空的邱清泉又奉命向南迎擊共軍。事後，共方故意謠傳「邱清泉見死不救」，旨在擾亂國軍軍心。平心而論，邱清泉勇則勇矣，然以一個兵團十二萬人對付陳毅劉伯承近五十萬精兵，談何容易！苛責邱清泉的人忽略了徐州剿匪總司令劉峙的責任。當邱清泉在碭山奉命援黃時，黃兵團已被圍三日了，陳毅便利用這三日兩夜的充份時間把阻援部隊配備在鼓山以西縱深數十里的崇山峻嶺地帶，完成了陣地構築，使邱兵團的救援行動完全成了仰攻與攻堅的陣地戰。倘剿總的命令早發兩日，邱兵團絕不致於耗四晝夜浴血奮戰才攻到鼓山。再者，劉伯承幾個縱隊的調動，徐州剿總竟毫無情報，聽任邱兵團腹背受敵，也不調動徐州的李彌、孫元良兵團出援，坐觀戰局日益惡化，劉峙的顛預無能、遲疑不為，貽誤了戎機，乃是徐蚌會戰國軍失敗的最大癥結。(77)

二三、歪曲史實 指鹿為馬

「原屬西北系之xxx將軍易幟為中共改編」，這又是李宗仁、唐德剛故弄玄虛。中共的編輯老爺考證此xxx係整編騎兵第一師師長馬呈祥(78)。其實騎兵第九軍軍長馬呈祥是一九四九年九月廿四日攜眷由南疆出境的，隴東兵團中將總指揮馬繼援是八月卅一日離開西寧的，他臨行給旅以上軍官寫了九封密信，要求部屬「再等機會，不要使我家鄉變為戰場，不要使我父老飢寒逃難……決定叫大家全部解散，各人騎上自己的馬，帶上自己的槍，把重武器完全毀壞，各自回

家。回家後將槍與彈藥埋藏起來。大家在家中，第一件事是料理家事，第二件事是叫大家休息一下，做種種破壞共匪行政工作，使大家變為民間的便衣戰士。」據共方的統計，西北地區國軍陶峙岳、馬家回軍等共有 20.56 萬人「起義」，但韓戰爆發後，陝甘青寧新五省有十三萬人反水，加上隨牧的民眾共二十二萬多人。共軍第一野戰軍暨西北軍區出動 14.4 萬官兵，耗費六個春秋才殲滅了這四百七十股義軍計 12.9 萬人，共軍第十六師副師長羅少偉、寧夏軍區副參謀長曹動之等四千三百多官兵陣亡。(79)這就是所謂馬家軍易幟的真相。

李宗仁的另一怪論是「共產黨的根據地多在贛鄂豫皖四省，正是中央權力徹底到達之區，在省當局統治能力最薄弱的山東、四川、雲南等省，中共卻無法滲透。孰為為之，孰令致之？」(80)言外之意，是蔣介石養癰遺患。

事實上，雲南是共方滲透最深的省份。抗戰期間龍雲榮任陸軍總司令、昆明行營主任，卻暗中勾結中共在五華山滇黔綏靖公署內設立電台與延安保持直接聯繫，中共南方局專派華岡赴滇洽談。龍氏為割據自雄，竭力排斥中央系統軍警，使之不能進駐昆明，且故意藉左傾知識份子力量牽制中央，乃將昆明變成反抗中央的輿論陣地，還對中共外圍組織「民盟」的反政府活動出錢出力支持，其本人也秘密加入「民盟」。抗戰勝利後，中央下令解除龍雲在雲南所有職務，他懷恨在心，乃透過各種渠道示意在東北戡亂的滇軍將領潘朔端、黃子華、曾澤生相繼投共，又讓繼他任雲南省主席的盧漢將在錦州被俘洗腦後遣回雲南的張秉昌等廿八名軍官安插於省保安司令部侍機譁變。盧漢按共方指示，給中共“邊縱”朱家璧送去步槍五百多支、機槍三十挺、子彈數萬發。一九四九年六月中旬盧漢還親筆寫了決心書託中共密使米一痕經香港飛北平送交周恩來要求共軍迅速入滇，內外夾擊中央軍李彌、余程萬部。十二月九日盧漢率部在昆明宣佈投共，並扣押西南軍政長官張群、第八軍軍長李彌、第廿六軍軍長余程萬，還指揮滇軍第九十三軍與共軍陳賡部、朱家璧“邊縱”合圍國軍，使國府經營雲南為反攻基地的宏圖功虧一簣。盧漢還將國防部、聯勤總部剛飛抵昆明的各級軍官，自上將魏益三以下

三千多人一網打盡，這一致命打擊把國府在西南的布建連根拔起，連潛伏都失去希望。(81)

二四、顛倒是非 混淆黑白

李氏說中共無法滲透山東，簡直在說夢話。早在一九三八年九月，中共魯西特委與魯西北特委就發展了四千五百名黨員，基層組織從縣、區滲透到鄉、村；到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時，中共山東軍區主力部隊發展到廿七萬人，民兵七十一萬人，攻佔了四十八座城市。(82)

說中共無法滲透四川，更屬語無倫次。勝利後嚴重打擊政府威信的滄白堂事件、較場口事件就發生在四川重慶。一九四七年中共地下黨發動的「反飢餓反迫害反內戰」遊行迫使全省二分之一以上的學校停課。光是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至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共川東臨時工委就在四川發動了三次大規模的武裝暴動，華鎣山遊擊隊的事跡還被寫成小說《紅岩》賣了三千萬冊，其作者羅廣斌竟是國軍駐川的第十五兵團司令羅廣文！

李宗仁的歪曲事實，還表現在對中共暴政的美化與頌揚，以作為日後投靠的資本。他侈言：「雖然共產黨現政權是有點蠻幹，但中華民族至少是有十年沒有內戰了」。(83)他遠隔重洋享用民脂民膏之際，竟對中國大陸億萬同胞所受的深重苦難充耳不聞。英國一九八九年版的《堅尼斯世界紀錄大全》第 203 頁〈大屠殺〉條目下記載著以下血淋淋的數字：

「人類有史以來最怵目驚心的殺戮發生在中國大陸，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五年五月有兩千六百三十萬中國人在中共統治下喪生。據一九六九年四月七日蘇聯電台廣播，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有二百八十萬人被毛澤東處死；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有三百五十萬人被殺；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〇年有六百七十萬人被殺；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五年五月則有一千三百三十萬人被殺。

「在一個月內處死的最高數字則是北京電台透露的：皖浙蘇魯四省一個月之內處死 117.6 萬人；在華中和華南一個月內則處死一百五十萬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薄一波在鎮反報告中提及：『為了永久的和平，

為了人民民主，在過去三年半(一九五〇至一九五三)，我們清算了二百多萬土匪(按：係指國軍遊擊戰士)』。

「一九七一年四月，中華民國行政院宣佈，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九年，至少有三千九百九十四萬人被中共政權處死，這個數字尚不包括中共已經承認的文革十年殺害兩千萬民眾的數字。

「法國外交官傑奎斯·圭拉麥將軍估計，從一九五一年二月到一九五二年五月間，至少有三百萬人被中共殺害。

「一九七一年七月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發表的華克報告披露，自一九四九年到那時，有三千二百二十五萬至六千一百七十萬人死於中共屠刀。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出版的法國費加羅雜誌宣告，中共已殺死六千三百七十八萬四千名無辜百姓。」

堅尼斯世界紀錄是當代最具權威水準的國際統計年鑒，她擁有數以千計的專職調查人員，她的觸角遍佈全球每一個角落。該書每年再版，在政治、經濟、文化、體育、法律、教育、軍事各個領域中廣泛蒐集最新資料，經核實後作出修訂。可悲的是，以上慘痛的紀錄自一九七〇年版堅尼斯世界紀錄問世以來，逾三分之一世紀始終未被糾正、修訂或者打破。中共也從未對此血腥紀錄表示異議。上述數字尚未包括八十年代以來歷次「嚴打」運動、天安門六·四屠殺以及數以千萬計的殺嬰、殺胎兒紀錄。李宗仁不能抹煞的事實是：中共用坦克、機槍屠殺手無寸鐵的民眾，並不是兩支軍隊的交戰，而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一個政權曾經殺害過上億的子民，也沒有一個政權能如此做盡壞事又說盡好話，乃至統戰它昔日的死敵來為自己歌功頌德。

二五、頌揚暴君苛政 同情亂臣賊子

「舉世最大的飢饉發生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中國大陸，那三年間餓死了三千萬人。」據一九八四年春出版的《中國統計年鑒》，三年災荒餓死了兩千七百萬人。但據一九八〇年中共高級黨校廿九省市黨委書記讀書班成員估算，餓死人口數字為五至六千萬。這是人類歷史上所有的暴君如尼祿、希特勒、秦始皇、隋煬帝都未造就過的暴政。

自一九八四年至二〇〇四年四月，有六千多名高幹盜竊一萬四千四百億人民幣的公帑順利運往外國；有一萬七千名中小官員和六萬六千名暴發戶將九萬四千億人民幣套匯移至外國。(84)李宗仁倘若泉下有知，一定會自嘆弗如！

李宗仁咬牙切齒說「蔣先生不擇手段豢養特務，魚肉人民，其屬下文武官員也每因私怨而被借端槍斃，或因受疑忌而慘遭毒手。例如暗殺學者楊杏佛、申報主筆史量才、湖北省主席楊永泰、前直魯督辦張宗昌、前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外交界元老唐紹儀、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樸、西南聯大教授聞一多，捕殺第三黨領袖鄧演達、第十三軍(按：應係第十四軍)軍長賴世璜、第十軍軍長王天培。」(85)上述人等究竟都是何方神聖呢？史量才以《申報》財力接濟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的活動經費，一九三三年任上海市參議會議長後，曾陰謀組織上海獨立運動，欲以抗日為名，將上海脫離中華民國政府而自成偏安局面，自然為國法所不容。楊永泰是因向日本軍方出賣中國軍事機密，事洩後被軍統制裁身亡的。(86)張宗昌死於被他枉殺的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副總司令鄭金聲之子鄭繼成的復仇子彈。整個槍斃案由韓復榘與石友三策劃，旨在收編張的山東殘部。孫傳芳死於被他枉殺的兗州鎮守使施從濱之女施劍翹的復仇子彈。唐紹儀有成立「軍政府」反叛中央的前科，抗戰爆發後密晤日酋土肥原證據確鑿被軍統人員制裁而死。李公樸、聞一多是雲南警備總司令霍揆彰擅自派人槍殺的，此事與蔣介石毫不相干。鄧演達一九三一年八月與陳銘樞、楊杏佛在滬密謀軍事叛亂，商定由陳銘樞到江西吉安指揮十九路軍停止剿共，將部隊從吉安往泰和趨贛州入廣東，與廣東部隊合作在南方建立叛亂基地，並商定由鄧去江西陳誠十八軍駐地臨川、清江一帶發動叛亂，首先攻取南昌，同時發動武漢、西安、華北方面楊虎城、馮玉祥等一齊響應，推翻南京國民政府。事洩後被上海警備司令熊式輝捕殺。至於賴世璜，是被李宗仁的心腹白崇禧以「反叛」罪槍殺的。(87)據王天培手下第十軍中將參軍孟紹濂回憶：「王天培第十軍以久懃之師獨當張宗昌、孫傳芳聯軍，力盡援絕潰退，李宗仁在徐州坐視不救，不派第七軍支援。是何應欽以擅自退卻的罪名扣押王天培。張靜江、吳稚暉恐王在南京不安全，遂要求蔣介石安置別處，蔣令移

押杭州。不料蔣赴日不久，何應欽密令杭州保安機關秘密殺王。何殺王係報私仇，因王天培在貴州曾驅逐王文華，使何應欽失怙」。(88)蔣介石復職後，一九二八年八月，國民政府明令昭雪，旋經軍事委員會議決，照陸軍上將陣亡例給恤卅年。可見前述：「借端槍斃」說，都是李宗仁睜眼說瞎話。

二六、心狠手辣槍斃王公度 草菅人命殺馬君武妾

李宗仁口口聲聲指責蔣介石「豢養特務魚肉人民」，然他自己又如何呢？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四日，李宗仁以「企圖在桂軍開赴前線抗日之際陰謀奪取廣西的政權」罪名，將他的心腹重臣、特務頭子王公度及其親信謝蒼生、區渭文、韋幹、陶寶垣、崔真吾等槍決，便暴露了桂系特務機關之殘害百姓、魚肉人民遠甚於中央系的調統人員。

自一九三〇年桂系反抗中央至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王公度一直是李、白的紅人，是獵人的功狗。一九三〇年李、白集團成立秘密政治組織「中國國民黨革命青年團」，一九三二年改組為「三民主義革命同志會」，一九三四年再改組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同志會」，都是李、白用來團結內部、對抗中央的秘密核心組織，旨在取代以蔣介石為首的中國國民黨。在前期，王公度任書記，後期任組織訓練委員會主任、政治委員會委員。同志會的外圍組織是王公度組織的「青年軍人讀書進德會」，入會者須向李、白畫像舉手宣誓「絕對服從領袖(指李、白)，嚴守秘密」，加入者只有縱的關係，沒有橫的關係。一九三一年王公度接任第四集團軍總政訓處處長，兼廣西省政府委員、廣西省黨部常委、中央軍校一分校(南寧)政訓處長、國民黨廣西黨政研究所訓育主任等等，連兒童機構都不放過，廣西童軍訓練所成立時要兼任教育長。白崇禧在廣西推行的三自(自衛、自治、自給)、三寓(寓兵於團、寓將於學、寓募於徵)政策，創始人就是王公度。不論軍校、黨政研究所、童訓所和民團幹部學校畢業的學生，都要組織同學會、通訊社。這些組織都由王公度及其親信掌控，以執行情報蒐集任務；李、白所設特務組織「樂群社」也任命王公度任常務理事。王公度被殺，原因之一是他為了蒐集中央政府情報，竟同日本特務勾結，東窗事發後使李、白都感到尷尬；

原因之二是王公度在桂系部隊中搞秘密組織，惹得黃旭初、廖磊、夏威、李品仙等對他恨之入骨，必欲置他於死地。由此可見李宗仁麾下特務活動的猖獗。李宗仁殺王公度是殺“功狗”，目的在於討好桂系軍人兼向中央示好，藉以擺脫困境，更表明他草菅人命，心狠手辣。然這已成為李宗仁的一塊心病。

據桂系一七〇師師長、後來官至湖北省政府主席的許高陽遺孀黃初秋回憶，她旅居美國新澤西州陪伴李宗仁夫婦打麻將的八年間，親耳聽到郭德潔同丈夫鬥嘴：「你一天到晚佩服共產黨，他們殺了你的弟兄與妹夫，你還要佩服他們。要回去，你回去，我是不回去的。」李說：「他們反對他(指毛)，自然挨殺呀！革命嘛！哪個不殺人呢？我也殺過人的呀！」黃寫道：「我一聽此句，忽想到王公度，即說：我不知你也會殺人的，那我要問你，王公度是不是你殺的呀？他聽時一呆，問：你認識王公度嗎？我說：你忘了嗎？我結婚時原是請你作證婚人的，但那天你要開會，才臨時改請王公度。我在南寧四年，人地生疏，言語不通，王的夫人對我非常同情，也是我僅有的朋友。後來我在南京聽到王被殺的消息，感到非常難過！我打聽他為什麼被殺？他們說：你殺他因為他是共產黨。但現在你自己又捧共產黨，那王公度豈不死得非常冤枉喲！他(指李宗仁)一時語塞半晌，始說：他是什麼共產黨？我問：不是共產黨，你為什麼要殺他呢？李說：他想造反呀！這我不知，也未聽別人說過。王死後，家產全被沒收，王夫人與兒女靠乞討度日……」(89)曾任白崇禧機要秘書的程思遠在其回憶錄中特地為王公度之死耗費了十二頁的篇幅，他披露：「一九六六年八月，我和劉仲容陪同李宗仁在北戴河濱度暑，有一天劉仲容問李宗仁：『當年德公為什麼殺王公度？』對此，李宗仁始終不吭一聲。看來他有難言之隱：因為從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六年五月這一段時期，李宗仁長期留粵，廣西內部的事，他並不過問。到一九三七年八月下旬，白崇禧突然向黃旭初提出王公度的問題，他也莫明其妙。後來在王案進程中，黃旭初、潘宜之一定在幕後低斟密酌、羅織罪名，竟使李無法保護王公度的生命，這一切，他怎麼能夠解釋呢？」(90)既然對自己的心腹、桂系排名第四的王公度都如此刻薄寡恩，那就不難理解他為何縱容

桂軍搶掠強姦，甚至縱兵槍殺他的上司、廣西省省長馬君武的愛妾。(91)

二七、與內奸衛立煌同惡相濟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李宗仁的顛倒是非也表現在他對叛徒內奸的無限同情。曾任北平行轅參謀長的金典戎說，李宗仁駐蹕北平時，和他比鄰而居的有保定警備司令池峰城，其妾馮氏係共諜，專在池將軍身上作策反工作，也直接間接從李宗仁身上得到許多情報。另一個與李宗仁來往密切的，就是第十一戰區設計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余心清，此人居然有膽策反司令

長官孫連仲投共。李宗仁夫人郭德潔主掌的婦女會就窩藏了一批共諜，例如中共北平地下黨財務負責人、鴉片販孔昭福的妻子李媚蘭將共諜張芸俊薦入婦女會，張以開設女子通訊社、出版婦女畫刊為手段



衛立煌

籠絡了一班軍政大員的夫人，藉以為中共刺探政、軍、經情報。由於李宗仁和北平市長何思源極力標榜民主，廣泛結交名流學者以沽名釣譽，共諜便格外肆無忌憚。當時中共在北平負責學運的職業學生費迪生與清華大學教授吳晗緊密配合，在大學校園鼓動學潮。治安當局依法拘捕費迪生後，張芸俊逕自找郭德潔說情，下令海甸警察分局放人，讓他繼續從事顛覆工作。(92)所以，當李宗仁說：「蔣先生一意孤行下令死守瀋陽，實犯兵家大忌……不痛定思痛，深自反省，反將全部戰敗責任委諸衛立煌一個人。立煌不但被拘禁，幾遭槍決。直至蔣先生下野後，我才下令將衛立煌釋放」(93)時，人們就見怪不怪了。

查衛立煌長期與中共私通款曲，在戰區司令部窩藏、輸送了數百名中共特工。一九三八年冬，他秘密申請加入中共，由西安聯絡處紅軍總代表林伯渠指示：「好好做一個革命的國民黨員，這樣對中國革命的貢獻更大」。此後向共軍運送大量軍火器材、私下釋放共諜楊公素、孟用潛、趙壽山等人。一九四八年一月他赴東北就任剿匪總司令，先向蔣介石伸手要了五個軍的實力。可他到了瀋陽就一直按兵不動，按中共指示「利用時機，做有利於革命的事」。當時林彪部在東北收編土匪、偽軍、馬賊一百三十萬之眾，連續發動七次猛攻，二月七日陷遼陽、廿六日佔營口、三月十四日奪四平，衛立煌卻一直不予救援。為此，蔣介石兩次召他回南京催促出兵，他總是藉故推諉，拒絕執行國防部打通瀋陽向外交通線的計劃。八月廿五日國防部擬就撤出瀋陽兵力，瀋、長、錦協力作戰由大連、營口撤向關內之計劃，已由蔣介石批准執行，倘計劃成功，國軍卅萬精兵退入華北，尚大有用武之地，至少也能保住江南半壁河山，可恨衛立煌處處刁難。當時瀋、錦、長三市補給全賴空投，而空投接濟數極有限，長春餓斃者逾十六萬人，衛仍無動於衷，他第三次回南京仍堅拒出兵解錦州之圍。九月廿五日林彪率廿萬眾猛攻錦州，衛遲至十月八日始派兵增援，顯已無濟於事。十月十五日錦州失守，國軍喪師七萬人，第六兵團司令范漢傑被俘(按：時隔八年多，范漢傑在「戰犯管理所」猶餘恨未消，對李以動大罵衛立煌是出賣東北給共軍的大功臣，錦洲之敗是衛氏按兵不救所造成。范漢傑被俘後囚禁於佳木斯監獄，受林彪酷刑虐待，與廖耀湘、盧濬泉等兵團司令一齊戴重鐐六年之久)。蔣介石派參謀總長顧祝同去瀋陽監督軍令時，衛召集高級軍官開會，引導眾將官反對出兵。十八日，蔣介石親臨瀋陽指揮戰事，但因戎機已誤，終未挽回頹勢，廿三日長春失守，十一月二日瀋陽陷落，衛搶先登機撤回北平。他按兵不動是為了拉一點隊伍，增加投共的資本，遂一手造成國軍精英卅萬人犧牲的慘局。有關衛立煌向共方拍密碼電報出賣機密軍事情報的細節，早由他的機要秘書、中共地下黨員趙榮聲著書(94)披露，連共產黨都承認衛立煌吃裏扒外，李宗仁還要聲嘶力竭為衛鳴冤叫屈。趙榮聲的回憶錄在大陸賣了十一萬本，當時在大陸當「客

座教授」的唐德剛偏偏視而不見，不知他的學術良知何在？

二八、包庇叛徒 歌頌軍閥

李宗仁指鹿為馬的又一例是聲稱陳儀被捕法辦是「蔣先生每次下野總要殺一、二要員以洩其胸中的積憤」「欲加之罪」「蔣經國挾嫌報復」「表面上雖為湯恩伯所執行，背後實全由蔣先生指使」(95)。李宗仁萬萬想不到，他對唐德剛胡謔的「先被槍斃以滅口」的陳儀小同鄉、「閑散軍官」胡允恭比陳儀多活了幾十年，還與同時被陳儀派去煽惑湯恩伯的陳儀外甥丁名楠各撰一文——〈陳儀在浙江準備反蔣紀實〉和〈一九四九年初陳儀策動湯恩伯起義的經過〉在大陸報刊公開發表，還由台灣雜誌全文轉載。(96)丁名楠當時任陳儀的機要助理，他在文中坦承陳儀派他攜帶其親筆信和另紙開列的五項條件去上海面呈湯恩伯，五項包括釋放政治犯、停止修築工事、根據共方標準改編所屬部隊等。丁名楠在陳儀公館的客廳結識了曾任福建縣長的中共地下黨員胡允恭，胡還建議在五項上再加一條「開放長江若干港口，迎接解放軍過江」，丁又上樓請示，獲得了陳儀同意。一九四九年一月廿八日丁名楠到上海蒲石路湯恩伯公館親自將信交到湯恩伯手，一週後再次奉陳儀命持親筆信去上海見湯，信中內容有二：一介紹胡允恭去見湯，二要湯委任丁為秘書。湯恩伯立即同意委任丁為秘書。丁回杭後，陳儀又叫丁送一封致李宗仁的「快郵代電」給湯恩伯看一下，內容主要是請求李宗仁調走浙贛路浙江境內沿線駐紮的國軍和停止在浙江徵兵。直至二月廿一日上午毛森率警備司令部稽查處人員到陳儀滬寓搜捕陳儀，他還乘隙示意在身邊的女兒陳文瑛通知丁名楠迅即躲避。胡允恭的文章則說，陳儀從陳銘樞口中知悉胡允恭係中共地下黨員後，即召見胡，經直接商談，訂立了幾條口頭協定，包括改編保安團隊為兩個乙種師援引解放軍渡江、釋放政治犯等。事後陳儀下令解散了毛森的五個戡亂大隊，還將該隊扣捕的一百多名政治犯全部開釋。一九四九年一月胡允恭探悉湯恩伯態度有變，立即停止會晤湯，故避過了軍警追捕。

倘若不是經濟開放熱潮迫使中共公開文史資料，那麼李宗仁的「謗言」及唐德剛的「整理」恐怕至今

仍要使蔣介石在黃泉之下蒙冤不白！孔祥熙家屬的文膽李龍鏞對此作了以下評論：「最令人莫明其妙的是，他認為蔣槍斃陳儀也是不合理的事之一，這恐怕全世界只有他一個人作如是觀。陳儀自己尚且心裏有數，自認必死無疑。事緣陳儀寫信給他的義子湯恩伯，要他乘蔣去上海巡視時，把蔣扣起來，戴罪立功。按照陳儀的計劃，老蔣的生命一定難保。這一步致命毒棋，無論換了歷史上任何統治者，都會採取同樣步驟，無餘地可言，這是最起碼的常識。蔣若不殺陳儀，是沒有第二條路可選擇，等於直接鼓勵其他部下挾持上官作為投靠晉身之階。此風可助長乎？這樣乘人之危，落井下石，賣主求榮，實難得有人同情。」(97)

二九、與大貪污犯毛邦初狼狽為奸

李宗仁另一同惡相濟行徑是為大貪污犯毛邦初喊冤叫屈。他在回憶錄中說：「政府即派員到美京空軍購料辦事處查帳，結果並無(毛)帳目不清的跡象，而對周將空軍款項以私人名義存放香港銀號事，竟亦置之不問。毛氏認為不公，仍喋喋不休。而宋美齡以毛邦初係蔣先生元配毛氏的內姪，故心存忌妒，遂慫恿蔣先生將毛邦初撤職，並勒令將當初私相授受的巨款交出。毛以該款既屬渠私人名義所有，並無公款佐證，拒不接受……」(98)

從蔣介石機要室主任周宏濤日記可知，事實完全相反，毛案的起因係毛邦初向蔣介石檢舉空軍總司令周至柔採購軍機與航空用油有弊，又將四十萬美元公款自美匯到香港私人戶頭。經查明，周至柔採購軍機報價比毛邦初報價更低，而空軍存於香港的歷年結餘軍費並未動用過，且早已列入空軍財監會的帳上有案可稽。蔣介石乃召毛邦初回國述職，並下令結束空軍駐美辦事處。然毛邦初在美國生活糜爛，挪用公款幾百萬美元存到瑞士的私人銀行戶頭，另外買了兩百萬可兌現的美國不記名國庫券，因畏罪而抗命拒辦移交，且透過美國專欄作家皮爾遜在華盛頓郵報撰文抨擊中華民國政府，以致影響了美國援華法案的順利通過。一九五一年九月廿八日，周宏濤奉命與司法行政部政務次長查良鑑、總統侍從武官夏功權等一行五人飛美對毛邦初提起民事訴訟，經查次長對中國銀行查

帳發現，戰後毛邦初在美國任職六年期間大肆揮霍，花光了五百八十萬美元辦公費，還超支卅八萬美元，又挪用公款同一個華僑古董商合伙在芝加哥開設了一家商店，另外在美國西岸開了一家商行。十一月十四日，國府所聘律師入稟華盛頓地方法院，十日後美國各報均刊登李宗仁致法院函件，宣稱他才是合法總統，毛邦初職務由他任命，蔣介石所代表的政府所提訴訟無效。十二月六日紐約時報刊登了李宗仁訪問記，他說他是中華民國總統，將會返台主政。十二月十日地院裁定毛邦初敗訴。周宏濤返國前，毛邦初又派他的副手向惟萱上校駕車追撞周氏座車。毛氏眼看美國法院不可能支持他，遂在全案未審結前攜款逃亡墨西哥。一九五四年六月，美國法院判決國府有權向毛邦初索還六百卅六萬餘美元。(99)

負責外交折衝的駐美大使顧維鈞在其回憶錄中以一章(十八頁)的篇幅澄清了毛邦初案。他說，經過六年在美國、瑞士、墨西哥三國法院提起訴訟，耗費巨萬(光是在美國就聘了四家律師行)，陸續追回了約五百萬美元，最後毛氏留下廿萬元維持生活，同政府達成和解。(100)

毛邦初在中華民國最需要美援之時惡人先告狀，直接影響到前線軍事。明顯一例是：一九五一年五月下旬，共軍連續攻擊國軍駐守的浙閩沿海小島時，守軍暫處劣勢，但空軍油料購買遇阻，使得空軍無法經常起飛支援。而李宗仁為了他個人爭名奪利，不惜損害國家利益，把風雨飄搖中的中華民國，在喪失大陸後辛苦重建的形象幾乎破壞殆盡，故其人格是極為卑鄙無恥的。

三十、剿共虛晃一招 造假本事一流

李宗仁的血口噴人、無中生有，特別表現在對蔣介石人格的恣意誣蔑，他說蔣「對共軍圍而不剿，一任中共在其直接統治的省區內坐大」「共軍入湘之後，中央軍本可南下截擊，而蔣先生卻屯兵湘北，任共軍西行……當共我兩軍正打得血肉模糊之時，中央追兵卻在湘中一帶作壁上觀」。他還大肆吹噓白崇禧指揮桂軍在桂北邊境以寡敵眾，使得「共軍狼狽潰竄，伏屍遍野，死傷萬餘人，被俘七千餘人，造成抗戰前剿共戰役中罕有的大捷」。(101)牛皮吹脹了必會

爆炸，廣西版與香港版的「李傳」都用腳註的形式戳穿了他的彌天大謊：

「據當時參與拍攝《七千俘虜》電影的周游同志稱：一九三四年農曆九月，共產黨中央及紅軍長征的主力部隊，由湖南邊界進入廣西，經過灌陽、恭城、全州、興安、資源、龍勝、三江等縣的邊界而進入貴州，用了約十天時間。

「桂系的最高指揮官白崇禧親自在桂林指揮。他命令廖磊所率的第七軍緊跟著紅軍之後，彼此相距四十華里，一路相送，一直把紅軍送入貴州省。雙方並無戰鬥。

「當時我是廣西桂系『中國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總司令部政治訓練處宣傳科少校處員』。處長是潘宜之，科長是李文釗。我們率領一個電影隊到興安，隊長是黃學禮。那時紅軍已經過了興安、華江，越過老山界，進入資源的潯源鄉(今兩水公社)，向龍勝、三江去了。

「在興安縣城外收容了由各處送來的一些跟隨紅軍長征時掉了隊的男女老幼，其中還有背孩子的婦女，總共約有一百二、三十人。這些人，都由電影隊作為紅軍俘虜攝了影，上了鏡頭。

「另外，華江千家寺燒了十多間房子，這是桂系尾隨紅軍部隊的第七軍因不慎失火燒的，我帶著電影隊長黃學禮去把殘餘的煙火及頹牆斷瓦等儘量上了鏡頭。後來這些都做了製造《七千俘虜》電影的鏡頭材料。隨後，李文釗就率領電影隊回南寧拍攝《七千俘虜》電影紀錄片。其中俘虜的鏡頭，是由民團扮演的，戰利品的鏡頭，也全是假的。時至今日，除我之外，現在在南寧的，還有當時電影隊員蒙惠坤(現在南寧冶礦廠)、李露莎、雷卡零、方衣零等可以證明。」(102)

三一、白崇禧冒領戰功 李宗仁五子登科

白崇禧的「小諸葛」外號，只是李宗仁大吹法螺。六十萬言的李宗仁回憶錄，諱言桂南會戰，因為「桂南係第四戰區作戰區域，這場戰事當歸戰區長官指揮才合理。不料桂林行營主任白崇禧建議由行營直接指揮，設指揮所於遷江縣。一九三九年年底，調集兩廣地區四個軍、中央系三個軍加入會戰，在崑崙關

附近作戰兼旬之後，中央才電令四戰區長官張發奎於一九四〇年一月上旬至遷江協同指揮。張到達時戰事已失敗，行營指揮所擬好撤退命令要張簽署，並負指揮錯誤的責任。蔣介石不久即召開柳州會議整頓紀律，將白崇禧降一級，張被記大過。張發奎對此事很不滿意。一九四二年張招待我與區壽年等晚餐，席間大罵白崇禧亂指揮，破壞指揮系統，招致大敗(南寧失陷)。他說，在四戰區作戰序列另行設一個指揮機構，越級指揮，古往今來世界戰史上是無前例的。當時他心情十分激動。」(103)

一九三九年九月，日軍使用六個師團、十二萬兵力進攻長沙，長江上的日艦也向岳陽集中支援。戰前白崇禧以副參謀總長身份到株州要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將部隊撤退到醴陵、衡山、湘潭地區，將長沙以北含洞庭湖各縣完全放棄。薛岳堅主固守長沙及湘北。白氏曰，長期抗戰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不應作過早決戰，而應保存實力，爭取長期時間，更不可爭功邀功，徒逞血氣之勇。且湘北及長沙地形，利於攻而不宜守，因此種種，應執行命令，且戰且退，放棄長沙以北，固守長沙東南地區。薛將軍至此勃然大怒，指責白氏「第一不明抗戰國策，枉為副參謀總長。抗戰則必抗必戰，乃能爭取長期勝利；第二責白氏不讀兵書，不讀地圖，不知長沙與湘北地形山嶽湖沼，錯綜複雜，可戰可守。今湘北工事堅固，民心士氣旺盛，湘北道路已徹底破壞，敵我武器逐漸相等，敵為驕兵，我為哀兵，我黨政軍民同仇敵愾，正反敗為勝、千載一時良機。若依你妙計，將九戰區長官部及湖南省政府撤往邵陽，你之用意只是叫我們為廣西看守門戶，請問如何看守？廣西有多少兵源、糧源？保有湘北，即保有湖南湘西，亦即保存了廣西。今太湖鄱陽湖已失，僅餘洞庭湖，如洞庭不守，何以足食足兵？如果湖南不守，兩廣湖北川黔亦難固守，請問你參的是什麼謀？是否準備做亡國大夫？」陳誠見白氏無辭以答窘態畢露，乃轉問曰「伯陵兄，你自信有勝算嗎？」薛曰：「有。我已向委座及夫人保證，如不能固守長沙，決自殺以謝委員長，自殺以謝天下」。其後續談作戰方案，需要何項支援。白氏默無一言，陳誠乃飭開車而去。薛將軍遂以重兵設伏於長岳公路兩側佈一袋形陣地，而以小部隊誘敵深入後，予以伏擊側擊、夾擊、追擊戰術，獲得殺、傷日軍四萬餘人之

輝煌戰果。日軍敗退後，白崇禧乃飭人先行通知衡陽新聞界及紳商領袖人物，乘夜車由桂林趕至衡陽發佈戰勝消息，大街小巷，鞭炮祝捷，報章以大字標題盛讚白崇禧之「豐功偉績」，「指揮若定」云云(104)。由此可見李、白人格之卑污。

李宗仁在回憶錄中說「我任北平行營主任三年，實在是吊在空中，上不沾天，下不著地呢！」(105)據金典戎回憶：「李宗仁在外貌上雖顯得一派忠厚，但他的權力慾和領袖慾卻特別強盛。北平行營表面上指揮第十一(孫連仲)、第十二(傅作義)兩個戰區，實際上不能過問受降事宜，也不能直接指揮軍隊，所以行營和戰區長官部權力上的爭奪戰集中在北平的敵偽產業、接收下來的物資以及一切生財有道的工廠企業。為此，李宗仁刻意架空忠厚老實的孫連仲，另組一個敵偽產業調查委員會，將對敵偽產業具有生殺予奪的大權掌握在行營手上。北平是有名的住宅區，又是僅次於南京的軍政中心，敵偽要人的住宅很多，經調查檢舉被查封的房產與物資不下千餘起。這些被凍結的東西，想啓封解凍，就要靠法幣與金條」(106)，如此這般，我們便不難理解，為什麼李宗仁在北平行轅(營)三年，能擷取故宮寶物十大箱了。

三二、扶植重用共諜劉斐郭汝瑰韓練成

在研究李、白的罪惡一生時，人們發現戡亂戰事期間長期在國防部執掌作戰機要的劉斐、郭汝瑰、韓練成盡皆李、白扶植重用的共諜。劉斐是白崇禧保送到日本陸軍大學深造，回國後由白崇禧破格提拔官至軍令部次長，「在一九四六年國共戰爭爆發後，為章先生以參謀次長參加官邸作戰會報，存心作出了許多錯誤的部署和獻議，使國民黨軍受到非常不利的後果。」(107)郭汝瑰受白崇禧賞識，僅一九四七年就一年三遷，由國防部第五廳廳長而第三廳(作戰)廳長而徐州陸總參謀長，在四年戡亂戰事中，他與共諜任廉儒接頭一百餘次，提供了歷次會戰的絕密軍情，幫共產黨打敗幾百萬精銳國軍。韓練成在萊蕪戰役中，以軍長身份故意將四十六、七十三軍引入共軍口袋，導致這兩個軍覆滅。事後他又和白崇禧唱和，指責陳誠指揮無能，致使陳氏由參謀總長降為東北地區的指揮官。一九四九年行政院把張治中等五人求和代表團名

單交李宗仁批准時，李特意加上劉斐的名字(108)。另據黃紉秋證明，郭德潔對李宗仁的部屬和武官最欣賞者就是劉斐。(109)這就不難明白，幾百萬國軍怎樣兵敗如山倒了。從李宗仁口述的回憶錄中，人們可以看到他是如此歌頌軍閥，包庇叛逆的：對土匪出身的舊桂系軍閥陸榮廷，讚為「無大過可言，治績比蔣先生頗有足多者」；對助紂為虐、協助陳逆炯明率軍圍攻總統府逐走孫中山、與革命軍鏖戰四年數度攻打革命大本營廣州且充任北洋政府所委潮梅護軍使、粵軍總指揮、督理廣東軍務善後事宜的叛徒林虎，則譽為「勇敢善戰，磊落光明，廉潔自守，用人不疑，影響我一生做人處事實至巨大」；只因李宗仁本人在林虎部下任過中尉排長。林虎的反覆無常、離經叛道，也確實對李宗仁叛變投共有所啓發與影響。後來，當共軍逼近陪都重慶、李宗仁專機飛昆明時，他每晚都與雲南省主席盧漢談至深宵。其時，盧漢雖建議由二人聯名發電誘蔣介石赴昆明，趁機扣押蔣介石施以凌遲酷刑，李宗仁只為擔心盧漢會把他自己也一併捉起來獻給中共邀功，才婉拒了。(110)

最不可思議的是李宗仁將賦性桀驁、狂妄自大的美國人史迪威吹捧為「赫赫的戰將」(111)可是翻遍這本六十萬言厚書，未見李宗仁說出史迪威有何「赫赫戰功」。此人畢業於軍校後，曾充任美國根據辛丑和約而派駐天津的佔領軍之語言教官，一九二六至一九二八年曾任駐津美軍第十五步兵團營長，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九年任美國駐華大使館武官。羅斯福將這位生平從未打過一仗的史迪威介紹給蔣介石擔任中國戰區最高統帥部的參謀長，是一大失策。由於史迪威的指揮失誤，擁有優勢裝備的英軍被日軍包圍於仁安羌，要勞動國軍第卅八師前往救援，英軍脫險後他又置數萬國軍於不顧，擅自離隊入印度，致使國軍最精銳的部隊不能回援危急的豫湘桂戰場，為了幫助史迪威報仇雪恥卻陷身印緬叢林，而我們自己因兵員不足損失了廿多萬平方公里國土、一百四十六座城市、三十多個機場，犧牲了裝備窳劣的近六十萬軍隊，使六千萬同胞淪於日寇鐵蹄之下遭到燒殺擄掠。在中國抗戰最艱困的日子，他將原在中國戰區作戰之美國第十轟炸機隊全部調埃及助英作戰，且拒絕將租借法案下撥給中國航空公司的兩架運輸機轉交給中國空軍；不肯向華盛頓代轉中國前線五百架飛機之作戰計劃、中印空

運每日保住五千噸數量之承諾；在豫中會戰吃緊時，蔣介石電史氏借用五百噸汽油與停泊在成都機場的二百架驅逐機，史氏悍然拒借。最令人髮指的是自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至一九四四年四月，他曾五次壓迫、三次要挾中國政府，以停撥援華物資相威脅，逼我遠征軍出擊，令他成爲叢林英雄。當華東戰事最危急之際，他以租借物資分配人之身份，對已運至昆明可供華東戰場使用之物資拒絕放行。日軍逼近桂林時，中國遠征軍在怒江前線與日軍惡戰，蔣介石欲調部份遠征軍回援黔桂，史氏竟親飛桂林自毀美軍機場，甚至要將美援武器直接援助共軍。像這樣一個危害中國人民整體利益的跋扈洋人，只有中共崇敬他，可李宗仁偏偏要吹捧他，豈不是與全體中國人民爲敵嗎？

三三、投共是因為不甘寂寞

李宗仁論及沈鴻英時，稱其「機警狡詐，反覆無常，早爲粵桂人士所不齒」；論及劉震寰則稱之爲「反骨仔」。(112)這可以說是「夫子自道」。據劉仲容回憶，早在西安事變前，李宗仁就與中共有所勾結：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李、白接張、楊電報，要求速派代表一人到西安商量要事，劉遂於事變前五日到達。事變發生後，劉以廣西代表身份在西安公開活動。中央軍進駐西安後，劉仲容秘密赴延安，會見了毛澤東，並答應秘密接待中共代表團赴廣西見李、白。此後，張雲逸到廣西，受到李、白秘密接待。抗戰爆發後，劉仲容代表李、白長駐延安一年多。一九三九年劉離延安時，毛澤東親函介紹劉給在武漢的周恩來，爲中共軍委會情報科做地下工作。劉仲容在白崇禧身邊十四年，官至國防部參議。一九四九年三月廿八日奉李、白派遣秘密北上向毛澤東乞和，向毛周匯報長達七小時。此人兩次北上，來去安全，均係李宗仁向毛澤東擔保。

從李氏自述知，他於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中就決定赴美治病，但十二月五日才辦妥簽證，美國駐華代辦師樞安則坦率對外交部北美司長陳岱礎說「李代總統出國時，美國方面並不歡迎，後因他是出國治病，也就未便拒絕。」據周宏濤記錄，李宗仁抵香港後態度數變，起初解釋赴港的理由是與蔣介石之間政見不合及蔣介石即將復職，隨後於十一月廿四日再致蔣介石

一函，堅稱要赴美治療胃疾。廿七日晚上白崇禧致電蔣介石，稱李宗仁「決心解除代總統職務請鈞座復總統職」。次日李宗仁得悉美國終於准許他赴美，態度又變卦了，他以親筆函致蔣介石，稱「在私爲根治舊疾、在公則實欲藉此爭取美援以期能解除今日我財政上之極度困難」，連他的總統府秘書長邱昌渭也對這種行徑極爲憤慨，強調不能以國家名器做任何人在國外的護身符。(113)

在競選副總統的日子裏，李宗仁以公帑招待近三千名國大代表，讓他們免費在五、六家飯店、酒家大吃大喝，一日三宴外加娛樂活動。(114)然而流亡美國後，失去了國庫這棵搖錢樹，他就不能繼續揮金如土了，「起初帶著一大堆隨員，光是食、住、行三樣就夠頭疼了。爲了曇花一現的風光付出的代價不但得不償失，且很快就產生坐吃山空的煩惱了，這才開始節流，遣散隨員，搬到較紐約生活程度低的新澤西州，花三萬美元買了一棟小平房」。郭德潔素以吝嗇見稱，「每週煮一鍋飯，一碗菜，且是一成不變的碎肉炒青豆，放進冰箱就解決一星期的民生問題」「兩個兒子，一是嫡出，一是抱養，兩個兒子都因愛母而仇父。在李最淒涼最需要親情安慰的歲月，他獲得的是冷冰冰的反應。僅憑此點，美國對他確係毫無留戀的地方。在大陸至少還有些親朋故舊可閑話桑麻，共敘家常，這也是吸引他回國的原因之一吧！一個在政治舞台上轟轟烈烈數十年的人物，突然變得有國難投無家可歸，被迫生活在人地生疏、語言不通、寸步難行的環境中，既無家室溫暖，也無天倫之樂，終日看報面壁，面壁看報，度過形同幽禁長達十六年的歲月，暮年他的心情苦悶豈是局外人所能體會？」(115)

三四、十二萬美金出賣人格與靈魂

「因久處高位，對世俗人情也日漸生疏，故在投資方面很容易受騙，先是玩股票被一廣東華僑蝕了一大筆，後又投資一位開旅館的廣東人，無端端蝕了五萬美元。可見他很容易受騙。他由反共、親共到投共的轉變也是如此，他看的報章雜誌是清一色的左傾刊物，最糟糕的是他對那些一面之詞照單全收從不置疑，故不知不覺地自動洗腦。他讀了太多的中共宣傳品，走火入魔地單相思」。這是他投共原因之二。

「劉仲容告訴我，李宗仁回國是他奉周恩來之命暗中策劃的，因程思遠在港生活困難，寫信向他求援，他寄了一筆錢給程，要他回國看看，並介紹程見周恩來。幾次會見之後，周要劉先給李宗仁二十萬美金現鈔，設法交到李手，不要經過銀行與外人。周說：我們知道李宗仁是在美國熬不下去了才想回國的，故先給他一筆生活費。」(116)

一九五五年八月，李宗仁在美國致函香港的程思遠起草《關於台灣問題的建議》，就是迫不及待洽降的信號。同年五月他讓程思遠秘密北上，向中共表達了他想歸國的願望，然中共懷疑他還想回去發展第三勢力搞局，故此事延宕了十年之久。李在北平行轅時，曾向故宮博物院借用一批大內書畫作裝飾，當選總統後未予歸還，一九四九年冬攜去美國。據一九六五至一九六九年擔負與李宗仁日常聯繫並陪他外出參觀的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宋坤披露，李宗仁「曾將自己收藏的一部份書畫作品送回國，聲稱當年自己是花了十一萬美金購買的。但其實不少是贗品，按當時的價格，頂多值三千美金。毛澤東得知這件事，答應給他十二萬美金，並說：『這是一筆政治賬，我們做統戰工作要講策略，他要十一萬，就給他十二萬』李宗仁拿到這筆錢，很滿意地說：『共產黨不簡單，是識貨的』」。「到一九六三年十一月，黨中央經過認真分析，認為歡迎李宗仁歸來的時機已經成熟。周總理特意囑咐事先向台灣當局打招呼，證明我方僅視李宗仁為愛國人士(按：不視作談判對手)以免引起誤會」。接著，程思遠赴瑞士蘇黎士向李宗仁提出「四不過五關」條件，即擺脫美國關係、不插手台灣問題、不和第三勢力攪在一起、不介入中美關係；過好思想關、政治關、家庭關、社會關、生活關。李宗仁全部同意，中共才安排他回國。宋坤對四不的解釋是「如果不擺脫美國的關係，出現對美國仍然抱有幻想言行，以他的影響，是要惹出麻煩的。鑒於李宗仁的特殊身份和地位，不宜由他出面在中美關係上做什麼事情；李宗仁是蔣的政敵，如果由李宗仁來插手台灣問題，必然要導致海峽兩岸關係的複雜化，正如周總理所說，已經告訴了台灣當局，我們不會利用李德鄰反蔣，所以李宗仁歸國後不能插手台灣問題；就第三勢力的問題來說，李宗仁曾經熱心於此，在這上面花費過不少精力。後來他組織第三勢力的活動失敗了，既

然是要歸國定居，理所當然要徹底斷絕這種念頭，不能再搞第三勢力、走什麼第三條道路了。」(117)

郭德潔去香港晤程思遠與收錢，還找了個算命的，對方說她是正宮娘娘的八字呢！「算命的說，李宗仁要東山再起呢，說不定蔣介石想開了，或者毛澤東上了西天，當然是李宗仁重登寶座呀！」甚至窗台上盆景開花她也說是鐵樹開花，幻想她能得回那失去的天堂！

李宗仁回歸的爆發點，是那年郭德潔查出罹患癌症，她不捨得在美國動用私蓄支付昂貴的醫療費，而期望能倚靠大陸高幹的特殊醫療待遇而出現奇跡。還有一種對外解嘲的說法是「要拯救他的部下和親友。自他回歸後許多部下和親友都獲平反而找到了好工作」。

然而不巧的是，他投共後正值文革動亂，他在抄家潮中度過了三年半心驚肉跳的歲月。郭德潔死後，中共公安部大肆追查「梅花黨」案件，稱郭德潔是美國特務組織梅花黨的負責人，奉中情局派遣赴中國大陸與高級戰略特務王光美聯絡，以梅花型胸針作為聯絡標誌。此案牽涉高幹甚多，成為文革十年的大型冤案之一。至於李宗仁本人，則是被共方用慢性毒藥毒死的。(118)據劉仲容說，李一回大陸，劉與他寸步不離。劉的任務是每天要記下李的言論及所見的客人，故直到深夜才能回家。李宗仁夫婦回大陸，僅享受了短暫的風光，卻成全了程思遠的富貴榮華。(119)

三五、反覆無常縱橫捭闔見利忘義的軍閥政客

據宋坤回憶，他陪同李宗仁拜謁廖仲愷墓時，李曾大罵：「老蔣是流氓，先殺廖先生打擊左派，後來又一手製造中山艦事件……」李宗仁在回憶錄中也提及蔣介石「發動三月廿日中山艦事變」。(120)關於刺廖案主犯張國楨、梁士鋒、楊錦龍被軍事法庭判處死刑，審判長本係周恩來。破案經過是，張國楨等人在廣州大塘李福林私宅舉行顛覆國民政府的會議，廖被刺身亡後，李福林怕東窗事發，於是出面自首。這樣一個早已水落石出的舊案還要翻出來誘過蔣介石，真係顛倒是非。

至於中山艦事件，近年公佈的大量史料，包括中共元老包惠僧、陳公博、張國燾等人回憶錄、季方報

告、黃珍吾報告、歐陽鍾報告、陳孚木回憶錄等等顯示，蔣介石根本沒有給海軍局或李之龍下過調艦命令，矯蔣之令的是黃埔軍校駐省辦事處主任歐陽鍾，幕後主使人是西山會議派、廣州市政委員長伍朝樞、孫文主義學會這三方面，而歐陽鍾的後台則是其叔、孫文主義學會骨幹、海軍官校副校長歐陽格；是「歐陽格與王柏齡定計，一面唆使姪兒矯令，一面向蔣介石謊報李之龍謀叛，其結果便演出了震驚中外的中山艦事件。事後，蔣介石查出事涉歐陽格，即下令逮捕，一九三七年歐被處死。事發時，蔣介石在日記表明，他以為係汪精衛擺佈與陷害，欲讓李之龍出動中山艦綁架他，事件真相大白後，蔣、汪之隙已成，且綿延十一年。」(121)其間蔣、汪時分時合，最後導致汪氏投敵叛國。弄清史實、撥雲見日的〈中山艦事件之謎〉一文曾被中共黨史與理論權威胡喬木讚為「一篇不可多得的具有世界水平的著作」「路子是對的，要堅持這樣走下去」，意謂此文作者楊天石在歷史研究領域撥亂反正，已證明「歷史研究為政治服務」是經不起時間考驗的。

一九四七年在上海曾發生過一起憲警衝突，荷槍實彈的憲兵殺死上海交警七人、傷七人；無辜行人死四人，傷二人。這宗發生在繁華市中心金都大戲院的慘案激成全市警察大罷崗，整個上海交通樞紐宣告癱瘓，中共上海地下黨乘機煽動警察組團赴京請願，還編印《伸雪報》，擴大事態打擊政府威信。事值美國特使魏德邁到滬，影響極壞。蔣介石遂下令國防部次長秦德純等大批中央大員到滬查辦。軍法審判結果，因掌摑警察並首先開槍的罪魁禍首、憲兵排長李豫泰竟從寬發落，僅判徒刑二年，只因他是李宗仁的姪兒；另槍決上等兵羅國新頂罪。警察方面兩名分局局長被撤職。(122)

由此可見，蔣介石對李宗仁確實做到以德報怨、仁至義盡。

李宗仁的人品究竟如何呢？據黃初秋文章披露，李宗仁僑居紐澤西期間「來訪的客人不少，同一些同病相憐的失意官僚政客，一談就是幾小時，自然全是政治上的的是是非非。如：某大員坐擁數十萬精銳而不可堪一擊；蔣介石臨陣換將和遙控指揮，以致失敗；某人丟了東北，蔣居然不加追究……美國人眼光狹隘，缺乏遠大眼光的政治家，若他們竭力援華，怎會發生

韓戰呢？這樣的談話多是與志同道合的人士，但若是李懷疑來人是親台或別有用心的，李的論調就變了，什麼我與蔣先生雖然政見不同，但私交毫無芥蒂，到底我倆為革命共同奮鬥幾十年，同甘苦共患難。大陸之失，我們都有責任，不能歸過於他一人……個人的榮辱不算什麼，大丈夫提得起放得下，我現在真感無官一身輕云云。可見李宗仁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的政客，他說的話多數不能置信。

對於李宗仁的上半生，陳存恭教授有如下評價：「李宗仁對北伐後第一個大動亂難辭其咎，他隱瞞了許多要點，刻意將挑起戰禍的責任反而歸諸魯滌平及中央，未免荒誕。最不幸的是北伐後的秩序因此打破，此後兵連禍結，從十八年打到十九年。馮玉祥既與桂系先有勾結，勢非決戰不可，而閻錫山在眾多反叛份子慫恿鼓勵下動兵，這些地方軍系或為保持並擴大割據的地盤，或為爭奪中央的領導權力，先後叛變，形成北伐後的大動亂」。(123)唐德剛氏雖然阿諛逢承李宗仁「不是反反覆覆、縱橫捭闔、見利忘義的黨棍官僚或市儈小人」「算個德勝於才的君子」(124)，但也不得不承認「這樁國民黨軍自相砍殺的內戰，實導源於一九二九年初之武漢事變。其後接踵而來的中原大戰和擴大會議，實是武漢事變所觸發的連鎖作用，而李宗仁正是這事變的兩造之一——也可說他是始作俑者，甚至可說是罪魁禍首。中華民國十八年如果沒有這一役討桂之戰，則後半世紀的中國，該又是另外一個局面了」(125)。李宗仁難逃歷史罪責罪責。

三六、首鼠兩端 左右逢源 學風妄誕 永遠有理

《李宗仁回憶錄》的撰寫，耗用了近六年光陰，唐德剛自稱是他此生「用功最深、費力最大、嘔心瀝血」之作，全書完稿於一九六四年，卻人為地延宕到一九八〇年由中共在大陸首印，亦即在先總統蔣介石逝世五年後才拋出，所有李氏渲染描述的「廣州梅花村訓蔣的過失和罪惡」等等均已成爲孤證，失去了當事人印證的機會。雖然唐德剛聲言已將李宗仁的聊天紀錄「用可靠的史籍、檔案和當時的報章雜誌所記載考據出確信不疑的歷史背景；再用烘雲托月的辦法把他口述的精彩而無誤的部門烘托出來」(126)，但這部

唐氏自詡「勢必永傳後世的民國信史」，卻大多數事件、情節不注明時間年月，這就為該傳主的歪纏、顛倒因果、巧言令舌打下了埋伏。

李傳英文版導言說，此書「是一位歷史製造者和一位歷史家的合著」(127)，唐德剛則自誇此書「勢必永傳後世」(128)，倒反而李宗仁說了一句「讓後世史學家去細細探討」。(129)然而讀者不難發覺，唐德剛的行文是有兩手準備的。他既說「全篇立說主旨，一切均以李氏意志為依歸，未參雜我個人半句褒貶之辭」(130)，又說「著述史料之蒐集、寫作計劃之擬訂，新式史學方法之運用與全部文稿之撰寫等等，則全是我一手包辦的」。(131)既說此書「是李氏一生各階段心路歷程底最忠實的報導」(132)，又說「他所說的大事，凡是與史實不符的地方，我就全給他箍掉了。再就可靠的史料，改寫而補充之」(133)；既說「盡量保持他口述時桂林官話的原語氣……盡量保留他那不文不白、古裏古怪的樸素文體」(134)，又說「李宗仁的口述歷史，統計起來，大概只有 15%是他口述，85%是我從圖書館、報紙等各方面資料補充與考證而成的」。(135)既自誇「這本書是李宗仁先生不平凡的一生事業底最完備的紀錄」(136)「是鮮有其匹、全始全終的一部當國者的自述」(137)，卻又稱：「老實說，這部書上所有的重要關節，很少我是不能在著述史料中提出註腳的。」(138)其言之“反覆無理”，昭然若揭。

唐德剛在撰寫過程中也常常是顛三倒四，自我擱掌。譬如「據個人探索，我也認為逼宮之說有點過甚其辭」(139)，卻又斷言「李氏豈能無『彼可取而代之』之心」。(140)這種種顯示，自稱歷史學家的唐德剛氏所秉持的學術信條就是：首鼠兩端，左右逢源；正反論點兼蓄，因此一貫正確、永遠正確。這一種學術捐客的投機耍滑學風被他攜入大陸，灌輸到萬千少不更事的青年學子腦海中，誤人子弟已經整整一個時代。

然而，唐德剛的大作，只會誤導一些讀書很少的、與世隔絕的年青人，以及毫無歷史常識的文化奸商(如成露茜之流)。像李宗仁回憶錄這樣的謗書儘管銷售一百多萬冊，但總有被人拆穿西洋鏡的一天。君不見大陸上新華書店的“毛選專櫃”門可羅雀無人問津嗎？想當年毛選印行十億冊以上，不少家庭擁有七、

八套之多，其中有官方強迫人民購買的，也有各單位作為職工福利饋贈的；然曾幾何時，四人幫倒台，工廠、學校、街道大掃除時紛紛將毛著成捆成捆裝上大卡車送去廢品回收站，如今要在普通民居找到一本毛著已是難上加難。《李宗仁回憶錄》從暢銷到被人們唾棄，當也可作如是觀！

三七、夏志清、宋淇、蘇雪林對唐德剛……

(該節為本刊全部刪除)

註釋：

- (1) 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的滄桑》，原載唐著《史學與紅學》，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十二月版，頁一七四。
- (2) 國防大學黨史教研室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檔案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九月版，頁三三一。
- (3) 陳存恭〈從李宗仁回憶錄論新桂系與中央的關係〉，載《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第一輯，中華民國國史館編印，一九八六年六月版，頁二六八。
- (4) 郭冠英〈張學良口述史腰斬的經過〉，載台北《傳記文學》第七十九卷第五期，頁六十七。
- (5) 同(3)，頁二六七、二九〇。
- (6) 同(3)，頁二二四。
- (7) 同(1)，頁一六四。
- (8) 唐德剛撰《李宗仁回憶錄》，香港南粵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三月版，頁六二三、六三〇、六三三、六三九、六四七。
- (9) 同(8)，頁六三五。
- (10)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國現代史學會理事長李新主編《中華民國大事記》第五冊，頁八三九，中國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二月版。
- (11) 同注(10)，頁八四四。
- (12) 同(8)，頁六〇八。
- (13) 同(8)，頁六〇〇。
- (14) 黃啓漢〈一九四九年和談的回憶〉，載中國文史出版社《文史資料選輯》第六十七輯，一九八六年版，頁十一—二十八。
- (15) 劉仲容〈白崇禧逼蔣下野前後〉，載《新桂系紀實》下冊，頁一一七。廣西區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一九九〇年十月版。
- (16) 朱振聲〈湯恩伯與保衛大上海之戰〉，香港《春秋》雜誌第三〇八期，頁二六。

- (17) 周宏濤《蔣介石與我——見證中華民國關鍵變局》，台北天下遠見出版有限公司，二〇〇三年九月版，頁一一九、一三〇、一五四、一五五、一八四。
- (18) 同(8)，頁六二四、五九六。
- (19) 同(8)，頁六三七。
- (20) <李宗仁的索權逐蔣計劃>，載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楊天石著《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〇〇二年二月版，頁四七八——四八六。
- (21) 程思遠《李宗仁先生晚年》，頁八六。文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
- (22) 同(15)，頁一一六，程思遠<蔣介石發表求和聲明的經過>。
- (23) 同(17)，頁四一四、八六、九二。
- (24) 陳存恭訪錄《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編印，一九八四年五月，頁八七八。
- (25) 同注(8)，頁六五五。
- (26) 同注(10)，頁八三五——八八七。
- (27) 東方綠<小諸葛白崇禧與華中之戰>，《春秋》雜誌第四〇三期頁十二。
- (28) 宋希濂<白崇禧怎樣逼退蔣介石>，載台北《傳記文學》第六十二卷第六期，頁四十七。
- (29) 《文強口述自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〇〇三年一月版，頁二六一。
- (30) 蟄翁<西南大撤退之際白崇禧竟毫無作為>，載《春秋》雜誌第四五四期，頁十三——十四。
- (31) 政海清客<李宗仁代總統前後>，載《春秋》第卅六期，頁八。
- (32) 同(17)，頁一三九——一四〇。
- (33) 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十八輯。中國文史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版，頁二五九。
- (34) 同(33)，頁二八二。
- (35) 同(33)，頁二八四。
- (36) 阮毅成<與王雲五先生談金圓券>，載《傳記文學》第四十五卷第二期，頁二十。
- (37) 谷正文《白色恐怖秘密檔案》，台北獨家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九月版，頁二三七——二四〇。
- (38) 據一位接近李宗仁與孔祥熙家族的香港商人李龍鏞披露，李宗仁攜往美國一百多萬美金，多數由其長子李幼鄰掌控，其中財政部長劉攻芸撥付三十萬美元、華中剿總公帑三十萬、廣西財政(存於香港銀行)二十萬、廣西錫礦存款二十五萬、李宗仁宦囊十八萬、郭德潔私蓄八萬。他在北平行轅任上，擷取了故宮寶物十大箱，均存放於紐澤西州住宅的地庫，其中有不少是徐悲鴻的名畫。郭德潔親口對黃初秋承認，李宗仁出國前，劉攻芸給了卅萬美元，為此，劉丟了官，還挨老蔣大罵一頓。
- 又據黃啓漢文章披露，財政部要中央銀行撥給華中軍政長官白崇禧大洋四百萬，由於央行沒有這麼多的現洋，其中一部份就以一萬五千兩黃金折價，派專機運去漢口給白。此事由央行業務局白懷民透露。一九六七年十月黃啓漢到北京最後一次見到李宗仁時，李親口證實確有其事，還說白曾託他問詢陳濟棠的哥哥陳維周，有無辦法幫他把黃金運進香港。[同(14)，頁三九]。
- (39) 同(8)，頁四四五、六七六。
- (40) 《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第二卷一分冊，頁一九七，中華書局出版。
- (41) 華南師大歷史系左雙文教授<九·一八事變後南京國民政府設立的特種外交委員會研究>，係二〇〇二年八月北京舉行的《中華民國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
- (42) 黃仁宇《大歷史不會萎縮》，頁二〇九、二一七。廣西師大出版社二〇〇四年五月版。
- (43) 同(8)，頁四〇二。
- (44) 同(8)，頁四四七。
- (45) 鍾卓安《陳濟棠》，頁二〇九——二一二，廣東省地圖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十二月版。
- (46) 《李潔之文存》，頁三〇三。廣東興寧縣政協文史委員會一九九〇年九月版。
- (47) 同(3)，頁二五〇——二五一。
- (48) 同(8)，頁四二五。
- (49) 同(8)，頁四一七。
- (50) 同(20)，頁五五八。
- (51) <胡漢民的軍事倒蔣密謀及胡蔣和解>，同注(20)，頁三〇三——三四九。
- (52) 陶然<胡漢民被困湯山內幕>，載《春秋》雜誌第六八七期，頁三三。
- (53) 黃旭初<東遊見聞再記>，載《春秋》第三二〇期，頁一六，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 (54) 同(8)，頁五〇二、四八三、四七一、四九一、四九〇。
- (55) 盧漢<第六十軍赴徐州作戰記>，載《抗日戰爭正面戰場》，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二〇〇〇年十二月版，頁一六五——一六八。
- (56) 同(1)，頁一六八。
- (57) 同(8)，頁四七八、四七九。
- (58) 李以劭<親歷台兒莊大戰>，載《傳記文學》第七十二卷第四期，頁五二。
- (59) 傷亡統計引自共軍上海警備區政治部、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會合編之《警備大上海》一書，頁九。上海遠東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發行。
- (60) 同(8)，頁五五六、五八九。
- (61) 蔣緯國撰《歷史見證人的實錄》第三冊，頁一三一，台北青年日報社出版，一九九七年十月版。

- (62) 士心<陳誠副總統二三事>，《春秋》第一八六期，頁十四——十五。
- (63) 同(8)，頁五九〇。
- (64) 白先勇<父親的憾恨>，刊香港《素葉文學》第六十八期，頁四三、四七、四九。二〇〇〇年十二月版。
- (65) 金典戎<哈爾濱燈火在望>，刊《春秋》第六十九期，頁七。
- (66) 同(8)，頁六四七。
- (67) 王禹廷《胡璉評傳》，傳記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六月版，頁一四五。
- (68) 《顧維鈞回憶錄》，頁八九四。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七年六月版。
- (69) 同(8)，頁六四二。
- (70) 顧維鈞回憶錄也提到：「一個剛從台灣和廣州回來的人，把廣州描繪成一個放蕩墜落、道德敗壞的地方。那裏有一種絕望和醉生夢死的氣氛。據說人人都盼望三樣東西來幫助拯救中國：美國的援助、第三次世界大戰或出現奇跡。但是他們自己卻不想工作，也不想戰鬥」。同(68)，頁八三〇。
- (71) 同(68)，頁八二七。
- (72) 同(68)，頁八三〇。
- (73) 同(8)，頁五六三。
- (74) 李龍鏞<延安巧妙利用美方的一次戰略空運>，刊《春秋》第八四〇期，頁十一——十六。有關美國幫助共軍將高級將領空運到內戰前線之事，也可見《聶榮臻回憶錄》，頁五二六。
- (75) 同(8)，頁五二二。
- (76) 同(8)，頁五九四。
- (77) 馬不羈<徐蚌會戰見聞錄>，刊《春秋》第一一一期，頁十六。
- (78) 同(8)，頁六四七。
- (79) 一野戰史辦公室《西北大剿匪》頁四、二七、四三〇。解放軍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九月版。
- (80) 同(8)，頁五四二。
- (81) 同(33)，第十一輯，頁四九九，雲南綏靖公署高參劉文潮<雲南起義前後的見聞>。
- (82) 田西如<中國抗日根據地發展史>，頁六五〇，北京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七月版。
- (83) 同(8)，頁六二〇。
- (84) 《博訊網》二〇〇四年五月十四日報導。
- (85) 同(8)，頁五四三。
- (86) 事見魏肇權<楊永泰被刺之謎>，載北京《法制文學選刊》一九八六年七月號。
- (87) 辛平編著《民國將領傳》，頁三一五。遼寧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二月版。
- (88) 孟紹濂<王天培之死>，同(33)，第三輯，頁八五六。
- (89) 黃紉秋<我所認識的郭德潔——兼談李宗仁在美國的寓公生涯及回大陸前後>，載《傳記文學》第五十二卷第四期，頁九三。
- (90) 程思遠《政海秘辛》，頁一〇四——一一五，<王公度案內幕>，香港南粵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一月版。
- (91) 同(8)，頁九七、六五、八六、一一四。
- (92) 金典戎<李宗仁主持北平行營時國共間諜鬥智紀實>，載《春秋》二〇八期頁十五。
- (93) 同(8)，頁五九二。
- (94) 趙榮聲《回憶衛立煌》，文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一月版。
- (95) 同(8)，頁六二五。
- (96) 載《傳記文學》第五十二卷第一期頁十六——二十。一九八八年元月出版。
- (97) 李龍鏞<論孔祥熙為國理財為功為過？>，載《春秋》第九一九期，頁二十。
- (98) 同(8)，頁六二二。
- (99) 同(17)，頁三一三——三三五。
- (100) 同(68)，一〇〇〇——一〇一七<毛邦初與周至柔之爭及這些問題對美國援華政策的影響>。
- (101) 同(8)，頁六七六、四二七。
- (102) 同(8)，頁四二八。
- (103) 李以勛<記張發奎將軍在抗日戰場的軼事>，載《傳記文學》第六十九卷第一期，頁五四。
- (104) 陳夢因<儒將薛岳百歲榮壽>，載《大成》第二五三期。
- (105) 同(8)，頁五六九。
- (106) 金典戎<李宗仁孫連仲鬥法記往>，載《春秋》一九五期，頁四。
- (107) 程思遠撰<深切懷念劉為章先生>，載劉沉剛著《劉斐將軍傳》，民革團結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九月版，頁十三。
- (108) 同(8)，頁六一五。
- (109) 同(89)，刊《傳記文學》第五十二卷第三期，頁三三。
- (110) 同(8)，頁六七五、五六、六六三。
- (111) 同(8)，頁五三三。
- (112) 同(8)，頁一二六、一二九。
- (113) 同(8)，頁一九七——二〇四。
- (114) 同(70)，頁八四三。
- (115) 黃紉秋<李宗仁回國投共前見聞>，載《傳記文學》八十二卷第二期，頁一四。
- (116) 同(89)，頁九六。
- (117) 宋坤<追憶李宗仁歸來>，載《文史資料選輯》第一四〇輯<統戰史話>欄，文史出版社，二〇〇二年二月版。
- (118) 同(1)，頁一九三。
- (119) 同(89)，頁九六。
- (120) 同(8)，頁二一一。

參加淞滬抗日戰爭回憶錄

薛寅軒

- (121)〈中山艦事件之謎〉，載楊天石《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〇〇二年二月版，頁一〇七——一二九。
- (122)柳和清〈金都血案親歷記〉載《上海文史資料存稿匯編》第十二輯，頁二〇八。上海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二〇〇一年十二月版。
- (123)同(3)，頁二四二。
- (124)同(8)，〈序言〉頁七、八。
- (125)同(8)，〈序言〉頁四。
- (126)同(1)，頁一六八。
- (127)同(1)，頁一五三。
- (128)同(8)，〈序言〉頁九。
- (129)同(8)，頁六三九。
- (130)同(8)，〈序言〉頁八。
- (131)同(1)，頁一五二。
- (132)同(8)，〈序言〉頁一。
- (133)同(1)，頁一六八。
- (134)同(1)，頁一七一。
- (135)〈文學與口述歷史〉，同(1)，頁二五。
- (136)同(8)，〈序言〉，頁一。
- (137)同(1)，頁一五六。
- (138)同(1)，頁一七五。
- (139)同(1)，頁一四八。
- (140)同(8)，〈序言〉，頁六。
- (141)夏志清《諫友篇——兼評唐德剛〈海外讀紅樓〉》，載《傳記文學》第四十九卷第二期，頁四二——五三。
- (142)宋淇〈未識其小，焉能說大？〉載《傳記文學》第三十七卷第五期，頁四九。
- (143)蘇雪林自費出版的文學評論集《猶太之吻》。
- (144)唐德剛〈我犯罪了，並無解說〉，載《傳記文學》第四十四卷第五期，頁七一。

先由我被徵入伍說起。中華民國施行徵兵制度，是由民國二十五年先在河南開始，成立豫南師管區，十月間開始徵兵，徵服兵役辦法是家有兄弟三人，即應徵一人，這時地方實施保甲制度，村莊十戶為一甲，十甲為一保，甲有甲長，保有保長，保上面是聯保，設有聯保主任，我們這個聯保，共應徵六人，我是其中一個，應徵者中，家庭環境較好的，大多花錢請人代替，我家雖有能力請人，但我不同意如此作，決心應徵，同時也是受到我大哥的鼓勵，他非常愛我，也是我最尊敬的哥哥。大哥很有遠見，也非常聰明，在地方上頗有名望，人緣也好，親友都知道薛潮海喝酒劃拳，沒有人能贏得了他。可惜受到生活環境關係，雖有過人的聰明智慧，亦難發揮其才華。因此他認為我雖然讀了不少書，不出外去闖，很難有所發展。所以他同意我的決定。

一九三六年十月間離開溫馨的家，踏上陌生的路途，中午時分，走到楊埠西十餘里的地方，休息片刻，就在路邊攤吃了一碗羊肉面片，稍稍有點辣味，也許是餓的關係，覺得非常好吃，至今記憶猶新。當晚到了汝南縣城，晚飯吃的是饅頭、大頭菜、白開水。臨睡沒有床鋪、沒有棉被，祇有麥秸鋪地。無奈祇好躺在麥秸堆裏和衣而眠。第二天走到駐馬店，吃的仍是饅頭、大頭菜、一碗稀稀的菜湯。第三天由師管會人員監管，由駐馬店走向信陽的道路。此時被徵者約有二百人左右，沿途監視森嚴，以防逃脫。經明港到信陽，師管區人員把我們移交軍方。此次豫南各縣被徵者，總共約一千五百人左右，開始軍訓，正式成為國家的一個軍人。

在信陽受訓快結束時，適逢西安事變，於是部隊開拔至西安，我們到達西安的時候，事變業已平息，但各部隊尚未離去，都集結在西安西門外廣場，約數萬人之多，聆聽高級長官訓話，當然我們也在其中。此時僅知楊虎城被捕，對西安事變始末，不得而知，

**感謝千小駒先生
捐助黃花崗雜誌 2000 美元**

本刊新增榮譽訂戶

王玉華、李又寧、趙贈義

徐英朗、胡芷民、羅漢卿

魏紫丹、張明宏、張國威

高優鏢、林先生 (10/31/04 前)

也無從去問，同時也沒有去問的必要。聽完訓話之後，即住進西安西北約數華里之遙的營房，分別編入正式部隊中。我原是學生被徵，較其他新兵知識水平稍高，就編入團部通信連。接受課程，當然與其他兵種不同，部隊的番號是整編第五十七師野戰補充團。當時通信連是張連長，未久調升團副，遺缺由王鳳岐接任（王連長一九三九年被勤務兵用鐵釘穿耳身亡，勤務兵掠其財物而逃，此系後事，順便一提）。團長龍子玉、旅長姓談、師長阮肇昌。在西安受訓時間，編入步兵連的同鄉，有被打的，有被罵的，他們向我訴苦，我心裏也很難過，就偷偷地寫了一篇文章，貼在廁所牆壁上（第二營與通信連共用一個廁所），大意是說：我們在家都是被父母疼愛的嬌嬌者，被徵入伍遠離親人，為國效力，現在受打挨罵，如果是官長的兄弟親友處此境地，能如此對待嗎？希望各位官長，善待下屬，多予言詞教導，少予打罵責罰，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縱有小過，衡情處理，期能使受罰者，心服口服，毫無怨言，如此則收效更巨，至所企盼。記得我寫滿了一張信紙，事隔已六十五年，詳細內容已記不清楚了。後來不知被誰撕下，送交第二營長，於是營長就召集全營官兵追查是誰寫的，當然查不出所以然來，因我不屬於第二營的人。這是在第二營服役的同鄉告訴我的情形。

在西安受訓期間，每星期由連長或排長帶領到西安城內澡堂洗澡一次，有時去看曹金順演唱河北蹦蹦戲（評劇），當時覺得她唱得很好，聲如黃鶯，至今音猶在耳。同時又見到一位殘廢人，沒有雙臂，用腳來表演點火吃煙及其他動作，年約四十多歲，後來聽說這個人是日本漢奸。

日本侵華七七蘆溝橋事變，淞滬戰事接續發生，我們部隊由西安開往上海，八月十三日下午三四點鐘的時候，到達上海老龍華車站，火車剛停下來不久，日機即來轟炸，這時我們通信連已離開火車，在附近地方休息。事後聽說第三營士兵被炸傷數人，當晚卡車來接，車不開燈，怕被日軍發現派機轟炸。到達前線，下了汽車，不知東西南北，祇見前方有數裏長的火光，如颱風般的嗶嗶聲，時而有呱嗒呱嗒炮聲，聽不見機槍和步槍聲，流彈火星不停地由頭頂上飛過，敵、我射出子彈的密度，可想而知。這時祇有聽從命

令，不知害怕，後來聽說上海抗戰，開始時，是由七十八、八十七兩個師先與日軍接戰，傷亡最為慘重。

通信連是團部直屬單位，隨團部行動，畢竟團部距前線較遠一點，因為團部前方還有營部、連部、最前線是步兵排。這天夜裏去到哪裡駐紮，已記不清楚了，祇記得經過大場，因為大場外面有被日機炸毀的汽車，有的還在燃燒。有一排樓上面書有大場二字，至今記憶猶新。這天好像就住在大場附近的地方，戰場附近老百姓皆已逃離，村莊房屋空無一人，部隊都是住在民房。在淞滬戰役初期，部隊調動頻繁，記得我們到過閘浦、浦東、閘北、南翔等地方，後來到江灣一帶住得比較久，最後到江灣上海新市政府。

在閘浦附近住的時候，有一天夜晚，我們一班人去查線（團部通營部電話不通，由通信連派人去查）走到一處高粱地頭時，突然砰砰兩聲槍響，有一槍打中一位同事的右肩，放槍者在高粱地，高粱高過人頭，我們在明處，他在暗處，每人身上雖帶有槍，也無可奈何，祇好攙扶傷者回連。後事如何，已記不起來了。

有一次夜間移防時，在路邊稻田裏有人發射信號彈，不久日機即到上空，並放照明彈，照明彈在空中照耀著地面，與月之十五亮度差不多，記得這時的月亮，有薄薄浮雲，我們伏在路邊，不敢動彈，這是我遇到的兩次漢奸在後方擾亂的情形，相信其他部隊也會遭到漢奸如此的傷害。據說上海有漢奸團，專門刺探軍情並伺機擾亂，部隊一有行動即告知日軍派遣飛機前來轟炸或掃射，但這次僅在空中盤旋一陣後即離去，也許我們伏在路邊，它看不清楚，同時部隊零星，不是聚在一起，即使轟炸，也不會有好的成果，等飛機離去之後，我們繼續行軍到了一個村莊，住進房屋之後，即在屋內挖塊地洞，上面蓋層門板或其他可利用的東西，門板上面加土，飛機來時，即躲進洞內，多少天來沒有洗過澡，也沒睡過床，夜晚靠一條軍毯就地和衣而眠，有一次幸運遇到老百姓在筐子裏尚未處理的棉花，就將它全倒在防空洞土堆邊充當床鋪頗感溫暖舒適。

天氣漸冷，上海商會募款制贈棉衣，號稱十萬，但兵員太多，不足每人一件。記得有一天深夜時分，奉派勘查電話線路，到一鎮上，商民均已逃離（聽說是江灣，大街上鋪有石板），四周靜寂，鴉雀無聲，

淒慘景況，不禁毛骨悚然。隻身一人，又恐遇到漢奸，真乃欲哭無淚。身上衣服單薄，難以禦寒，寒風侵肌之苦，乃使我不顧其他，走到一家店舖，找到一件銀灰色女子旗袍禦寒，然後強打精神，完成任務，幸有月光時隱時現，並賴神靈保佑，安然返回營地。到連上才把它脫下，連排長明知亦不過問。又過不久，團部命令通信連派兩排人去前線架設鐵絲網，我是其中的一員，這件旗袍又派上用場，到了前線戰壕的前面，剛把鐵絲網架好，稍作休息，有位同事，劃一根火柴吃煙，被敵人發覺，機槍步槍一起射來，我就連忙由鐵絲網下面爬進戰壕內，幸好沒有人員傷亡。可惜我的旗袍被鐵絲網掛了一個大口子。這件旗袍，頗具紀念性。一直保存到長沙第二次會戰，實在無法再帶，才把它丟掉。

我們對漢奸痛恨到極點，有一天在我們連部附近，發現有一男子，此人年約五十歲上下，身高五尺半左右，面紫色，身體魁梧。這時當地居民均已逃離，沒人敢留在家中，他在連部門的左前方，約一百公尺處稻草堆旁(有幾堆稻草已記不得了)鬼鬼祟祟，形跡可疑，於是連長就命人把他捉著綁了起來。詢問結果，此人非但不是當地居民，也說不出在此鬼崇行動之理由，漢奸嫌疑極重。爲了我軍少受漢奸之害，遂由連長報告上級核准就地活埋。這個人被埋的地點，是在連部門的右邊約一百公尺左右田地裏。連部門前有一條長型池塘，草堆就在池塘左邊(以當時的連部門爲准)。如果這家老一代的人，看到這個報道，可以把這個漢奸的屍骨挖出來，這個地點在當時也沒想到把它記下來。

團的編制有通訊連，它的任務是團部與營的通訊聯繫，通訊連有一部總機，營部通訊排有一部總機，其他各級主管所用之電話機完全是手搖式，外面牛皮套，有帶子可背在身上。團部各單位主管及各營的電話線路，由通訊連負責架設：電線裏面是銅絲，外面橡皮包裏纏在工字型鐵架上，成爲一卷一卷的，鐵架中間軸是空的，用作穿繩或將其他替代品背在身上，如果線路不通，就要排人去查。當時部隊通訊設備落伍可想而知。

這天輪到我當值負責查線，可巧線路發生故障，祇好不畏艱險一段一段地去查啦，大約九時左右走到一條河流旁邊，這時約有二三十位工兵在那裏做工，

河流上面有一道浮橋，這是工兵架設的。查到這裏，發現線路仍有問題，必須過去浮橋繼續再查。我走到橋頭，看見橋邊一堆人的屍體，有的已腐爛、有的尚屬完整、有的手臂沖搭橋邊(漲潮的關係)，蛆及蒼蠅佈滿屍體，真是慘不忍睹，臭氣四溢，聞之鼻酸，至今偶爾憶起，猶感嘔心。

這些屍體大多是軍人，雖然可怕，但還得經過這道浮橋去查，過橋後是片稻田，走到離稻田地不遠處，猛一抬頭見一士兵頭戴鋼盔跪在那裏死去，身上沒有槍枝，再走幾步，敵人槍彈射擊過來，啪啪數響，上天保佑，未射中我，這時有一廣西戰士喊叫，表示你怎麼這樣大膽敢到這裏來，這是敵人封鎖線。怎樣知道是廣西士兵呢？因廣西部隊所戴鋼盔與中央軍不同，中央軍鋼盔藍綠色較大，廣西部隊鋼盔淺黃色比較小，所以認定他是廣西士兵。

查完線路之後，繞路回到浮橋，又見橋的這邊有一堆屍首(退潮的關係)，橋那邊的屍首，漂到別處去了，同樣是那種慘狀。

過了橋就是一座工廠，工廠前面是一條公路，工廠就在河流與公路的中間。我過了浮橋，經過工廠後邊，剛離開工廠約百公尺左右，突然看見日機飛來轟炸這座工廠，被炸起飛的土塊，約小飯碗般大落在我的面前，飛機投彈的情形，看得非常清楚，飛機往下俯衝時，表示即要投彈，這時祇有微弱聲音，炸彈脫離飛機一剎那，則噙的一聲，往高處爬升，繞飛一圈，又轉回頭來再炸。如此這般反復數次，才行離去，炸彈在空中墜落時聲音嗖嗖……落地爆炸候煙塵瀰漫。在第一顆炸彈丟下時，看它似乎要落在我身邊。當時因我離工廠不遠，好在僅一片泥塊落在我面前。當時緊張情形，可想而知。等地二輪轟炸時，我已逃離工廠較遠處躲藏，此時我心不再砰砰地跳動得那麼厲害。日機轟炸這座工廠，因爲本日上午有工兵在工廠後面河邊做工，可能被日軍發現，認爲工廠內駐有我方部隊，所以才召空軍前來轟炸。可是工廠內並無我方部隊，其實工兵也早已離去。倒楣的是這家工廠啦。

日機去後幾分鐘，又見這家工廠的右前方約三四公里處上空，三架意大利六個頭飛機，轟炸一處村莊，我們稱這種飛機是黑寡婦。飛機左右翼上一動，約二三十枚炸彈便從空而降，不知爲什麼炸這個

村莊，可能是這裏駐有我方部隊，有漢奸報告或者被日機發現，因為日機每天從早到晚總有一架或兩架在空中盤旋，如果有三五人同行，它就用機槍掃射，一旦發現人數較多時即召轟炸機前來轟炸。

意大利派飛機幫助日本轟炸我們，當時它是日本的同盟國，這種情況下，我們部隊便白天躲藏，夜晚始能行動，如此抗戰，何等艱苦。前線官兵在戰壕內抵抗日軍進攻，有時亦受飛機掃射，傷亡慘重，可以推想到的。死亡戰士，大多就地埋葬，戰壕內也成軍人墳場，由於屍臭味，不能再待下去，就退至另一戰壕。更可恨者日本坦克，在戰線前面踱來踱去，並不時向我陣地襲擊，據聞在無可奈何之下，有戰士身綁手榴彈衝至坦克車下，用手榴彈將它炸毀，此種犧牲精神可歌可泣。

另一次夜晚去前方查線，不是我一個人，而是幾個人同去，到了前方營部駐地，沒有燈光，也無月光，傷兵在那裏哭叫，淒慘情況，不言而喻，藥品缺乏，醫護人員又少，亦無交通工具，祇靠擔架，傷者人多，往後方運送困難。此情此景，真是人間地獄，加之不知從何方隨風吹來的陣陣屍臭，更顯淒慘。當時心情，可說壞到極點，痛恨日軍侵略我國造成這種悲劇。

最後移防至江灣小上海新市政府，大門好像向西，後面離江不遠，一棟(四層或是五層已記不清楚了)鋼筋水泥建築，在我們到達以前，靠江的那幾間和頂樓，已被飛機與江中的軍艦炮火轟得稀爛，可能其他部隊在此駐防時，被轟炸成這個樣子。這棟建築很大，長方形，我們整團都住在進門的大廳和其他房間內。第二天早晨日機投了一枚炸彈在我們住的窗戶下面，當時覺得房子搖晃一下，結果窗戶上約二公分左右粗的一隻鋼筋欄桿被炸彎曲，窗外靠牆炸了一個約五六尺深的大坑。第三天下了一陣大雨，彈坑裏積了部分雨水。我們吃的乾饅頭，一點包心玻璃菜，很少有其他菜類，淡而無味，因倒了胃口，至今對包心玻璃菜，不願再吃。火夫挑擔送來的水，根本不夠喝，口渴無奈，就在這炸彈坑裏取水解渴，神靈保佑沒有鬧肚子，同時看到日艦在黃浦江中游來游去，毫無忌憚，並不時向我住處發炮，但我們在市府大樓這頭，安然無恙。我有時去到樓上看看，祇見廢紙滿地，辦

公用品亦零亂不堪。聽說有人在樓上撿到一些貴重物品，可見市府員工逃離時，情況如何緊張。

記得在江灣附近駐防時，我團第二營兩個連曾在某日午時，奉命出擊敵人，覺得祇有兩三個小時，兩連官兵回來的不到百分之二十。這些為國犧牲者，百分之九十是河南人。我們一個聯保入伍六人，有三人在上海戰死，相信有在這次突擊中犧牲的。

十一月中奉命撤退，這時我已調在連部當幫寫，在前方辦理師爺的事(當時文書上士和軍需上士均稱為師爺，在後方辦公)，行動比較自由。走了一夜，第二天上午，饑渴難耐，這時撤退沿途居民均已逃離，碰巧遇到路旁有戶人家，好像是一家餐館，門未上鎖，不管是否違紀，進去看看再說，希望能夠找到可以吃的食物，可能店東將未售出之食物，留在櫃檯，故意門不上鎖，讓經過之國軍饑餓時食用。因此地居民均已逃離，祇有國軍經過，唯恐趕不上部隊，不敢久留。於是拿著邊走邊吃，至晚又沿火車路線走了一夜。一天又一夜，沒有休息，實在疲勞不堪，很想躺下大睡一番，但時事逼迫，不得不勉強繼續地走。有時走在平坦路時，兩眼不由自主地閉起來，但兩腿仍一步一步地在移動，偶爾還作起夢來，由此可知是如何的疲勞啦。

第三天已離開戰場較遠，其他部隊也已退了下來，沿途人潮洶湧，有休息的，有繼續走的，日機一來，大家都伏在路旁，有時集中火力向日機射擊，祇靠步槍與機槍，畢竟射程有限，據說日機曾被射中過，可是我沒親眼看見，但也未見日機投彈或掃射，我們邊走邊休息，大概已經走過了昆山，有些老百姓開始跟著部隊逃離，見一年青婦女，穿著高跟鞋，擔著擔子，後來擔子不要了，高跟鞋也不要了，另換其他鞋子，把重要的東西挑出來，包著小包背在身上，我想他們是要去後方某處親友家暫避禍患，認為跟著部隊走比較安全。在常熟抑或無錫附近，有一小女孩約六七歲，身穿紅毛衣，清秀可愛，與家人失去聯繫，哭個不停，其他逃離者，自顧不暇，均置之不理。小女孩可能很多時未曾吃飯，當時我們部隊從此經過，見此情景，深感可憐，於是就由我們通訊連傳令兵(名字已不記得了)帶領照顧。曾幾何時(時間也記不得了)，到達惠山腳下一民宅住下，是何地方當時亦未留意，祇聽說過了山就是太湖。這小女孩頗聰明，在

連裏已不生疏，我當時的名字是薛朝會，她叫我薛到貴，不知她說的是何處語言。

那位傳令兵，年約二十六七歲，北方人，部隊在此駐紮數日，即行開拔，傳令兵和小女孩，即未隨部隊後撤，他們的去向，至今仍是個迷。上海抗戰三月，可說艱苦倍嘗，死裏逃生。

這篇回憶錄，均系事實，毫無虛構。因時間已逾六十餘年，還有許多事情，一時想不起來，僅就記憶所及予以寫出，多多少少可使後代子孫知道抗日的部分情形。

二〇〇二年書於紐約市

我憤怒了！

92歲要飯人……

——一個抗日英雄的淒涼晚年

讓我們把「92」這個數字倒過來就是「29」。63年前，29軍大刀片曾壯我國威，讓侵華日軍鬼子兵聞風喪膽，屁滾尿流。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在今天，當然是「最後一批人」。當時，江澤民的生父在當漢奸，江澤民在日偽大學學習。

楊雲峰，92歲，29軍老兵。他家住河南省舞陽縣北辛渡大牆後鄉。我和我的同事98年6月去他家探訪時吃了閉門羹，我們足足等了四天也不見他的人影回來。後來，聽說他要飯去了。當時的舞陽縣驕陽似火，麥浪翻滾。百般無奈，我們幾個一商量：「看看他家裏什麼樣也好」。於是，我光著大膀子沿河邊走了七公里去鄰村他86歲的妹妹家，老太太再操小腳頂烈日沿河堤陪我回到他家。

「鬼子當年到咱這兒來了，他們進村的第一件事就是抓女人。」老太太邊走邊對我說：「楊雲峰是日

本鬼子投降以後回村的，他當時穿著軍衣，背著大刀。」

用鑰匙打開他的房門，眾人一看，果然，家徒四壁。

老太太說他早喪失勞動能力了。「四處要吃要喝，確有其事。」

楊雲峰膝下無子、亦無老伴。「他已經獨身多年了」老太太說。

楊雲峰的家鄉是貧困縣，他所在的村莊裏居然沒有一家像樣的飯館。村頭有家炊飲小店賣「呼啦湯」和大餅。「呼啦湯」是用豬下水做的「大鍋燴」。鍋的直徑有兩尺，支在一個大油桶改造的爐子上，勺子是全木的，似乎沒有鍋蓋。「呼啦湯」一煮就是一天，藍天微風之中四起的是「嗡嗡」的蠅聲。

村裏的幹部看來對他也有看法，說他90歲了還和人家吵架；說村裏的財政支出拮据，所以……。不過37歲的村幹部對他前幾年思維清晰時講起抗戰惡仗就失聲痛哭的事，仍然記憶憂新、歷歷在目、感慨萬千。

楊雲峰有個女兒，家住豐台東高地萬源南裏17棟1單元10號，因為「不是親生的，所以不好處」，楊雲峰老人這樣對我說。他每次來京，我們都能見上一面，好好聊聊。每次，我都再把老頭兒送到他女兒家，然後，他再出走。他女兒家住在五樓，楊老漢登樓從不喘，就像他的破衣服從不換一樣。

楊雲峰1908年生人，為了吃飯，他1926年在綏遠參加馮玉祥的西北軍。「當時的師長是馮治安中將，旅長是何基澧。解放後何基澧擔任農業部副部長，還常常接濟我。」這是我們後來見面時他告訴我的。有人說他是老糊塗，我卻感到他95%的思維脈絡是清晰的。人們之所以躲避他、恐懼他，完全因為他是窮人，他是老人。他如果是個將軍，人們對他的評價會“天翻地覆慨而慷”。

楊雲峰老人身體素質好，他的身板永遠是挺直的，抗戰勝利50週年的1995年，80多歲的他還能在盧溝橋邊上的宛平城上掄大刀，足以證明其英雄氣概。如果他是貪官污吏、雞鴨魚肉、前呼後擁，那麼，他肯定活不到今天。狼使鹿似箭離弦、餓使鼠機敏翻飛、貪使人心驚肉跳、色使人骨斷神傷。但是，

讓貪官污吏過楊老漢的生活而長壽，怕是無一人能點頭稱是。

我感到，92 歲老漢要飯並不能說明一個人的廉恥，它祇能說明一個人命運的坎坷。楊老漢對我說：「1931 年，艦兵話藪事變以後，29 軍整軍備戰，準備抵抗日本的進攻。1933 年 1 月侵華日軍佔領了山海關，2 月進佔熱河，3 月進犯我長城喜峰口！」老人激動起來，他站立著，雙手插著腰，不時揮手大聲喊：

「何旅長下命令了，用大刀！夜襲！寧為戰死鬼，不作亡國奴！」——好像日本鬼子又來了似的。

我知道 1933 年 3 月，在北京密雲縣喜峰口羅文峪的戰役，29 軍殲滅日寇 6000 餘人，擊斃少佐以上軍官 53 人，繳獲坦克 11 輛、裝甲車 6 輛、大炮 11 門、機槍 36 架。29 軍當時犧牲了多少人？我沒問他。他是幸存者。我問他外孫女才知道他渾身都是傷，日軍子彈從他左臉頰穿進，使他上下槽牙全掉了。耳朵早被大炮震聾了，身上、手上也都是傷。

楊老漢告訴我，1940 年的棗宜戰役他參加了，那次戰役中張自忠將軍殉國。1945 年，他的部隊駐紮河南開封時，他向長官申請回家。「當時，祇帶了一把 29 軍的大刀片回去，盤纏沒到家就花完了。」

作為 29 軍的一名老兵，楊老漢年年都來盧溝橋看看，不是為了感懷，而是為了生存。他認為當年的戰場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他把毫無關聯的紀念章都別在胸前，仿佛是對 63 年前自己與日本侵略者血戰過的首肯。每次，他都能給我講講當年的激戰情景。雖然不太清楚，但是我卻很滿足。我曾經告訴過他，我在日本留學期間採訪了十幾個侵華日軍老鬼子，他們每月的退休金有十幾萬日圓，每月還有天皇給的五萬「恩給」。他們的醫療也有保障。他們在一種比較現代化的社會狀況中生活著。楊老漢聽了沈默片刻，挺起胸膛說：「他們再敢來，我還要迎上去！」

他的褲子很破，誰都可以看得出來。

請他吃飯時我觀察到，掉在桌上的麵條被他拾起來放進碗裏。

他的破書包是 1952 年買的，那裏面幾乎裝下了他全部的家當和讓人辛酸的食物。我每次見面都給他錢，我友誼商店的朋友們在參觀盧溝橋時，都傾其所有資助他。每次送他走，我都有一種犯罪感。「我這

把老骨頭這次，就不知道放倒在哪裏啦！走到哪算哪吧。」他對我說。

我想，再見他兩次，我就會說河南話了。

我給他準備了幾套衣服，如果再能遇見他，想給他換換。

1937 年，29 軍官兵有十萬人衛戍北平，威風凜凜、聲震八方。盧溝橋事變之後直至抗戰勝利，29 軍官兵一直在抗日戰爭烽火的最前線與侵華日軍血戰，在反侵略戰爭中是付出犧牲最多的中國軍隊之一，中國的歷史上詳細地記載著他們，人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按語：然而，遭受了長期欺騙的人民確實已經把他們忘卻了太久太久……）。事隔 63 年，29 軍官兵還剩下不到兩個排的人了，他們分佈在中國大陸各省，台灣島上和美國、加拿大等地。92 歲腰板挺直的 29 軍老兵楊雲峰，就是其中的一人。

我想，他到死也是光榮的，何況他今天還健康地活著。電視人們難道不想給歷史留下什麼活生生的資料去拍拍他嗎？難道不想拍拍普通人的悲歡離合嗎？普通人的命運不就是我們民族的歷史嗎？不就是我們國家的昨天嗎？

最近，我在採訪幾位三星將軍時，都向他們提及了國民黨軍老兵的生活拮据與艱難。我向首長彙報說，他們其中很多人都說：「經濟上的資助是次要的，祇要民政局的幹部來看看我，就算是對我『國難當頭、挺身而出』的肯定了。」87 歲的郭林祥上將非常「客觀」地告訴我：「在抗日戰爭的正面戰場是國民黨正規軍在打，可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後的抗戰牽制了大量的侵華日軍有生力量。（按：候半句話還在說謊和欺騙！）絕對不能忘了他們。」郭將軍要我針對國民黨老兵的實際情況，給中央有關部門寫報告，以引起足夠的重視和出台相應政策。

我不知道該不該寫這樣的報告，也不知道寄給誰，更不知道電視人們的鏡頭是喜歡對著那漢奸江澤民呢？還是喜歡對著窮困潦倒的抗日老兵們。我祇知道許多膾炙人口、動人心弦的故事會在中國民間世代流傳下去，而且，任何黨派也左右不了這些故事的傳誦。這些故事是對歷史的評價、是對美德的頌揚、是對時弊的褒貶、是對外國入侵者的鞭撻。不過，有些故事的尾聲是可以修改一下的，祇要去做，還來的及。

蚌埠工人集會示威活動

全景

蚌埠 張林

一年多來，中國市場物價持續上漲，鋼材水泥等基礎工業原料，價格早已一下子竄升了 100%，而糧油肉蛋等基本食品，價格也逐漸上漲，米價由原來的 7 角多一斤突升到 1 元四角多一斤。與去年初相比，目前全國各地居民生活必需品的價格上漲幅度，早已超過了 50%，房地產價格也漲了 50% 以上。

而與此同時，中國各地民眾的工資收入，卻絲毫沒有跟著上升。最明顯的是，中國經濟最發達的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地區，突然出現大範圍的民工荒，而且缺口高達數百萬之巨。原因主要就在於，這些地方的農民工工資，20 年來幾乎沒有上升（據大陸經濟學家陳淮統計，20 年來平均祇上升了 68 元人民幣）。數百萬農民工面臨如此昂貴的物價，已無法維持基本生存，不得不棄工回家。

除了 10% 左右的貪官污吏和紅色資本家，靠黑錢和偷稅漏稅生活，不太在乎物價暴漲，剩下 90% 以上的中國人，畢竟是靠工資或合法收入生活，現在收入沒有任何提高，物價卻上漲 50%，也就意味著大家的生活水準悄然下降了 33%！很多人還沒有省悟過來，還以為這祇是暫時現象，而沒有意識到，這正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綜合危機全面爆發的開始！

這幾天我不斷聽到親戚、鄰居紛紛抱怨說，物價漲的太快，米價也漲，肉價也漲，買菜都不敢買了。中國人民銀行得不到存款，周轉困難，已經強烈要求政府提高利率，他們宣稱，由於民眾現在往中國的銀行存款，不僅毫無收益，反而要蒙受損失，所以人們根本不願把錢存在銀行。

這一切的背後，實際上就是中共中央在濫印濫發鈔票。而再往後看，則是中國的經濟危機已到了一個

新的一觸即發的危險境地，除了拼命印鈔票維持財政平衡，中共財政隨時可能徹底破產。所以儘管中共也清楚濫發鈔票的可怕後果，但現在面臨滅頂之災，也就祇好不顧一切地蠻幹了！

這個趨勢，在中共不改變管理國家的基本國策的情況下，會繼續下去，直到崩潰。因為目前政府面臨的財政壓力，不是幾年之內的政策錯誤導致的，而是幾十年荒謬政策蓄積而成的。

長期以來，從中央財政到地方財政，各級政府都是寅吃卯糧，鉅額赤字累累，還對外界保密；絕大部分大型企業和股份公司，都是資不抵債，靠銀行貸款勉強維持運轉；而銀行和保險公司本身，更是一個巨大無比的經濟黑洞，早已處在破產狀態，完全是靠政權不停地輸血打氣苟存。

目前的危機，實質上是全方位的社會危機。黔驢計窮，中共當局現在也祇有濫印鈔票這一飲鴆止渴之術了。人民群眾的不滿情緒，在不斷惡化的經濟狀況下，在生活水平迅速下降、難以苟活的情況下，可能會以誰也無法預料的方式，突然爆發出來。

危機果然很快就爆發了，萬州民眾暴動就是一個最突出的事件。與此同時，全國各地的退休工人為了生存，首先行動，開始了要求根據物價調整工資的集會示威。東北許多大型企業的退休工人開始集會示威，有的還去堵鐵路。安徽合肥的退休工人也開始集會，並且迅速波及全省。其中蚌埠退休工人的示威活動，規模相當大，對地方政府的衝擊力度也最大。在這期間，我每天都走進示威區域，進行獨立的調查瞭解，並且向境外媒體即時報道了工人示威活動的真實情況。

10 月 22 日上午 7 時起，蚌埠市各單位退休工人陸續在勝利路一帶集結。勝利路是蚌埠市中心主幹道。至 7 時 40 分，數千工人開始佔據道路，阻斷交通。自蚌埠市科學文化宮起，至工農路口，長達 1 公里的寬闊路面上佈滿了退休工人，最高峰時達到萬人。

蚌埠紡織廠是蚌埠市大型骨幹企業，退休工人近萬人，紡織女工是這次示威運動的主力。紡織行業被稱為地上煤礦，女工的辛苦程度可以和礦工相比。尤其是布機車間的擋車工，長年累月在強噪音環境中長時間工作，普遍患有各種行業性疾病，但是當局卻長

期拒絕承認這是一種職業病，拒絕給以特別醫療保障。

這些女工的青春血汗被榨乾之後，普遍病弱不堪。而且她們的退休金極低，祇夠勉強糊口，多半沒有錢看病。我在現場看到，許多退休工人是被家人扶至示威地點，並帶來一隻板凳放在路口，以便她們坐下示威。

看到這些年老體衰的示威者在烈日下苦苦支撐，令人心痛。據瞭解，爲了籌備這場示威，退休工人們做了大量的聯絡與討論，之所以選擇這個日子，是因爲這天蚌埠光彩大市場要舉行開業典禮，據傳屆時溫家寶將可能出席。一般人認爲溫家寶比較親民，所以示威者很希望溫家寶能看到此一壯觀場面，從而指示地方政府給長期受損害的退休工人們一點利益補償。

據示威者稱，他們的退休工資一般祇有 3—5 百元，本夠勉強維持生活，但是最近一年多來物價輪番上漲，而工資卻絲毫沒有調整，令大家入不敷出，生活變的異常艱難，實在忍無可忍，大家才來此示威。

示威者決心堅持下去，以維護自己的生存權利。據示威者表示，此前幾天，安徽省會合肥的數萬名退休工人已經進行了多次示威，迫使合肥當局增加了部分退休工人的工資。示威者普遍認爲，面對由貪官污吏組成的政府，祇有抗爭才能維護自己的切身利益。

示威現場有幾輛小轎車被棄，據說是幾個不明情形的官員驅車誤入示威重地，遭到攔阻後，被示威者盤問時，驚慌失色，突然棄車鼠竄而逃。

現在一般的中共官員，由於大多數都大量貪污，所以很多實際上都是罪犯、甚至是待判待決的死刑犯身份。他們內心裏知道，困苦的中國民眾十分仇視他們，都想打死他們解恨，所以一旦被示威群眾圍困，就害怕的要死，所以官員碰到這種意外情況，一般選擇先逃命再說，何況車是公家的，丟了也無所謂。

但是現場也有一位老者分析說，「我是一個有 50 年黨齡的老共產黨員，深知共產黨陰險狡詐。你們大家不要忘記，15 年前，黨中央就讓解放軍在北京長安街上故意丟棄大批軍車坦克，然後派特務去燒毀，從而嫁禍與學生市民，製造鎮壓藉口。所以這幾輛車，都可能是當局故意丟棄的。你們聽我的話，絕對不要掀翻車子，反而還要注意保護好這幾輛車！」

到我回家寫稿時爲止，示威仍在繼續。地方當局沒有進行任何鎮壓，甚至沒有派警察到示威現場。可能是由於重慶市萬州區發生大規模警民武力對抗，各地政府擔心引爆流血衝突，激怒民眾。因爲中國社會，處處都是乾柴烈火，早已民怨沸騰，處於一觸即發狀態。

由於蚌埠當局祇是在勝利路兩頭加派交警，指揮往來車輛繞道行駛。因爲沒有警察，示威現場就像 89 年 6 月 4 日之前的天安門廣場，解放軍還沒有殺進去之前一樣，異常平靜、平和，好像節日一般。最憤怒的示威者，也沒有任何過激行動，祇是三五成群地在一起討論社會問題，控訴腐敗罪惡。

由於政府當局沒有答應增加工資的要求，退休工人們第二天繼續示威。他們今天佔據的區域有所擴大，但是由於當局的恐嚇和勸說，已經阻止了一部分人參加示威，所以今天的示威人數似乎沒有昨天多。但是在高峰時期，仍有數千退休工人佔據了從交通路到珠園路長達三公里路面的所有交叉路口。

當局在上午曾經試圖威嚇示威者，出動了兩個方隊的防暴警察，分別列隊挺進到示威中心，但是示威者無所畏懼，不肯後退。警察方隊祇好停留在附近待命，雙方沒有發生任何衝突。得不到撤退命令的大隊警察祇好站在那裏互相開玩笑、聊天，以打發時光。當我從雙方之間穿過，不由想到我在紐約經歷的許多示威場面，與此情形幾乎相當。區別祇在於，紐約警察立即建立隔離墩，從而使示威活動盡可能不影響交通。

由於示威者幾乎都是 70 歲左右的老人，所以將近中午時分，烈日當頭，許多老人不能堅持，祇好回家休息。但是午後又有一些人返回，繼續示威活動。

我在上午穿過了整個示威現場，發現各處都很平和，示威者與警察都沒有任何過激行爲。下午我再次穿越示威區域時，看到許多老人十分疲憊，於是我便去附近商店買來兩箱康師傅綠茶，送給他們。我自己也在烈日下尚且感到疲憊，這些年逾 70 老人的境況肯定更令人擔憂。

據示威者稱，他們計劃示威三天。但是如果當局答應他們的要求，示威將隨時終止。在示威者中間，不停傳來對腐敗行爲切齒痛罵的聲音。

與此同時，當局動員大批軍警，在蚌埠最豪華的錦江賓館一帶戒嚴，行人不得穿越。據報道，昨天舉行的光彩大市場開業典禮，有許多高級官員從首都北京和省會合肥趕來，估計都住在錦江賓館。

此次示威是 1989 年民主運動以來蚌埠市規模最大的示威活動。與學生運動相比，工人示威者有許多不足。第一，他們不注重宣傳，幾乎沒有標語旗子橫幅；第二，他們沒有建立以原有組織（例如工廠、車間）為單位的示威分陣地，致使成員流失很快；第三，他們不重視演講，幾乎沒有有組織的演講活動，致使許多人根本不知道他們在幹什麼？爲了什麼？第四，他們把主要力量用於阻塞交通，結果反而自我封閉起來，不利於向社會爭取同情，而訴諸社會、訴諸公眾本來應該是示威者的主要目的。何況城市交通四通八達，政府祇要加派交警，即時疏導車輛，就會使示威者反而處在孤立和不利的境地。

明天可能是示威活動的最後一天。依這兩天當局冷靜應對的情形來看，可能不會爆發重大事件。當局無需鎮壓，老人們可能就會累垮，從而無奈地結束這場持續三天的和平示威。

一年多來物價飛漲，而工資紋絲不動，致使普通民眾的處境日益艱難，怒氣迅速凝聚。而官員們專心致志於貪污撈錢，調控能力不斷減弱，又使各種社會矛盾不斷加劇。預計從今以後，示威遊行將會成爲中國人正常社會生活的一部分。

各地當局會認真掂量武力鎮壓的後果，輕易不會再釀血案。因爲那樣做，政府所付的代價會更大。重慶市萬州暴動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民眾的怨憤既然可能會因爲一個與己利益不相干的打人事件而突然爆發，那麼在利益悠關的問題上更有可能走火。

蚌埠退休工人多達 7、8 萬人，親友遍佈整個城市。這次蚌埠退休工人示威，如果軍警強行阻止，可能會有幾位本來已是風燭殘年的病弱老人因爲憤怒和衝突而突然死亡，從而激怒整個城市，可能導致當局無法預測的可怕後果。

蚌埠退休工人示威進入第三天。我以爲今天的示威已接近尾聲，所以下午 3 點鐘我才去示威現場觀察，意外地發現蚌埠市交通樞紐——交通局一帶人山人海，約有 5000 個示威者和旁觀者。而在人群的中心，則是數百名頭戴鋼盔、手執盾牌的軍人，以及另

外幾百個警察。軍警佔據了示威中心地帶，用人牆建立了一個陣地，人牆外與軍警對峙的就是人數多過他們十倍的示威者和圍觀者。

據示威者稱，這僅僅是他們佔據的三個示威陣地之一，另外兩個示威陣地則在東邊的中山街路口和中榮街路口。他們還告訴我，全市各工廠、各單位的退休工人都已參加進來。

示威者特別強調，這是一場退休工人忍無可忍、自發自願的示威活動。這不是一場由敵對勢力組織的、有預謀的抗議活動，沒有幕後策劃者。

大約 3 點半左右，軍警利用示威老人行動不便、彼此缺乏聯絡呼應的弱點，突然出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抓走了一位正在散發傳單的示威者，軍警們跑步將他抬到戒嚴中心的救護車中，當一些示威者省悟過來，試圖營救時，被軍警盾牌擋住，救護車則在掩護下迅速開走。

這時示威者開始激動起來，大聲議論，氣氛變的緊張。我當時十分擔心爆發衝突，便擠進人叢近距離觀察，由於我懷裏抱著孩子，一名警官便警告我說，他們即將使用武力強行清場，混亂中可能殃及無辜，尤其是小孩子可能被人擁擠踐踏。我祇好離開人叢，到附近高處觀察。

我估計，在指揮室裏通過多台攝像鏡頭密切關注現場動態的地方黨政軍官員，也感覺到了現場隨時可能爆發嚴重衝突的緊張氣氛，所以最終下令軍警撤退，以避免事態激化。

當軍警終於乘軍車撤退向朝陽淮河大橋的時候，示威者發出勝利的歡呼聲。狼狽不堪的軍人們擔心受到攻擊，慌忙舉起盾牌屏護。其實人群祇是以嘲笑的方式歡送他們。

我以爲示威活動今天就會結束，但是許多示威者告訴我，不達目的，他們決不會罷休。看來示威活動可能繼續進行下去。而且由於沒有組織者，抓捕幾個人顯然無法阻止示威活動。由於當局拒絕談判，我擔心事態有可能自明天起轉向惡化。

中共各級政權，向來不承認民眾的遊行示威權利，根本沒有通過談判解決紛爭的基本概念，所以一旦面臨民眾示威，就手足無措。而民眾平時逆來順受，一旦反抗起來，也很難掌握分寸。進行談判的另一個困難則是由於中共一向堅決鎮壓各種形式的民間

組織，所以當局即便需要，也找不到可以代表大家的談判對手，無法達成對雙方都有約束力的協議。

高壓政治總有崩潰的時候。現在已經到了中共各級政府轉變思路，現實面對社會矛盾，嘗試通過民主協商，從而解決各種問題的時候了。我倒是很樂意站在第三方立場，主持談判。我相信我有能力調解這場紛爭，但是冥頑不靈的當局，怎麼可能願意放下威權，嘗試平等談判的解決辦法呢？

我家人這幾天都緊緊地跟著我，他們非常擔心我捲入其中，他們更擔心我會成為替罪羊，因為二十年來我一直當局的政治迫害對象，一直受到嚴密監控。但是我向家人堅持說，無論有什麼危險，我都不能放棄自己的良知，不能放棄最起碼的做人責任，我起碼應該向世界提供一份客觀的報道。

25日清晨，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把我叫醒，蚌埠市公安局政保支隊宣佈對我傳喚，勒令我半小時之內到達他們的辦公室接受審訊。我憤怒地拒絕了。但是對方卻嚴厲地警告說，我必須去，否則他們將會開警車對我採取強制措施。看看仍在熟睡中的一歲多的女兒，我確實擔心那些粗魯的傢夥會嚇壞她。最後我祇有妥協，擦了把臉，連鬍子都沒刮，早餐都沒吃，就去接受審訊。

審訊員指控我接連寫了三篇關於工人示威情況的紀實報道，把蚌埠市的情況捅到了外界，尤其是捅到了國際媒體，造成了惡劣的影響。我爭辯說我的的報道符合實際情況，做為公民，我也有責任報道這些情況。

但是對方十分嚴厲地說，過去一年多裏我已經寫了100多篇反動文章，若按照幾年前的標準，早就該給我治罪了。但是他們一直很寬容。現在我已經涉入最敏感的領域，必須立刻止步，停止繼續報道。而且為了淡化我造成的影響，我不能再就此次示威活動接受境外記者採訪，否則他們就會立刻採取控制行動。

我意識到危險已經降臨，為了以後還能繼續我的活動，我必須有所妥協，否則就會再次失去自由。

走出公安局大門以後，我徒步穿越示威者曾經佔據的整個區域，發現局勢已經平定，交通已經恢復正常。但是在關鍵路口，仍有示威者站在路邊。而在附近區域，則有大隊軍警集結待命，尤其是部署在科學

宮廣場的警察隊伍，恐怕有上千人。整個示威區域的軍警，可能達數千人。

途中我仔細閱讀了蚌埠市公安局到處張貼的布告，發現當局為這次工人示威的定性是「集會示威」，但是沒有強調這是「非法活動」，祇是聲明，如果「集會示威者堵塞交通，圍攻黨政機關，則違犯了【治安管理條例】，會受到治安處罰。」這表明，當局已經從傳統立場上後退了一大步，默認了民眾的集會示威權利，默許了這次工人示威的合法性。這一點意義重大，為以後民眾合法集會示威預留了合法存在的空間。而在過去的55年裏，幾乎任何抗議政府當局的集會示威都被當局視為「違法犯罪行為」。

26年前，安徽鳳陽農民的農業大包乾嘗試，開闢了中國農村經濟改革的道路，從那以後，大部分在毛澤東時代長期饑寒交迫的農民，開始有飽飯吃了。

而這次蚌埠退休工人的示威運動，意義也不可低估。蚌埠當局沒有像萬州當局那樣輕率地使用暴力強行鎮壓，而是十分謹慎地審時度勢，一方面答應儘快解決工人提出的問題，釜底抽薪；另一方面盡力調整城市交通，使整個城市的居民生活沒有受到太大影響；最後，堅持不採取硬打硬衝的戰略，堅決避免流血慘案激起更大的動蕩。

當局這種清醒理智的應對方式，最終化解了一場迫在眉睫的危機。反過來，如果對示威的老人們硬打硬推，局面失去控制，有幾個老人猝然死亡，那就會如同火上澆油，工人們也會被逼的失去平靜心態，家屬子女會抬屍遊行，整個城市的市民和學生都可能會捲入，局面就可能完全失去控制。

所以對待民眾的集會示威，「蚌埠模式」是各地當局在當前錯綜複雜、危機交織的形勢下的一個很好的解決辦法。即首先要默認民眾的集會示威權利，其次要積極疏導，避免使用暴力。最重要的是，當局應該明白，集會示威是社會矛盾已經達到尖銳程度的必然反應。另一方面，集會示威也不是洪水猛獸，並不可怕，祇要從容應對，別說幾千退休工人示威，就是幾萬工人示威，天也不會塌下來。近年香港多次爆發數十萬人遊行示威，也沒有什麼，第二天人們還是照常生活。

安仁坊暴力拆遷

欺下瞞上有恃無恐

陝西 尚馬

2004年5月27日，西安市新城區區長趙長春、副區長劉強親自指揮，組織西安西北商務中心建設工程拆遷安置辦公室工作人員近300人，僱傭學生、社會閒散人員四五百人，推倒大門和圍牆，闖入西安市安仁坊居民小區，砸門撬鎖、攀樓、翻陽台、闖入居民家中，強迫居民在搬遷協議上簽字。暴徒們砸壞居民的傢具用品、毆打居民，隨後又殘暴毆打上街堵路抗議的安仁坊居民。在這次暴行中，有20多位安仁坊居民被打傷。

6月初，根據中國國務院領導的批示，湖南省政府、監察部查處了湖南省嘉禾縣強制拆遷的事件；陝西省政府和建設部查處了陝西省周至縣非法圈佔耕地的事件。6月4日，中國的《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等主要宣傳機構，都報導了這一消息。

6月6日，中國國務院辦公廳發出了《關於控制城鎮房屋拆遷規模嚴格拆遷管理的通知》，簡稱「46號文件」。通知要求端正城鎮房屋拆遷指導思想，進一步完善法律法規、規範拆遷行為，加大對違規違法案件的查處力度，堅決糾正城鎮房屋拆遷中侵害人民群眾利益的各種行為；凡拆遷矛盾和糾紛比較集中的地區，除保證能源、交通、水利、城市重大公共設施等重點建設項目，以及重大社會發展項目，危房改造、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項目之外，一律停止拆遷，集中力量解決拆遷遺留問題；房屋價格評估機構要按照被拆遷房屋的區位、用途、建築面積等合理確定市場評估價格；嚴禁採取停水、停電、停氣、停暖、阻礙交通等手段，強迫搬遷；政府部門要從過去直接組織房屋拆遷中解脫出來，實行「拆管分離」，實現拆遷管理方式從注重依靠行政手段向注重依靠法律手段的根本性轉變；拆遷安置方案不落實的項目，不得發放拆遷許可證，嚴禁未經拆遷安置補償，收回原土地使用權而直接供應土地；政府行政機關不得干預或強行確

定拆遷補償標準，以及直接參與和干預應由拆遷人承擔的拆遷活動；要提供質量合格、價格合理、戶型合適的拆遷安置房和週轉房；加強監督檢查，嚴肅處理違法違規行為等等。

根據國務院辦公廳的要求，7月下旬，陝西省建設廳向國家建設部呈文，「報告」了「安仁坊的拆遷情況」。上報文稱：安仁坊拆遷是西北商務中心建設拆遷安置指揮部進行的，「是企業行為」，又說制定和實施拆遷安置方案的西安市新城區改造低洼棚戶區和危舊房屋領導小組「是事業單位」。省建設廳的上報文竟然歪曲了基本的事實：是西安市房地局和新城區政府將這塊67畝地皮「賣」給了銀邦公司；西安市和新城區政府多次在書面和口頭上聲稱是與銀邦公司合作，在這裡建設經營西北商務中心；「低改辦」不是社會群眾團體，不是企業，不是私人或其它性質的機構，就是政府的一個機構；「西北商拆指揮部」的主要成員就是西安市政府和新城區政府的有關主要領導，對居民制定「安置」方案、實行強迫野蠻拆遷，都是由政府組織實施的，直到區長要求「動員多方力量」，「形成一個拳頭」，僱傭社會數百打手，親自指揮，對居民大打出手。20多個居民被打傷，派出所接到上級命令不得出警，更談不上立案查處，陝西的大小媒體對此禁若寒蟬，所有的信訪部門談虎變色。除了政府，誰有這麼大的特權？這能說安仁坊的拆遷是企業行為麼？

說到這塊地的「出賣」，面積說是67畝，實際上是81畝。按西安市2000年市區土地基準價，二類商用價為每畝169萬元，這塊地最少也值11,323萬元，而市國土局在根本沒有進行拆遷準備、更談不上拆遷安置的情況下，在2003年就把這塊地「出賣」給銀邦公司，當時掛牌總價是2,100萬元，成交價是2,300萬元，每畝約34.3萬元，僅為西安市2000年基準價的1/5。這9,000萬元的土地價值流失到哪裡去了？而按照2003年的地價，這塊地皮價值流失額約有3億元。這符合商業性建設經營項目土地買賣的規則嗎？

說到對安仁坊拆遷的名目，政府說是「要招商引資」，「發展經濟」，要與「銀邦公司」合作建設經營西北商務中心，但同時又覺得這樣做政府直接參與商業性經營的性質太顯眼，太露骨，明知故犯經營與管理分離、拆遷與管理分離的原則，而且又要受到有

關商業性開發房地產的許多規定的約束，所以西安市政府和新城區政府在拆遷報告中和對外宣傳中竟謊稱對這個好端端的小區要「進行低洼和危舊房屋改造」。陝西省建設廳向國家建設部報告安仁坊拆遷情況時，仍然謊稱這是個低洼危舊房屋改造項目。其實安仁坊小區既不低洼，房屋也不危舊。這個小區是西安市人民政府於 1980 年對這一帶低洼、危舊住房進行改造，拆除舊平房，建起了 28 棟樓房。當時設計的質量技術等級並不落後，可抗八級地震，施工質量很好，使用 24 年後，至今結構完整，沒有出現斷裂塌陷，就連牆皮也堅固完好如初。西北商拆指揮部這次僱傭民工拆除已搬走居民的房屋，民工們都覺得難拆難砸。有記者問到，有的住戶還沒有搬遷，民工就在相鄰的上下左右拆除房屋，會不會危及仍在居住的居民的安全？商拆指揮部的工作人員回答說：「房子結實得很，.....不會影響到居住者的安全。」

按照西安市政府的有關規定，對於商業經營性的房地產開發，對拆除區的居民應就地或就近安置，如果是政府拆遷報告中所說的對安仁坊實行的是低洼危舊房的改造，那居民更無可爭議地要得到就地安置。但安仁坊拆遷區內的居民沒有得到就地安置，連一百多私房戶也沒有就地安置。新城區低改辦的安置方案規定，安置補償費每平方米為 951 元，而在附近購買二手房，最低每平米也得 2,000 元，新房在 3,400 元以上。需要低改辦安置住房的，可以搬遷到西安東北郊的辛家廟聚泉科技園區，距離安仁坊 6 公里，每平方米最低 1,800 元，拆遷戶需要支付房價與舊房總補償額的差價。許多居民到低改辦指說的所謂聚泉科技園區打問查看，連安置樓的影子也沒有，甚至連地皮也沒有徵購。這個償不抵價的易地房屋安置方案，完全是個騙局。總之，不論是貨幣補償還是房屋補償，安仁坊拆遷戶要重新獲得住房，都必須增加幾萬元到 10 幾萬元的購房支出。這對相當一部分居民來說，根本達不到。

安仁坊的居民大多原是這一帶的私房戶，1980 年政府對安仁坊進行低洼危舊房改造，建起樓房，房產改為公有，原私房戶就地安置租房居住。現在「改革開放」，招商引資「發展經濟」，他們連公房也住不成了，無力重新買房，不知到哪裡棲身安家。私房變

公房，公房變無房，在這住了幾十年、幾代人的老住戶們，真沒想到能落到房地產如此被剝奪的困境。

對於無力搬遷，不能在搬遷「協議」上簽字的住戶，指揮部除使用毆打、騷擾的種種手法外，還有一個看似合規合法的辦法，那就是通過西安市城市房屋拆遷安置管理辦公室的裁決。這種裁決按政府的規定是具有法律效力的。這樣的房屋拆遷辦公室，隸屬於同級政府，也就是說，政府既有管理權，也有經營權，還有裁決權，好比雙方發生爭執糾紛，而其中的一方既是當事人，又是法官，那結果可想而知，自然是一紙強制執行的裁定。拆遷辦人員拿上這種「裁決書」，就可以「依法」強制拆遷，砸門撬鎖，抬傢具、抬人，拆樓板砸牆。被拆遷者到哪裡去告，到哪兒去講？

國務院對強佔土地野蠻拆遷事件的處理和 6 月 6 日的《通知》公佈以後，安仁坊的情況怎麼樣了呢？

5 月 27 日新城區政府主要負責人指揮工作人員及打手對安仁坊居民進行野蠻殘暴的毆打後，政府調集的近千名「工作人員」和打手駐進安仁坊，對居民進行恐嚇騷擾達一個多星期。許多居民看到對政府講不成理，再抗爭下去連人身安全都不保，紛紛被迫在「搬遷協議」上簽字，相繼搬出安仁坊。也有的居民因政府的補償費太低，無法接受，以區區個人的力量面對政府的打壓逼迫，據理力爭，不退縮、不簽字、不搬出。政府拆遷辦都使用了什麼手法呢？毆打、謾罵、不分晝夜成群結伙地到居民家「做工作」，砸陽台、砸玻璃、挖門撬窗、砸牆揭樓頂，在居民週圍的空房內拉屎撒尿，在樓梯、門口倒垃圾堆磚塊灰渣，堵塞下水道、破壞上水道，向低層居民家灌污水，斷水、斷電、斷電話，拆除樓梯扶手、拆毀樓梯、堵鎖眼、砸門扭鎖搬傢具，偷竊居民的房產證等等。

請看幾位居民的控訴：

鄧長生（21 號樓 1 單元 11 號住戶）：

6 月 27 日拆遷辦工作人員就砸了我家的防盜門、陽台頂棚和全部門窗玻璃。我照顧病人不在安仁坊住，8 月 30 日 9 點多，鄰居打電話告我，拆遷指揮部把我家的東西拉走了，門窗也拆了。我回家一看確是這樣，當即報了警。派出所通知了拆遷辦，隨後我在派出所內等候處理達 33 個小時。拆遷指揮部的吳學忠到派出所後指著我說：「你就欠砸！」我說：「你不

要以爲你哥哥是市公安局副局長吳金彪，你就可以這樣欺壓我！」

8月9日，拆遷辦強拆沒有簽字的常生機家，他們在常家週圍攔繩子，不讓旁人接近，我路過說了句「野蠻拆遷不合法」，三四十個拆遷辦的人圍上來，把我一拳打倒，踢了幾腳，衣服扯破。我爬起來到派出所報警，派出所派了民警王光明和一個協警員到了現場，叫打手到派出所去，上百打手堵住通往派出所的道路，圍住民警，拽掉民警的兩個釦子，吳學忠推搡我們3個人進了指揮部，王光明又打電話叫來派出所副所長韓勇。韓勇一進門就握著吳學忠的手說：「咱都是一家子麼！」根本不聽王光明述說情況。王光明對我說：「老同志，你讓我保護你，誰又來保護我呢？」

我父母從1946年起就住在城里尙勤路，1979年尙勤路拆遷時，我們家有私房5間，180多平方米，政府把我們安置到安仁坊的公有房租住，面積祇有30多平方米。這次拆遷的補償費根本不夠買房，改革來發展去，我們的房產竟然被剝奪殆盡！

李新年（18號樓1單元12號住戶）：

我的父母從1946年就住在安仁坊，到1979年低洼改造時，全家有大小私房13間，房院面積有六分九釐地，改造後蓋成樓房屬於公有，安置我們租住。

7月1日下午，我姐夫趙偉民在樓下院子裡正在與拆遷辦工作人員協商拆遷事宜，後背被人猛擊一拳，趙回過頭問：「你憑啥打我？」拆遷辦的打手說：「你不配合工作。」又給了一拳，打在鼻樑上，兩鼻孔頓時血流如注。我愛人跑過去問：「你憑啥打人？」打手說：「我就打你了。」一拳打在我愛人左眼側，頭後又打了幾拳，我愛人當即倒地，身上又挨了幾拳幾腳。醫院診斷證明：頭外傷，胸、腹壁挫傷，全身多處軟組織損傷。

7月1日下午，拆遷指揮部動遷組頭頭王寅虎指示20多名打手先後打傷居民9人，其中傷重送醫院搶救者6人。他們分別是：16號樓王偉、秦琦夫婦，王偉右肩部鈍器外傷，左眼角外傷，視力受限；秦琦腦震蕩，頭部多處血包腫，上身多處外傷；16號樓居民劉鳳震腦震蕩，耳膜穿孔，聽力喪失，頭部外傷；16號樓居民崔平安肋骨骨折三處；18號樓居民趙偉民鼻骨骨折、腦震蕩。拆遷辦原計劃7月2日再打傷一批

人，因爲軍委主席江澤民到西安來，才未實施。這一天16號樓81歲居民王秀英在做飯時，被五樓拆下來的樓板砸在防盜窗上震昏倒地，掉下的樓板距老人站立處僅50釐米。老人被送醫院搶救住了7天。這是拆遷辦獻給黨的生日的最好禮物。

我們家至今沒有簽字，人還在裡面住著，樓板已經被砸得裂縫露水，傢具、壁紙、衣物被褥全部潮壞，我們都抱到派出所作爲報案的證據。他們斷了我們的家水和電，樓梯的扶手被拆掉，樓梯樓道堆滿垃圾灰渣，民工們的尿和污水從二樓流到一樓趙雙文家裡。

趙雙文（18號樓1單元3號住戶）：

8月9日我被拆遷辦的數十人叫到院子裡談事情，後拆遷辦的人又跟著我湧入我家，在我家談了十多分鐘。到了下午我就發現我的房產證不見了，事後拆遷辦承認他們「拿」走了我的房產證。

王海容（18號樓1單元11號住戶）：

8月11日上午我去上班，中午回到家，發現拆遷辦正在搬我家的東西，他們砸開了我家的房門。我根本沒有在拆遷協議上簽字，他們連裁決書也沒有。我躺在汽車前面不讓搬家車開走，被七八個打手抬著四肢，一直抬到拆遷辦。有錄像爲證。

李秀英（18號樓1單元4號住戶）：

8月30日上午9點多，拆遷辦的吳學忠敲我家的門，說要與我們談談，我們不敢開門，把防盜門反鎖上。我母親把木門打開，隔著防盜門給他們跪下，吳學忠後面跟了一幫人，他說他一個人進來。我們開了防盜門，進來10幾個人，叫我們簽字，我們不簽，門外又有人拿撬槓撬開了門，進來一屋子人。我父親79歲了，嚇得從沙發上溜到地上，我和我母親給他們跪下，但是我們仍無法簽字。拆遷辦的幾個女的把我和我母親又攙又架，帶到拆遷指揮部，我們仍不簽字。拆遷辦的人把我推出來關上門，拉著我母親的手強按了手印，我們沒有給他們房產證。我們家早已被停了水停了電，我們在街上提水用，回到家裡一看，我們存在缸裡、鍋裡的水倒了一地，傢具物品全部被拉走了。

張良（17號樓3單元39號住戶）：

我眼睛患多種疾病，視力左眼0.06，右眼0.1，是一級殘廢。因爲拆遷每平方米祇給我補償951元，我

認為不合理，太低。拆遷辦說的把我們安置到離安仁坊六公里的東北郊辛家廟的樓房，每平方米最低也要1,800元。我們照他們說的安置樓地點一看，是墳地桃園，連地都沒有徵。這種協議怎麼能簽？拆遷辦的人員說：這就是霸王協議，你簽也得簽，不簽也得簽，簽了你我都沒事了。我不簽字。我們這個單元還有兩戶沒搬，一戶住五層，是一位80多歲的老教師，我住三層。7月4日，拆遷辦就把樓梯扶手用氣割機截掉，我拿出殘疾證給他們看，拆遷辦人員說：「我沒拆樓梯就算照顧你了。」我們樓下住的民工在我們樓上和對門拉屎撒尿，並且堵住下水管，破壞上水管，使混有尿尿的污水流進我家，積滿地面，房內的電因漏水而斷路。拆遷辦曾斷了我的水電，我發現後阻止，拆遷辦人員就擁過來打我。我向派出所報案，派出所民警說：政府行爲，我們管不了，你去找拆遷辦說去。

6月29日下午5時許，指揮部僱用近20名打手，對拆遷區內正在搬遷的自來水公司東郊營業部大打出手，用螺紋鋼筋、木棍等追打營業部王主任，將其打倒在地，致使王主任肋骨被打斷多根，昏迷不醒，幾近死亡，經搶救脫險。這次打傷自來水公司職工多人。

8月9日拆遷指揮部動遷組王寅虎調來搬家車，指揮30多名佩有指揮部工作人員卡的僱用打手，強拆了18號樓46號、54號、55號及19號樓18號4戶居民的住房，這4戶居民並未簽搬遷協議。強拆時，既無公證人員，也無法院人員在場。其中19號樓居民李秀英因工傷致殘在家，王寅虎指揮打手在拳打腳踢之後，讓10多人強行將老太太架走，囚禁在指揮部內，將家中10口人的所有私有財產裝車拉走，其中包括李秀英丈夫原單位的有價票據約250多萬元、檔案以及全家的生活費和李母的醫療費8,000多元。

8月11日，同樣的強拆又降臨到16號樓、18號樓、20號樓的五戶居民頭上。這幾戶居民中午下班回來時，房子被砸，房內的所有財產都沒了。他們身無分文，連換洗的衣服都沒有，晚上，女居民們無處可去，祇好住進了長樂西路派出所。

政府好厲害！國家的法律、法令、規定、實施細則等等完全不起作用。說要「發展經濟」，地就

「賣」了，定個拆遷方案，趕走、打走老百姓，串通一氣弄虛作假。老百姓怎麼活？

安仁坊居民聯繫電話：

任亞莉	029-83028013	張良	029-88063558
王海榮	029-82529966	侯玉齊	029-81055351
李新年	029-88591842	李新好	13319251525
趙新	029-81914819	鄧長生	029-81928318
李秀英	029-83082231		



首次頒獎會發言續刊

黃花崗的精神

也談國父自有後來人

（在首屆黃花崗精神獎頒獎儀式上的發言）

羊子

蒙《黃花崗》雜誌社同仁、郭平等邀請，我有幸出席今日莊嚴的「黃花崗精神」頒獎會和「中華民國百年護國護法運動」研討會。當今的年輕人是否還記得：黃花崗，是中國百年歷史上響當當的碑名？想當年，在國父等先哲領導下的黃花崗起義，七十二祖國健兒，他們，相貌堂堂，英俊瀟灑，學有專長，有的留美，有的留日，有的在祖國各個崗位上，恪盡職守；他們，本來可以前程似錦，安享人生快樂……，可是，爲了結束清朝帝制，爲了祖國人民自由民主的明天，他們放棄了誘人的、本能的人生追求，跟隨先哲們，拼死在疆場——黃花崗了。行將百年了，作爲後代的咱們，該愧對抑或喜對？

三年來，《黃花崗》雜誌社的全體人員，正是秉承這一不朽的精神，以自身高貴而聖潔的卓越才智，出污泥而不染，披荆斬棘，脫穎而出，辦成求真、公正、挺拔、當今海外唯一的民間刊物，已經度過了嬌

嫩、嗷嗷待哺的嬰兒期，而成長為活潑、燦爛、生命力無限的少兒期。這是老伴若望生前和我最為看好的雜誌。早在 1994 年春（當時尚未知《黃花崗》雜誌會創刊），老伴就預言，國父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理念，應該會是下世紀中國大陸全面實踐的偉大事件。倘能見到雜誌今日之發展，老伴定含笑九泉。

前年，即 2002 年 4 月 6 日，在紐約見到王炳章，我曾為數月前在老伴的追悼會上，未能讓炳章發言，親口向他道歉，他絲毫沒有計較我，還送了《中國民主革命之路》這本書給我。我情不自禁地將這本書與連續電視劇《走向共和》第 38 集中，國父孫文在 1907 年 12 月 2 日發動三次起義時，所著《革命方略》作聯想；他們，前後上一百年，一個為推翻帝制、一個為結束共產專制，奮鬥不止，而且屢敗屢戰，鬥志彌堅，從不氣餒；還有，美國首任總統華盛頓，開始也是帶領眾人與號稱世界最強大的英軍對壘，也歷經屢戰屢敗，從不退卻，直到 1776 年 7 月 4 日，在費城召開大陸會議，56 位代表勇敢簽署了獨立宣言，才有了今天的強盛和一年一度的國慶節。炳章不正是牢牢把握住『政治正確』這一大方向嗎？這是我等平庸之輩難以抵達的超凡境界！我曾在紐約一次營救會上說：「王炳章是一隻矯健的雄鷹，儘管鷹有時比雞飛得還低，但雞卻永遠飛不到鷹那麼高」！獲得多人認同。不是嗎？炳章拋卻了前程似錦的第一位公派留學生的榮華富貴，屢屢單槍匹馬挑戰極權專制，而架構《重建中華民國》的藍圖。當然，引來周圍烏鴉鼓噪、雞飛狗跳，不一而足，也不足為奇。因為，這正是民主與專制較量的常見現象。恰恰見證了中國人自古英雄多寂寞的悲壯情懷。

獨排眾議的《黃花崗》雜誌社，慧眼識英雄，頒王炳章博士「黃花崗精神獎」，正逢其時。歷史將記下這閃光的一刻！讓那些不登大雅之堂的噪音無地自容吧。

整整兩年過去了，對著鐵窗，炳章在想什麼呢？明知寂寞難耐，但他必須苦捱，中國有句古話：充軍不怕路遙，坐監不怕日長。不幸，正是炳章的寫照；我也想，炳章的大腦不會休息，更不會消沈，他會更冷靜地整理自己的思路，尤其是「處事易，處人難」的哲理性，他也更會沈思：何謂「高處不勝寒」的意境，唯此，有朝一日，千軍萬馬才會擁向他，浩浩蕩

蕩去衝破集權專制；監獄的苦度，定將造就他成為中國的曼德拉而回到我們的身邊。

然而，人有時又常常是脆弱的，長年累月的囚禁，不見天日，會逼瘋一個健康人的。我們今天從世界走向三藩市，為炳章頒獎，正是對他幾十年來所作所為的最大褒獎。如何將這和煦的春風，去溫暖他冰冷的心田？何日可去探望他？何日方能寫信給他？一旦他得知咱們嘉獎他，他枯竭的心田，定將激起蕩漾心聲，從而健康倍增的。

自老伴從小獻身於「中國向何處去」的探索，如今我也進入婆婆的年齡，咱們面前仍然面臨「中國向何處去」。我就不怕見笑，張開婆婆嘴了：

前述，七十二烈士，都是國家棟樑人才，已九十三年過去了；我們被逐海外，也已十幾年。讓我重復一遍，在海外，我最看好《黃花崗》，似乎情有獨鍾。是的：他們的確確為中國的未來，在扎扎实實地、無私地奉獻，主辦人不僅卓越非凡，更是平易近人，在他周圍，與他相知有素的幾位友人，也是甘心情願地打義工。我更想說的是，主編先生也食人間煙火，他分文不取外，連稿酬都不支取（僅依靠夫人微薄收入維生），就是說，他在倒貼柴米油鹽；這也罷了，明明是忠心耿耿，高風亮節的形象，偏偏周圍，風聲鶴唳，無中生有，竭盡誣蔑、中傷，硬指著白鴿說烏鴉，明明黃花崗雜誌社高舉黃花崗烈士的義旗，九十三年前七十二烈士英勇捐軀了，雜誌社的同仁義不容辭，前仆後繼，而且，他不是國父的孫兒，更非蔣中正的兒子，純系對祖國民族崇高的責任心和深深的愛，本是可喜可賀、發揚光大、理應蔚然成風的事情，卻時時有小人作亂，雞蛋裏挑骨頭。炳章是被殘酷判處無期徒刑的人，今天，《黃花崗》給王炳章頒獎，《黃花崗》同仁，不是到老虎頭上拍蒼蠅嗎？在座的與會者中，應該有中共的特工人員吧？咱們都生活在美國自由的土地上，你們都很聰明，希望你們用身上尚存的良知，好好想一想，你們應該吸取頒獎會的什麼精神？我也請求與會者，今後多關注《黃花崗》同仁的安危，因為，實在是，在此自由民主的土地上，咱們華人圈不見得安全，紅色薩斯病菌已染向全球。今天咱們關心《黃花崗》，其實也是關心祖國人民，更是關心我們自己以及我們在祖國大陸的親人們。我們一定能團結再出發，為中國免於饑餓、免於

匱乏、免於恐怖而奮鬥。還要囉嗦幾句的是，我所以寫這些，絕不想為難任何人，祇向世人宣示：肩負重任的主辦人，其多年如一日行爲，實在是感召華人團結、凝聚的楷模，咱們唯有團結，方能排山倒海，去挑戰並結束一黨獨裁專制。

營救王炳章，重建中華民國，再造曾經優秀、被共產觀念暴政劣變了的中華民族性格和心智，就得保證《黃花崗》雜誌如期辦下去，以向人民永不止息地『鼓』與『呼』，直到光輝燦爛的明天！讓咱們有力出力，有錢出錢。

民國二十五年十月三十一日，蔣中正五十生日感言中一段話：唯吾先民之教，以孝爲先。總理嘗語吾人，以中國立國，自有其道。『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德，爲吾中華立國固有之精神與道德。《黃花崗》雜誌的宗旨即弘揚這八德，中共的特工人員們，咱們正好用此精神去影響他們；我想起1983年若望被開除黨籍後，接著是一批年輕隊伍，來我家抄家，他們發現一本本《爭鳴》、《百姓》、《九十年代》、《明報月刊》等雜誌時，已是深更半夜，房間裏鴉雀無聲，一個個拿著雜誌，站在各自位置上，忘我地讀著，記得當時，我既討厭他們抄家，又希望他們多讀些外部世界的真實聲音，多汲取民主養料，以喚回他們的良知。我意識到，二十幾年後的今天，我們首先要開啓他們的心智，用咱們的誠意，感召他們至少與當政者不合作，咱們就成功一半了。希望這是拋磚引玉。

王炳章：真正的勇者

著名民運人士 鄭元

驚悉炳章兄被中共惡判無期徒刑，
含淚草成此詩，
獻給海外民主運動的先驅者王炳章博士。

你是一個啓蒙者，
把海外民運的大旗從北美傳到世界各個角落；
《中國之春》那八個大字：「自由民主人權法制」，
讓更多的人明白什麼是真正可以奉獻的事業。

你是一個創建者，
把中國民主團結聯盟建成了一個溫暖的歸屬；
讓海外遊子漂泊的心，
更加貼近世界自由民主的脈搏。

你是一個革命者，
當中共用機槍坦克鎮壓和平的請願者；
你率先喊出：
人民革命的權力誰也不能剝奪。

你是一個實踐者，
把目標投向西南邊陲要塞；
怯懦的專制者把你投入石壁鐵牢，
害怕的是你點燃的星星之火。
你是一個受傷者，
誤導的路比誰走得都更曲折；
作為前驅，你沒有前車之鑑，
甚至停不下改正錯誤又投入另一個吶喊。

你是一個真正的強者，
傷口處有太多敵對者的鹽巴；
雖然太多的不顧失去了許多朋友，
衡量了取捨又把生命投入不停的活躍。

你是一個男子漢，
無家無國無所依託；
心中了無一絲牽掛，
投入火中做一個撲火的勇者。

你是一個獨立者，
金錢的捐助沒有收買你那獨立的人格；
也沒有低下那高傲的頭顱，
向統治者乞求一點點施捨。

你是一個基督徒，
在祈禱的日子裏要挺過那煎熬的每一刻，
我確信垂死的邪惡不可能等到那一天，
死亡不會吞噬掉思想者的軀殼。

你是一個奠基者，

在漫長的黑暗中盼望著光明的迎接；
無論來自何方的誹謗誣陷，
王炳章的名字一定會刻入中國民主殿堂的基座。

歸來吧，清水君

加拿大 辛明

像一池晶瑩透明的清水，
是一面輝煌耀眼的明鏡，
你映照著歷史，
你反射著現實。
你叫妖魔鬼怪現出原型，
你催人民大眾從沈睡中猛醒。

你向歷史發出質問——
「魯迅：族魂還是漢奸？」[1]
「中華民族不是劣等民族……」[2]
——你催人民猛醒！
你發表「諫江澤民書」，
公然在太歲頭上舞劍！

啊，黃金秋，清水君[3]！
為了爭取愛國的自由，
為了享受民主的權利，
你籌建中華愛國民主黨，
為祖國的民主自由貢獻力量。

你變賣電腦、自籌路費，
回到念茲在茲的祖國[4]，
享受到的卻是「被跟蹤型自由」[5]。
在美麗的海濱城市連雲港[6]，
你終於落入醜惡政權的魔掌。

你原可以戴著作家的桂冠[7]，
安坐在象牙塔裏享受安康。
為了祖國的民主人民的自由，

你卻勇敢地衝向了專制的羅網。

你的年齡還不足以而立[8]，
你的業績卻早已經頂天立地。
「萬歲爺」算得了什麼，
對你的成就他們祇能妒嫉！

他們把你投入監獄，
想把一個文學巨子，
和一個政治新星，
無情地扼殺在搖籃裏！

我們不答應啊，愛祖國的人民！
我們不容許啊，愛民主的老百姓！
正告野蠻兇殘的專制者，
立即釋放熱愛祖國的黃金秋！
立即釋放熱愛民主的清水君！

歸來吧，黃金秋——清水君！
重歸爭取民主自由的大海汪洋。
向茫茫大海中注入你那一池清水，
讓大海掀起更高的波浪，
把萬惡的專制政權徹底埋葬！

注释：

[1] 清水君：魯迅：族魂還是漢奸？（之一）《黃花崗》第5期。

[2] 清水君：中華民族是劣等民族嗎？《黃花崗》第3期。

[3] 清水君原名黃金秋。

[4] 2003年6月19日，清水君變賣個人電腦，自籌路費，從東南亞秘密回國考察社會，立志要改變民主組織和民主人士祇能在海外吶喊、無法和國內有效協商配合的局面。

[5] 2003年8月25日，清水君向網上發出消息：「我目前安全，享有被跟蹤型自由」。

[6] 2003年9月13日，中國共產黨黨國政府在連雲港市非法逮捕了清水君。

[7] 黃金秋二十歲時出版了散文集「整理心緒」。二十二歲時山東省舉辦了黃金秋作品討論會。二十三歲出版報告文學集「跨越時空」（與喻季欣合著）。二十七歲撰寫「回儒文明之研究叢書」。2001年榮獲馬來西亞第十三屆全國大學（大專）文學獎散文冠軍。

[8] 黃金秋1974年9月3日生於山東郟城，尙沒有達到而立之年。

大陸生活

回憶錄

編者按：清水君——一個剛屆而立之年的優秀青年，他在海外求學的歲月裏，出於對自己祖國深摯的愛心，既寫文章批評共產黨的專制統治，又組建中國愛國民主黨以求推動中國的民主進步，非但沒有任何政治背景和國際背景，而且從沒有做過讓我們苦難大陸人民丟臉和厭棄的壞事，更沒有在民族大義面前畏縮和退讓，他勇敢地回到祖國，祇是要身體力行地去追尋他夢寐以求的民主事業，卻被那個洋教專制復辟政權逮捕並判以十二年重刑。然而他至今沒有屈服。他在法庭上為自己和為人民的辯護，足以催人淚下，激勵人心……本刊為推崇他的愛國民主精神，和做人的優秀品質，特轉載他曾投寄本刊的“大陸生活回憶錄”一文和辛明先生讚頌這個中國年輕人的詩歌，以表示本刊全體同仁對他由衷的尊敬……

其實我離開大陸並不久，很多事情還需要沈澱和反思。所以我拒絕回憶。然而，許多故事總是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想起，然後莫名其妙就流著眼淚，覺得自己悲傷得過於矯情，脆弱得不像自己。然而，還是回憶了。因了「黃山雨」教授的那句話：你知道的應該更多；因了博訊論壇朋友「大力」的那句話：我會拭目以待。

一、計生委的打手們和一個 10 歲孩子

很久很久以前，我還是一個孩子，喜歡在外面閒逛，喜歡看熱鬧。有一天，我看到很多人往一個院子湧去，還有一些小孩子也夾在裏面，我就糊裏糊塗地跟人們進去看熱鬧，然後看到有那麼兩三個青年，光著上身被銬在樹上，好像被打得奄奄一息。當時人們一邊看著，一邊議論說：共產黨真狠，雇這些打手專門欺負老百姓！說話間，那些打手們一邊敲著鐵飯盒，一邊氣勢洶洶地走過來了。

「你們找死？看什麼看？把鐵門關上，一個都不能放過！」人群忽拉一下回頭散去，祇聽到孩子被擠得哭喊的聲音，轉眼，大鐵門已經被關上，而院子裏，除了奄奄一息的被毒打青年，就是面帶猙獰圍過來的五六個打手，以及被無辜關在裏面的我和兩個小孩子。那兩個孩子祇有四五歲，倒很機靈，比猴子還快地爬上高達 5 米高的大鐵門，跳了出去！現在，祇剩下我一個 10 多歲的孩子。

正在莫名其妙間，其中三個打手已經以三角形把我包抄在裏面，劈頭蓋臉打來。那時，我還不知道害怕，本能地轉身，騰空，躲過了三個打手對一個 10 歲孩子的毒招，然後他們再出拳出腿，其實他們也沒有什麼功夫，祇是仗勢欺人，沒人敢還手就自以為了不起罷了，所以我很容易地三跳兩跳，就跳出了包圍圈，根本沒有讓他們打上，但是我在閃避的時候猶豫了起來：該不該還手？算不算自衛？因為單獨和他們三個打我還是不怕的，覺得吃不了虧，可是院子裏還有幾十個打手，正紛紛放下飯碗走過來，天也黑了，我不知道僵持下去會有怎樣可怕的結局，所以我一點都不敢還手，祇是閃避跳躍罷了。然而他們惱羞成怒起來：「好小子，你敢還手？！打死你！」我再次跳出他們的包圍圈，拉開架式，警惕地看著他們。誰知又冒出來一個惡人，趁我不備，從後面偷襲，雖然我躲過那狠狠的一腳，可是我看到他手裏拿著黑黑的鐵鏈子，一副手銬，還有幾個人拿著電警棍撲上來，上面磁磁地冒著藍色的火花(後來我知道那是幾千伏的高

壓電)，我不敢和他們糾纏下去。就叫了聲暫停！然後問他們：你們爲什麼要打我？他們嘿嘿冷笑著：這裏本來就是專門打人的地方，你自己闖進來找打！我說：我祇是進來看熱鬧的，沒有做什麼，你們放我出去罷！然而他們不肯：今晚上非得把你抓起來打死，敢和我們比劃功夫？我一看，好說歹說是沒有用的，他們非要對我下毒手了，我害怕起來，我終於哆嗦著說了一句：你們這邊黨委裏，我認識某某某。

哦？這句話比什麼都靈。那個從後面偷襲我的人，口氣馬上溫柔了：你是某某某什麼人啊？我說：我是他什麼什麼親戚，今天是到他家來玩的，不信你問他。那個傢伙眼珠轉了轉，說：原來是某某某領導的親戚啊，你怎麼不早說呢？要不要在這裏一起吃晚飯啊？我們這裏還有乒乓球桌，你會不會打啊？我已經被他們的陣勢嚇倒了，哪裡敢留下來？祇是要求：放我出去。大鐵門咣當打開了，那個偷襲我的人，親切地握住我的手說：替我給某領導問好啊，我們純粹是誤會！

後來，我那個親戚告訴我，他們那個大院，是計劃生育委員會！那個偷襲我的人，就是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然後告誡我說：他們打死人很正常的！在計劃生育處理上，是沒有憲法不講人情的，打死了白死，最多給一點錢，那還得是家屬在上面多少有點關係的。而且，計劃生育工作每個幹部都有份，我也曾經半夜三更帶治安聯防隊去摸崗，把平時逃跑、過年偷偷回家的違反計劃生育份子堵在家裏抓走罰款；如果找不到他們，就砸破他們的門窗，把所有值錢的東西都沒收，用推土機把房屋全部鏟倒，再把他們親的近的抓起來罰款。這不是和土匪一樣嗎？親戚無奈地

說：誰想得罪人被人罵？這都是上頭的命令和黨委的決定，老百姓死活是沒人管的。

我那時不知道什麼是計劃生育，祇是知道這個社會似乎充滿了恐怖，一群大男人可以對一個 10 歲左右的孩子痛下毒手，還有什麼不能做出來的？如果我不是恰好和當地的某領導有關係，我今天還能存在嗎？思之總讓人不寒而慄。

二、治安崗亭的打手與領導的網

那時我看到的毒打場面挺多的。倒不是因爲我喜

歡看熱鬧，經常有鬼哭狼嚎般的慘叫聲伴隨著訓斥從一個個大院裏傳出來：司法所、派出所、計生委、法庭、稅務所……加上地方領導借鑑了日本鬼子的方式，在每個自然村設立一個治安崗亭，每條交通要道則是千米一崗，這些治安崗亭一般配置 4 個人，每兩人一組，24 小時輪班，擁有警服警車



及全套警訊器材，每人月薪祇有 80 元，其它的錢，全靠打人和罰款而來，打人有獎金，罰款有提成，表現好的可以轉幹，可以進派出所，表現不好的，辭退不要。所謂的表現好壞，完全是根據是否聽領導話，打人是否賣力而決定，如果有一點仁慈的心，都呆不上兩個月，當然，兩個月後，良心已經麻木，所以他們也不會手下留情，反正，打死人也不會被追究。所以這些從農村裏挑選出來經過打人培訓上崗的青年，個個都急於打人立功，以得到更高的獎賞甚至調進派出所。

我在農村有一個遠房表弟，有一身功夫，還曾經是學校長跑冠軍，拿過一些縣地級的比賽冠軍，然而初中畢業後無事可幹，後來，就找關係進了崗亭，順便說一句：治安崗亭招聘的打手，都是外地的，本地

的怕報復，打人不狠，領導不喜歡。那個表弟偶爾到我們家來坐坐，問起來，他總是歎息著說：領導說，必須打人，可是我下不了手，老被領導罵，甚至還被自己人打，看不起。其實我要是打，裏面我是最厲害的，祇是那些人，那麼可憐，我怎麼能下手？

於是他就給我講起一個個故事：有個酒店服務員，是個十幾歲的女孩子，因為不願意跟領導上床，領導一個電話，治安崗亭的幾個人 1 分鐘內趕到，然後把那女孩抬進房間裏，給領導「開葷」……有一個外地客商，到酒店喝酒，老闆看他有錢，就打電話給崗亭，說他嫖娼，然後他們就出動，把那個人抓回崗亭，打了整整一天一夜，那個人才改口認罰，交了 10000 塊，2000 塊給了飯店老闆，5000 塊上交派出所領導，3000 塊崗亭的人私分，因為他沒有打人，祇給他 500 塊。同時，必須要說明，派出所和治安崗亭對於任何罰款幾乎都不給收據或者祇是給隨便印出來的單據，根本不是財政局統一收費單據。所有這些錢，都不會上交國家，都由地方領導和派出所用作「治安經費」，因為，據說財政預算給他們的經費從來都不夠用。

雖然，事實上，這些治安崗亭的聯防隊員不屬於警察的編制，但是，他們受派出所直接領導，派出所受當地領導直接領導，領導要抓的人打的人實在太多，派出所還要經常到公安局開會請示，忙不過來，於是聯防隊員(當地人們都稱為領導打手)就構成了密密麻麻的網，在這個網裏，一旦得罪了領導，那麼，就祇有被吃掉。在當地，總人口大約兩萬多的樣子，然而，治安聯防隊員從最開始 80 名一直增長到 200 名，還不包括派出所法庭稅務所計生委裏那些打手。僅僅為了養活這些打手和警車警械，就要老百姓負擔多少費用呢？

後來曾經和一些地方領導聊天，他們居然把這種治安聯防制度說得天上有地上無：不管什麼事情，一個電話通知派出所，然後所有治安崗亭的聯防隊員人手一部對講機，立即接到命令開拔，不管是下鄉抓計劃生育還是催徵公糧稅務，都是順順當當。我冷冷地說了一句：這個不新鮮，日本鬼子佔領中國，就用過這招！不過還是敗了！他們臉色馬上就鐵青，比他們天天在酒桌上喝的竹葉青還青。

三、80 歲老太太的死和鄉親們的憤怒

在中國城市生活的人，恐怕永遠不會瞭解為什麼那麼多農民工到城裏打工，難道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城市受白眼受排擠受抓捕罰款直到受遣送回家嗎？他們知道，可是和農村他們所受到的待遇相比，城裏的警察多少還不至於那麼狠，還要考慮一下打死人可能要負擔的責任。

祇說說計劃生育罷，我認為計劃生育的出發點是好的，然而在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中，卻充滿了猙獰和血腥。在農村，祇要說起計生委三個字，我估計 10 個人裏面有 8 個人當場能嚇暈，另外一個孩子被嚇得哭，一個孩子還不懂事。那種恐怖氣氛和今天法輪功國民們所面對的 610 辦公室是同一個屬性，同一個操作方式。

先說說我親眼看到的事情。大約 15 年前，我去朋友處做調研，到了朋友所在的鄉鎮，忽然見一個大院子門口圍了很多人，大家都在扒著門縫向裏看，我有過小時候被關進去差點吃虧的例子，當然不敢亂攪和，可是我聽到人們在驚呼：快斷氣了、快斷氣了！

我還是忍不住隨人流從門縫裏偷窺：祇見一個老太太躺在院子裏，身穿破爛的藍衣，頭髮花白帶黃，鼻孔和口裏都不斷滲出血來，旁邊，是皮鞭和電棍，幾個打手正在竊竊私語。我一看出了這樣的大事，可能連現場觀看的人都得遭殃，就趕緊從人群裏擠出來，跑到朋友那裏。到了下午，我和朋友再經過那個計生委院子的時候，那裏已經是人山人海，院子早已經被砸開，打手們全部逃出去，祇剩下老太太的屍體和她的家人在哀哀地哭泣。

聽人說，那是因為老太太的兒子出去逃計劃生育，結果 80 多歲的她就被抓來打，直到打死，那些打手還以為是假冒，上前踹了幾腳，激起了眾怒，鄉親們就把計生委給包圍了，要求抵命，而計生委主任早就坐車逃到城裏去了。沒有多久，城裏的武警公安約幾百人殺氣騰騰地趕到，警車引著狼一樣的尖叫，到處廣播：你們不要鬧事，馬上離開現場，不然就地正法！然而悲憤的農民們推翻了警車：你們打死了人，還不讓講理嗎？在幾千名農民們的包圍下，武警公安只好灰溜溜地開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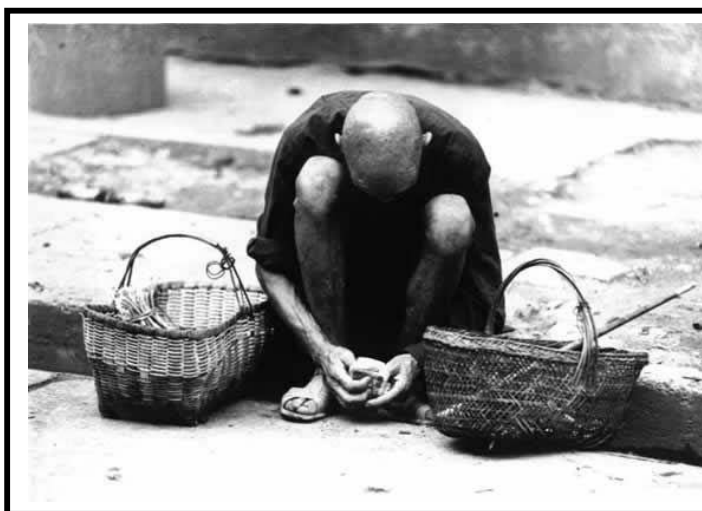
於是，鄉親們衝向鎮政府，要求書記和鎮長出來負責，可是，整座大院，所有的機關，全部空空蕩蕩，所有平時瀟灑或者土氣、親切或者冷酷的領導，一個也不見。連續一個多星期，當地都沒有一個官兒出來收拾殘局，陷入了徹底“無政府”狀態。

後來，聽朋友說，因為那個死者家屬中，有親戚關係在省委，省委批了個條子下來，要求妥善處理，於是，鎮裏要給幾萬塊錢私了，死者家屬不肯，要求懲辦兇手，結果就一拖再拖好像就沒了下文。對那個地方的領導，唯一的影響是：那個計生委主任從此就調到幾十裏外的一個鄉鎮繼續擔任計生委主任，因為「打死人說明他抓計劃生育工作還是很得力的」，而鎮長調到另外一個鎮當了書記。其它一切如舊。

四、舉報者的卑鄙與高尚

在執行計劃生育的時候，是長期作為一票否決的政策來執行的。所謂一票否決，即是說無論其它方面工作再好，無論經濟發展到什麼水平，祇要這個方面的工作達不到要求，整個地方或者單位的所有政績全部被否決，全部泡湯，失去考優資格，而失去考優資格，對於地方領導轉調升職是很不利的因素。地方政府對於計劃生育抓得那麼狠，不惜搞出人命，是和長期以來實行計劃生育一票否決制有直接關係的。而想升官發財的人，除了要送禮行賄外，所有的一票否決工作都最好不要出問題（今天的 610 鎮壓法輪功我想也是同樣的一票否決制罷）。當然，為了調動辦事人員的積極性，經濟的獎罰就完全雷厲風行起來。

記得有一年，我回到母校參觀，最吸引我的，不是蓋了幾座高樓，而是貼在中學公告欄上印著某縣委公章的縣計生委文件。上面非常細緻地列出幾項計劃生育管理措施，主要內容有：計劃生育實行株連政策，假設現在有一戶人家超生，



那麼，方圓 100 米之內，所有住家全部株連，都要交幾百到幾千元的罰款，越近的罰得越多。同樣，如果計劃生育責任人逃跑，那麼，包括他的直系親屬非直系親屬，妻子的直系親屬非直系親屬，都要受株連，全部要罰款。如果違反計劃生育的責任人是非農業戶口，那麼，無論是否黨員，是否幹部，一律開除，然後予以罰款 10000—20000。如果違反計劃生育責任人全家逃跑，那麼，所有財產設備電器由計生委充公，房子等不動產由當地政府強行拆除，取消戶口。即使是合法結婚人員，沒有得到生育許可證的，一律按違反計劃生育處理，強行人流並罰款結紮。為了獎勵舉報，凡舉報違反計劃生育政策的，一經查實，可憑自己在舉報信箱留下的代號直接到銀行領取活期 5000 元存摺。每舉報屬實一個 5000 元，依此類推。計生委替所有舉報者保密。凡是違反計劃生育的，每次計劃生育工作大檢查都必須繳罰款 10000—20000，計生委還特別註明：一次超生，終生受罰……

看到這裏我簡直呆掉了，不相信今天還有這樣蠻不講理的政策，還有這樣蠻不講理的國家！我想，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公告是公告，不見得能實行罷？大概這又是政府的 3 分鐘熱度罷？

然而，我錯了。我來到老家拜訪一個朋友，看到許許多多的住家已經牆倒屋塌，一副荒蕪人煙的樣子，而村裏的許多民牆上，刷著血紅的標語口號：寧可讓你家破人亡，也不能讓你超生一個！

然後遇到我的遠房表姐，表姐夫剛剛去世不久，她一個人支撐著家，帶著兩個孩子，開店做家俱製造生意。閒話起來，她就哭起來，說她丈夫剛剛去世，可是鎮裏還是根本不顧人情感受，強逼她去「進站」，就是去「計生委」結紮！第二天早晨，她果然就被村裏

的村長、村婦聯主任、計生委員 3 個人給拉到 50 拖拉機上，上面已經有幾十名姐妹，然後幾十輛這樣的車

便轟轟烈烈朝幾十里外的鎮計生委開去！那個計生委員我從小就認識，在拉我表姐上車時像一個流氓，然而我表姐一上車就馬上堆起笑臉，說：你別怪我們，我們都是被上頭給逼的，也沒辦法……然後熱情地邀請我去他家坐坐。

我就去了，不去不知道，去了真是嚇一跳。

沒想到在那麼貧窮的村裏，還有這樣闊氣的房子：巍峨高聳的樓房，僅牆基就是兩米厚的水泥，而院牆的高度，大約有十米，而厚度至少有一米，完全能夠抵擋核輻射，進了他家的大廳一看，哇，天哪，簡直就是金碧輝煌，什麼现代化的設施全部都有，連電腦鋼琴都一應俱全。他看到我吃驚的樣子，就忙著解釋說：我沒有錢，都是孩子他媽家裏給的。他的岳父岳母就是同村的一個窮戶，我知道得很清楚，哪裡會有錢給他？他的老婆在旁邊也臉紅了。我記得我表姐頭天和我聊天告訴我的事情：「那個強啊，你可不知道那個惡啊！天天對這個打那個罵的，當了計生委員之後，就更加孬種了！到處去告密，說這個懷孕了，那個超生了，光拿獎金一年就能拿十幾萬，什麼活也不用幹！大人小孩見了他都躲著走！結果人家還入黨了，還要當村長！」果然如此啊，我暗暗想，也難怪他把牆建這麼高這麼厚了，想炸他房子沒有幾噸炸藥是不行的，他打個電話告密也不怕隔牆有耳，太厚了，隔音！

我在心裏不由罵了他幾百次小人，然而他忽然很真誠地給我說：「我知道你經常在上面寫文章，能不能給我們反應一下：農民實在是太苦了，這樣下去非把農民給逼得造反不可！」然後他細細地給我算了一筆賬：每人祇有一畝地，春季產麥祇有四五百斤，秋季產地瓜祇有 1000 斤，小麥產值祇有三四百元，地瓜切成瓜乾曬乾祇有三、四百斤，產值二百元左右，全部祇有五六百元產值，可是光肥料就得至少一二百元，然後買種子買農藥也要一二百元，鎮上教育捐款每年一二百元(多的時候五六百元每人)，鎮裏經費每人要四五十元，鎮裏要是修路，又得出勞力又得出修路費每人一、二百，何況村裏還要給村幹部、管理區幹部(在鄉鎮和自然村之間的管理機關)負擔工資福利招待費……你說這叫農民怎麼活？

我說：不是說每個農民年收入兩千元嗎？他憤憤地說：你別聽那些人胡扯，他們那收入是怎麼算的？

你養個狗養個貓，好，產值兩百；你開個荒種點蘿蔔青菜，好，產值兩百；你在家養幾隻雞幾隻鵝，好，產值五百……然後他們就拿這些去報數，好升官，可是老百姓就苦了，上面按照這個產值標準收費。老百姓交不起，交不起怎麼辦？我們就抓人，打人，打死人也不出奇。這樣，村裏的年青人都快走光了，就剩下走不動的老頭老太太了。地也沒人耕了，上級就把地收回去，賣地給人建工廠蓋樓……天！他然後拿出了一堆收據：這些是他們亂收費的單據，根據中央和省裏發的不准加重農民負擔的文件，他們明顯都超出太多了，你要是寫報道，我就給你作證，拿這些單據登出來！

我感動於他的真誠，雖然知道他的發達也不是什麼光彩的事，可是從他這番話裏，我知道他還沒有泯滅最後的良知。祇是，這樣的報道，我知道是發不出來的，即使發出來，除了給他 and 表姐等人帶來災難以外，並沒有多大用處。而且，宣傳部已經幾次三番下令，不准擅自報道，要按照統一口徑的新華社報道轉載農民生活是怎麼日新月異好得不能再好。

五、可憐的龍鳳胎與特殊材料製成的非人

在極度的內疚中，我想瞭解一下計劃生育執行的情況，或許可以從這上面作作文章，讓有關部門引起重視，從而舉一反三把農民的痛苦都給揭露。

他沈默了很久，我想是他不敢說罷。然而，他終於抬起頭，眼睛裏居然都是淚水，聲音也哽咽起來：我給你說一個真實的故事……

那一年，我跟著計生委的人去各村搞計劃生育大運動，這樣的運動，一年總有兩三次，那天我們接到一個舉報：在某一個衛生院裏，一個孕婦正要生產，我們幾個人連夜乘車去抓。到了醫院裏，護士不讓我們進去，被一個巴掌打倒，然後我們衝進去，可惜……產婦已經生完了，而且是一對白胖可愛的龍鳳胎！我想那就祇有罰款了，可是……你怎麼也想不到，計生委的那個女人，突然上去，要把兩個孩子給掐死！全家人苦苦哀求，產婦跪在床上，孩子的奶奶跪在地上，然而她還是去掐孩子，我受不了，勸了她一句：不如罰款罷？計生委的女人，回頭罵我說：計劃生育超出指標你負責？！然後她……活活把這兩個

剛生下來的龍鳳胎給摔死在地上……產婦當場瘋了，而孩子的奶奶，當場就給氣死了……他猶自歎息：要是我們男人幹的，也就罷了，怎麼這個女人，都這樣沒有人性？！不是那個女人沒有人性，是因為那個女人祇有「黨性」，早就是一個「特殊材料製造的」非人！

六、信訪部門與精神病人

公正地說，中共的信訪部門是所有衙門裏面最善良的一個，因為它的設置初衷是爲了接待信訪群眾，向各級領導反映社會輿論與民情，所以選配的信訪幹部，過去都是一些上了年紀的資深老幹部，他們作風清廉，爲人可親，經常笑容滿面，然而，因為這個部門是清水衙門，這些老幹部被選配到這裏，就已經表明沒有了政治前途，已經是被排擠出去的非主流，所以即使他們真心想做事，他們也沒有任何權力和實質影響力。這就是在中共黨內，清廉幹部被排擠出局的事實。

在過去，信訪部門曾經爲數量龐大的被迫害群眾恢復了名譽，進行了艱難的歷史平反工作；而近年來的信訪部門，無法面對數量龐大的因計劃生育以及鎮壓法輪功引起的信訪群眾，不得已放棄了偽善的面容，開始了恐嚇和迫害信訪群眾的行徑，當然，信訪部門的幹部，也紛紛換上了「立功」心切的年青官僚，他們爲了配合領導的心意，也爲了擴大自己的權力，開始聯合司法醫療機關，無所不用其極，力爭把信訪數量降低到零，力爭把歷史問題沒有解決而被迫長期信訪的群眾打成「精神病」，以此來粉飾太平。這樣做的結果祇有掩耳盜鈴，自欺欺人說什麼「盛世」！

我曾經有長期做信訪工作的親戚，因此不僅能夠親自查閱到一些信訪原始檔案，也在親戚家見到了一些信訪者本人。

給我印象最深的一個，是一個 50 多歲的老信訪，當然看樣子他應該有 70 歲，和他說話時，他溫文而雅，知書達理，談話風趣，祇是黝黑的臉上寫滿了深深的皺紋，一提到他的歷史問題，他的嘴角就向下拉出了悲哀的弧形，欲哭無淚的樣子，最讓人受不了的，是他不管有用沒用，見縫插針似的逮住一個人就

不停訴苦，似乎所有被迫害長期不能解決問題的人，都很像「祥林嫂」。據親戚說，他是個老信訪了，問題倒簡單，以前他是一個高材生，村文革主任爲了霸佔他的妻子，把他打成「反革命」，他服刑出來之後，就要求平反，然後層層信訪，鄉里不行，到市里，市里不行到地區，地區不行到省裏，省裏不行到中央……中南海信訪辦，他曾經去過幾次，還沾沾自喜人家給他倒了一杯水，感歎：共產黨真偉大！

可是中共的信訪政策，是不管你信訪多高層次，都是「批轉當地處理」，然後他的問題從中央批轉到省，從省批轉到地區，從地區批轉到市(縣)，從市(縣)批轉到鄉(鎮)，然後由基層信訪部門處理，信訪部門處理這些問題的基本方法是：根據信訪者所在單位出具的意見，會同相關部門負責人一起開會研究處理。

我的親戚是很負責的了，應這個老信訪之邀，經常下去找幾十年前的當事人約談，也爲此事找過派出所法庭等各部門的頭頭一起開會研究處理辦法，搜集舊檔案和新資料上報領導，然而，最關鍵的是，當年迫害這個老信訪的村文革主任，後來擔任村長，後來擔任村書記，一直鎮壓群眾有功，行賄領導有禮，所以歷任地方領導是他的靠山，由他所把持的共產黨村委會，用鮮紅的大印證明老信訪是誣蔑革命幹部，證明老信訪是流氓，證明老信訪是「精神病」！當然，通過組織的威嚴，他們也找到足夠的證人證言，證明老信訪的確是個「反革命」！由於信訪者「所在單位」長期堅持這樣的立場，所以信訪部門無法給老信訪一個交代，畢竟，給「歷史反革命」翻案，不是一個小小地方信訪部門能夠辦到的！

這樣的情況下，老信訪的問題一拖幾十年，他被激怒了，他「相信共產黨政府」，所以頻繁寫信上訪，爲了證明他不是反革命，他由衷地寫了很多革命作品，交給各級信訪部門，這些文筆不錯然而政治幼稚到極點的文章，沒有給他帶來平反昭雪「反革命」的機會，反而被各級領導抓住了把柄：這個人分明是個精神病嘛(言外之意：我們都不相信共產黨了，他還寫這麼肉麻的吹捧文章)，去作個鑑定，看是不是精神病，以免影響我們的工作考評。

有一段時間，共產黨地方政權，是把信訪工作的好壞當作和計劃生育一樣的一票否決的關鍵因素來看待。至於信訪工作的好壞，是根據群眾來信是否增

加、群眾上訪是否增加等指標來確定的，特別重要的是，對於群眾向上級信訪，共產黨文件稱爲「越級信訪」，各級領導是深惡痛絕的，因爲他們擔心會暴露地方上的貪贓枉法事實，影響上級領導對自己的印象，所以一方面不得不撰寫處理報告給上級信訪部門備案，一方面對越級信訪人員採取強制措施。

措施一，每到過年過節，或者其它重大節日，各級領導都指示信訪部門，做好工作阻止越級信訪，這當中少不了好說歹說，直至恐嚇；措施二，勒令派出所、法庭及地方上密密麻麻分佈的治安崗庭共幾百名武打人員，出動警車和對講機，封鎖交通路口，嚴格盤

查外出人員，對信訪人員實行多人盯梢跟蹤，一旦發現他們要外出信訪，立即攔截抓捕。因此，我們就不難理解，爲何北京一到節日，就緊張得雞飛狗跳，把外地人口趕出去不說，還要禁止外地人員車輛進京，領導人的害怕心理可見一斑。

當然，最絕的一招，是不管節日不節日的，祇要信訪人員還是「信任黨和政府」，還要麻煩「黨的領導」解決各種遺留問題，領導們就要求「鑑定」信訪人員是不是精神病！鑑定當然要找領導「信得過才任命」的醫療機關，他們有時懶得把信訪人員抓去，連面都不見就能出具「精神病醫療鑑定書」，宣判了信訪人員的尊嚴死亡！而信訪部門會把這個醫療鑑定以及信訪人員所在單位或有關人員提供的「精神病線索」，交給領導批閱「可」，然後把這些資料以及信訪人員的幾年幾十年厚厚的文件，全部放進檔案夾，鎖在文件櫃……

從此，信訪人員的所有信訪動作都隨著「精神病」三個考語而變得沒有任何意義，而政府的信訪政策，是「精神病人的信訪不予統計，不影響政績考評」，所以，各級領導眼看著老信訪長年累月出入信訪部門，卻心中早就沒有了他們的存在，在信訪部門的統計中，「精神病」的信訪全部是0，不再處理。這樣的處理方法，固然對各級領導是一了百了的好方法，然而，對於「相信黨的政府」，甚至狂熱「相信黨和政府」的信訪人員來說（可以說，真正長年累月信訪的人，內心裏真的是堅信共產黨的，他們聽到別人說共產黨壞話還要憤怒反駁呢），是何其的可笑和悲哀！

說回頭，那個老信訪和我的親戚是老朋友了，兩家經常互相走動，我親戚還曾經周濟他一些錢解決肚子問題，然而，他既然無能爲力解決老信訪的「反革命」問題，就祇有把他的問題給領導彙報，領導的意思很簡單，不能讓老信訪長年累月影響政府的考評，所以……「精神病」三個字的鑑定從此裝進了老信訪的檔案裏，各級信訪部門的信訪通報，每個月都有這樣一批批的「精神病」黑名單，上了黑名單的信任訪人員，祇要共產黨執政，就永遠不可能再有平反昭雪的日子。爲了老信訪的自尊，也爲了老信訪不至於真的變成「反革命」，我親戚沒有把這個「精神病」鑑定告訴老信訪，老信訪還是經常來，還是懷抱希望越級信訪，直到不久後我親戚上調市局，而接手的是年青的官僚，終於沒有耐心聽老信訪「祥林嫂」一次次訴說冤屈，把他給銬在信訪辦公室門前的樹幹上，毒打了一夜。結果怎麼樣？不得而知，但我想，絕對不會比「精神病」的鑑定更好。

祇是，我現在還忘不了他熱心地要給我輔導功課，熱情地背誦「黨啊親愛的媽媽偉大的爸爸」這一類他自創的肉麻詩歌，和熱情地表示：「不論什麼情況下，我堅定地相信黨和政府，祇要給我摘掉反革命帽子，我決心繼續爲黨奮鬥幾十年……」嗚呼，一頂「反革命」帽子，毀了多少國民一生的幸福和希望！

七、縣委的招待與總統的享受

我真不想寫下去了，因爲無論怎樣寫，無論直筆還是曲筆，都必然落一個惡毒攻擊的罪名。好罷，我寫一點不太灰色的罷。

話說那一年，我到某縣去調研，到了之後，縣委領導親自開著專車過來迎接。然後就是豪華酒宴招待，我祇是一個人，他們來陪的，包括各局各委的頭頭，不下十幾個人。我對他們說：不要這樣浪費罷！爲首的縣領導說：不浪費不浪費！你們要是不來，我們這招待經費還不好開出來呢！旁邊一個宣傳部領導就解釋說：我們每年都有預算多少經費，要上面來人才能動用，不然就不好辦。我擔心地說：那萬一你們的預算超支了怎麼辦？還是節省著用罷。縣領導說：超支了不怕，再追加一點預算就好了！……

那頓晚宴，全桌 16 個人，我祇忙著一邊記資料一邊和他們談話，酒也沒喝什麼菜也沒吃幾口，最後領導問我要不要煙，我說不要，於是他們領導每人又另外追加了一條美國萬寶路，然後瀟灑地簽單，花費了人民幣 10000 多元，吃完飯，那個宣傳部領導陪我去酒店，替我簽單要訂總統套房，我不肯，他說：你別瞧不起我們，我們這裏可真有總統規格的套房，專門接待高級領導的。我說我不是高級領導啊。他說你別管。後來進了房間，他一頭衝進衛生間：我先在裏面洗桑拿舒服一回。哦！

然後，第二天大清早，我還沒有起床，他們就來請我吃早餐，我一去，喝，昨天那批人全到齊了，然後一頓早餐一直吃到中午 12 點，感覺好像他們特有空。他們說：平時也忙，這兩天不能忙，關鍵時刻哪裡也不能去，陪上級領導。我一再聲明我不是領導，然而上級機關在他們口裏就是領導，我要是再否認，表明他們請錯人了，那他們和我都得自掏腰包，所以我爭不過他們。

祇是，我記得那個縣，是個超貧困的縣，沒有多少工業，而農業經常歉收，很多孩子失學，因而盜匪也頗多，然而，那裏有一項工作據說是很先進的：宣傳！從地區的日報到省裏的日報直至中央的日報，經常看到他們的政績，經常看到記者的特寫專訪。因此，到那個縣做領導的，一般很快就能升官，好像是為到地區、省裏工作熱身。

八、小小的工商管理員與大大的造假老闆

記得在我剛工作那一會，認識了很多人。其中一個，是在工商局下面的某菜市場工商所當專門向小商小販收工商費的工商員。

那個傢伙平時樣貌不佳，可是口氣挺大。他天天提著小黑皮包，裏面都是他從菜市場收上來的工商費。這個塊兒八角，那個一塊兩塊。記得那時我們的工資水準還是在一二百元的時候，他經常大手大腳請人吃飯，結帳時多數是欠著(人家大多不敢要)，偶爾用黑皮包裏的工商費一張張數出來給人家，很搞笑。我問他，你怎麼回去報帳？他牙一呲：朝誰報帳？我一天收多少祇有我知道！我說，那多少得有個標準罷？他說：有啊，我一天收幾百，交上去幾十！我才知道

他口氣大的理由，怪不得聽說我要出版作品集，馬上主動提出要贊助，還天天要和我結拜兄弟，我心裏想，可不能和這個貪污犯沾邊，否則將來我可說不清。

那段時間，全國造假貨特別猖獗，但是我沒有想到在我們那裏，他居然知法犯法，帶頭造假。我曾經去他的生意倉庫去看，全部是假造的農藥以及香水化妝品藥品等等，他得意地和我說：這些東西特別暢銷，今天你看到的，明天就發往廣州了。我問他：你身為工商人員，天天打別人的假，卻自己造假？他神秘地說：光我自己造假，成本多高啊？把別人的假貨拿來賣就行了！一個小小的工商人員，每個月能夠貪污幾萬，每個月造假賣假幾十萬，另外他還勾結黑社會老大做其它生意。那如果是他的領導、如果是他的領導的領導……他們可以貪污多少？他們可以造假賣假多少？我不敢想像。

後來他要找我一起做假冒偽劣的大生意，我不肯，然後他讓我介紹銀行經理給他貸款(那時找銀行貸款很難，需要有門路)，被他天天纏得沒辦法了，我祇好把一個銀行經理的電話給他，但專門告誡銀行經理：我和這個人不熟，也沒有合作，讓銀行根據情況他們自己談。我不知道他貸款成功沒有，就是不成功，我想他還是有很多辦法搞到錢。這樣的人，被稱為能人。

但我總以為他有一天會案發被捕，然而不知過了很久很多年，他居然還沒有東窗事發。而我，已經成了「海外反動勢力」的一部分，如果回去，大概坐牢比他還要快。

鄭文英詩選

巨奸李賊

大奸大逆大惡人，
四個黨籍於一身，
民主愛台原為假，
倭寇爪牙纔是真。

陳寅恪之死



羅思義

旅美學界余英時曾經就中國大陸卓越史學家陳寅恪在文革中的遭遇做了相當深入的研究，他推敲陳寅恪所寫的詩文去尋找他受苦受難的真相，始終沒有一個詳盡的答案。最近，中國大陸發表了一篇“冤案實錄”的文章，詳述陳寅恪從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九年三年間所受到的折磨，許多事實證明，陳寅恪夫婦是被文革的造反派活活整死的。

陳寅恪是中國現代史學界的泰斗，他的睿智，他的淵博，他的成就說得上是前無古人，直到今日尚未見來者。這樣一個奇才，竟在毛澤東所訂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標準中遭到橫禍，夫婦兩人先後在驚嚇、惶惑、批鬥、戰慄中死去。陳寅恪之死，證明了共產政權之殘暴、和中共紅衛兵與造反派之可怕。這是中國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災難。

其實陳寅恪的不幸遭遇，從中共君臨中國大地之初就開始了。在中共所訂的標準下，陳寅恪是“舊社會的反動文人”，再加上他曾經到國外深造，更是被誣為裡通外國的買辦、特務，這許多標籤貼在陳寅恪的身上，說明了他在“解放後”的中國大陸不會有好日子過。

這裡先說說陳寅恪的背景：陳寅恪一八九〇年出生，是江西萬寧人(今江西修水)，遊學歐美七年，一九二五年回國，先後任清華大學、西南聯大、嶺南大學教授。大陸政權易手後，任中山大學教授、中央文史館副館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對中國古代史、古文學和佛學經典均有精湛研究，著作有“隋唐制度淵源略論”、“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柳如是別傳”等。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五日歷經文革浩劫、政治打擊、人格羞辱、身體摧殘後去世，比他小十一歲的夫人唐筮也在他死後四五天自我了斷去世，追隨陳寅恪於地下。

陳寅恪的災難雖始於文革，但導致他挨整被批去世的原因，則應回溯到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毛澤東對“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批判。那一天，毛澤東聽完鄧小平、陸定一、林彪、康生、彭真等人對教育工作情況介紹後，大罵當前教育政策與教育方式，他罵：“現在課程就是多，累死人，使中學生、大學生天天處於緊張狀態，要不得”。又說：“歷來狀元都是沒有很出色的，李白、杜甫不是進士，也不是翰林，韓愈、柳宗元只是二等進士，王實甫、關漢卿、羅貫中、蒲松齡、曹雪芹也都不是進士、翰林。”

“現在這個辦法是摧殘人才、摧殘青年，我很不贊成，讀那麼多書，考試辦法是對付敵人的辦法，害死人，要終止”。

兩個多月後(七月五日)，毛澤東又與他的侄子毛遠新談“教育改革與教育革命”，內容涉及階級鬥爭，毛說：“教改問題主要是教員問題，教員就那麼點本事，離開講稿什麼也不行。”

在毛一句頂一萬句的時代，中共便在四個月後(十一月九日)向大陸轉發了“毛主席與毛遠新談話紀要”，這就種下了以陳寅恪為代表的中國教育工作者在文革中被整、被囚、被殺的原因。

一九六六年七月文革開始不久，廣州中山大學開始張貼各種各樣批鬥陳寅恪的大字報，他們不從學術角度批陳寅恪，而是罵“貫徹資產階級反動立場”的陳寅恪，指他“大肆揮霍國家財富和人民的血汗錢，每月吃進口藥物，每天要享受三個半護士的護理”，甚至誣指他“污辱護士”。

早已目盲腿斷的陳寅恪，被罵“這瞎老頭什麼也不用幹，住最好的、拿最高的工資，還不是勞動人民養著他！”

心高氣傲的陳寅恪受不了鋪天蓋地的大字報醜化攻擊，乃於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日向中山大學保健室主任梁綺誠醫生寫了一封短信：“梁主任：因為我所患的病是慢性病，一時不能痊癒，而一時又不能就死，積年累月政府負擔太多，心中極為不安，所以我現在請求您批准下列各點：(一)從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起，一切我經常所需用的藥品皆由我全部自費，一部分藥丸可在市內自己購買，另一部分如水劑藥——‘稀釋酸’、‘必先’、‘薄荷水’、‘灰溴’以及本校有的‘安眠藥’等(如急需藥品一時買不到者)均請

仍由保健室供給，但全部自費。(二)消毒物件指紗布、棉簽等物仍由保健室代為消毒，請酌量收費。此致敬禮！陳寅恪敬啓(印章)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日。”

由於中共的造反派指陳寅恪“污辱女護士”，他的妻子唐筭寫了一個書面聲明給廣東省委駐中山大學文革工作隊，說明陳寅恪“雙目失明，腿骨折斷，又患腸胃心臟等病”，因此醫囑要護士為陳寅恪“沖洗陰囊、上藥、照光”，並非污辱護士，而沖洗陰囊時她從旁助理。

工作隊與造反派豈會接受陳寅恪夫婦的解釋？他們繼續以大字報醜化攻擊，尤其是一向主張保護陳寅恪的中共高幹陶鑄被打倒後，陳寅恪的遭遇更壞，大字報覆蓋了他所住的東南區一號大樓，甚至貼到他住房的床頭前面，處境十分恐怖。接著，紅衛兵衝入屋內，見陳寅恪目盲腿斷，沒有打他，拳腳全部落在他妻子唐筭的身上，把陳寅恪嚇得屁滾尿流，場面十分悲慘，這種死亡威脅的責罵、批鬥，持續了一段很長的時間。接著就是抄家，以搶劫的方式掠奪了他家中的財富，撕毀或焚燒他的書籍與手稿。

幸虧第一批到陳寅恪家中抄查的“革命群眾”是中山大學歷史系的學生，他們知道若干手稿、文件、書報是學術瑰寶，因此抄出來之後貼上封條查封，沒有遭“灰飛煙滅”的厄運。

陳寅恪損失最大的是破四舊的“革命群眾”上門抄家批鬥，他們不但搶去他妻子珍藏的首飾，還把他先祖遺留下來的文物字畫沒收，從此不知去向，大概都被“黨和人民”佔為己有。

當時年近八十的陳寅恪與他六十八歲的妻子唐筭均成為待罪羔羊、驚弓之鳥，但“革命群眾”對他們的醜化仍不停止，甚至陳的學生兼學術研究助理黃萱也被學校歷史系召去參加運動，逼迫她批鬥陳寅恪，又指她與陳寅恪有不清楚的男女關係。這是中共上下對待敵人的手法，但對陳寅恪與黃萱來說，則是最嚴重的中傷與侮辱。

從一九六六年的冬天開始，陳寅恪被迫多次寫書面檢查交待。一代大儒竟向一群如土匪般兇狠的無知“革命造反派”哀哀求饒、自擱自辱，並說他從不反對共產黨，也不反對馬列毛，但革命群眾仍不滿意，迫他一寫再寫，現在把他一篇檢討公開如下：(一)我生平沒有辦過不利於人民的事情，我教書四十年，只是

專心教書和著作。(二)陳序經和我的關係只是一個校長對一個老病教授的關係，並無密切來往。我雙目失明二十餘年，腿骨折斷已六年。(三)我自己的一切社會關係早已向中大的組織交待。

等待死亡降臨的陳寅恪，面對漫漫無盡的批鬥、抄家、羞辱，內心痛苦可以想見。在他生命最後一年，中山大學的“革命群眾”這樣批判陳寅恪：“陳寅恪對於蔣家王朝的覆滅，對於亡國給共產黨是不甘心的，他聲稱不吃中國麵粉、不為五斗米折腰；他狂叫‘興亡遺恨尚如新’；他還說，雖然年紀老到皮包骨了，但還不願死，要看共產黨怎麼亡，死了以後，骨灰也要拋在大海裡，不留在大陸，簡直是反動透頂、惡毒至極。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眾對他也確實憤恨至極，他要至死不變，就讓他帶著花崗石腦袋見上帝吧……”。

在整肅陳寅恪的種種手段中，最慘的是有線廣播的高音喇叭。有整整兩年的時間內，陳寅恪被四面八方的高音喇叭所包圍，痛苦不堪，在正常的日子裏，陳尚且要安眠藥幫助才能睡眠，何況二十四小時不斷向他播放令人恐懼到極點的惡魔般的聲音。革命群眾知道他眼盲，但聽覺靈敏，故意以噪音來干擾他的聽覺，他們甚至把喇叭懸在他的床頭，說是“讓反動學術權威聽聽革命群眾的憤怒控訴。”

二十年後，梁宗岱夫人含淚寫下當時的情景：“歷史系一級教授陳寅恪雙目失明，他膽子小，一聽見喇叭裡喊他的名字，他就渾身發抖，尿濕褲子，他就是這樣被活活嚇死的！”

陳寅恪既成為革命的對象，他的妻子、女兒、親屬當然受到株連。他的親屬有人受不了酷刑迫害與批鬥毆打，只能“坦白招供”承認自己是“特務”，而陳寅恪是“大特務”，他的兩個女兒也是“特務”。因此“清白”的家屬均主動站出來與陳寅恪劃清界限，他的兩個女兒當然也不敢回去看望受苦受難的父母，深恐牽連到自己。這種家破人亡的悲劇，在中共統治大陸幾十年中，屢見不鮮，何止是文革而已，因此沒有人會同情陳寅恪，因為比他們更悲慘的人實在是太多太多了！

在陳寅恪最後的兩百天中，他已瘦得不成樣子，有人偷偷上門去看他，他一語不發，只是眼角不斷流淚，但外面對他的批鬥詛咒仍然十分凌厲，他們罵他

“比狗屎還要臭”，罵他“死不悔改的反動派”。但到了毛死文革結束，中山大學熱愛毛的革委會則說，陳寅恪到死仍表示對毛主席和共產黨感激！

一九六九年十月七日晨五時許，瘦弱不堪的陳寅恪終於嚥下最後一口氣逝世，經診斷死因是：心力衰竭、腸梗阻、腸麻痺，享年七十九歲。而為他吃盡苦頭的妻子唐筭則在陳寅恪死後四十五天，也就是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廿一日晚上八時死去。雖然中山大學方面說她是死於心臟病、腦出血，實際則是唐筭在從容安排好一切後方隨陳寅恪而去，也就是為殉夫而自行了斷，只是不願讓革命群眾為她帶上“自絕於人民”的帽子。

到了一九七六年，中山大學革委會政工組才下結論說：“陳寅恪同志屬人民內部矛盾，按國務院規定一次補發其遺屬撫恤金伍佰二十元”，體現了毛與黨對他的“恩情”！

陳寅恪死後，消息一直被掩蓋，也許中共當局認為“微不足道”，也許有些共幹把它訂為“國家機密”，因此外界無從得知。直到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一日，在香港出版的“春秋雜誌”才發表了一篇“史學權威陳寅恪一死了之”的文章，透露了陳寅恪死訊。到了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台灣中央日報副刊又刊登出一篇長文，歷述中共把陳寅恪迫害致死的經過。兩個月後，也就是三月三十一日，台灣國府國防部長俞大維在中央日報寫了一篇“紀念陳寅恪先生”的文章，內有“緬懷此一代大儒，不禁涕泗滂沱”之句，但並無責怪中共政權之句。接著海外傳媒在一年中發表了許多名人追悼陳寅恪的文章，其中包括有趙元任、楊步偉、毛子水、羅香林、勞幹、方豪、牟潤孫等。

俞大維與陳寅恪有姻親關係，陳的母親是俞大維的姑母，陳的胞妹是俞大維夫人，而俞、陳兩人均先後赴美國、德國同窗留學。

也許海外紀念陳的文章有批評中共政權之處，因此中共方面對此有所反應，一九七八年五月，毛死江囚，廣東出版的“學術研究”刊出陳寅恪的“柳如是別傳”，在前言中這樣寫：“解放後黨和人民對陳寅恪先生的工作和生活給予妥善照顧，使這位早年雙目失明的學者的著述工作從未中斷，對此他曾多次表示對毛主席和共產黨的感激。陳寅恪先生於一九六九年

逝世，在他去世前用了十幾年的工夫研究了大量明末清初的史學、文學材料，終於完成了‘柳如是別傳’，這種學術鑽研的精神是難能可貴的。蔣幫的一些無恥文人、政客，因為陳寅恪先生十多年沒有發表文章，便大談他晚年遭遇，並借此進行反共宣傳，這部洋洋數十萬字的著作，就是給這些反華、反人民的人一記響亮的耳光。”

此文發表在中共“一舉粉碎四人幫”並宣佈文革浩劫結束的年代，但從此文用句來看，四人幫餘孽仍在，而文革浩劫還沒有結束！看來，中國大地的文人，仍有人要步陳寅恪的後塵，命喪祖國！



（上接第 4 頁）十美，但王炳章能夠以極大的熱情棄醫從政，救民運義士於危難之間，創建別開生面的民運理論，闡述與共產暴政作有理、有力、有節抗爭的民運策略。尤其是他躬身實踐、深入中國大陸內地，對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給予理論、組織與經濟等的全方位支持，委實可驚可歎，可歌可泣之至也！王炳章不愧為中國民主運動的希望之所在，不愧為中華民族的良心之所在，不愧為中國大陸走向全面現代化和政治文明的光輝旗幟！首屆黃花崗精神獎頒發給王炳章，是名至實歸的，是恰如其分的！在此，身居中國大陸茫茫黑暗中的筆者謹向《黃花崗》雜誌、向作為《黃花崗》雜誌主編的歷史學家辛灝年先生、向《黃花崗》雜誌編輯們表達我最誠摯的感謝與最美好的祝願：感謝你們為中國民主運動做了一件善之又善也的大好事！願黃花崗精神成為中國大陸走向民主自由的一盞萬丈燈塔，熠熠照亮共產統治下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漆心；願黃花崗精神綿綿流長，猶如長江大河滾滾滔滔，蕩滌一切非文明的污泥濁水，徹底淹沒腐朽無能的共產統治！

筆者認為，黃花崗精神是中國大陸民主運動引以為自豪、引以為驕傲的寶貴財富。在黃花崗精神激勵下，大陸民運人士將彙同十三億中國人民一道，以自己生生不息的偉大創造迎候草原般遼闊壯美的民主自由。這，就是人人心嚮往之的以人類文明普世價值為基礎、並實現全面現代化的嶄新的公民社會！

黃花崗精神，萬丈燈塔永不滅！

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中共文革和紅衛兵

陳永生

〔黑幫粥〕

在「學術權威」接受鬥爭時，必須集體食宿，每日供應兩餐稀粥。為了「消滅黑權威的威風」，紅衛兵當著這些教授老師的面，在稀粥裏解小便，吐口痰，再強迫他們吃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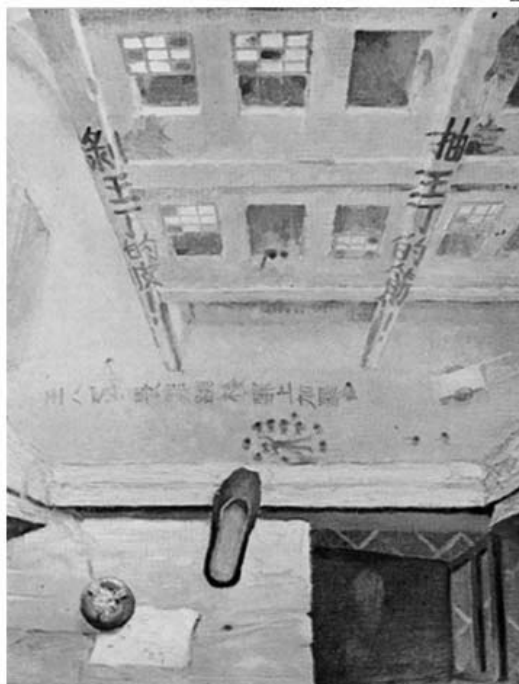


「劫」後師生

為了打倒「學術權威」，規定每個紅衛兵至少要張貼每位老師十張大字報，也就是揭發每位老師十件「黑材料」。廈門四中女生陳花，在編造老師的「材料」充數以後，眼見老師被鬥的悲慘情形，不禁良心發現，向老師懺悔，師生抱頭痛哭……。

斯文掃地

所有大中學的教授老師，幾乎全被打成「學術權威」，在飽經折磨凌辱之後被宣佈「靠邊站」，有的被趕往農村做拾豬糞，掃廁所等工作，以表示「黑權威」從此結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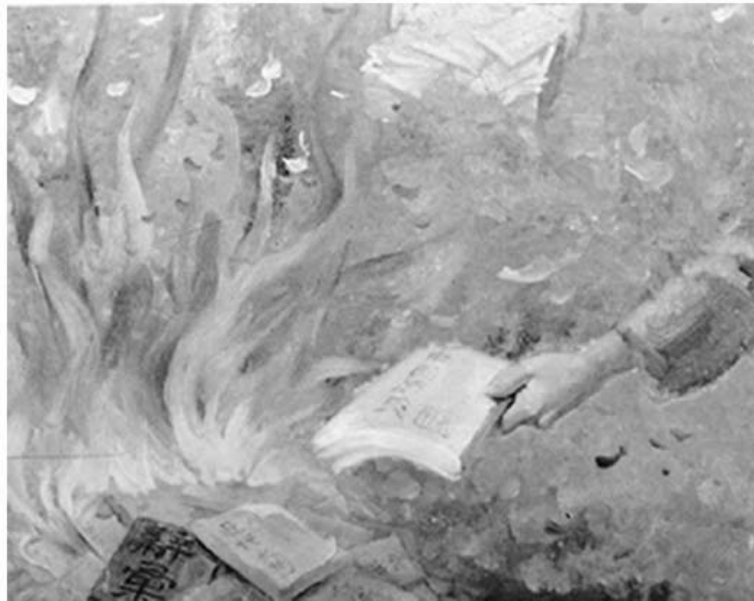
高樓冤魂

一九六六年六月，在批判「三家村」的同時，各地掀起「鬥倒文化權威」運動。《廈門日報》副刊（海瑤）主筆王丁，熬不住精神和肉體的雙重折磨，從五樓跳樓自殺，為「文革」以來廈門市第一條人命，死後共產黨還強迫其家屬「自動」聲明：「王丁罪大惡極，畏罪自殺，應罪上加罪」。



如此「牛鬼蛇神」

遭受鬥爭或被迫遊街示眾的人無論男女老幼，頭髮都被剪得奇形怪狀，在臉部塗上各種圖案或標語，變成人造的「牛鬼蛇神」。



中華文化大浩劫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六條決定」公佈之後，在「除四舊」名義下，紅衛兵挨家挨戶進行搜查，所有非毛澤東著作，包括字典辭源在內，全部付之一炬，每個紅衛兵組織門前，都是火勢熊熊，焚書越多，表示他們的「戰果」越好。



報「恩師」

一九六六年七月，在「鬥倒學術權威」口號下，廈門市第二中學「鼓浪嶼」紅衛兵，強迫全體教師在炎炎烈日下，每人肩挑或背負一百餘斤，作整日跑步，不支倒地者，則以皮鞭抽打，教導主任黃德全等百餘人，被毆成重傷。



為師何辜遭此浩劫

一九六六年七月，廈門市第八中學的紅衛兵發明了一種最新的「刑法」，將被稱為「學術權威」的老師們，集中起來，把他們的頭髮剪得奇形怪狀，並且規定每人捉一百隻昆蟲，然後強迫當眾吃下，據說：唯有這樣，才能「刺激他們的靈魂」

本刊第十期發表的文革圖中，林詩坤應為劉詩昆，雖為英語譯音錯誤，亦為本刊的失誤，為此特向讀者致歉。

依中國文化傳統析論

三民主義、共產主義與中國現代化

編者按：本期發表旅美著名學者丘宏達教授的這篇重要文章，裨能使讀者對三民主義與中國文化傳統特別是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關係產生真正深切的瞭解。

任何一個能夠長久存在的民族，一定有一個中心思想，在中國這個思想就是孔子的儒家思想。在春秋戰國之時有諸子百家，為什麼到後來祇有儒家能成為支配中國而千多年來的思想呢？據個人看法，道家思想過於消極，法家思想過於嚴厲，墨家思想要求個人犧牲之精神陳義過高，絕大多數人無法做到；祇有儒家思想較為折衷，一方面承認人性之缺點，另一方面也瞭解祇用嚴刑峻法無法改正這些缺點，而需要用倫理、道德來感化。由於儒家思想較合實際，因此成為我國思想之主流。不過其他如道家、法家、墨家等思想仍然並存，並且對我國之政治也有相當影響，這點是必須注意到的。

儒家思想由於是二千多年前農業社會之產物，其在政治方面著重安定；在經濟方面，由於生產技術無法提高，因此著重減少或壓制個人的欲望，以免為了貪欲引起社會動亂。當中國可以閉關自守之時，這種政策確能達到安定社會之目的，但在科技方面較不易進步，因為整個社會之風氣並不鼓勵科技之發展。

中國在歷史上也曾幾次被外族徵服，但由於外族祇是在軍事上優於中國，在文化層次上卻較中國低了很多，所以最後外族本身為中國文化所同化，而成為中華民族的一部分。到了清朝中葉以來，西方勢力入侵中國，在軍事上將中國擊敗。當時中國人並不瞭解西方人在文化上並不低於中國，仍想用傳統對付所謂化外之人的方式來處理此種挑戰，結果一再失敗，使中國人逐漸瞭解此次西方對中國的衝擊不祇是軍事上的，其優於中國的科技、政治及經濟制度均對中國社會造成震撼。最初中國人還認為祇要在軍事、科技方

面效仿西方，就可以對付此種衝擊；但在一八九四—九五年中國竟然被日本擊敗，終使國人瞭解必須像日本一樣在政治、法律及經濟方面均向西方學習才能強國。後因清朝光緒皇帝變法失敗，使國人由於改革無望而傾向革命，在一九一二年革命成功，建立了中華民國。

由於傳統儒家思想無法應付此一中國所從未遭遇過之大變局，因此至清末民初以來，就有人主張捨棄傳統思想而全盤西化。其中有人主張效仿西方國家之民主政治，另一批人則主張傾向共產主義。此乃由於知識份子對自己所處社會的缺點感受特別敏銳，而傾向於建立一個理想社會；然而本身並無實際政治經驗，祇是鑑於歐美民主政治由於是開放社會，缺點容易暴露，因此特別會傾向共產主義。

孫中山先生與當時一般知識份子不同，不但對中國傳統文化有深切之研究與認識，且對西方民主政治也作了深入的研究與觀察，加上本身多年從事革命及政治工作的實際經驗，所以其所提出解決中國問題之主張，卻是實際可行的。

在民族主義方面，中山先生觀察英國之經驗，發現尊重傳統才能維持人民之自尊心與愛國心，國家才能夠強大。在尊重傳統下的進步雖當時看來緩慢，但卻能真正生根；因此，中山先生並不主張全盤西化，而建議一方面吸收西方文化之優點，一方面保留中國傳統文化中許多優良的部分。如果完全拋棄傳統文化，使人民喪失了自尊心及自信心，又如何能使中國強盛呢？因此，中山先生一再強調中國自文武周公孔子以來有一個道統，他的主義就是繼承這個道統。

然而在政治方面，中山先生認為儒家思想雖有「選賢與能」之理想，但祇有考試取仕一途，國家領導人並不由人民選出；因此是人治而不是法治，缺乏民主精神，這個缺點必須自外國文化中吸收其優點來

改正。中山先生觀察各國民主憲政之發展，發現凡是民主制度真正生根之國家，如英、美二國，其發展之過程均是漸進的。凡是不顧實際情況，想一日之間即實行民主之國家，如南美各國，最後往往形成獨裁。所以，中山先生在民權主義中提出訓政時期之辦法，必須使人民瞭解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權之意義與行使後，再來舉行全國大選方能達到真正的民主。

其次，儒家對經濟事物採取消極的態度，此點也必須吸取西方之優點，所以，中山先生在民生主義中主張工業化，使政府對經濟事物採取積極的態度；但他也反對政府對經濟事物過度干涉，妨害個人的自由發展及積極性。

第三，儒家因為當時婦女不能外出就業及受教育機會少，所以對婦女祇在社會中給以從屬的地位，此點已與目前社會與經濟情況不合，所以，中山先生主張男女平等。

由上述分析可知，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實在是最適合中國國情之主義，在台灣施行的結果可為明證。

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論是十九世紀中葉的產物。他根據工業革命後歐洲社會之一些不良情況，提出階級鬥爭之革命理論；並認為工業愈發達之國家，階級衝突愈厲害，將因而導致社會革命推翻現有政府，成立無產階級專政之政權。但歐洲社會日後的發展卻完全未如其所料，所謂資本主義政權反而能夠自我修正，採取部分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之改革主張，所以中山先生認為馬克思祇是社會病理學家。馬克思學說在客觀上雖對後來西方社會之改革有積極的貢獻，然而實際上實行的結果卻是造成假共產主義之名的政治獨裁。

中共的領導人未能瞭解到中國的實際情況，又對西方社會沒有深切瞭解，因此主張在中國實行共產主義，結果是造成中國大陸目前之落後情況，其平均每個國民所得祇有台灣地區之十二分之一。台灣地區之人口密度高於大陸五倍，土地面積祇及大陸的千分之三，在這種極不公平之競爭條件下，台灣能夠優於大陸十二倍，由此可見三民主義的優越性，及共產主義之低劣性。

中共自毛澤東死後，由華國鋒繼任，華氏瞭解以往關閉政策不利經濟發展，因此想大力引進外資來發展。其最初所定計劃大而無當，企圖在一九八五年前

投資六千億美元，因此實施不到兩年迫不得已停止。現在中共自稱此為「洋躍進」，與一九五八年之「大躍進」，及一九六六年至六七年的「文化大革命」同為三次經濟建設之大挫折。其實中共的挫折何止經濟方面，大躍進造成三千萬人餓死（中共祇承認一千多萬。編按：實際是四千三百萬。），文革有一億人受害。為什麼在共產制度下會發生這種事情，除了其制度本身有問題外，還能有什麼合理的解釋？中共自採取開放政策以來，許多知識份子對所謂共產主義之優越性紛紛提出疑問，為什麼共產主義在各國實行之結果均變成法西斯獨裁？為什麼大陸不如台灣？

自鄧小平掌握大權以來，為了挽救日益困難的經濟危機，因此不得不採取一些我國政府在台灣的經建措施，如將人民公社事實上解散，將土地轉包人民，仿效我國政府之三七五減租；另外又積極引進外資，放鬆一些中央集權式之經濟控制等。這些措施實行了不過幾年，中共經濟已有相當改善，由此可見三民主義的建國路線才適合中國。不過中共的改革祇限於經濟方面，其作法仍是清末「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模式，而不敢在民族認同與政體上作根本改革。片面之經濟改革祇能延緩一個政權的危機，並不能根本解決問題，使中國真正走上富強康樂之路。這種片面之改革如果真的能徹底解決問題，清朝也就不會亡了。

中華民國政府在台灣所以能達到今日之進步，乃由於其建設不僅祇是在經濟方面，而是在民族主義與民權主義方面，在客觀環境許可之情況下，也積極進行民主政治及加強民族精神，否則不可能達到這麼高的成就。因此中共如果想真正使中國走向富強之路，則必須仿效在台灣之中華民國政府，逐步實行民主。並應恢復民族之自尊心，將馬克思、列寧及史大林等思想自意識形態中徹底排除。自古以來，中國人固然不斷吸收外來文化之長處，但像中共這樣將外國人當祖宗一樣崇拜，可以說是從未有過的。許多來到海外的中國大陸之知識份子也都認為這實在是中國人的大恥辱。據中共自己的報道，目前大陸引進外資，加強與外國人接觸的結果，更造成崇洋媚外之不良風氣，其主要原因就是當初將馬列主義及史大林思想強加於中國人，使人民傷失了自尊心與自信心；所以從中共本身的利益來看，也必須排除馬列主義及史大林思想才有前途。但中共領導人卻不願面對這個現實，仍然

強調所謂「四個堅持」，其中包括一黨獨裁及史大林思想的化身毛澤東思想。海內外的人士幾乎一致再三勸告中共必須放棄「四個堅持」，才有希望實現中國現代化。中共卻至今不能接受這項忠告，反而掀起所謂「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運動。用中共自己的術語來形容，簡直是拿起石頭打自己的腳；在此情況下，其現代化的前景不可能樂觀。

由上述分析可知，如不以三民主義替代中共之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則中國不可能現代化。中共領導人鄧小平在某種程度上也看到這點，所以提出所謂具有「中國特色之社會主義」，但其內容含糊，如果包括了「四個堅持」，則等於換湯不換藥，不會產生良好結果；如其內容轉為三民主義就可以發生良性作用。

然而目前將三民主義推行到大陸卻遭遇到三個重大困難。第一，在台灣，一般人、特別是學生與青年，雖在校均修習過三民主義，卻不大瞭解三民主義，也缺乏去瞭解的興趣。如果在台灣都不能使一般人對三民主義發生興趣，如何能向大陸同胞推廣呢？據個人看法，在台灣形成這個問題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在教學研究方面將其教條化，加之有些無知的人斷章取義引用國父有關三民主義的言論，來反對政府一些進步的措施，因此造成這種不幸現象。

我們知道任何一種政治理論都有原則與細節，細節部分是根據歷史經驗或當時情況對原則有所解釋與說明，否則理論就會淪於空洞。因此細節部分受到時間與空間的限制，並非萬年不易的，而隨時可依據原則，配合時空情況予以修正。原則部分則要經過實踐的考驗，才知道是否正確。三十多年的台灣經驗證明三民主義的原則是正確的，否則台灣地區今日也不會有目前之安定、均富與繁榮。不幸在過去多年中，大部分對三民主義作研究與教學的人，未能分清此二者的重要區別，致使三民主義被一般人誤為教條，現加實例說明。

國父在三民主義中曾提到中國人口太少應增加，此點曾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被少數人曲解，來反對政府推行家庭計劃。後來，國父哲嗣孫科先生公開指出，由於現實情況不同，所以家庭計劃並不違反三民主義。國父的目標是要對付帝國主義，他當時提出中國人口太少而必須增加，是要對付白色帝國主義。但

現在是要對付赤色帝國主義，其根本解決之道在消除貧窮，如不實行家庭計劃就無法達此目的因此家庭計劃並不違反三民主義。

個人認為研究與實行三民主義必須注重其基本原則及精神而不在細節，或國父對某些事怎麼說。特別是下列幾點值得強調：

(1) 三民主義之目的在維護中國文化傳統之優良部分，並吸收其他文化，優良且適合中國的部分，在此基礎上建立民主、自由、平等、均富（而不是均貧）之王道中國。

(2) 三民主義之精神在以理性的態度處理問題，而不訴諸情緒；並且在處理問題時以調和各方利益為目的，而不在製造各方仇恨與矛盾使執政者從中取利（如共產主義）。

(3) 三民主義著重可行性，不好高騖遠，針對實際情況，提出確實可行之步驟及實行方法，不以口號與教條來逃避問題。

要想推行三民主義，必須先根據上述原則，將其精華根據實際情況與台灣經驗，用科學方法整理，確實改進三民主義在台灣之教學與研究，提高一般對其之興趣，才能夠進一步向大陸同胞介紹。

其次，戒嚴、黨禁、報禁在台灣地區早期確有必要，但如今國防鞏固、經濟繁榮、社會安定，這些政治禁制已無絕對必要。但由於執政黨中某些人士之堅持，不能早日解決，致與三民主義中之民權主義產生矛盾。這些措施不僅使我國形象大受影響，且無法吸引大陸民心。所幸蔣經國總統在去年已決定解除三大禁令，祇待立法院制定國家安全法後就可解禁。中央民意機關久不改選也與民權主義不合，所幸政府正在研擬辦法改進。上述幾個措施，對號召大陸人心，動搖中共極權統治將有重大影響。

第三，恐共心理使三民主義無法落實地在大陸宣揚。目前我國政府統治的地區不論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均遠較大陸進步，應排除這種恐共心理，使三民主義向大陸積極推行。

目前中共表面上人多地大，但內部有嚴重的問題。我國雖然地小人少，卻代表了進步的希望與中國現代化具體可行之模式，所以我國必須有信心、毅力與勇氣，積極向大陸發展，以謀求整個中國的現代化、自由化與民主化。

為中國文化 敬告世界人士 宣言

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 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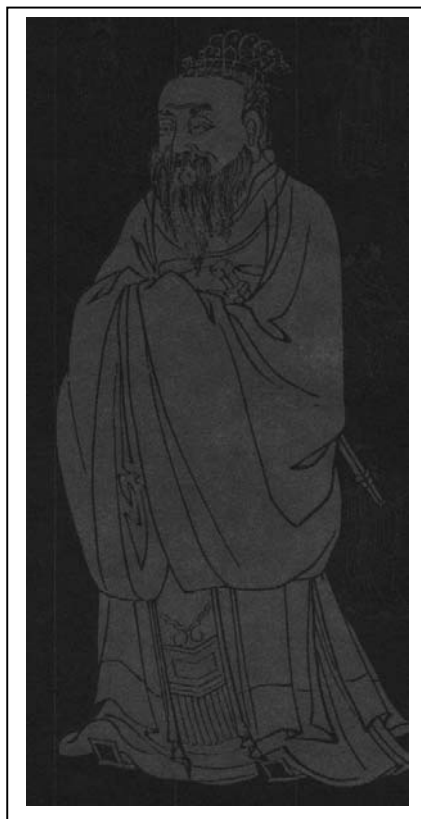
牟宗三 徐復觀 張君勱 唐君毅 合撰

(續二)

九、中國文化之發展與民主建國

至關於民主建國之問題，我們上已說過，中國文化歷史中缺乏西方近代之民主制度之建立，中國過去歷史中除早期之貴族封建政治外，自秦以後即為君主制度。在此君主制度下，政治上最高之權源，是在君而不在民的。由此而使中國政治本身發生許多不能解決之問題。如君主之承繼問題。改朝易姓之際之問題，宰相之地位如何確定之問題，在中國歷史上皆不能有好的解決。中國過去在改朝易姓之際，只能出許多打天下的英雄，以其生命精神之力，互相搏鬥，而最後歸於一人為君，以開一朝代。但在君主世襲之制下，遇君主既賢且能時，固可以有政治上之安定。如君主能而不賢，則可與宰相相衝突，亦可對人民暴斂橫征。如君主不能不賢，則外戚、宦官、權臣皆覬覦君位，以至天下大亂。然賢能之君不可必，則一朝代終必就衰亡。以致中國之政治歷史，遂長顯為一治一亂的循環之局。欲突破此循環之唯一道路，則只有係於民主政治制度之建立。故 1912 年，亦終有中華民國之成立。而現在之問題，則唯在中國民族迄今尚未能真正完成其民主建國之事業。

但是中國今雖尚未能完成其民主建國之事業，然我們卻不能說中國政治發展之內在要求，不傾向於民主制度之建立，更不能說中國文化中無民主思想之種子。首先我們應當知道，中國過去政治雖是君主制度，但此與一般西方之君主制度，自來即不完全相同。此種不同，自中國最早的政治思想上說，即以民意代表天命。故奉天承命的人君，必表現為對民意之尊重，且須受民意之考驗。所以古來在政治制度上：「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百工諫，庶人傳話，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使政治成為通上下之情的機構。同時史官的秉筆直書，人臣對於人君死後所共同評定的謚法，都是使人君的行為有多少顧忌。這些都是對君主所施之精神上之限制。由中國政治發展到後來，則有代表社會知識分子在政府中之力量之宰相制度，諫諍君主之御史制度，及提拔中國知識分子從政之徵辟制度，選舉制度，科舉制度等。這些制度，都可使君主在政府內部之權力受一些道德上的限制，並使中央政府與社會間，經常有溝通之橋樑。而這些制度之成立，都表示中國社會之知識分子所代表之中國文化力量。只是這些制度之本身，是否為君主所尊重，仍只繫於君主個人之道德。如其不加尊重，並無一為君主與人民所共認之根本大法——憲法——以限制之，於是中國知識分子仍可被君主及其左右加以利用，或壓迫放逐屠殺，而在此情形下，中國知識分子則只能表現為氣節之士。至此氣節之士之精神中，即包涵對於君主及其左右之權力與意志之反抗。由此反



抗之仍無救於政治上之昏亂，國家之敗亡，即反映出中國政治制度中，將僅由政府內部之宰相御史等對君主權力所施之限制，必須轉出而成爲：政府外部之人民之權力，對於政府權力作有效的政治上的限制。僅由君主加以採擇與最後決定而後施行之政治制度，必須化爲由全體人民所建立之政治制度，即憲法下之政治制度。將僅由篡竊戰爭始能移轉之政權，必須化爲可由政黨間作和平移轉之政權。此即謂由中國君主制度本身之發展及中國文化對於君主制度下政治之反抗與要求，中國政治必須取消君主制度而傾向於民主制度之建立。

至於我們不能說中國文化中無民主思想之種子者，則以儒道二家之政治思想，皆認爲君主不當濫用權力，而望君主之無爲而治，爲政以德。此即對君權加以限制抑制之政治思想。此固只是一對君主之道德上的期望。但儒家復推尊堯舜之禪讓及湯武之革命，則是確定的指明「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而是天下人之天下」及「君位之可更迭」，並認爲政治之理想乃在於實現人民之好惡。此乃從孔孟到黃梨洲一貫相仍之思想。過去儒家思想之缺點，是未知如何以法制成就此君位之更迭，及實現人民之好惡。禪讓如憑君主個人之好惡，此仍是私而非公，而儒家禪讓之說，後遂化爲篡奪之假借。而永遠之革命，亦不能立萬世之太平。儒家所言之革命，遂化爲後來之群雄並起以打天下之局。但是從儒家之肯定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並一貫相信道德上，人皆可以爲堯舜爲賢聖，及民之所好

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等來看，此中之天下爲公人格平等之思想，即爲民主政治思想根源之所在，至少亦爲民主政治思想之種子所在。

我們所以說中國過去儒家之「天下爲公」「人格平等」之思想之必須發展爲今日之民主建國之思想與事業者，則以此思想之發展，必與君主制度相矛盾。因君主之家天下，畢竟仍是天下爲私。同時人民在政治上之地位，不能與君主平等，所謂「臣罪當誅，天王聖明」，則在道德人格上亦不能與君主平等。反之，如君主與人民在道德人格上真正平等，則人民在政治上應亦可言「人民聖明，君罪當誅」。若欲使此事成爲可能，則君主制度必然化爲民主制度。故道德上之天下爲公人格平等之思想，必然當發展至民主制度之肯定。

此種政治上之民主制度之建立，所以對中國歷史文化之發展成爲必須，尙有其更深的理由。在過去中國之君主制度下，君主固可以德治天下，而人民亦可沐浴於其德化之下，使天下清平。然人民如只沐浴於君主德化之下，則人民仍只是被動的接受德化，人民之道德主體仍未能樹立。而只可說僅君主自樹立其道德主體。然而如僅君主自樹立其道德主體，而不能使人民樹立其道德的主體，則此君主縱爲聖君，而一人之獨聖，此即私「聖」爲我有，即非真能成其爲

聖，亦非真能樹立其道德的主體。所以人若真成樹立其道德的主體，則彼縱能以德化萬民，亦將以此德化萬民之事之本身，公諸天下，成爲萬民之互相德化。



宋人 柳陰高士圖 軸

同時亦必將其所居之政治上之位，先公諸天下，爲人人所可居之公位。然而肯定政治上之位，皆爲人人所可居之公位，同時即肯定人人有平等之政治權利，肯定人人皆平等的爲一政治的主體。既肯定人人平等的爲一政治的主體，則依人人之公意而製定憲法，以作爲共同行使政治權利之運行軌道，即使政治成爲民主憲政之政治，乃自然之事。由是而我們可說，從中國歷史文化之重道德主體之樹立，即必當發展爲政治上之民主制度，乃能使人真樹立其道德的主體。民主之政治制度，乃使居政治上之公位之人，皆可進可退。而在君主制度下，此君主縱爲聖君，然其一居君位，即能進而不能退。縱有聖人在下，永無爲君之一日，則又能退而不能進。然本於人之道德主體對其自身之主宰性，則必要求使其自身之活動之表現於政治之上者，其進其退，皆同爲可能。此中即有中國文化中之道德精神與君主制度之根本矛盾。而此矛盾，只有由肯定人人皆平等爲政治的主體之民主憲政加以解決，而民主憲政亦即成爲中國文化中之道德精神自身發展之所要求。今日中國之民主建國，乃中國歷史文化發展至今之一大事業，而必當求其成功者，其最深理由，亦即在此。

十、我們對中國現代政治之認識

我們以上論中國歷史文化精神之發展至今，必然要求民主建國，使我們觸及中國之現代史。所以我們須略述我們對中國現代史之一些基本認識。

在懷疑中國能否民主建國的人，常由中華民國史以舉證。中華民國之歷史，從民國初年之一度袁世凱稱帝，一度張勳復辟，及十餘年之軍閥割據，到民國十五年國民革命成功，即開始國民黨二十年之訓政，訓政剛結束，表面行憲選舉完成，即有共產黨之取國民政府而代之，今已實行專政九年。這都似可證明中國政治永不能真正走上民主憲政之路，以至使人可根本懷疑中國人民之是否真要求民主政治。

首先我們之看法，關於中國人民之要求民主政治，根本是不成問題的。因袁世凱稱帝，亦要先僞造民意，而洪憲之命運，亦只有數月。張勳復辟之命運更短。而國民黨之訓政，在中山先生之思想中，亦自始只以之作爲憲政之準備工作。只有共產黨所宗之馬

列主義，在理論上是反對西方民主的，然其必以「人民民主」之名置於專政之上，並首先以新民主主義爲號召，則仍證明其未能真正否定民主，足見中國人民之要求政治民主是不成問題的。則現在的問題是何以中國人民要求民主，而民主憲政終不能在此數十年之中國歷史中實現？則此中有現實社會的理由，亦有學術思想上之理由。就民國初年一段時期說，則辛亥革命之成功，本來主要係依於清末變法圖強運動之失敗，而漢民族之民族主義意識之興起，遂將滿清推倒。變法圖強運動，雖亦要求立憲，然當時立憲之目標，只重在用新人才以求富強。而漢民族之民族主義意識之興起，則是要雪所受於滿清的三百年之恥辱。當時的思想中，雖亦有民權民主之觀念，但這些觀念之涵義，中國人民並不清楚，或視民國之成立只爲中國歷史上改朝換代之類。而中國社會又自來缺乏各種宗教經濟學術文化之團體與地方自治之組織及各階級之對峙。於是民國初年之議員，多只是一種純粹之知識分子，無社會之客觀力量以爲其基礎，亦不能真正代表社會某一組織某一階層之利益。我們看西方民主政治之起源，分明由於社會之各組織各階層之利益互相限制，互相爭取而成立。而西方之議員，亦恆有社會之客觀力量，以爲其言論所以有效之基礎。中國則一向唯以知識分子之作爲社會之中心，而此知識分子，又素未與工商界結合，亦無教會之組織，則民國初年之議會，必只成爲社會浮游無根之知識分子結合，而終於不能制裁袁世凱之稱帝，亦不能抵制曹錕之賄選，亦無足怪。至於從民主之思想方面說，則由中山先生之民權主義思想，民國初年之代議政治之理論，以至陳獨秀辦新青年之標出科學與民主之口條，固皆是民主思想。但是陳獨秀等一方面標科學與民主之口號，一方面亦要反對中國之舊文化，而要打倒孔家店。這樣，則民主純成爲英美之舶來品，因而在中國文化中是無根的。以民主與科學之口號，去與數千年之中國史文化鬥爭，中國文化固然被摧毀，而民主亦生不了根，亦不能爲中國人共信，以成爲制度。於是陳獨秀終於轉向社會經濟方面，而注意到西方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對中國之侵略，由是而改談馬克思主義。不再談所謂資產階級之民主。以陳獨秀這種特別標榜民主口號的人，而終於一度拋棄了民主口號，這即是民國初年之民主思想之最明顯的自我否定。於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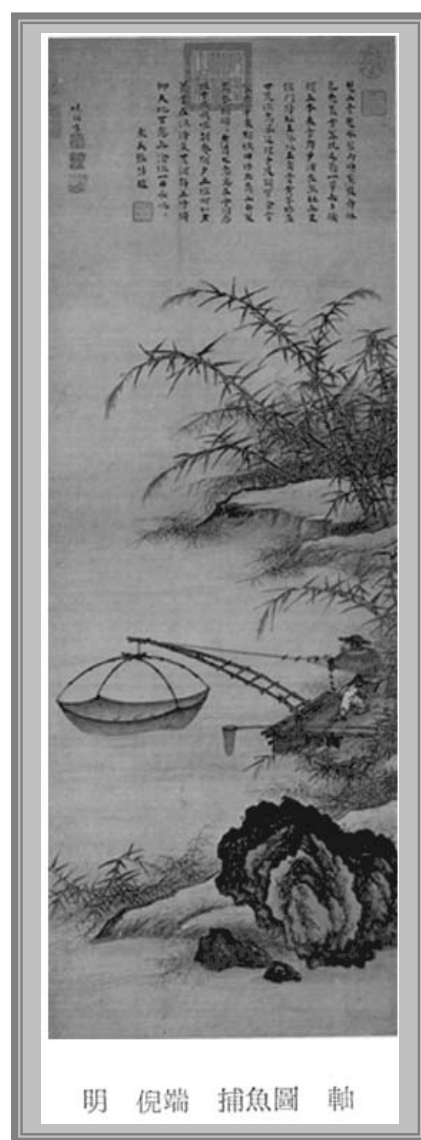
民國十二三年後的中國思想，便一步步的走入馬克思之旗幟下去。這不僅共產主義者為然，即當時之三民主義者如胡漢民，廖仲凱等，亦同樣是唯物史觀之信徒。十三年國民黨改組，歸於聯俄容共，亦重在共建一革命組織，以為北伐之準備，而不在直接實現民主制度。中山先生與陳獨秀之不同，只在他始終有一由軍政訓政以達民主憲政之思想。然在國民革命的實際行動中，此民主憲政之觀念，並不能凸顯為人所注意。而在國民黨訓政的廿年中，此觀念亦幾為黨治觀念所代替。

至於國民黨之訓政何以延至廿年之久，此固可說是由於國民黨人在主觀上之不願輕易放棄其政權，但在客觀上的原因，則自一九三一年日本侵佔東三省後，又特別喚起了中國人之民族思想。民族思想，常不免要求集中力量意志以便對外，因而一時有各種仿效希特勒、莫索里尼等思想之興起。及中日戰爭起，政體自更不易輕於改變。然人欲由此推論中國人民願長為訓政下之人民，則並無是處。故在民主政治以外之任何努力，對予解決中國問題，終皆一切歸於無效。

至於今日共黨在大陸之專政，似最易證明中國人民之不要求民主。再連我們上面所說的陳獨秀之講民主而改信馬列主義，及國民黨人士在思想及作法上，曾受共黨及法西斯之影響等，似更證明中華民國以來之思想界，並不重視民主之思想。對於這個問題，我們的答覆是此共產主義思想之來源，根本不是中國的。其所以能在中國蔓延，乃由於自十九世紀末以來，中國確曾受西方資本主義的侵略與帝國主義的壓迫。此共產主義之思想，乃由住在租界中的亭子間的知識分子，因深感此侵略壓迫之存在，而後介紹至中國的。這種思想之介紹至中國，並非由中國民族文化思想中所直接發展而出，而只是由於中國民族與其文化，因受侵略壓迫，不能一直發展，然後才由外輸入的。這種思想之本身，並非真為中國人民本其客觀的精神生命之要求而在正面加以接受。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取得政權，我們亦不能忽視二重大的事實。第一、即共黨之坐大，初由於以共同抗日為號召，這是憑藉中華民族之民族意識。第二、共黨之能取國民政府之政權而代之，其初只是與其他民主黨派聯合，以要求國民黨還政於民，於是使國民黨之黨治，先在精

神上解體。這是憑藉中國人民之民主要求，造成國民黨精神之崩潰，而收其果實。由此二者，即可證明中共今雖然在思想上要一面倒於蘇俄，並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然其所以有此表面的成功，仍正由於它憑藉了中國人民之民族意識及民主要求，而不是由於人民先正面的接受了馬列主義專政思想。因此馬列主義之專政思想，是決不能長久成為中國文化與政治之最高指導原則的。

馬列主義之專政思想所以不能長久成為中國文化政治之最高指導原則，其根本理由：一、在馬列主義想否認普遍的人性，而只承認階級的人性，因而想打倒一切建基於普遍的人性基礎上之宗教、哲學、文學、藝術、道德、而徹底以階級的觀點，加以劃分，此處是違悖了世界一切高級文化之共同原則。尤與中國數千年之文化思想中之植根於對此心此性以建立道德的主體者相違，而想截斷中國歷史文化之統緒。二、在由其階級的人性觀所



明 倪端 捕魚圖 軸

產生的無產階級的組織，想否認每一人的個性與自由人權，這是與一切人之各為一個人，因而必有其個性，亦當有其自由人權相違的。三、在中國文化之歷史的發展，是必然要使中國人除成為一道德的主體

外，兼成爲一政治的主體及認識的主體、實用技術的主體。人要成爲一認識的主體，則其思想理性決不能爲教條所束縛，而思想之自由，學術之自由，必當條件的被肯定。四、在中國人民要成爲政治的主體，則既不能容許君主一人在上，人民成爲被治者，亦不能容許一黨專政，使黨外皆只成爲被治者。五、在中國傳統政治中問題之一在對於改朝易姓，君主繼承等問題，無妥善的解決。但以前之君主繼承，尚有習慣相傳儒家所力加維護以求天下之安定之傳長子制度，而在共黨之極權政治中，則最高政治領袖之繼承問題，連類似傳子之制亦無法建立，則只有歸於如蘇聯列甯死後斯大林死後之互相砍殺。此砍殺之必然產生，乃在於共黨體制之內，視不同之意見爲必不能並存的敵人。有我無敵，有敵無我，此乃共黨體制所造成之心理狀態。於是共黨內權力之爭，同時即爲參與者的生命的生死之爭。故此砍殺，乃由一黨專政之本性所注定者。欲避此砍殺，只能由全民依共同遵守之憲法，以行自由之選舉，使政權能在和平中移轉。由此種種理由，則我們雖亦可承認在中共之集體組織之專政下，若干集體的實用技術性之事業，可暫表現若干成績；然對整個中國文化之發展言，對人之個性自由人權言，對人之普遍的人性與依於此普遍的人性而建立之一切人類文化言，此專政乃不當長久，事實上亦必不能長久者。其所以在事實上必不能長久之理由，即在吾人前面所言，此馬列主義之思想，在中國民族之客觀精神生命之要求上，本無正面之基礎。中國人之接受此思想，唯因此思想乃直接以反帝國主義反資本主義之侵略爲目的。在此點之上，此種思想亦實較任何其他中國思想西方思想，其旗幟較爲鮮明，而富於激動力。故自民國十二三年以來，即流行於國內。然而中國民族之所以反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則唯由其自身要求獨立存在，並繼續發展其文化於當今之世界。而此則有中華民族之精神生命正面要求的存在。此正面要求是「正」，此正面要求之受百年來之帝國主義資本主義之侵略壓迫是「反」，而馬列主義則至多只是被中國人一時所信，而用以反此反者。則馬列主義在根本上只是此正面要求之暫時工具。因而絕不可能倒轉來代替原初之正面要求，或妨礙到此正面要求。如妨礙之，則此正面要求既能因受外來之侵略壓迫，而尋求此工具，則他亦能因對其自身之矛盾，而捨棄

此工具。所以無論中國今後政治發展之曲折情形，我們縱不能一一預料，然馬列主義思想本身，總是歸於被否定，而中國文化之客觀的精神生命必然是向民主建國之方向前進，則是我們可以斷言的。

十一、我們對於西方文化之期望及西方所應學習於東方之智慧者

西方文化是支配現代世界的文化，這是我們不能否認的事實。自十九世紀以來，世界各民族的文化都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都在努力學習西方之宗教、科學、哲學、文藝、法律、實用技術，亦是不能否認事實。但是畢竟西方文化之本身，是否即足夠領導人類之文化？除東方人向西方文化學習以外，西方人是否亦有須向東方文化學習之處？或我們期望西方人應向東方文化學習者是什麼？由此東西文化之互相學習，我們所期待於世界學術思想之前途又是什麼？這是一個大問題。我們於此亦願一述我們之意見。

照我們對於西方文化的看法，我們承認西方文化精神之最高表現，主要在其兼承受了希臘的科學哲學精神，與希伯來之宗教精神。希伯來之宗教精神，使西方之人心靈直接通接於上帝。希臘的科學哲學精神，使西方人能對宇宙間之數理秩序，對各種事物存在之普遍範疇與特殊法則，對人類思考運行所遵守之邏輯規律，都以清明之心，加以觀照涵攝，而人乃得以其認識的主體，居臨於自然世界之上，而生活於普遍的理性之世界。近代之西方人最初是北方蠻族，而此蠻族又以其原始樸質之靈魂，接受此二文化精神之陶冶，而內在化之，於是此近代西方人之心靈，乃一方面通接於唯一之上帝之無限的神聖，一面亦是能依普遍的理性以認識自然世界。由此而轉至近代文藝復興時代，人對其自身有一自覺時，此二者即結合爲個人人格尊嚴之自覺，與一種求精神上的自由之要求。由此而求改革宗教，逐漸建立民族國家，進而求自由運用理性，形成啓蒙運動；求多方面的了解自然與人類社會歷史，並求本對自然之知識以改造自然；本對人類社會政治文化之理想，以改造人間。於是政治上之自由與民主、經濟上之自由與公平，社會上之博愛等理想，遂相緣而生。而美國革命，法國革命、產業革命、解放黑奴運動、殖民地獨立運動，社會主義運動，亦都相繼而起。由科學進步應用於自然之改造及

對社會政治經濟制度之改造，二者相互為用，相得益彰。於是一二百年之西方文化，遂突飛猛進，使世界一切古老之文化，皆望塵莫及。凡此等等，蓋皆有其普遍永恆之價值，而為一切其他民族所當共同推尊讚嘆學習仿求，以求其民族文化之平流競進者也。

然此近代之西方文化，在其突飛猛進之途程中，亦明顯的表現有種種之衝突與種種之問題。如由宗教改革而有宗教之戰爭；由民族國家之分別建立而有民族國家之戰爭；由產業革命而有資本主義社會中勞資之對立；為向外爭取資源，開發殖民地，而有壓迫弱小民族之帝國主義行動；及為爭取殖民地而生之帝國主義間之戰爭；為實現經濟平等之共產主義之理想，而導致蘇俄之極權政治，遂有今日之極權世界與西方民主國家之對立；而二十世紀以來，亞洲非洲之民族主義興起，既與西方國家之既得利益相衝突，又因其對歐美之富強而言，整個之亞洲非洲，無異於一大無產階級，於是亞非民族，既受西方政治上經濟上之壓迫侵略於前，故共產主義之思潮最易乘虛透入。亞洲非洲之民族主義與共產主義相結合，以反抗西方國家，又適足以遂蘇俄一國之野心。在今日科學已發展至核子武器，足以毀滅人類之時期，人類之前途乃惶惶不可終日。此皆近代西方文化之突飛猛進所帶來之後果。則我們今日對西方文化，畢竟應如何重新估價？並對之應抱有何種希望？應為吾人所認真思考之問題。

從一方面看，由近代西方文化進步所帶來之問題，亦多由西方人自身所逐漸解決，如由宗教自由原則之確立，宗教戰爭已不可再起。對勞資之衝突，西方文明國家，亦有各種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之措施。對由狹隘的民族國家觀念所導致的國際戰爭，亦先後有國際聯盟聯合國之成立，希望由此加以破除。而自美國由殖民地成為獨立國家以來，世界人類的良心，在廿世紀，亦皆同趨向於謀一切殖民地之獨立。人類當前的問題，唯在共產之極權世界與西方民主國家間

之對立，而亞非之民族主義，又可能與共產主義相結合。然此亦正為西方人士所竭心盡智以求解決者。但是照我們的看法，這許多問題雖多已解決，但其問題之根源於西方文化本身之缺點者，則今日依然存在。不過今只表現為蘇俄之極權世界與西方民主國家之對立局勢而已。在今日蘇俄之極權世界與西方民主國家之對立中，居於舉足輕重之地位者，分明係亞非之民



宋 牟益 擣衣圖 卷 (部份)

族之何去何從。本來亞洲之中國文化，印度文化，及橫貫亞非之回教文化，在先天上皆非唯物主義，在理論上正應與西方之自由民主文化相結合，然其今日何以尚未如此，實值得西方人士作深刻的反省。

西方人士初步之反省，是歸其原因於十九世紀以來西方對亞洲非洲之侵略，以致今日尚有歷史遺下之殖民地存在於亞洲及非洲。此種反省之進一步，是如羅素斯賓格勒之說：西方人在其膨脹其文化力量於世界時，同時有一強烈的權力意志、征服意志，於是引起被征服者之反感。但是照我們之意見，此權力意志還是表面的。真正的西方人之精神之缺點，乃在其膨脹擴張其文化勢力於世界的途程中，他只是運用一往的理性，而想將其理想中之觀念，直下普遍化於世界，而忽略其他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因而對之不免缺乏敬意與同情的了解，亦常不能從其他民族文化自身之發展的要求中，去看西方文化對其他民族文化之價值。此義在我們研究中國文化的態度時已提到而未加說明。本來這種運用一往的理性而想把理想中之觀念

直下普遍化出去，原是一切人之有的原始的理性活動之形態。但因西方文化本源於希伯來與希臘之文化傳統，而近代西方人又重實用技術之精神，於是近代西方人遂特富此心習。因為依希臘文化之傳統，人之理性的思維，須自覺的把握一切普遍者，而呈現之於人心之前。又依希伯來之宗教文化傳統，則人信上帝是有預定之計劃，乃由上至下以實現其計劃於世界者。而本近代之實用技術之精神，則人對自然社會之改造，都是把由我們之理性所形成之普遍理想，依一定之方法而實現之於現實者。由是而上信上帝，又有依理性而形成之普遍理想，而兼習於實用技術精神之西方人，遂有一種自覺或不自覺的心習，即如承上帝之意旨，以把其依理性所形成之理想，一直貫注下去之心習。這個心習，在一個人身上表現，後果還不嚴重，但在一群人身上表現以形成一宗教社會政治經濟之改革運動時，則依此心習所積成之一群人之活動，遂只能一往直前，由是而其力量擴張至某一程度，即與另一群抱不同理想之人，互相衝突。此乃近代之宗教戰爭，民族國家之衝突，經濟上階級之衝突，各種政治上主義信仰者間之鬥爭，恆歸於非常劇烈，無從避免之原因。亦是各西方國家之政治經濟文化之力量，必須轉而向亞非各洲膨脹，以暫緩和其內部之衝突，遂再轉而為對弱小民族之侵略壓迫，並造成爭殖民地之戰爭之原因；同時亦即是西方人今日之良心，雖已認殖民地為不當有，在亦願與亞洲非洲民族結合，但仍不能對亞洲民族文化之特殊性加以尊重與同情的了解，而仍貌合神離之原因。

又據我們東方亞洲人之所感覺，西方之個人，在本其此種心習來與東方人辦理外交政治事務，以及傳教或辦教育文化之事務，而同時又在對東方作研究工作時，更有一種氣味，為我時時會接觸，覺其不好受，而有不易表諸文字者。此即在其研究的態度中，把其承繼希臘精神而來之科學的理智的冷靜分析態度，特為凸出；而在此態度之後，則為其所存之於心的理想計劃，預備在研究之後，去實施或進行者。於此情形下，東方人一方自覺成為西方人之冷靜的研究對象，一方又覺其正預備以其理想計劃，自上貫注下來，到我們身上。東方人在覺其自身只為一冷靜的研究對象時，即覺為被西方人所推遠而感到深的冷酷。而在其覺西方正以其預定之理想貫注下來時，則感一

精神上的壓迫。而此種感覺，則更使東方人與西方人之直接的交際關係，亦歸於貌合神離。而在西方人方面，如自信其理想是公的好的，亦是為東方人本身的，則恆以此種東方人之貌合神離，乃由東方人之不知其好意，或東方人對西方人有距離感自卑感，以及仇恨心，或為東方人之狹隘的民族國家意識文化意識，從中為梗。這些東西我們亦不能完全否認東方人之莫有，而且亦可能有得很多。但是西方人本身之態度，亦正有極大的關係。而此種態度，在根本上，正由西方所承受之希臘文化精神希伯來精神及近代之實用技術精神，三者之一種方式的結合之產物，此乃與西方文化之好處、西方人之長處雖難於分別者。當我們東方人了解到此點時，亦應當對西方人之此種態度，加以諒解。然而西方人如真欲其對人之態度，與其自身之精神，再進一步，或真欲與東方人亞洲人及非洲人接觸以調整人類關係，謀取世界和平，以保西方文化本身之永遠存在於人間世界，則我們認為西方人之精神思想，尚可再上升進一步，除由承繼希臘精神希伯來精神而加以發展出之近代西方之精神以外，尚可有學習於東方之人生智慧，以完成其自身精神理想之升進者。此有五點可說。

西方人應向東方文化學習之第一點，我們認為是「當下即是」之精神，與「一切放下」之襟抱。西方文化精神之長處，在其能向前作無限之追求，作無窮之開闢。但在此向前追求、開闢之精神狀態中，人雖能以宗教上之上帝為托命之所，而在真實生活中，其當下一念，實是空虛而無可在地上立足。由此念念相續，亦皆實空虛而無可在地上立足。於是西方之個人與國家，必以向前之追求開闢，填補其當下之空虛。當其追求開闢之力量，隨自然之生命之限制，或外來之阻限而不能不停頓時，其個人之生命，國家之生命亦可能同時倒下。故西方之老人，多為淒涼寂寞之老人；而西方歷史上之強國，當為一仆不起，或絕滅不世之強國。中國文化以心性為一切價值之根源，故人對此心性有一念之自覺，則人生價值，宇宙價值，皆全部呈顯，圓滿具足。人之生命，即當下安頓於此一念之中，此即所謂「無待他求，當下即是」之人生境界。中國以知進而不知退為人生之危機，而此正西方文化之特點。其所以不知退，則因在其當下精神中實無可立足之地。則由當下即是之生活智慧可與西方人

以隨時可有立足之地，此即可增加西方文化自身之安全感與堅韌性。

其次，西方以承希臘精神之重智而來之文化活動，必表現為概念之構成。此為成就知識之必需條件。但西方人士之沉浸於概念知識之積累者，無形中恆以概念積累之多少，定人生內容之豐富與否。此固有其一面之意義。但概念之本身，對具體之人生而言，本有一距離，具有其局限而造成其阻隔。人之精神中如時時都背負一種概念的東西，而胸襟不能廣大空闊。此缺點首表現為西方人之不易與東方人有真實的 Authentic 接觸。因我們與他人之真實接觸，首先要我們心中全莫有東西，而成為生命之直接相照射，一有此概念的東西，則此東西，雖亦可為媒介，以使我得同其他與此概念生關係的人接觸。但是此種概念的東西，卻同時可成為人與人的真實接觸之阻隔。此種概念的東西，包括我們預定的計劃目標，用以聯繫人之抽象理想，用以衡量人之抽象標準成見習見等，這些東西在我們求與人有真實接觸時，都應一切放下，唯由此放下，而後我與人才有彼此生命之直相照射，直相肯定，而有真實的了解。此事似易而實難，必須極深的修養。此中有各層級之工夫可用。而皆須在平時用，然後我在接觸人時，才有真實的接觸與真實的了解。

此平時之工夫，是在我平日生活中，隨時在自覺有東西時，隨時超越之而放下之。此放下之智慧，印度思想中名之為空之智慧，解脫之智慧。在中國道家稱之為虛之智慧，無之智慧。中國儒家稱之為「空空如也」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廓然大公」之智慧。由此種智慧之運用去看生活中之一切經驗事物，理想事物，都要使之成為透明無礙。於是人雖可照常的有概念的知識、理想，但他可以無執著，無執著則雖有

而能超越此有，若無若有。這種智慧要使百萬富翁，覺其身無長物，使大政治家覺「堯舜事業何異浮雲過太虛」；使一切大科學家大哲學家之口，如「掛在壁上」；使一切大傳教師自覺「無一法與人」；使一切外交家，自覺只是臨時的賓客。這種放下的智慧之表現於印度之哲學宗教中；中國之儒道禪宗之人物之思想與風度中，及中國之文學與藝術中者，實值得西方人之先放下其文化傳統中之觀念，去體會、欣賞、涵泳，然後知其意味之無窮。而其根源仍在於當下即是，一切平等之人生境界。此是西方人應向東方文化學習之第一點。

西方人應向東方人文化學習之第二點，是一種圓而神的智慧。上所謂一切放下之智慧，是消極的。圓而神的智慧，則是積極的。所謂「圓而神」，是中國易經裡的名詞，與「方以智」對照的。我們可說，西方之科學哲學中，一切用理智的理性所把握之普遍的概念理，都是直的。其一個接一個，即成為方的。這些普遍的概念原理，因其是抽象的，故其應用至具體事物上，必對於具體事物之有些方面，有所疏忽，有所抹殺。便不能曲盡事物之特殊性與個別性。要能曲盡，必須我們之智慧成為隨具體事物之特殊單獨的變化，而與之宛轉俱流之智慧。這種智慧之運用，最初是不執普遍者，把普遍者融化入特殊以觀特殊，使普遍者受一特殊之規定。但此受某一種特殊之規定之普遍者，被人自覺後又成一普遍者。又須不執再融化入特殊中，而空之。於是人之心靈，可再進一步以使其對普遍者之執，可才起即化。而只有一與物宛轉

之活潑周遍之智慧之流行。因此中之對普遍者之執才起即化，即如一直線之才向一方伸展，隨即運轉而成圓，以繞具體事物之中心旋轉。此即為一圓而神之智慧。或中國莊子思想所謂「神解」「神遇」，孟子所



元 張舜咨 樹石 軸

而能超越此有，若無若有。這種智慧要使百萬富翁，覺其身無長物，使大政治家覺「堯舜事業何異浮雲過太虛」；使一切大科學家大哲學家之口，如「掛在壁上」；使一切大傳教師自覺「無一法與人」；使一切外交家，自覺只是臨時的賓客。這種放下的智慧之表現於印度之哲學宗教中；中國之儒道禪宗之人物之思想與風度中，及中國之文學與藝術中者，實值得西方人之先放下其文化傳統中之觀念，去體會、欣賞、涵泳，然後知其意味之無窮。而其根源仍在於當下即是，一切平等之人生境界。此是西方人應向東方文化學習之第一點。

謂「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此神非上帝之神，精神之神。神者，伸也，人只以普遍之抽象概念原理觀物，必有所合，亦有所不合。有不合處，便有滯礙。有滯礙則心之精神有所不伸。必人能於其普遍抽象之概念原理，能才執即化，而有與物宛轉俱流之圓的智慧，而後心之精神之運，無所不伸。故謂之圓而神之智慧。此種智慧不只是一辯證法的智慧，而略近於柏格森之所謂直覺。辯證法之智慧是以一普遍者規定一具體實在後，再即觀其限制，而更湧現一較具體化之普遍者以觀物。此中之普遍者仍是一一凸出於意識之前的。而此種圓而神之智慧，則可對一切普遍者之執，才起而不待其凸出，即已在心靈之內部超化。於是在人之意識之前者，唯一與物宛轉之活潑周運之圓而神的智慧之流行。故略近於柏格森之所謂直覺，但柏格森之直覺，只是其個人之哲學觀念。而中國人則隨處以此圓而神之智慧體會自然生命，觀天地化幾，欣賞讚美活的人格之風度，以至以此智慧觀時代之風會氣運之變，並本此智慧以與人論學，而應答無方，隨機指點，如天籟之流行。而我們在中國之文學藝術，與論語、孟子、世說新語，禪宗語錄，宋明語錄，及中國先儒之論學書信中，皆可隨處發現此種智慧之流行。是皆待於人之能沉潛涵泳於中國文化之中，然後能深切了解的。西方人亦必須有此圓而神之智慧，乃能真與世界之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接觸，而能無所阻隔，並能以同情與敬意之相遇，以了解其生活與精神之情調與心境，亦才能於其傳統文化中所已認識之理型世界、知識世界、上帝世界、技術工業世界，分門別類的歷史人文世界之外，再認識真正具體生命世界，與人格世界與歷史人文世界中一切的感通。而西方之學者，亦才能於各自著書立說，自成壁壘之外，有真正的交談，而彼此隨時能相悅以解。

西方人應向東方文化學習之第三點，是一種溫潤而但惻或悲憫之情。西方人之忠於理想及社會服務之精神與對人之熱情與愛，都恆為東方人所不及，這是至可寶貴的。但是人對人之最高感情，不只是熱情與愛。人之權力意志與佔有之念，都可透入於人對人之熱情與愛之中。要使此權力意志與佔有之念不透入，在西方主要賴其宗教信仰中所陶冶之謙卑，及視自己之一切功德皆所以光榮上帝，服務於上帝，亦由上帝

之恩典而來之種種心情。但是人之權力意志，亦可借上帝作後盾，自信自己之所行，已為上帝所嘉許，而更向前施展。人亦可以私心想佔有上帝，如在戰爭中與人衝突時，祈禱上帝幫助自己。此處上帝之道與人心之魔又可俱生並長。於是基督教又有對敵人及一切罪人之寬赦 Forgiveness，以求去此病。但是對人之絕對的寬赦，亦可化為對世間一切之「放棄」Renunciation，而只求自己個人之道福。如要去此「放棄」之病，則仍須再重視愛與熱情。此成了一圓圈，而愛與熱情中仍可有權力意志與佔有之念。問題仍無究竟之解決。要使此問題有究竟之解決，只有在開始對人之熱情與愛中，便絕去其權力意志與佔有之念之根。要去此根，則愛必須真正與敬同行。愛與敬真正同行，其涵義之一，是如我覺我對人之愛是原於上帝，其泉源是無盡的上帝之愛，則我們對他人之敬，亦同樣是無盡之敬。而此中對人之敬，亦可是敬人如敬上帝。中國所謂仁人之「事親如事天」「使民如承大祭」即此之謂。此處不容許一個回頭自念，自己是信上帝的，知道上帝之愛的，而對方都不是。如此一想，則覺對方比我低一級，而我對人之敬則必有所不足。對人若須有真實之敬，則必須對人有直接的絕對的無條件的真視「人之自身為一目的」的敬，能有此敬，則人對人之愛，皆通過禮而表現之，於是愛中之熱情皆向內收斂，而成溫恭溫潤之德。而人對人最深的愛，則化為一仁者惻怛之情。此可通於佛家之悲憫。惻怛悲憫與一般之愛之不同，在一般之愛，只是自己之生命精神之感情，視人如己的向人流注。此處之視人如己，即可夾雜「對人加以佔有之念」之泥沙並下。而惻怛悲憫，則只是自己之真實存在之生命精神，與他人之生命精神間之一種忐忑的共感，或共同的內在振動，此中，人對人自然有真正的同情，亦有情流向人流注。但是這些情流，乃一面向外流，一面亦都為自己所吞噬，而回到自己，以感動自己，遂能將此情流中之夾雜的泥沙，加以清洗。這中間有非常微妙的道理。而更哲學的說，則西方人所重之愛，要真化為惻怛與悲憫，必須此愛之宗教的根原之上帝，不只是一超越於一切人精神之上，而為其貫通者，統一者，為人之祈禱之對象者，而須視同於本人之本心深心，而透過我們之肉軀，以表現於一切真實存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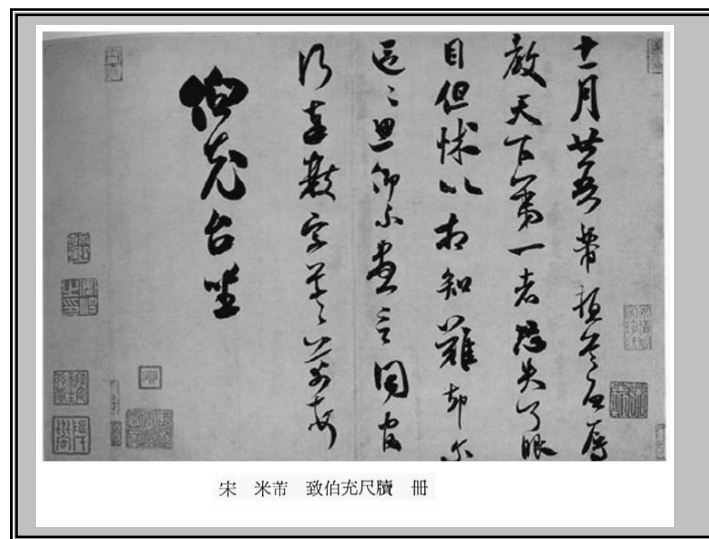
生命精神之間之直接的感通關係中者，然後可。但詳細討論此中問題，則非今之所及。

西方之應向東方學習之第四點，是如何使文化悠久的智慧。我們以前已說，中國文化是世界上唯一歷史久而又自覺其久，並原於中國人之自覺的求其久，而復其久的文化。現代西方近代文化，固然極精彩燦爛，但如何能免於如希臘羅馬文化之衰亡，已有不少的人憂慮及此。照我們的意思，文化是各民族精神生命之表現。依自然的道理，一切表現，都是力量的耗竭。耗竭既多，則無一自然的存在力量能不衰。人之自然的精神生命之力，亦然。欲其不衰，人必須一方面有一上通千古，下通萬世之由歷史意識所成之心量，並由此心量以接觸到人心深處與天地萬物深處之宇宙生生之原。此宇宙生生之原在西方人稱為上帝。由西方之宗教生活，人亦可多少接觸此宇宙之生生之原。但是一般宗教生活，只賴祈禱與信仰來接觸上帝，上帝之對於人，終不免超越而外在，而人只想上帝之永恆，亦尚未必即能直下有上通千古下通萬世之歷史意識所成之心量。且由祈禱信仰，以與此宇宙生生之原之上帝接觸，乃是只以人之超越向上的心靈或精神與之接觸，此尚非直下以吾人生命存在之自身與之接觸。要使生命之存在自身與之接觸，吾人還須有一段大工夫。此一段大工夫之開始點，乃在使吾人生活中之一切向外表現之事，不只順著自然的路道走，而須隨時有逆反自然之事，以歸至此宇宙生生之原，而再來成就此自然，這正是我們以前所說之中國歷史文化所以能長久所根之智慧，這個智慧不只是一中國哲學的理論，而是透到中國之文學藝術禮儀之各方面的。依這種智慧，中國人在一切文化生活上，皆求處處有餘不盡，此即所以積蓄人之生命力量，使之不致耗竭過度，而逆反人之自然的求儘量表現一切之道路，以通接於宇宙生生之原者。而以此眼光看西方近代文化之只求效率之快速，這中間正有一大問題存在。在當前的世界，以中國人以前之尚寬閒從容之態度來應付，固然很多不適宜之處。但是近代西方世界，帶著

整個人類奔馳。人縱皆能乘火箭到星球世界，而一人飛上一個星球，還是終沉入太空之虛無，此並未得人類文化以及西方文化自身真正長久存在之道。西方人亦終當有一日會感對只有上帝之永恆而無歷史文化之悠久，人並不能安居樂業於此世界，則星球中亦不可容居。這時西方人當會發展出一上通千古下通萬世之心量，並本此心量以接觸宇宙生生之原，而生活上處處有餘不盡之價值，並會本此心量而真重視到父母祖宗之孝，並為存宗祀而生子孫，為承繼祖宗遺志而求文化之保存與延續，以實際的實現文化歷史之悠久。但這些問題亦不是我們在此文中，所能一一詳細討論的。

西方人應向東方人學習之第五點是天下一家之情懷。我們承認人類現在雖然有許多國家，而凡未能民主建國之國家，皆須一一先走上民主建國之道路。但是人類最後必然歸於天下一家。所以現代人，在其作為一國家之公民之外，必須同時兼備一天下之情懷，而後世界真有天下一家之一日。在這點上說，東方人實更富於天下一家之情懷。中國人自來喜言天下與天下國家。為養成此情懷，儒家，道家，墨家，佛家之思想皆有所貢獻。墨家要人兼愛，道家要人人相忘，

佛家要人以慈悲心愛一切有情，儒家要人本其仁心之普遍涵蓋之量，而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本仁心以相信「人皆可以為堯舜」，本仁心以相



宋 米芾 致伯充尺牘 冊

信「東西南北海，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之聖人心同理同」。儒家之講仁，與基督教講愛，有相通處，因基督教之愛，亦是遍及於一切人的。但是基督教要先說人有原罪，其教徒是本上帝之意旨，而由上至下，以救人。儒家則多信人之性善，人自身可成聖，

而與天合德。此是一衝突。但教義之不同處，亦可並行不悖，而各有其對人類與其文化之價值。但在養成人之天下一家之情懷上，則我們以為與其只賴基督教思想，不如更兼賴儒家思想。此乃由以基督教為一制度的宗教，有許多宗派之組織，不易融通。基督教有天堂觀念，亦有地獄觀念，異端與不信者，是要入地獄的。則各宗派間，永不能立於平等之地位，而在自己之教會者與不在者，即分為二類。而一可上天堂，一可入地獄。如此，則基督教對人之愛雖以一無條件，仍可以有一條件，即信我的教。此處實有一極大之問題。照儒家的意思，則只要是人，同有能成聖而與天合德之性。儒家並無教會之組織，亦不必要人皆崇拜孔子，因人本皆可成聖而同於孔子，此即使儒家之教，不與一切人之宗教成為敵對。儒家有天地之觀念，而無地獄之觀念，亦無地獄以容異端。「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乃儒家之信仰。則人類真要有一「天下一家」情懷，儒家之精神實值得天下人之學習，以為未來世界之天下一家之準備。此外，東方之印度之佛教婆羅教，同有一切人可成佛，而與梵天合一之思想，而可足養成人之天下一家之情懷者。此各種東方之思想，亦同連繫於東方之文學藝術禮儀，而同值得西方人加以研究而學習者。

我們以上所說西方人應向東方學習者，並不能完備。儘可由人再加以補充。我們以上說的是西方文化如要完成其今日欲領導世界的目標，或完成其自身之更向上的發展，求其文化之繼續存在亦有須要向東方學習者。而這些亦不是在西方文化中莫有種子的。不過我們希望西方文化中這些種子，更能由對東方之學習，而開花結果而已。

十二、我們對於世界學術思想之期望

我們如承認西方文化，亦有向東方學習的地方，則我們對於中國與世界之學術方向，還有幾點主張可以提出。

1.由於現在地球上的人類，已經由西方文化之向外膨脹，而拉在一起，並在碰面時彼此頭破血流。我們想現代人類學術的主要方向，應當是我們上面所謂由各民族對於其文化缺點之自己反省，把人類前途之問題，共同當作一整個的問題來處理。除本於西方文化

傳統之多元，而產生的分門別類的科學哲學之專門研究之外，人類還須發展出一大情感，以共同思索人類整個的問題。這大情感中，應當包括對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本身之敬重與同情，及對於人類之苦難，有一真正的悲憫與惻怛之仁。由此大情感，我們可以想到人類之一切民族文化，都是人之精神生命之表現，其中有人之血與淚，因而人類皆應以孔子作春秋的存亡繼絕的精神，來求各民族文化之價值方面保存與發展，由此以為各種文化互相並存，互相欣賞，而互相融合的天下一家之世界之準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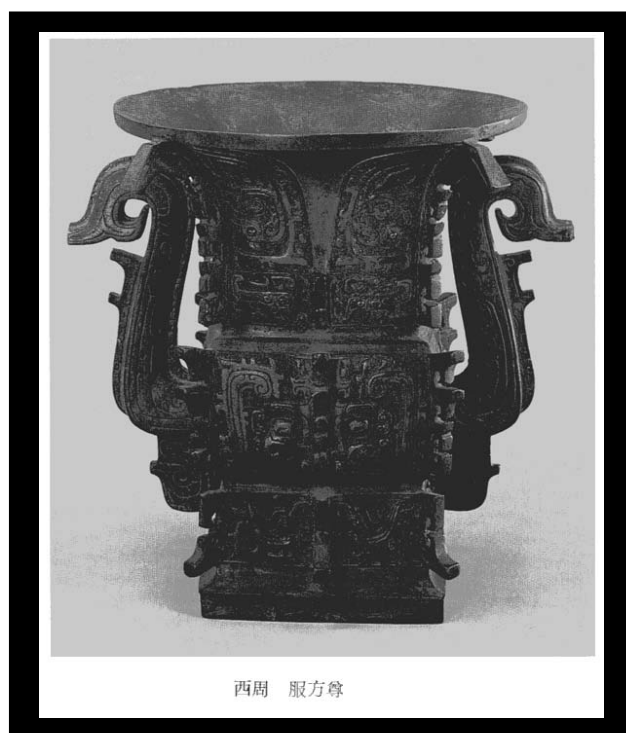
2.人類要培植出此大的情感，則只是用人之理智的理性，去對各種自然社會人類歷史作客觀的冷靜的研究，便只當為人類學問之一方面。人類應當還有一種學問，這不是只把自然與人類自己所有之一切客觀化為對象，而加以冷靜的研究之學問，而是把人類自身當作一主體的存在看，而求此主體之存在狀態，逐漸超凡入聖，使其胸襟日益廣大，智慧日益清明，以進達於圓而神之境地，情感日益深厚，以使滿腔子存有惻怛之仁與悲憫之心的學問。這種學問不是神學，亦不只是外表的倫理規範之學，或心理衛生之學，而是一種由知貫注到行，以超化人之存在自己，以升進於神明之學。此即中國儒者所謂心性之學，或義理之學，或聖學。此種學問，在西方宗教之靈修中，印度之所謂瑜珈行中亦有之。而西方由杞克葛（Kierkegaard）所謂之存在哲學之注重人如何成為基督教徒，而不注重人之入教會祈導上帝之外表的宗教行為，亦是向人生存在自己之如何超化，而向上升進向上用心的。但因西方之傳統文化，是來原於理智之理性認識客觀世界之條理之希臘精神，承受上帝之誠命而信托上帝之啓示之希伯來精神，注重社會國家之法制組織之羅馬精神，所以這一種學問，並未成西方之學術之核心。而人不能超化其存在之本身，以向上升進於神明，則人之存在本身不能承載上帝，而宗教信仰亦隨時可以動搖。同時人亦承載不起其自身所造成之知識世界，與科學技術所造成之文明世界，故原子彈似隨時要從人手中滑出去，以毀滅人類自己。人亦承載不起由其自身所定之政治社會之法制組織，對個人自由所反施之壓迫。此即為現代之極權國家對個人自由所反施之壓迫，而今之產業社會之組織對個人自由，亦同有此壓迫。人類之承載不起人類自身之所信

仰及所造的東西，此根本毛病，正在人類之只求客觀地了解世界，以形成智識，本知識以造理想，而再將此理想不斷客觀化於自然與社會。於是如人生存在以外之文化物財不斷積累加重，而自成一機械的外在桎梏，似非人力之所能主宰。而此處旋乾轉坤的學問，則在人之主體的存在之真正自作主宰性之樹立，而此主宰性之樹立，則係於人生存在自身之超化升進。人有此一學問，而後人乃有真正之自作主宰性之樹立，亦即中國之所謂立人極之學問。人極立而後人才能承載人之所信仰，並運用人之所創造之一切，而主宰之。這是這個時代的人應當認識的一種大學問。

3.從立人極之學所成之人生存在，他是一道德的主體，但同時亦是超化自己以升進於神明的，所以他亦是真能承載上帝而與天合德的。故此，人生存在，兼成爲「道德性與宗教性之存在」。而由其爲道德的主體，在政治上即爲一民主國家中之一真正的公民，而成「政治的主體」。到人類天下一家時，他即成爲天下的公民。即孟子所謂天民。而仍爲天下中之政治的主體。在知識世界，則他成爲「認識的主體」，而超臨涵蓋於一切客觀對象之世界之上，而不沉沒於客觀對象之中，同時對其知識觀念，隨時提起，亦能隨時放下，故其理智的知識，不礙與物宛轉的圓而神的智慧之流行，而在整個的人類歷史文化世界，則人爲一「繼往開來，生活於悠久無疆之歷史文化世界之主體」。而同時於此歷史文化世界之悠久無疆中，看見永恆的道，亦即西方所謂上帝之直接顯示。這些我們以爲皆應由一個新的學術思想之方向而開出。即爲立人極之學所嚮往的究極目標，亦即是我們前文論中國文化及西方人所當學習於東方智慧者時，所望於中國文化之發展與世界文化之發展之目標之所在。而此目標之達到，即希臘文化中之重理智、理性之精神，由希臘之自由觀念至羅馬法中之平等觀念發展出之近代西方文化中民主政治的精神，希伯來之宗教精神，與東方文化中之天人合德之宗教道德智慧，成聖成賢心性之學義理之學，與圓而神之智慧悠久無疆之歷史意識，天下一家之情懷之真正的會通。此理想要何時實現，我們不知道。但是要有此理想，則我們當下即可有。當下想而回到我們各人自己現實上之存在地位來作努力，則依我們中國人之存在地位，仍是如何使中國能承其自身文化發展的要求，而完成其數十年來之

民主建國的事業，及中國之科學化工業化，以使中國之人生存在兼爲一政治的主體與認識的主體。而西方人則應自反省其文化之缺點，而求有以學習於東方，同時以其今日之領導世界地位，更應以興滅國繼絕世之精神，來護持各民族文化之發展，並完成一切民族之民主建國之要求，使其今日先成爲真正之公民，而在未來天下一家之世界，成爲天民。而其研究中國等東方民族之學術文化歷史之態度，亦當如我們前面所說應加以改變。

我們記得在十八世紀前的西方曾特別推崇過中國，而十九世紀前半的中國亦曾自居上國，以西方爲蠻夷。十九世紀的後半以至今日，則西方人視東方之中國等爲落後之民族，而中國人亦自視一切皆不如人。此見天道轉圓，絲毫不爽。但是到了現在，東方與西方到了應當真正以眼光平等互視對方的時後了。中國文化，現在雖表面混亂一團，過去亦曾光芒萬丈。西方文化現在雖精彩奪目，未來又畢竟如何，亦可是一問題。這個時後，人類同應一通古今之變，相信人性之心同理同的精神，來共同擔負人類的艱難，苦病，缺點，同過失，然後才能開出人類的新路。



西周 服方尊

(本文插圖均選自中國故宮珍藏)

從張伯駒的一生 看中國共產黨對知識份子的

其序中仍然舊話重提。可見他把張伯駒的詞擺在何等崇高的地位。

摧殘和掠奪

(3) 書法：張伯駒臨模書聖王

一、愛國玩主

張伯駒（1897-1982）是我國現代偉大的詞人、收藏家、古董鑑賞家和戲曲家。其父張鎮芳[1]是北洋軍閥元老、中國鹽業銀行創辦人。張鎮芳活躍於政界、軍界、財界，掙得家財萬貫，富甲一方。但張伯駒偏偏無心繼承父業，既不願意從政，又不願意經商，祇喜歡隨心所欲地吃喝玩樂，被人稱為「京城玩主」，為舉國聞名的「民國四公子」[2]之一。但是，他的玩與浪蕩公子們花天酒地地嫖賭逍遙卻決然不同。他玩出了水平，玩出了尊嚴。

1·玩出水平

張伯駒愛好廣泛，除了是圍棋高手和著名美食家之外，還喜歡戲曲、詩詞、書法、字畫、古董，而且在這些方面都達到了登峰造極的水平。

(1) 戲曲：張伯駒是京城著名票友，北京戲劇協會的重要贊助人。他曾拜京劇大師余叔岩為師。整整十年在余叔岩門下潛心研究余派藝術。1937年，張伯駒四十大壽，客串演出《空城計》，出演主角諸葛亮。余叔岩、楊小樓、程長庚、王鳳卿、王福山等大牌名角為他當配角同台演出，北京城為之轟動。抗日戰爭期間，張伯駒還到西北重鎮蘭州去搞過義演。

(2) 詩詞：張伯駒一生填詞數千首。出版有《從碧詞》、《張伯駒詞集》等。著名紅學家周汝昌為《從碧詞》寫跋說道：如以詞人之詞而論，則中國詞史當以李後主為首，而以先生殿後——在他之後，恐怕不易再產生這種真正的詞人之詞了。周汝昌把張伯駒與李後主相提並論，而且堅持這一觀點「死不悔

義之的《十七貼》練過草書，臨模鍾太傅的《賀克捷表》練過楷書，最後從反復摩挲玩味蔡襄的《自書詩冊》中獲得書法真諦，創造了自己似蔡非蔡的獨特字體。該體不慍不火、不激不勵，落筆時露鋒、收筆時藏鋒，啓承轉合無一敗筆。1980年，北京美術家協會和北京工筆重彩畫會在北海公園舉辦了《張伯駒潘素夫婦書畫聯展》，轟動海內外。1981年初，繼北京之後，香港書畫界又舉辦了《張伯駒潘素夫婦書畫聯展》。

(4) 古董：張伯駒堪稱我國自古以來最大的收藏家和古董鑑賞家之一。對於珍稀字畫、書籍、陶瓷、木器，張伯駒都有極高的鑑賞力。他的藏品以古代字畫和善本圖書為主。他的收藏方針是貴於精而不在多。例如，隋代畫家展子虔的《遊春圖》是現存於世的最古老的中國畫。張伯駒把弓弦胡同的老宅（原為慈禧太后的太監總管李蓮英的住宅）賣給輔仁大學得200兩黃金，又加上變賣夫人潘素的首飾湊足220兩黃金而買回[3][4]。

2·玩出尊嚴

張伯駒生性豪爽、仗義疏財，從不巧取豪奪、欺行霸市，在古董市場享有盛譽。他對奸商、權貴、以及他們與洋人狼狽為奸、變賣國寶的罪惡行徑義憤填膺、深惡痛絕。張伯駒的尊嚴表現在——

(1) 藐視權貴：抗戰期間，陝西省主席祝紹周為來西安造訪的蔣經國舉行宴會，張伯駒應邀與蔣經國同桌作陪。他看不慣蔣經國堂而皇之地在首席就坐，鼻子裏哼出一聲，「黃口小兒，何德何能，在此坐大。」蔣經國含怒詢問祝紹周，「此人何方神聖？憑什麼有如此大架子？」不待祝紹周為他打園場，他自

己倒搶先自答，「昔日四大公子，今日一介草民，中州張伯駒是也。」此言發出，祝紹周的臉都嚇白了。倒是蔣經國頗有肚量，心中暗想，「文人狂生，不與他計較也罷。」[3]

(2) 嫉惡如仇：抗戰勝利後，古董商郭昭俊把王羲之、王獻之與王殉三人的字帖《三希堂法帖》送給宋子文。宋子文大喜，指示故宮博物院以十萬美金買下他非法佔有的古瓷器，並任命他為中央銀行北平分行襄理。張伯駒聞訊，揮筆寫出《故宮失散書畫見聞記》發表於上海《新民晚報》，以生動翔實的文字說明故宮失散書畫的去向和《三希堂法帖》的遭遇，在上海文化界引起轟動。蔣介石風聞此事，對宋美齡抱怨，「子文也太不知輕重了，身為國家大員，為了兩幅字鬧得物議沸騰，壞了政府的威信。」宋子文聞言，不敢再留《三希堂法帖》，忍痛將原物奉還，由中南銀行保管。

(3) 保護國寶：與別的古董收藏家不同，張伯駒收購古字畫的基本目的不是要將它們藏之於密室，待其升值之後再撈一大把。他擔心的主要是這些稀世珍寶落到洋人手裏、流入外邦。張伯駒以四萬元買回晉代陸機的《平復帖》後不久，就有買辦古董商白堅甫找上門來，願以二十萬收購。張伯駒冷笑道：「白大爺出的價是夠高了……可惜啊，這幅字落到了我張伯駒的手裏。別說我張某人現在還算不上窮，就是哪一天上街討飯吃，也不會出讓國寶的。」白堅甫發出威脅，「張大爺也應該知道我白某人的底細……是個外國朋友喜愛上了你手中那幅字……價格不滿意，也可以再商量。如果張大爺就這樣認死理，惹鬧了我那位外國朋友，弄出麻煩來，就不是我來府上的本意了。」張伯駒哈哈大笑，「白大爺何時聽說我張某人怕過誰了。今個兒我給你句實話，金錢有價，國寶無雙。甭說二十萬，就是二百萬，你也拿不走這幅《平復帖》……」張伯駒就這樣趕走了假洋鬼子白堅甫。後來，他又同樣地趕走了為《平復帖》而來的北平城頭號大漢奸——偽華北臨時政府行政委員會委員長王克敏。

(4) 不畏強暴：抗戰爆發後，張伯駒南下上海。鹽業銀行上海分行襄理李祖萊害怕少東家查出他貪贓枉法、營私舞弊的劣行，勾結日偽特務在培福裏弄堂口將張伯駒綁架，關在一個廢棄的農家小院裏，號稱

沒有兩百根金條就撕票。張伯駒絕食抗議，不進水米。有人給潘素傳話，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趕快把晉代陸機的《平復帖》賣掉救人要緊。潘素斷然拒絕，說：「伯駒把《平復帖》看得比生命還要緊。賣掉它，伯駒回來我沒法交代。」最後，張伯駒的朋友孫耀東通過周佛海打通關節，終於救出了奄奄一息的張伯駒。

這就是「舊社會」的張伯駒——鐵骨錚錚、視國寶勝於生命的愛國人士和才華橫溢、蕭灑自在的京城玩主。那麼，讀者要問，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社會」，張伯駒又如何呢？

二、傾家獻國

1. 忘我奉獻

1949年，中國共產黨在軍事上打敗中國國民黨，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社會名流，張伯駒得到了許多頭銜：燕京大學國文系中國藝術史名譽導師、北京中國書法研究社副社長、北京京劇基本藝術研究社副主任理事、北京棋藝研究社理事兼總幹事、北京中國畫研究會理事、北京古琴研究會理事、文化部文物局文物鑑定委員會委員、公私合營銀行聯合會董事、第一屆北京市政協委員、中國民主同盟總部財務委員會委員、文教委員會委員、聯絡委員會委員等等。張伯駒一生淡泊名利，不願做官。當年，西北軍將領宋哲元居華北，轄區內有好幾個市長空缺，請張伯駒挑一個市長當。張伯駒聽後，掩耳即走[3]。現在這些頭銜都算不上「官」，與「玩主」的身份相得益彰，所以張伯駒自認當之無愧。

1953年大年初一，毛澤東派秘書田家英給張家送來火腿、糕點、白酒等四色禮品，張伯駒感激萬分。「君贈我以木瓜，我還君以瓊瑤。」張伯駒把自己珍藏的唐代李白手書《上陽台帖》回贈給毛澤東。毛澤東稱：「連城之寶，不敢歸諸己手」，將它轉交故宮博物院收藏，又自掏一萬元並讓中辦寫感謝信交張伯駒，使張伯駒對毛的人品感佩得五體投地。1957年初夏，陳毅請張伯駒到家裏下棋，張伯駒感激陳毅的知遇之恩，帶上清初名家范西屏的對局棋譜，雙手奉上作為禮物送給陳毅。陳毅答曰：「無功不受祿，這樣的珍寶我受之有愧。這本棋譜可放在我這幾天，待抄

錄完畢，一定完璧歸趙。」張伯駒再次大為感慨：共產黨的幹部果真朗如日月、清如明鏡啊！

張伯駒從舊社會過來，國民黨政府的貪官污吏他見得多了。是凡與他打交道，誰又不想雁過拔毛？對「舊社會」的貪污腐化的不滿，促使他對「新中國」充滿了盲目的熱愛。他心甘情願地想為「新生的共和國」作出貢獻。由於他長期「遊手好閒、不務正業」，所以家庭經濟狀況入不敷出、坐吃山空。父親張鎮芳留給他的萬貫家財早已變成了古帖古畫古董，所謂的京畿巨富早已祇是一個空名。於是，他為「新中國」作貢獻的唯一方式就是把他賣房子、賣股票、賣首飾換來的稀世珍寶捐獻給國家。

早在 1952 年，共產黨為了「抗美援朝」進行全民動員大搞捐獻之際，張伯駒就把展子虔的《遊春圖》、唐伯虎的《三美圖》和幾幅清代山水畫軸獻給了國家。1955 年底，國家發行公債，開展購買愛國公債的全民動員，張伯駒又把晉陸機的《平復帖》、唐杜牧的《張好好詩》、宋范仲淹的《道服贊》、蔡襄的《自書詩冊》、黃庭堅的《草書卷》、宋吳琚的《雜書詩帖》、元趙子昂的《草草千字文》等等無價地捐獻給國家。這些價值連城的寶物換來的祇是文化部長沈雁冰（茅盾）的一張褒獎狀。

同時，他還不辭辛苦地為「新中國」做他喜好的工作。作為北京京劇基本藝術研究社副主任理事，根據康生「尊重遺產」的指示，他推出了《甯武關》、《祥梅寺》等傳統京劇，並且熱心張羅傳統京劇《馬思遠》的演出。他傾家蕩產地給中國共產黨黨國作貢獻，鞠躬盡瘁地為中國共產黨黨國工作。他幹得很歡。

2· 淪為右派

他做夢都沒有想到：這個「幹部果真朗如日月、清如明鏡」的共產黨，在 1957 年居然把他打成了「右派份子」！他一片茫然，不知道自己在什麼地方對不起國家、對不起共產黨。他至死都沒有弄明白，他怎麼會是「右派份子」！

中共黨國現在的出版物[3]把此事歸罪到「反革命野心家」康生。據說，康生有次到張伯駒家探訪，看中了蔡襄的《自書詩冊》，一心想據為己有。張伯駒慷慨大度，名聲在外，康生以為祇要稍加「啓發」，張

伯駒就會把它送給他。沒想到他反復“啓發”，張伯駒都啓而不發。張伯駒心裏早已形成概念，以為共產黨的幹部都像毛澤東、陳毅那樣朗如日月、清如明鏡，不會像國民黨的某些官僚那樣索賄受賄。康生含恨空手而去，從此對張伯駒懷恨在心。反右鬥爭一開始，他就向北京市文化口和北京市民盟打招呼，要注意張伯駒的動向。由於張伯駒自建國以來的表現無可挑剔，康生祇好在張伯駒挖掘傳統劇目上做文章。哪怕是他本人作出過「尊重遺產」的指示，他仍然指責張伯駒搞傳統劇目是想復辟。他氣勢洶洶地說：「這張伯駒是何許人也？是竊國大盜袁世凱的親戚，是北洋走狗張鎮芳的兒子。他與國民黨的許多官僚稱兄道弟，是個不稼不穡、不勞而獲的吸血鬼……張伯駒為什麼不去研究革命戲劇的創作，而要讓那些封建糟粕起死回生？他這是想復辟，想恢復剝削階級失去的天堂。這樣的人，不是右派，難道還是左派？」

就這樣，張伯駒當上了右派。對於這種傳說，我們不妨姑且聽之，但不可完全信之。共產黨總是把它所犯的錯誤推給已經打倒的前領導人。至於它極力維護的人物，則永遠是無懈可擊的聖人。毛澤東大權獨攬、用一個又一個的政治運動來禍國殃民，其卑鄙和殘忍絕對不亞於康生。陳毅任上海市市長時，把因喪失家產而跳樓自殺的資本家叫「降落傘部隊」，也同樣表現出了他的殘忍。我們應該認為：張伯駒被打成「右派」是具有歷史必然性的。它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對富家子弟在本質上的懷疑和猜嫉。無論你如何傾家蕩產地幫助它，無論你如何死心踏地地為它工作，它總會認為你是偽裝積極，它總是覺得你在夢想復辟。即使沒有康生，即使在 1957 年不被打成右派，張伯駒也逃不過 1966 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3· 貶職吉林

自從「新中國」成立以來，張伯駒就謹小慎微地度日。他響應共產黨關於舊知識份子要努力改造思想的號召，反復告誡自己，要注意改造思想，莫要公子脾氣。在莫名其妙地當上右派份子以後，他更加謹言慎行，連自己為什麼被定為右派都沒有打聽過。1960 年，陳毅通過吉林省省委書記于毅夫把張伯駒調到吉林省博物館任第一副館長（無館長）。雖然不知何罪

之有，張伯駒仍以「待罪之身」開始在吉林省加倍努力地工作。

吉林省地處關外，文化底子相對薄弱，省博物館的藏品無法與國內重點單位比擬。張伯駒再次慷慨解囊，又無償地捐獻了幾十件自己的珍貴收藏，包括元代仇遠的《自書詩》卷、顏輝的《煮茶圖》卷、宋代趙伯嘯的《白雲仙喬圖》卷、元代趙子昂的《篆書千字文》卷、明代薛素素《墨蘭圖》軸、唐人寫經《大般若波羅密多經》、明代董其昌的字對、唐人楷書冊等等。吉林省委宣傳部長宋振庭對吉林博物館的藏畫中尚無宋人真跡甚為抱憾。張伯駒聞言又捐獻了宋代楊婕好的《百花圖》。當初，他離開北京時，鄧拓請他把《百花圖》留給北京人民作禮物，他捨不得。現在，連這件最後的寶物，他也和盤托出了！

張伯駒的勤奮工作和傾囊捐獻，祇讓他過了幾年平靜日子。「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張伯駒夫婦就成了當然的「牛鬼蛇神」。對於自己的挨批挨鬥，他倒能忍辱負重。但是，當聽到陳毅也成了走資派之後，他卻忍無可忍了。一怒之下，他填了一首《金縷曲》，把江青比成陷害忠良的呂後。這樣的「反動詩詞」當然逃不過革命造反派的「火眼金睛」。他們在抄家的時候把它抄了出來。於是，張伯駒就成了污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偉大旗手江青同志的現行反革命」，被抓入大牢。由於實在查不出什麼問題，在關押八個月後，被發配到舒蘭縣農村去勞動改造。大卡車把他們夫妻扔在一個偏僻的鄉村，一溜煙地開跑了。他們去找生產隊長上戶口。沒想到隊長大人不同意在當地無親無故的這對老人落戶。在數九隆冬、北風呼嘯的嚴寒裏，張伯駒夫婦在一間廢棄的茅棚中相對無眠地熬了一夜。第二天，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他們牙一咬、心一橫，自作主張地返回了北京。就這樣，在北京住了大半輩子的張伯駒，在「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變成了北京的黑戶，在沒有糧油副食和日常生活用品票證的狀況下艱難度日。

4· 又為上賓

1972年1月6日，陳毅逝世，張伯駒送了一副挽聯，被安放在靈堂的角落。毛澤東在追悼會上看到張伯駒手書的挽聯，突然想起世界上還有這麼一個捨棄了榮華富貴和錦衣玉食，將稀世珍寶無償地奉獻給國

家，一心一意跟著共產黨走的公子哥兒。在愧疚之餘，他把周恩來叫到身邊，叫周「過問一下、儘快解決」。於是，幾天以後，章士釗就派專人把中央文獻館館員的聘書送上門來，當地派出所所長和戶籍警也上門來為張伯駒夫婦辦好了戶口。

張伯駒夫婦再次被「禮為上賓」。在毛澤東去見馬克思、「四人幫」倒台之後，張伯駒更成了大忙人，詩詞學會、書法學會、畫院、京劇院、昆曲社、文物學會、文史資料委員會，到處都有他的身影。對於他在中共黨國遭受的劫難，他居然不計前嫌、泰然處之。他說：「想想陳帥，人家是開國元勳，尚能忍辱含垢。我等之人，有些不順心事，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但是，張伯駒對共產黨如此寬宏大量，共產黨卻並沒有給他相應的回報。1982年2月，張伯駒得了感冒，妻子潘素把他送進後庫的北大醫院，住在八人一間的病房。潘素向院方請求換到單人病房或者雙人病房。院方說：「張伯駒不夠級別，不能換。」兩天以後，同房的一個病人死了。張伯駒的病情不見好轉，反而加重。潘素再次請求換病房，回答還是張伯駒不夠級別。再過兩天，又死了一個同室病友。張伯駒的感冒也轉成了肺炎，最後於26日去世。

張伯駒死後，有打抱不平者在北大醫院門口高聲叫罵：『你們醫院知道張伯駒是誰嗎？他是國寶！你們說他不够級別住高幹病房？呸，我告訴你們——他一個人捐獻給國家的東西，足夠買下你們這座醫院！把那些住高幹病房的人都扒拉一遍，看看哪個的貢獻能趕上張伯駒！』」[4]

三、掩卷長思

「舊社會」藐視權貴、遊戲人生、不懼豪強、厭惡官場的「京城玩主」怎麼會變成「新社會」畏首畏尾、誠惶誠恐、無怨無尤、感恩戴德的芸芸眾生呢！這個問題值得我們每一個熱愛中國、熱愛中華民族的人深思。

它表明：中國共產黨的思想改造、思想束縛、思想閹割、思想奴役使中國人民失去了自己貫有的思想作風和行為方式。對此，許多作者（包括筆者本人[5]）都進行過深入地剖析。但是現有的研究還遠遠不夠，還需要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它還表明：在中國共產黨的高壓統治和愚民政策下，中國人民——無論貧富貴賤、無論男女老少——都失去了做人的基本權利，都變成了貨真價實的奴隸。儲安平先生在 1947 年說得好，「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一個『有』『無』的問題了。」也就是說，所謂的「舊社會」實際上比所謂的「新社會」要好得多。大家都知道：“多少”與“有無”的差別不是量的差別，而是質的差別。

那麼，具體落實到張伯駒本人，作為一個「玩世不恭」的人，他怎麼會走向自己的反面，自動放棄自己的終身藏品和人身權利呢？這與中國共產黨的虛偽和奸詐有關，與張伯駒本人的盲從和輕信也有關。

1. 在張伯駒心目中，中國共產黨個別法令的正確性掩蓋了中國共產黨整體上的無法無天。1950 年 4 月 13 日，中國共產黨政府頒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這是中國共產黨政府在隨後很多年裏僅有的唯一法律），規定中國實行一夫一妻制。由於沒有子嗣，張伯駒聽從父母之命，娶過三房妻室，最後才與潘素自由戀愛成婚。當時，長房已經過世，他還有二夫人鄧氏、三夫人王氏以及四夫人潘素。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他必須與鄧夫人和王夫人離婚。對此，以「祇可人負我、不可我負人」為信條的張伯駒感到十分愧疚。他對朋友說：「她們自從嫁給我，便把命運賦予我，把心也交给了我。然而，她們沒能得到女人應該享受的權利，因為我真的不喜歡她們。她們的一生也就給打發了，想起來，真是內心有愧。」在鄧夫人和王夫人離家那天，他把自己關在書齋裏，無顏面對她們[3]。他一定在想：如果早有「新中國」的婚姻法，明文規定戀愛自由、婚姻自主，實行一夫一妻制，他就不會辜負她們終身。他對自己公子哥兒三妻四妾的荒唐生活，一定懊悔不已。他也許就此下定了決心，一定要聽黨的話，認真改造自己。至於在隨後很多年裏，除了形同虛設的憲法之外，中國共產黨再沒有頒佈過任何法律（不管是刑法，還是民法），張伯駒沒有去想，大多數中國人也沒有去想。

2. 在張伯駒心目中，中國共產黨個別領導人在個別事件上的誠信掩蓋了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利益集團

的欺詐。張伯駒僅僅根據一兩件自己親身經歷的小事，就把毛澤東和陳毅當作聖人，就以為「共產黨的幹部果真朗如日月、清如明鏡」，犯了以偏概全的邏輯錯誤。他甚至以中共黨內的殘酷鬥爭現實來寬慰自己。他由「陳帥……是開國元勳，尚能忍辱含垢」就推出「我等之人，有些不順心事，何足道哉」，從而主動放棄了自己的基本人身權利。這是一種消極遁世、自我麻醉的想法。「陳帥……忍辱含垢」是陳帥的事。「我等之人」作為獨立自主的人——不管是多麼平凡，也應當堅持自己的權利。我們不能以陳帥在非正常情況下不能保護他的個人權利為由，就放棄自己的權利。

對腐朽的「舊社會」的不滿，使張伯駒對「新社會」盲目地信任和嚮往，使張伯駒不惜逐步把自己傾家蕩產而積蓄的寶貴藏品全部捐獻給了國家，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原諒了國家（對於中共黨國，政府即國家）對他的虧欠。這是張伯駒的悲劇，也是許多尚未覺醒的中國知識份子的悲劇。

註釋及參考文獻

[1] 張伯駒的生父為張錦芳，因其伯父張鎮芳無後，於六歲時過繼給張鎮芳。

[2] 張伯駒：《續洪憲記事詩補註》。「人謂近代四公子，一為寒雲（即袁克文——袁世凱的二公子。括號內為筆者註，以下同），二為余，三為張學良（張作霖之子，東北軍少帥），四、一說為盧永祥之子小嘉，一說為張謇之子孝若。又有謂：一謂紅豆館主溥侗（滿清皇族、恭親王之子），二為寒雲，三為余，四為張學良。」

[3] 張慶國、潘千葉：《京城玩主張伯駒》，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年。

[4] 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君子之交——張伯駒夫婦與我父母交往之疊影》，《黃花崗》網站網絡版，2004 年。關於《遊春圖》的來歷，章詒和的說法與張慶國、潘千葉的說法大同小異。章說，張伯駒對她說過：「買展子虔的《遊春圖》，是我把公學胡同的一所宅院（據說是李蓮英舊居）賣給輔仁（大學），再用美元換成二百二十兩黃金，又讓潘素變賣一件首飾，湊成二百四十兩，從玉池山秀老闆那里弄來的。」

[5] 辛明：《自宮、脅迫自宮和宮刑——中國共產黨是閹割中國人民思想的封建邪教組織》，《議報》第 90 期。

王若望自傳

第三部連載之四

抓右派的拉網戰術

我是在七月三十日被張春橋的一篇文章定為右派，而由毛執筆寫的《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麼」早在六月八日。我被拉出來當上右派晚了兩個月，因我仍在圖書館工作，才得知領導層中有些同志還是想力挽狂瀾，設法抵制反右運動，在反右剛開始的第一階段，市委宣傳部長石西民和副部長周而復，也曾阻止把我的名字列入黑名冊。宣傳部辦公室還打電話給我兩個『心』字的勸告：『儘管放心，不過寫文章要小心』。市委宣傳部兩個部長是反對文教書記張春橋的跋扈的。後來聽說周而復為此寫了檢討，而張春橋卡住，不讓他過關。

以吳強、孔羅荪為首的作協黨組也不同意把王某打成右派，一位黨組成員在討論右派黑名單時，為我說好話曰：「王若望黨齡比在座的都長，又是無產階級出身，他在反胡風鬥爭中表現積極，王若望是右派的話，我們都是右派了」。這位同志在第二年的『右派補課』中，他自己也成了右派，並開除了黨籍。（補課補上的右派，稱作『補課右派』）

黨中央反右辦公室主任鄧小平抓右派的戰術，跟他撒大網搞嚴打有相似之處（『嚴打』即嚴厲打擊流氓刑事犯的簡稱），先抓住幾個『要犯』，然後向縱深拉網，學的是韓信用兵，多多益善，成幾何級數擴大戰果。

試以活靶子王若望為例，王是第一被捉拿的要犯，然後四面開花，不久將安徽勞動局工作的三弟王鶴打成右派，我的小弟弟雷華在青島海軍當兵，按黨中央指示，部隊裏不搞反右，但從他的哥哥是『要犯』的血緣關係上小弟弟雷華未能逃過這一劫，他被軍隊押送回我的老家，並向親鄰宣佈雷華是右派，交群眾監督改造，連經商或進街道工廠的資格都沒有，祇能下田幹勞役。

孟子曰：「澤梁無禁，罪人不孥」（梁惠王篇），即不能禁止人民在水中捕魚；不得株連犯罪者的子

女）。孟子所說犯罪者是真有罪，而當今的「右派份子」卻是莫須有哪！

在一個陰雨霏霏的周末，我回到上海市度過可憐的禮拜六，我的李明精神恍惚地告訴我：「前天來了一個自稱代表組織的人，對我說：『你要做黨員還是要王若望？由你選擇』」。

我妻子直截了當地回答說：「我們有這麼多孩子，我不能不要王若望呀」！

從那以後，她的精神和信仰一起崩塌了，許多反常的行為出現了。有時，她會抱住我嚎啕大哭；有時嘴裏罵著：「你為什麼要反黨」？並且用頭撞我，踢我。我那時非常馴服地接受了她的打，一點違拗的意思也沒有。我意識到，她把心裏的怨恨朝我身上發泄，或許能減輕她內心的痛楚，叫我赴湯蹈火我都樂意幹。我深深地譴責自己，是我在文字上闖下了滔天大禍，害得她得了精神分裂症，我必須管束自己，千萬不能也得了精神病，一定要保住頭腦清醒去伺候她，安慰她，報答她。

整個家庭，這幾年中籠罩著陰沈和哀愁的氣氛。我去農村下放勞動，不把我當人看待的那種歧視和政治壓力，並沒有損傷我的意志和精神，老實說，這一切對我已經失去了威懾作用，因為我的神經變麻木了，我的感官變遲鈍了。縈繞在我心頭的唯一的懸念，便是我的神經不正常的妻李明：「她現在怎麼樣呢？她肯按時吃藥嗎？我不在她跟前，她會砸碎家裏的什麼東西吧？一時腦筋想不通，她會從窗口跳下去嗎……」？

當我一想到這個可能發生的悲劇場面，我身上直出冷汗，呼吸都感到局促，我不能自己地向朝西的大路上奔過去。直奔得兩腿酸麻，上氣不接下氣，這才停下來，我才悟到剛才那個悲劇不過是心造的幻影，這是不可告人的內心的悸動。我拍拍自己的前額，自問自答地說：「王若望啊，沈住氣吧，首先不要讓自己得了分裂症。為了李明，為了我們的孩子，必須活下去，千萬不能得精神病呀」！並且意識到我是在這裏「監督勞動」，不辭而行又會招來新的折磨，於是我拖著疲憊的腳步又慢慢走回來。

李明始終站在我這一邊，她是以整個生命捍衛愛情的忠貞，見面時，她沒有批評過我闖了大禍的雜文有什麼差錯。

經過這一場折騰，我們之間的愛情又昇華到一個更高的高度，我教會她下象棋，我跟她一起朗讀《西廂記》，我還教她如何欣賞唐詩。蒸汽機車的馬力也沒能把我倆拆開，我們反而凝結得更緊密，誰也離不開誰。過去我們倆由於都擔負著繁重的工作，一直沒有這樣的閒情逸致來消受陶醉藝術裏的天倫之樂，如今我們倆無官一身輕，有足夠的餘暇把自己的宿舍經營成一個安樂窩，把外界的一切政治歧視，無謂的懲罰，卑劣的虐殺扔到九霄雲外去了。祇有一次，我又惹她哭了，那是我漫不經心地回憶起她在神經失常的時候打了我，她聽了我的這段痛苦的回憶，臉色忽然變得蒼白，一定要看打在什麼地方，並說：「我從來不曾打過你呀！打痛了嗎？」一面說著，就伏在我身上哭起來了。這時我說不出一句話來，祇覺著鼻子酸，眼睛濕潤了，我真懊悔不該再說這些無聊的話。我早有體會，不要朝後看這個提法是多麼正確！

在百家爭鳴的第一階段，康生跟在毛澤東後頭也來上海鼓勵大家鳴放，他在「文藝會堂」召見文藝界人士，我聽康生傳達毛的兩句名言：「黨外無黨，帝王將相；黨內無派，千奇百怪」，沒有牆，沒有派反而不正常。我便在這一啓發下，寫了支持「拆牆」的文字。半個月以後，《解放日報》用頭版頭條以贊許的語氣做標題，「王若望提出黨外有牆的主張」（原稿的副題是「康生談黨外有牆」，編輯部刪去了康生的名字。

這樣便掀起了批鬥王若望的高潮，我在批鬥會上申辯道：「這兩句話原是康生同志說的，到會的作家都聽到的吧？這筆賬怎麼算到我的頭上」？台下觀眾卻以喊口號壓倒了我的申辯。這樣的批鬥會共開了三次。記得有一次，遠調至山東的作家劉知俠特地趕來上海，厲聲批判王若望。他發言的內容提到了當年孫峻青小集團如何受王某壓抑的老賬，我在被告席上祇有苦笑而已。

凡外出公幹，按制度可以公費報銷全部旅費，而劉知俠從青島遠道而來，全部自費，足見其鬥爭性之強矣。

再舉另一種引蛇出洞的陽謀，就在我的故鄉武進縣施行過。由於黨政部門沒法湊足上峰頒下的右派份子的指標，有位熟悉政治運動的『智叟』獻計曰：如此這般，縣委書記覺得此計甚妙，便挑選在端午節前

夕，由教育局出面招待所有的中小學班主任和語文老師，大擺筵席，說過端午節，請大家聚餐。

當時正逢外面大鳴大放空氣高漲，右派帽子還沒有出籠，來賓在酒足飯飽之餘，就很自然地議論反右的消息，什麼人是右派等等作為談助。

教育局在每一桌上安排一名心腹，暗暗記下張三李四發議論的精彩部分。宴會散席，他們的右派論點也就編織停當，於是這些人上了一百多位規定的名額。

為什麼挑選班主任和語文教師呢？據告知我的老師解釋道：祇有教師中的尖子，發起議論來才有骨頭，至於把教師中的骨幹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必然影響教育事業的健康發展，縣委書記和教育局長哪裡會顧及它的後果呢？

令人不勝驚異的是：爲了湊指標向上邀功，連安排做記錄的心腹，也有幾人上了右派黑名冊。

浙江省省長沙文漢，在反右鬥爭中被打成大右派，他是右派中等級最高的。沙的妻子陳修良，曾任地下黨南京市委書記，日後成了我的朋友，她避免談沙文漢的挨整，卻談了另一位極右份子楊朝龍的故事：

楊朝龍曾任國民黨政府司法行政部司長，他妻子沙溯因和妹妹沙軼因皆是沙文漢一族的小姊妹，一九四九年一月，蔣介石下野，李宗仁代總統，陳修良誤以爲發覺李宗仁比蔣介石有其開明之處，那時在上海監獄中關著三十多名政治犯，陳修良便通過溯因去說服楊朝龍，曉以大義，趁早釋放中共的政治犯，將功折罪，幾經轉折，在解放軍在山東取得大捷後，楊朝龍設法將全部政治犯釋放。應該說，楊是有功之臣，祇是爲了他響應大鳴大放，在發言中講了「應將政治和法律分開」等語，就把楊劃入極右派，沒收其家產和存款。他的妻子沙溯因自殺而死，子女三人同時劃爲右派。楊本人判無期徒刑，他在獄中身患重病，至一九七五年特赦出獄，祇剩孤身一人，眼睛昏花，滿頭白髮，至一九七九年死去。

如果說，三反五反運動成了自殺的高潮，連陳毅市長都說：「跳樓自殺者就像降落傘部隊！」那麼反右運動引起自殺事件肯定超過三反五反。

至今我還記得：祇因說了句「黨天下」就成爲右派的儲安平，最後連屍體都不知在何方；電影演員石

暉剛演完「霧海夜航」，在反右第一波時乘寧波輪船躍進大海而自殺。胡適在大陸的兒子胡恩杜，任唐山鐵道學院的講師，因看到《人民日報》刊出他與機械系主任孫竹生妄圖「合夥妄圖奪取學校領導」權的消息，胡恩杜即自殺身亡；在廣州水力發電設計院的女技術員黃倩，因叔祖是大流氓黃金榮，哥哥又在台灣，出身成份不好，一連幾晚的批鬥大會，這位剛從大學畢業的二十歲青年最後上吊自殺，第二天還召開了「批評右派黃倩謬論大會」，發動大家批判冤魂。法國文學翻譯家傅雷，在右派補課階段，也被劃進右派，延至一九六六年，文革尚未登場，傅雷夫婦開了煤氣一同自盡。文化界為此悵悵不已，對傅雷夫婦之死有人總結了兩句話：反右跟上末班車，文革趕上頭班車。是對一茬接一茬的政治運動的一種冷嘲。

《文匯報》被毛點名批判為「……資產階級右派方向」，故那裏的右派份子特別多，全社一百餘人就有多三十多名右派，社長徐鑄成當然逃不了！該報社管理部主任梅煥藻跳樓自殺，范瑛為詩人流沙河寫了一篇專訪，他和流沙河一同被打成右派；另有該報駐京記者浦熙修女士，她是羅隆基維持了十年之久的愛人，這就成了章羅聯盟與上海右派集團串通一氣的女幹將，當然成了極右派，還有一位記者劉光華，報導了北京的民主牆，被定為極右分子，押送北大荒勞改。該報社的其他的右派份子就「不及備載」了。

上窮碧落下黃泉般拉大網搜捕右派，所有基層組織則以越多越好，多多益善的邀功請賞，製造右派，於是產生了許多延伸的新名詞，使帽子店花色品種多姿多彩。諸如有自薦右派，內控右派，點頭右派(欣賞大鳴大放中右派言論而點頭者)，候補右派(五八年補課中軋進的右派)，極右派，又謂『極右份子』，佔比較多的尚有株連右派，血統右派及夫妻右派等等。一九七八年給右派份子改正，官方公佈的數字為五十五萬名，不能改正的祇有六人：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陳仁炳、彭文應和林希翎。復旦大學外文系教授彭文應拒不認罪，他的次子自殺身亡；上級文件駁回林希翎的申訴，批示曰：「林為右派份子，不是錯劃，不予改正」，她也是拒不認罪。據《陽謀》的作者丁抒的統計，自1957年開始劃入反革命右派者八十多萬，再加上二十二萬候補右派，共計一百零二萬人。

回想當年赴朝慰問團，就有三分之一被打成右派，六個不許改正的彭文應、陳仁炳二人，劃入中央級的極右份子，另外還有復旦生物系教授張孟聞，《文匯報》社長徐鑄成和赴朝慰問團秘書長王若望，在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右派份子濟濟，成群結隊，其密集程度可見一斑。

林昭之死——之一

我先是認識林昭的妹妹即林凡女醫師。先從我的年輕朋友徐建講起，原來徐被打成右派，是受我的株連，他在國防工業飛機修理廠任工會文教部長，工會系統紛紛請我去做報告，他曾邀我到該廠去演講過一次，他又在黑板報出過特刊，讓聽眾發表意見。

就憑這一事實，徐君被說成是大右派王若望打入要害部門進行反革命活動的爪牙，這時的黑板報一變而為批判小右派徐建的小字報。他被扣上右派帽子，攆出「要害部門」，也許該廠的領導對這位工會部長手下留情，沒有發配邊遠地區勞改，而是分配至浦東一家玻璃廠，交群眾監督改造。其中我有一部分責任。他對這場反右鬥爭滿腹牢騷，怨有頭，債有主，正是王若望害得他戴上了緊箍咒，他設法找到我的住所，熱淚盈眶地吐苦水。我講了自己的遭際，他收起淚水：比起你受的委屈，我的陪綁也就不算什麼了。

以後徐到我家來過幾次，有一次他提到玻璃廠沒有女工，顯然是光棍漢嚶嚶求偶的一種暗示。對這一類婆婆媽媽的事，從來不熱心的我，甘願為他出一臂之力，實由於內心浮起負疚的歉意，如有將功補過的可能，當然是義不容辭了！

我於是拜訪親家高先生，我向他提出可否物色一個姑娘，我簡單介紹了男方年齡、文化程度，以及頭上有頂「帽子」，提出要女方留心。親家想起他的朋友許憲民的二女兒叫彭令凡醫師，也是由於出身成份不好，尚待字閨中。我把徐建領到家中，覺得徐建高高身材(因上海的少女對男方的身高特別計較，故說媒也得從女方的角度衡量男方)，目光中雖透著憂鬱，但掩蓋不了男子漢的英武氣概。親家有信心為林凡小姐搭橋撮合。這樣，我便認識了林凡醫師，她身材顯得矮小，面色有點兒蒼白，矜持中帶著靦腆，衣著樸素得近乎男性化。我在她跟前又為徐郎美言了一番，安排在復興西路我的寓所讓他們見面，當她點點頭表示

「滿意」時，我和親家都為此感到高興。往後，徐郎在另外什麼地方和林凡會面，媒人祇等待撈一頓喜酒喝了。

從徐建贈給對方一件別出心裁的信物，旁邊的人即可看出他是愛得多麼深！是細工打磨兩塊不銹鋼材料設計成太極圖似的兩顆心可分可合，用拉丁字將二人的名字分別刻在兩顆心上。信物小巧玲瓏，正好掛在鑰匙鏈上。

沒料想到這麼一對天作之合的情侶，而且接受了定情的信物即意味著訂婚，卻走上了幾千年不斷重複演出的梁山伯與祝英台式的悲劇，從中作梗的卻是林凡的母親許憲民，她堅決反對女兒的婚姻，如果說歷史上的「梁祝哀史」是封建制度造成的，那麼，徐、彭的愛情悲劇卻是政治因素起了破壞作用。

有一天許老太親自來到我的宿舍，我恭敬地請她裏邊坐，她不肯，不聲不響站在門外，似乎特地給我站崗來的。這是我頭一次認識許老太，她頭上裹著黑紗巾，滿臉的肅殺之氣表現了性格的剛烈，她喃喃地囁囁著，帶著蘇州口音說：「我要找徐建說句話」。我勸她：「徐建不會來過」。她還是不走。我的住處是一幢高樓的第五層，上上下下的鄰居都經過這裏，大樓裏便傳開了王家門前來了個瘋婆子。我祇得請高先生出面，勸說她這件事容易了結，許老太並不瘋，她便乖乖地跟親家走了。

許老太氣咻咻地埋怨做媒的：我怎能接受一個右派的女婿呢？她爸爸遭鎮壓害了我一家子，難道還不夠呀！言下之意，女婿千般好，萬般好，頭上有一頂右派帽子就不是『人』！這就是看不見摸不著而威力無比的「政治因素」了。

設身處地為林凡的媽媽想想，那個「政治因素」確是無法逾越的障礙。

在那個時候，便有「遂使天下父母心，有女不嫁黑五郎」的無窮感歎，「黑五郎」，即指黑五類，地、富、反、壞、右是也。

林凡和徐建被迫割斷了來往，許老太達到了目的，她請我到家中作客，找出一張舊照片給我看。我是從照片上認識了她的大女兒林昭，照片上的林昭祇有十五六歲，比林凡更美麗，前額的頭髮剪成劉海形，一付稚氣天真的面孔，透著一雙賽過媽媽的眼睛。

林昭的父親參加過考試院的文官考試，做過安徽省的霍山縣長，鎮反第一批的鎮壓對象，就把彭縣長判了死刑。父親慘遭殺害，給兩個女兒的命運留下陰影，林凡變得謹小慎微，沈默寡言，姐姐則變得更為激烈，開始用批判和懷疑的眼光對待中共的新貴們。還有一個弟弟彭榮華，這個青年則變得有點玩世不恭，對兩個姐姐的關係不冷不熱，他自學日語，能著手翻譯日本的俳句。

生當作人傑，死也為鬼雄——林昭之死之二

十九歲的林昭曾在《常州民報》當過記者，她邊寫新聞稿，一邊提高文學水平。二十歲轉入北大新聞系，在大鳴大放中成了引蛇出洞的不幸的「蛇」，北大學生中的兩名女將被打成右派：一位叫林希翎，第二名即林昭，外界誤以為她倆是一母所生，其實林昭姓彭，在鎮反運動中，死刑犯的子孫以為拋棄父系的姓或許能不予株連，而彭家姊妹不以為然，戶口簿上還是跟父親的姓氏，這裏面就透出她們消極的倔強。

北大對林昭的處分是開除學籍，回老家交群眾監督改造，那時她的老家在蘇州，驅逐出校的林昭不思悔改，反而變本加厲聯繫六、七位北京和常州的同學，辦起題為《星火》的刊物。她在上面發表一首詩，把自己比做竊火到人間的普羅米修斯，該刊沒辦了兩期，就被公安部門破獲，其他六位同學也一網打盡。同案都判了十年以上的徒刑，祇有林昭判了二十年有期徒刑。許老太對我說：大姑娘判得這麼重，祇因她是右派，還由於父親是被鎮壓的反革命，林昭本人在法庭上又公然與法庭頂嘴，她在關押期間偷偷地寫了「天鵝之歌」的詩，法官指出詩是反黨的罪證，十分反動。這姑娘說她不過是一隻純潔的天鵝，嚮往在天空自由飛翔，沒有別的意思。

一九六六年四月，許老太家中來了一個不速之客，他自我介紹姓章，他是跟同學林昭一同辦《星火》判刑七年，剛刑滿釋放，便尋到上海的地址，所一出獄就來林昭的老家尋訪，他並坦承在北大時已跟林昭訂下山盟海誓，要媽媽設法讓他無論如何跟林昭學妹見一次面。此人的懇切和剛出獄的光頭標記證明這個姓章的不像是公安線上的人。許老太勸說姓章的早點死掉這份心吧，她講了大姑娘在裏面判刑二十

年咧，那就耽誤了章同志的青春。他熱淚盈眶，竟聲言非林昭不娶，守她一輩子也在所不惜。

小章對愛情如此忠貞，這樣的小夥子現今似乎不多了，共產黨活活拆散這對佳偶，做媽媽的以為深深感到遺憾。許老太寧願把一個月難得有一次探監的機會讓他去進行一場冒險。聰明的小章根據自己七年牢獄生活的體驗，把媽媽的設計補充的更加周詳。

小章來到提籃橋監獄。填親屬接見表時，他亮出自己北大學生證，編造了一段自己曾與監犯訂過婚約，願意勸說她奉公守法，爭取最高法院寬大處理云云。監獄官不明有詐，偏偏這個女犯在裏頭行為乖張，連母親的勸告都聽不進去，有過愛情關係的未婚夫對改造她的思想或許有作用。

小章終於見到了夢寐以求的林昭，一旁站著獄警，他對她說了一番好好的接受訓導員教訓，真正認罪服法，爭取減刑，還是有指望，我保證在外頭等你之類的话，而女犯的臉部沒有表情，卻以詩歌的語言說了這樣的話：我是折斷了翅膀的白天鵝；祇有呆鵝才幻想維持這個死亡了的愛情。

下個月探監的日子，許老太頭上披著黑紗來到提籃橋監獄(平時她並不披黑紗)，獄警告知她，女犯林昭在裏頭還是不老實，希望做娘的給她一點勸告，媽媽問：女兒在裏頭幹了什麼不老實的事呢？獄警說：我們讓她在工場做生活，正經活不做，卻剪下一塊白布繡上一個大大的「冤」字。許老太不該插上以下的一句話：「她心裏是有冤枉呀！」弄得獄警下不了台，很生氣的回答她：「看來你的探監對在押犯思想改造不利。」這裏看出媽媽也是那副剛烈脾氣。正所謂有其母必有其女，她就學不會小章那樣，看著監獄官的眼色行事。

下個月探監的日子，改由林凡前往，帶回來的消息更令家人心疼，監獄當局不但不讓姐姐做裁縫生活，爲了處罰她，還將她關入單身牢房，那年頭正是語錄歌流行的狂熱歲月，連監獄裏的大喇叭都不斷播放喧囂乏味的語錄歌，林昭沒武器來抵抗令人作嘔的噪音，竟把她的頭髮浸在馬桶裏，用熏人的臭氣來沖淡鬼哭聲號的語錄歌廣播。

當林昭用塊白布繡出「冤」字的時節，文革第一階段的紅衛兵印了五花八門的造反派小報，我從《井岡山造反報》上看到了一條好消息，報導中央文革小

組兩個紅人，接見一名姓錢的戴過右派帽子的地主份子，解釋錢某的地主份子是個錯劃，右派份子是一場誤會，中央文革小組兩個領導才召見他云云。這條喜訊教我喜出望外，中央文革小組中有一位王力同志，我認識他，聯繫到林昭的冤案，我忽發奇想，把這一期《井岡山造反報》送到許老太那裏，她大喜過望，竭全力支持我的計劃，於是聯繫五個青年朋友，她們皆參加過第一期的紅衛兵隊伍，我至今記得他們的名字：俞建民，金龍、銀龍兄弟等，他們帶了我寫給中央文革副組長王力爲林昭說情的信，路費由許老太出，前往北京，上訪中央文革。

結果可想而知，這幾位紅衛兵被中央文革聯絡小組當場攆了出來，可說是無功而返。這一步棋大大的錯了，說明我的天真幼稚，而且中央文革將王若望的信件存檔，留下王某爲右派份子翻案的筆跡，兩年以後我被拘捕入獄，這條事實成了罪狀一條，此是後話，按下不表。

一九六八年勞動節的前夕，政法部門突然改判林昭死刑，立即執行。後派了一個公安人員通知家屬收屍，並索取一枚子彈費用，一角五分錢。

幸而有位隱姓埋名的好事者悄悄地保存了林昭生前用血寫的「血書」，最後的一節：

將這一滴血注入祖國的血液裏，

將這一滴向摯愛的自由獻祭。

揩吧，擦吧，抹吧，這是血液！

殉難者的血跡，誰能抹得去？

這就是「死而爲鬼雄」留給我們的大寫的「血跡」！

過了勞動節，街道委員會宣佈許憲民爲歷史反革命份子。許老太的剛烈性格不減，就在當天黃昏時節，她穿了孝服至靜安寺電車軌道，讓側面而過的電車把她碾死，但僥倖沒有闖入車輪之間，被車箱突出的部分反彈出來，祇是破了頭皮和盆骨骨折，立刻送醫院急救，她老人家沒有死成，沒住多久她活著從醫院出來，許老太讓林凡帶一根拐杖去接她。看來老太仍然丟不開這個殘暴的世界，她牽掛著兩個孩子。

她負傷以後我前往她家中問候，她神經緊張地招呼我快走，生怕街道小組長就在跟前。我問她：「林凡醫師常來看你嗎」？許老太說：「她到了美國」，並把舊金山的地址抄給了我。

今日中國政治革命的導向

旅美台灣華僑 陳繼強

政治革命的基本理論

兩岸誰最不希望有人致力推動政治革命，我認為在大陸地區祇有共產黨最不希望有人致力推動政治革命，因為共產黨自認為祇有他們有資格有能力「控制」中國，不容許其他任何黨派有任何機會取而代之。在台灣地區，我認為任何黨派的政客們都不希望有人致力推動政治革命，因為都「怕」，怕政治革命會帶來動亂，因而失去已有的政治利益，失去一般人沒有的物質享受，更怕共產黨以武力跨海進行統一。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各民主先進國家的國內外政治其重點都著重於「人權」，著重於如何保障「基本人權」，著重於如何提倡「人權」，如何尊重「人權」。為什麼？為什麼一個民主先進國家在有了「民主」，有了物質文明之後反而大談「人權」？難道是這些民主先進國家的社會道德文化教育失敗了嗎？不是！我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是資本主義過份的發達，人與人之間祇求利益的強烈競爭，強者愈來愈強，弱者愈來愈弱，得勝者對失敗者缺乏足夠的同情心，得公權力者以炫耀自己的權力為樂，因此弱者敗者的仇恨心態增強，無時不想法子以各種手段擊敗自己的對手。人與人間的關係如此，國與國間又何嘗不是如此，因此國際恐怖主義份子反而借著這種矛盾現象得以生存。所以聰明的政治家們重新提出「人權」主張，為求社會的和諧避免動亂，借「人權」抑制獨裁國家過度膨脹，並期望達到國際的均衡。

那麼在中國的文化歷史中是否曾經提倡過「人權」呢？當然有！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地尊重他人的基本人權，如在「禮運大同篇」裏陳述了保障基本人權和在國家體制下如何伸張人權以達到人類社會的大同世界，更有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集人權之大全和實用性，民生主義(民享)從保障個人的基本生活

權延伸到群體生活的利益如何獲得，民權主義(民治)從如何保障和伸張個人的意識表達權延伸到群體同一意識表達權的力量和功能，民族主義(民有)從強調各個人與生具有的平等生存權延伸到我國民族與其他民族爭取世界同地位的和平共存權力。現在我必須試問諸君，你是否真的希望中國未來是一個自由，平等，博愛，民有，民治和民享的新中國，一個真正的自由民主共和國呢？如果你的回答是肯定的，我再問你，你對你現在居住的大陸地區(包括港澳兩地)政治環境認同嗎？你對你現在居住的台灣地區之政治環境認同嗎？如果你的回答是否定的，那麼我就肯定地向你說，你已經有了足夠的理由從事中國的政治革命。

政治革命的方法

既然我們有了足夠的理由從事中國的政治革命，我們就必須認真地，實際地，勇敢地以理性的態度努力以赴，除非你是一個冷漠的中國人。說到革命，我想有些中國人立刻會起反感會怕，原因是在過去的中國歷史中，祇要一有革命運動就會發生殘酷的流血事件，甚至於千百萬人的性命喪生，然而在二十一世紀資訊發達的今天，我相信我們中國人已經到達民主、法治、理性和尊重他人生命等應有的水平，我們不能應為一個「怕」字而裹足不前，停滯在走向自由、民主、法治、共和的途中，而任憑中國共產黨的馬列匪徒們殘害我們的同胞，作賤自己的人民，並且阻礙了大陸地區法治民主的進步。或者任憑台灣獨立集團份子們踐踏台灣地區已有的民主法治和破壞中國和平統一的進展。我相信我們今日的中國人一定有足夠的智慧在政治革命的過程中化解殘酷的流血危機。

當然，政治革命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方式，一是和平的政治運作，二是以武力推翻執政黨，由於兩岸政治環境不同，因此政治革命的形態應有所區別。

有關和平的政治運作方面我認爲：

在大陸地區：

1. 積極提倡建立以人權爲基礎的法治環境。
2. 廣泛宣傳三民主義思想和五權憲法的政府組織結構言論。
3. 倡導要求軍隊國家化和強調國家幹部是人民的公僕。
4. 以各種方式強烈支持司法機關的獨立性和執法力度。

在台灣地區

1. 發動恢復國民大會運動。
2. 倡導恢復台灣省政府組織功能爲中國和平統一找回正確的第一步。
3. 要求加強一個屬於中國的實用教育改革。
4. 鼓勵大陸人士移居台灣省。

有關以武力推翻執政黨方面我認爲：祇要有以下情事發生，熱愛自由民主共和國的中國人就應該勇敢的團結起來，武裝起義復興共和國。

1. 兩岸執政黨以任何理由執行流血式武力鎮壓。
2. 兩岸執政黨任何一方發動中國內戰。
3. 台灣執政黨宣佈獨立。
4. 在以民主法治條件下促進中國統一走向民主共和國方面對執政黨徹底絕望時。

政治革命的對象

現在我就政治革命思想做一個最簡單的陳述。孫中山先生發動革命推翻清朝帝制建立中華民國，他的最終目的，就是希望中國將是一個民主共和國，並與其他先進國家平等共存於世。中國共產黨則認爲他們最能夠以共產的方式讓全中國人民過上自由民主幸福的日子，能將中國人從貧窮落後中徹底解放，一部份中國人被他們欺騙了，將蔣介石等逼出大陸遷移台灣地區，中國共產黨另行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此中國共產黨把反對者、甚至是原來擁護他的人，都打成反動派、反革命份子，其鎮壓的名目不一而足。今天，兩岸分離分治已經超過了半個世紀的歲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一直由中國共產黨統治至今，請問，對中

國共產黨的所作所爲你認同嗎？中華民國因民主選舉由台灣民進黨獲得政權執政已超過四年，卻把台灣帶向了分離獨立之途。中國的內戰似有一觸即發的可能……兩岸執政黨究竟想把我們中國人帶向何處呢？我認爲我們現在必須在政治思想上做出明確的判斷和在政治信仰上做出正確的選擇，首先我們必須確定的是：中國共產黨的馬列餘孽們和極端臺獨份子集團（包括大陸參預人士）是當今中國兩岸的反革命份子。

政治革命的首要條件是中國知識份子和資本家必須先行自我革命

政治革命要成功就必須要有足夠的條件。中國知識份子在中國走向民主共和的進展上佔有非常重要的關鍵地位，中國知識份子不僅祇是宣傳自由民主思想以啓發民智，也要傳承中國文化和科技文明並發展之，以能夠將中國「優質化」，並要將中國置於被尊重的世界平等地位，與其他民主先進國家和平共存於世，所以中國知識份子在政治思想上必須是民主共和，必須有自由、平等、博愛、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信仰，必須堅定這個政治信仰，否則「筆桿子向槍桿子下跪了」，那麼中國的民主共和國理想勢將遙遙無期。

再說資本家一向是那裡有利便往那裡去投資獲利。在民主國家的社會裏，資本家又時時扮成慈善家施惠於社會，目的是發揚人性的光明面。而我們中國的資本家呢？在台灣地區，在李登輝執政前的執政黨——中國國民黨視台灣地區每一個人都是平等的中國人時，國民黨曾努力發展政經與世界經濟接軌，這才有了台灣在李某人時代的經濟蓬勃期，我想台灣的資本家們是無法否認中國國民黨依一個中國的觀念執政，曾給台灣地區帶來的政經功效的。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雖然主要是從中國共產黨內產生了新一代的資本家，他們已經知道經濟利益給他們自己和中國共產黨執政帶來了極大的好處，可是他們在中國民主共和的發展途中會給中國帶來真正的正面價值嗎？從台灣地區政治發展經驗中，我們可以看到由於某些資本家們因唯利是圖、政商勾結，從政府方面獲得龐大政策利益卻剝奪了自己同胞的工作機會，不但造成社會道德價值混亂，亦將民主政治發展的正途改變了方向，

把他們自己和台獨份子集團綁在一起走上了分離中國的不歸路，也成爲中國兩岸走向民主共和國途中的絆腳石。所以我認爲資本家們在中國兩岸民主政治革命中，不應祇以經濟利益爲借口卻模糊了整體中國之民主政治的真正價值。爲了整體中國的未來，也爲自己在經濟領域有更好的發展，就應該在自己的政治思想上自我革命，時時爲整體中國的民主政治提供一些有利的行爲，不要成爲中國兩岸走向民主共和國途中的一塊絆腳石。

政治革命的基本要求

中國的政治革命如果要以和平的政治運作方式達成，兩岸就必須有健全、又具功效的國民大會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大)。爲什麼？因爲要民主就必須尊重這個國家的每一個國民，聆聽每一個國民的建言，否則這個國家就不是健全的民主國家。但是要聆聽每一個國民的建言又談何容易，因此在設定的條件下先選出一些代表們，會集各種不同的意見，再帶到大會發言討論表決做出結論，然後交付政府實施，這就是國民大會或全國人大的最基本功能。何況中華民國憲法是由國民大會製訂，祇有國民大會才有權修憲。這也充分表示了中華民國是依中華民國國民的理想和意願所創立，如果沒有了國民大會，就等於沒有了中華民國，就沒有了真正的民主。所以，在台灣地區因爲台獨集團坐大後導致了對國民大會組織功能的凍結，從而說明民進黨和台聯黨所進行的各式各樣政治活動，實際上就是要消滅孫中山先生所領導創立的中華民國，是一場已經開始和持續發燒的政治鬥爭運動。至於大陸地區的全國人大早已被學者專家們視爲中國共產黨的橡皮圖章，所以中國共產黨如果真心想改革，就必須把全國人大的功能提昇到如同中華民國的國民大會的功能一樣，甚至更好。這就是我要將恢復國民大會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組織和功能做爲政治革命之最基本要求的理由。

政治革命的個人基本條件

1、堅定的政治革命信仰

孫中山先生說：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但是我還是要提出疑問，爲什麼中華民國在信仰三民主義爲救國主義的中國國民黨執政下會遭遇兩次亡國危機？

第一次發生在大陸地區，在艱辛的八年抗日戰爭勝利之後，當中國政經民生極度貧乏之時；第二次發生在台灣地區，在以三民主義爲政經建設之精神成功之後，當台灣地區政經民生高度富裕之時，爲什麼會這樣？難道是三民主義不能救中國嗎？還是五權憲法不適合中國？在我認爲，則是在中國國民黨中，有太多的重要領導幹部太過崇尚中庸和忠恕之道，祇重視「人之出，性本善」，卻輕忽了人性的弱點和人格的缺陷與變化，因而淡化了自己的重要政治信仰，減弱了因信仰而產生的力量，更不知如何鞏固整個黨的政治信仰「三民主義」。因此，三民主義就淪落在學術論述的範圍之內被禁錮了。當中國國民黨的政治信仰「三民主義」衰退時，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就會起變化，人性的弱點卻開始轉強，人格也開始變化。所以在抗日戰爭勝利之後，當中國政經民生極度貧乏之時，共產黨乘機以武裝鬥爭奪取了權利，不少青年人也相信了共產黨的甜言蜜語。而在台灣地區以三民主義爲政經建設之精神成功之後，當台灣地區政經民生高度富裕而中國國民黨的政治信仰「三民主義」卻產生衰退之時，於是台灣地區整個社會價值錯亂，笑貧不笑娼，唯利是圖，私心大漲。因此群眾才傾向了台獨集團，有了「劃地爲王」的心態，多數年青人也祇沉醉在資本主義的世界裏不能自醒。所以並不是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有什麼不對，是因爲信仰三民主義的中國國民黨被「軟化」，被分化，才導致失去了以三民主義主導中國和平統一的政治革命力量。因此，我們必須堅守自己的政治信仰「三民主義」，堅守對民主共和國的政治信仰，再由信仰生出政治革命的力量直至完成這場政治革命。

2. 互相扶持的政治革命情感

強大的政治革命力量是靠深厚的革命情感和團結來鞏固的。今天，假如革命志士們還有「一盤散沙的舊病」，促進中國成爲自由民主共和國的路程將更遙遠，因此我們必須有一個具有統一性且強而有力的組織，能夠做經常性和統一性的政策宣導，一個公開性的組織領導全世界的革命志士，從而能喚回「冷漠的同胞們」。大家在這個組織領導下互相扶持達到世界性的串聯，這才能真正發揮政治革命的力量。

3. 不怕死的政治革命勇氣

護國護法

陸
耘

一個龐大的清朝帝國最終被人數不多的革命先烈們推翻，原因除了有共同的堅強的政治革命信仰外，就是一個不怕死的政治革命勇氣，雖經多次起義的失敗但最終還是成功。雖然現在中國的情況與清朝當時不同，但是要達成革命事業成功的道理是一樣的，祇是政治革命的方法有所改變，所以祇要每一個革命志士都有不怕死的政治革命勇氣，自由民主共和的新中國就一定會實現。

結論

在柏林圍牆被推倒後的十四年歲月裏，我們並沒有看到德國有任何混亂的局面，也沒有看到德國人有過度的長時間的激情表現，祇看到德國人在默默地建設他們的國家和勇於認錯，並承擔因「希特勒」所產生的人道賠償。雖然和平的榮耀給予了美、蘇的兩位領袖，其實真正帶給世界和平的貢獻者應該是所有的德國人。因為祇有在東德人民勇敢地徹底地拋棄了馬列思想和共產主義之後，和在西德人民誠心誠意的包容之下，全體德國人都已經覺醒到必須建立「一個統一整體的民主共和國家」才能夠真正給德國人帶來希望，德國才能夠真正實現和平、統一與發展。今天德國在政治經濟上的進步和在國際上的被尊重，不就是我們中國人最好的榜樣嗎？反觀中國共產黨的馬列餘孽們和極端臺獨份子們的所作所為，不但沒有給現在的兩岸中國人民帶來民主與和平的希望，反而造成了人民的更大痛苦和國家分裂的巨大危險。據此，難道我們還要與當今中國兩岸的反革命份子大談什麼中庸和忠恕之道嗎？

在中國走向自由民主共和的政治革命過程中，另外還有一個決定性的條件，那就是現在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對民主共和的信念與追求。也就是說，在這兩個不同的軍事團體裏是否存在著這樣一個共同的理想和意願？說道底，就是是否願意共同保衛一個完整的中國和保護自己的同胞在一個統一的國家裏享有自由民主，共同護守一個真正的自由民主共和國。我期望兩岸軍事團體的表現，能讓我們視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同為一個整體，更期望在今後中國的政治革命過程中，祇有和平的政治運作，或祇有武裝起義，而沒有有武裝鬥爭。從而為中國民主、統一與和平的最終實現而奮鬥。

一、中國民主運動的百年歷程

一八九四年，孫中山在檀香山成立「興中會」，以倒滿興漢，「振興中華」「申民志而扶國宗」為宗旨。之後，孫中山參照歐美民主憲政思想，結合中國的傳統政治哲學精髓，創造了三民主義思想體系，將中國引向了現代民主革命之路。1905年7月，在孫中山、黃興等的積極活動下，於東京成立中國同盟會，以孫中山提出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十六字為同盟會政綱。自此，明確的革命民主思想在以同盟會為主的共和革命者中形成了。

同一時期，許多留學生和革命者在國內積極鼓吹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如從日本歸國的留學生鄒容，在所寫的《革命軍》一書中，不僅表現了強烈的民族主義思想，而且比過去其他人更加鮮明地、系統地宣傳了民主共和國的理想。他從國民的天賦權利這一觀點出發來提出問題。寫到：「今試問吾儕何為而革命？必有障礙吾國民天賦權利之惡魔焉，吾儕得而掃

除之，以復我天賦之權利。」「有生之初，無人不自由，即無人不平等，初無所謂君也，所謂臣也。」「後世之人，不知此義，一任無數之民賊獨夫，大盜巨寇，舉眾人所有而獨有之，以爲一家一姓之私產，而自尊曰君、曰皇帝，使天下之人無一平等，無一自由。」「自世界文明日開，而專制政體一人奄有天下之制可倒。」故「革命必先去奴隸之根性」。並得出這樣的結論：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殺盡專制我之君主，以復我天賦之人權」。鄒容還進一步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國的具體方案，如：「立憲法，悉照美國憲法，參照中國性質立定。」「定名中華共和國」；「建立中央政府爲全國辦事之總機關」；「於各省中投票公舉一總議員，由各省總議員中投票公舉一人爲暫行大總統，爲全國之代表人」；「全國無論男女，皆爲國民」；「凡爲國人，男女一律平等，無上下貴賤之分」；「各人不可奪之權利，皆由天授」；「無論何時，政府所爲，有干犯人民權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推倒舊日之政府。」鄒容的這些主張，在一個世紀後的今天來看，也是比較徹底的民主主義思想了。直到今天，中國民主人士仍然在爲實現當時民主革命者的追求目標而艱苦地奮鬥著。

所以，孫中山、黃興、章太炎、鄒容等一大批革命民主人士所從事的，既是中國民族復興運動，也是中國民主運動。

這樣，一個全新的，以建立天下爲公（國家權力是公有的）、保障民權、圖謀民生幸福的社會爲宗旨的民主共和革命——國民革命，在中國出現了。中國國民革命，從第一天起，就是中國民主運動的具體實踐。

在許多民主革命者前仆後繼的不斷努力下，一九一一年，在武昌起義的硝煙中，中國人民終於推翻了滿清的專制統治，結束了帝王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的新中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有了第一部等同於憲法的民主大法——《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華民國具有了初步民主的政體。從這以後，中國民主人士，就以維護和健全中華民國的民主共和性質，維護中華民國的憲政法統，爲自己的職志。而各種反動復辟勢力，也必然以推翻中華民國政府，或變更中華民國的民主共和性質，爲復辟的手段。之後，中華民國經歷了多次「復辟」、「毀法」的變故，孫中山先生

先後發動了「二次革命」，反袁護國、反張護國的「護國運動」，和以反對北洋軍閥假民國與共和之名義以行專制之實的「護法運動」，直至一九二八年蔣介石北伐成功，中國國民革命取得了階段性勝利。

這時，中華民國理應迎來了民主建設國家的大好時機，但是，蘇俄要移植共產專制制度於中國，利誘不成，便來顛覆。日本步步緊逼，欲先圖滿蒙，後謀中原。中國共產黨在蘇俄的指使下走向叛國，軍閥殘餘的殘餘（陳獨秀語）也連續發動了大規模叛亂。由是，維護中華民國法統、反對復辟反叛就成了中國國民革命的新任務，也是中華民國政府的首要任務。其時，中華民國政府真正處於「四面楚歌」了。但是，中華民國的「共和革命人士」，卻堅定地承擔起繼續完成國民革命的歷史使命，在中共武裝叛亂地區，不甘受中共魚肉的民眾也用各種形式，反抗中共的禍國與摧殘，配合中華民國政府圍剿蘇俄馬列邪教政權在中國的代理人中共，維護中華民國的憲政法統。

中共在大陸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後，各地民眾的反抗更是從未間斷，他們以各種形式配合退到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的反攻大陸計劃。各種形式的反抗中共獨裁專制統治、宣揚民主的秘密組織更是層出不窮。在中共的殘酷鎮壓下，他們微弱的聲音甚至不被外界所知。但是，他們的努力，是中國民眾長期的、爭取社會民主化運動的一部分。他們是中共改革開放以來，不得不對社會控制實行「讓步」後出現的民主運動的先聲。由於中共實行的是在「革命」、「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名義下的專制復辟，是對中國民主共和革命的反動，因此，從本質上說，當代中國大陸以各種形式出現的愛國民主運動，就是歷史上中華民國護國護法運動的延續。

二、當代中國民主運動的目標與中華民國的民主共和性質相一致

當代中國民主運動，是一場政治運動，也是文化復興運動（關於民主運動的文化復興特性，筆者擬另文闡述），其目的是結束中共的獨裁統治，在中國建立一個保障國民自由和人權，實行民主政治，以法治國的社會制度。中國民主化的目的在於使中國儘快地繁榮富強起來，使中國人都能在民主自由的制度下健康地生活。

辛亥革命後，成立了中華民國。1912 年公佈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是一部民主政體的憲法，其重點是公民權利、議會制度、總統及內閣成員的權限和司法機構的設立。《臨時約法》分爲總綱、人民、參議院、臨時大總統副總統、國務員、法院、附則七章，計 56 條。《臨時約法》第一章（總綱），明確規定，「中華民國由中華人民組織之。」「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第二章（人民）規定了，「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人民有言論、著作、刊行及集會、結社之自由。」「人民有保有財產及營業之自由。」第三章（參議院）中規定，「中華民國之立法權，以參議院行之。」「參議院以第十八條所定各地方選派之參議員組織之。」第四章（臨時大總統副總統）中規定，「臨時大總統副總統由參議院選舉之，以總員四分之三以上出席，得票滿投票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者爲當選。」第六章（法院）中規定，「法院依法律審判民事訴訟及刑事訴訟。」「法官獨立審判，不受上級官廳之干涉。」《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的這些規定，決定了中華民國的民主共和制度性質。

經過多年的戰亂，在衛國戰爭勝利後的 1946 年，《中華民國憲法》公佈。這部憲法，共分：「總綱」、「人民之權利與義務」、「國民大會」、「總統」、「立法」、「行政」、「司法」、「考試」、「監察」、「中央與地方之權限」、「地方制度」、「選舉、罷免、創制、決議」、「基本國策」、「憲法之實行與修改」等 14 章，175 條。《中華民國憲法》第一章（總綱）規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國民大會之決議，不得變更之。」第二章（人民之權利義務）中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人民有集會及結社之自由。」「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法官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不受任何干涉。」《中華民國憲法》保障了人民的各項基本自由權利，並規定國民大會代表由全國選出，國民大會選舉總統副總統。

《中華民國憲法》分權制衡的基本體系，政府官員民選，明確規定人民之權利義務，及「總綱」關於「國體」的陳述，與現代民主憲政思想和民主國家的

憲政體系是一致的，也是中國民主運動人士目前正在爭取在中國大陸實現的目標。

三、當代中國民主運動也是護國護法運動

1949 年，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國家學說建立的。在 1935 年發表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毛澤東說：「那是沒有問題的，人民共和國不代表敵對階級的利益。相反，人民共和國同帝國主義的走狗豪紳買辦階級是處在正相反對的地位，它不把那些成分放在所謂人民之列。」1949 年 6 月 30 日，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說：「人民是什麼？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組成自己的國家，選舉自己的政府，向著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兇們實行專政，實行獨裁，壓迫這些人，祇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中共建政後，又將「人民」定義爲由「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的人」所組成。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四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序言」中規定，「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總綱第三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機構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這裏，中共在「憲法」中明確規定了，中國必須在中共、實際上是中共寡頭政治家的「領導下」（也就是在中共寡頭政治家的「統治下」）；在馬列毛思想指引下，就不能有思想、理論的自由；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就是要由中共「人民」，實際上是「人民」的代表者中共來「獨裁」；實行民主集中制，就是將「民主」作爲花瓶，由中共領導來「集中」，也就是由中共領導來「決定」政府和社會事務。通過分析，我們就明白了，中共爲什麼要那麼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因爲這是中共獨裁統治的「生命線」。中共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了自己在中國大陸的至高無上的「人民無可選擇的」統

治權。這樣，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必然是一個由中共「獨裁」的社會，不可能有普遍的社會公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總綱第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這裏，中共依據馬列主義的國家學說，將社會階層歧視政策明確規定在憲法中。

中共憲法的基本體系同民主憲政的要求是完全不同的。在中共憲法之下，不可能有真正的民權平等，不可能由人民自由選擇自己的民意代表和政府官員，因此，在中共憲政體制內無法進行真正的民主改革。這正是中國大陸民主化無法進行的真正原因。要在中國大陸實現民主、保障民權，必須徹底拋棄中共的「黨憲」，回歸民主憲政制度。

歷史已經證明，中共建立的「人民共和國」，實行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實行獨裁」（毛澤東語），它分裂了國民，分裂了社會，給中國國民帶來了無窮的災難。

一旦中國民主化後，中國必將是全體中國人的國家，中國的民主政府必將是全民的政府。因此，國名中帶階級性的「人民共和國」，就應該恢復為「共和國」。共和國本義即指「國家代表機關和國家元首由選舉產生的國家」。而中華民國，就是中華共和國的意思，中文「民國」更易為普通民眾理解其意，正如孫中山所說「民國是民眾當家作主之國」，也就是中華民國憲法總綱所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

由於中華民國本來就是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的憲政目標同中國民主運動的目的是一致的，所以，中國民主運動如果以恢復中華民國的憲政法統為目標，就是一項順理成章的選擇。我們沒有必要別出心裁。人類的政治社會文化等都是繼承的。我們都是中國文化、中國文明的繼承者，秉承古人優秀文化，創造新的文明，必是智者所為。因此，當代中國民主運動也可以說就是中華民國的護國護法運動，護全體中國人的中華民國，護中華民國的憲政法統。

需要說明的是：

第一，在中國台灣地區，中華民國政府仍然存在，依據憲法，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仍然是代表全中國的政府，雖然目前中華民國政府由主張台獨的民進

黨執政。現在，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和各主要政黨已經失去了「反攻大陸」、將自由民主憲政制度推向大陸的胸懷和膽識，偏於一隅。而且，台北政府正試圖通過違反中華民國憲法和民主法則的修憲、制憲、公投等手段，將代表全中國的中華民國憲法，變為台灣的地方「憲法」。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已經成了中國民主運動護國護法的阻力。依據中華民國法律，主張台獨是違反中華民國憲法和法律的叛亂行爲。

所以，我們要堅決維護中華民國的法統。中華民國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國家，目前中國的分裂狀態是由於國家內戰造成的。我們要在中國大陸推動恢復中華民國法統的活動，以孫中山先生共和民主思想的旗幟號召大家。我們也要在台灣地區維護中華民國的全中國性質。台灣決不是一個國家，台灣祇是中華民國的自由地區，我們要將中華民國的自由民主共和的憲政法統推向全中國。有遠見的中國民運人士，就應該聯合台灣、香港、海內外一切民主人士，實現中國大陸的民主轉型，恢復中華民國憲法在中國大陸地區的法統地位。

第二，一個國家的民主性質，由其民主共和的憲法決定。而判斷一個政府是否民主，在於可能的情況下，這個政府是否願意並且實行民主憲政。護國護法，就是要維護中華民國的民主共和憲政體系，這才是中國九十餘年護國護法運動的實質。

第三，電視劇《走向共和》，簡潔明瞭地解釋了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我黨的三民主義，民族主義就是民有主義，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二人所可獨佔；民權主義就是民治主義，天下者人人皆有治之之責，亦應負治之之責；民生主義就是民享主義，天下既為人人所共有，那天下之利權，亦自當人人所共享。」我們應當體認，三民主義同西方馬克思主義以階級鬥爭理論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從思想體系到哲學基礎都是相對立的。馬列共產主義實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無產階級專政、階級鬥爭，其本質上是反人類、反人性的，而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是現代民主國家賴以存在和健康發展的基礎，它結合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是符合人性和社會協調發展的。三民主義對恢復和發揚中華民族精神，建設民主中國仍然有重要的號召意義和現實意義。

第四，有民運朋友主張中國未來實行「聯邦制」，這涉及到國體問題。中國民運的目標是在中國大陸實行民主制度，是要解決中國的政體問題。這是兩個不同範疇的問題。聯邦制本身並不能保證民主制度。（這裏插一句無關的話題，國家大小本身也與民主制度的建立沒有關係）聯邦制或單一共和制涉及到政府權力的來源問題，也同文化傳統密切相關。這是憲政專家，需要根據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和傳統習慣考慮的問題。這裏筆者祇是提醒諸位，聯邦制和「地區主權獨立」是沒有關係的，聯邦的任何組成地區並沒有自由選擇獨立的權力。在這一點上，聯邦制或單一共和制似乎並沒有差別。單一共和制的地方制度中的省、縣等地方自治體，其管理權限與中央政府各不相同，同樣可以很好地處理好不同地區的特殊情況和利益及地區間的關係。所以，筆者的建議是，中國民主運動還是首先考慮如何在中國大陸實現民主，回歸民主的中華民國憲政為好。

第五，中國大陸民主化後，即使用別的國號，用新憲法，實質上也是同中華民國的憲政法統大同小異的，還是中華民國的繼承和發展。既然如此，為什麼不用這個簡便而具體的方案——沿用中華民國的國號和憲法呢？這樣，「既簡單，又明確」（王炳章語）。而且，一旦中國大陸非共化後，中國現代史的真實現象將會展現在國人面前，中華民國國號本身都將具有巨大的號召力和凝聚力。如果大家都根據自己的偏好，設計出許多不同名字的「政府」、「憲法」，要取得國人的認同，則要困難的多。所以，沿用中華民國的國號和法統，是中國民主化最方便的捷徑。當然，結束中共獨裁統治後，關於國號、憲法這些問題，必須由中國人民和他們的代表來決定。

第六，依據中華民國憲法，中華民國是保障國民人權自由的民主共和國家，在中華民國的憲政法統內，共產黨人也有信仰共產主義的自由，也有參政議政、擔任國家和社會職務的權利，所以，共產黨人盡可放心，決沒有所謂「反攻倒算」。所不同的僅僅是，將共產黨官僚集團所獨佔的國家權力，變為全體國民所有，由全民選擇和監督國家的管理者。

四、中華民國護國護法運動的一點經驗教訓

回顧中國民主運動百年的歷程和中華民國九十年護國護法運動，對今後中國民主運動的發展，必將有很好的啓示作用。

一個極重要的經驗教訓也須是，在法律上詳細規定人民的自由民主權利當然重要，但是，建立健全一個易於操作、責權分明、相互制衡的分權體系和地方自治制度更為重要。要注重建立民主政治體制，要相信制度而不是相信人。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在國家最高層面，共和的制度比民主本身要重要的多。祇有把各方人士的政治活動都納入民主與法治的軌道，讓制度管著這些人的手腳，民主共和制度才有可能鞏固。法律，尤其是憲法，是協調人們的工具，而不是貫徹意志的手段。中華民國歷史上的多次「毀法」、「復辟」，都是從破壞分權制衡體系開始，直到中共在憲法中明確規定中國必須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也就是各種權力機構都必須接受中共，實際上是中共最高層小集團和個人的「統治」，從而徹底否定了權力必須限制和相互制衡的民主憲政原則。

在國家層面，健全民主共和制度的另一個意義是，即使是多數人的意志（如在議會多數贊成），如果違法，也不能實行。國家憲法不應輕易修改和變動。否則，在一個沒有民主共和傳統的國家，很容易將民主共和制推到名存實亡的境地。

「人民的意志」，也必須在憲政和法律下體現，並且要合乎民主程序，這既可防止暴民政治，又可以限制「人民意志」的盲從。人民，有時是很幼稚的，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地區推翻中華民國政府，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利用了共產主義的邪惡潮流中，人民的盲從和對人類自身的無知（當然，中共在大陸的「勝利」，還有許多也許是更重要的原因）。「人民意志」的盲從和幼稚的另一個例子是希特勒時代的德國。

所以，中國民主運動者們，當「我們多數人怎麼說就可以怎麼做」的一天到來的時候，首要的事情是，定好嚴格具體的政治遊戲規則，而且要讓不遵守遊戲規則的人「玩」不下去。

另一個啓示是，從社會意義上來說，由專制制度進入健全的民主制度，或許不可能一蹴而就，期間經歷多次「復辟」、「毀法」的反復，也就是很自然的了。另外，使民主成為人們的生活方式，也需要有一

個過程。在民主共和制度建立初期，面對強大的復辟勢力，特別是在有外部勢力干涉、顛覆的情況下，共和政府不可能表現得像制度健全的民主國家在和平時期那樣「民主」，否則新生的民主共和制度也許無法生存。這也許就是所謂「訓政」的意義了。這個時期共和政府的「訓政」政策，表現在為了維護民主共和制度，而採取的一些「非常」措施。這同專制統治者一切從維護專制制度出發的「獨裁統治」是完全不同的。

五、當前中國民主運動護國護法的迫切性和歷史任務

正是中共在蘇俄的操控下，利用抗日戰爭期間的混亂局面，假抗日、真擴張，才得以發展壯大，並在其後的內戰中打敗因抗日戰爭已經精疲力竭的中華民國政府軍，正在艱難推進中的中國民主進程和中華民國護國護法運動因而在中華民國大陸地區中斷。然而，如前所述，人們對共產主義理論宣傳的所謂未來美好生活 and 人類光明前途的盲從，也是中共得以佔據大陸的原因之一。另外一個原因是，在社會混亂尤其是戰爭環境下，民主制度有時確實沒有專政制度那麼有效，這在調動社會資源進行戰爭的情況下尤為明顯。這從另一個方面，反證了中華民國政府決不像有些人至今仍然認為的那樣「專制」。

所以，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們，這些挾洋教以亂中華的形形色色的左傾份子，才是百年來中國遲遲沒有完成民主化的禍首。如果沒有他們以及人們的盲從，中國建立健全民主共和制度，將比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更為平和和順利。現在，已失去信仰的中共官僚們，正在利用馬克思主義作為維護其獨裁專制統治和特權階層利益的工具。中共特權階層利益集團是現在中國民主化的巨大障礙。

在這裏，我們還要認清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的反人類性。馬克思主義以分裂人類的階級鬥爭學說否定人類社會的一般性，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核心之一，也是共產主義理論的核心，是近一個世紀以來給人類帶來無群災難、赤禍滿天的重要原因。作為一個民主主義者，我們必須徹底拋棄它，要徹底回歸民主主義，回歸自然的人性論。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馬克思主義的學說包括其國家學說是對人類文明的顛覆。

徹底拋棄馬克思主義，回歸中華傳統文明，借鑑人類的主流文化，是中國民主化的一項重要任務。

在民主化的道路上，中國已經失去很多時間和機會。現在是中國民主化的又一次極好機會。中國大陸社會矛盾已經激化到了非經民主化不可解決的時候。而回歸中華民國的憲政法統，如前所述，是中國民主化的最好途徑。

如果，台灣朝野各政黨一致高舉中華民國的自由民主旗幟，堅持民主統一，團結大陸、香港、海內外一切民主反對力量，形成爭取中國自由民主前途的總戰線，對大陸中共將形成巨大的壓力。在大陸人民已經拋棄共產主義思想的今天，中共將沒有任何道義力量來感召人民，這將大大增強中國民主力量陣營，最終加速大陸的民主化，加速中華民國護國護法運動在全中國的最後勝利。這對於每一個大陸人和台灣人來說，都將是最好的結果，尤其對於已經初步實現民主的台灣，將大大增強其在全中國事物中的地位和作用。

遺憾的是，台北的民進黨政府，把台灣獨立作為一切工作的首要目標。他們配合中共打擊認同中華民國憲政、維護中華民國法統的愛國民主運動人士。他們破壞中國民眾的整體利益，無理由地攻擊中國的歷史，攻擊中國的文化，攻擊漢人，攻擊任何可以使中國人具有自尊的東西，台獨極大地瓦解和削弱了中國民主運動的總戰線，台獨已經成為中國大陸民主化進程中的巨大阻力之一。

必須指出，推進中國民主化，維護中華民國的憲政法統，將中華民國民主共和制度推向大陸，完成中國民主革命的任務，進而實現中國的民主統一，是全體中華兒女的歷史責任。在中國愛國民主人士的不斷努力下，結束中共的一黨獨裁統治，建設民主中國的一天，也許很快就要到來了。

參考文獻:

- 1, 《檀香山興中會章程》 1894, 11, 24
- 2, 《興中會宣言》, 1895, 1, 24
- 3, 《中國同盟會總章》, 1905, 8, 20
- 4, 鄒容:《革命軍》, 1903年
- 5, 辛灝年:《誰是新中國》, 美國藍天出版社, 1999
- 6, 王炳章:《重建中華民國》, 《黃花崗》第二期

無法告別的革命

曉

黑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有些人從崇拜革命到害怕起革命來，仿佛革命就是粗魯的，殘酷的，改良就一定是科學的文明的有助於社會穩定的。讀李澤厚與劉再復的對話錄《告別革命》，光是標題就令人感到困惑。李澤厚並不是發動了一場革命的革命家，也不是倡導了一輩子革命的宣傳家，何以突然要告別革命？（這話如果由格瓦拉來宣佈更有資格）是他自己要告別，還是勸別人告別？革命並不是他一個人的事，他有什麼資格要別的人告別革命呢？在《近代思想史論》中，李先生還循著老例指出康梁的保守性，現在卻又與時俱進地肯定康有為的價值了。在這本可稱為「思痛錄」的書中，曾經「咸與維新」結果吃了趙家一棒的李澤厚還反思出一個生存和吃飯哲學。人活著，當然要吃飯，但人活著不是為了吃飯，這個簡單的道理是「雷鋒」說的，並不需要哲學家來論證，如果一定要提到哲學高度，那麼其暗含的意思大致是除了吃飯生存，人最好少想點其他的，更不要侈談什麼革命，按照康有為的設想，中國人民總有一天可以拖著辮子走進大同極樂世界的嘛。如果吃飯就是李澤厚「告別革命」後的理想，那真是返樸歸真得像阿 Q 抱著蘿蔔回了土穀祠。但是李澤厚忘了，以為自己已經告別了革命的阿 Q 卻告別不了反革命，最後還是被捉去殺了。究其根源，這叫「不許革命」，主動權在人家手裏，你還自我安慰，覺得是自己祇要揮一揮衣袖就可以告別的了。

今日的上灘有一個一向主張由權威領袖統治中國的權威癖歷史教授蕭功秦，尤其嚴肅的呼籲，要警惕革命性的變革。表面上看來，中國的教授們越來越「人性化」了，擔心革命會帶來社會的動蕩，好像很

會為我們的大眾蒼生考慮，深怕中國人發生想做奴隸都做不得的悲哀，憂國憂民之心可鑑。實際上，他們故意將革命等同於動蕩，抹殺了革命的進步實質。而這蕭功秦一邊警惕革命，說孫中山太「浪漫」，一邊公開為袁世凱歌功頌德，這讓人恍然大悟：原來警惕革命的目的，未必是為了社會的穩定，而是在替袁世凱們獻計獻策，要穩定的是奴隸主們的位置。奇怪的是，蕭教授對於防止發生革命充滿警惕性，卻偏偏不去警惕袁世凱簽定二十一條，不警惕袁世凱的出賣，暗殺，鎮壓，復辟，一心想在不「浪漫」的「新權威」的旗幟下將「新中國」帶入蕭教授所期望的「現代化。」蕭功秦教授還把韓國的朴正熙也供奉為新權威主義的偶像，卻不提韓國的民主浪潮如何一次次以勇氣和鮮血衝擊專制，並帶來真正的社會進步。他似乎也忘了，袁世凱和朴正熙一個憂懼而死，一個被刺身亡，做這用命換來的新權威，誰願意？

毛澤東說過，革命不是繡花做文章，革命是暴烈的行動，主要強調其暴力的一面；列寧說，革命是被壓迫階級的狂歡節，符合其娛樂性的形式一面。儘管革命常常帶有暴力內涵，革命的本意，卻絕不僅僅是在暴力中狂歡，這樣的定義，無疑也是對革命的歪曲。在不列顛百科全書中，革命（revolution）一詞指的是「既有制度的根本的，快速的，不可逆轉的改變」（Fundamental, rapid, and often irreversible change in the established order）如法國大革命，辛亥革命，不似在中國，祇要農民造反狂歡，就稱為革命。不具備根本變革內涵的，英文中祇能叫反叛（rebellion）。因此，英文的中國史著作中，將洪秀全們和義和拳們的活動，一概叫做 rebellion。從這一定義看，革命不一定意味著暴力，而暴力也不一定就是革命，但革命一定意味著對一個違背人性的舊制度的根本的制度重構。和平地改變政權的性質，如捷克不流血的天鵝絨革命終結了共產黨的統治，無疑就是一場偉大的政治和社會革命。這樣看來，中國歷史上不過是一哄而起的反叛太多，貨真價實的革命並不是太多，其實是太少。

美國的政治學者對革命的起源有不同的見解，有的人強調社會基礎，有的關注革命者的心理驅動和意識形態，有的則注重政權本身的適應能力。例如，Theda Skocpol 認為，現代革命是否發生，並不是革命

家進行有意識煽動的結果，而是舊政權軍事和行政自行崩潰與國際環境綜合作用帶來的。不論從何種意義上，革命都將是客觀存在的。當某種專制制度已經衰朽，而又實在無法自我更新的時候，終究會出現一場民主革命，以除舊布新。日本啓蒙思想家福澤諭吉並不是革命者，但他在 1870 年代的《文明論概略》一書中論及中國時就已經提到，滿清不滅亡，再來一百個李鴻章也無濟於事。這是一個清醒的旁觀者對一個不可救藥的政權的道德判決和對大革命的預言，可是一百多年後的中國學者還在嘖嘖咕咕：假如就按康有為那樣改良下去……好像剝奪了康有為改良機會，而且到處追殺他的不是清王朝，倒是革命派。是啊，中國人為什麼不再早點「告別革命？」假如還有半口剩飯吃，那就在西太后的領導下這樣變革下去，或者就緊密團結在袁世凱的周圍那樣改良下去，直到他們毫不浪漫的屠刀落下來。

變革和革命是在發展中相互交織的，並沒有絕對的模式。和平的發展會為革命性的變革準備物質和心理條件，但未必能替代一次根本的劇烈改變。今天，中國革命的終極目的……是建立一個民主的，享有充分民權的現代社會——並沒有實現，也就是說，革命尚未真正成功，何來告別一說？當數以千萬計的人命連革命的力氣都沒有就被活活餓死，數以千計的人連革命的念頭都不敢有就被掃射而死時，不見教授們呼籲告別這暴虐，警惕這殘忍，卻面對著偷生的幸存者宣佈從今以後告別革命。這是什麼邏輯和理論？當專制的牢籠套在每一個人的頭上，站起來反抗專制的，是每一個身受其害的人，這種反抗的力量深深地蘊藏在民眾中間，而同時，專制也同樣地腐蝕和戕害著政權本身，減弱政權化解局部危機的能力，促使它在全面危機中自行崩潰。革命基本上來源於這兩種力量。蘇聯勃列日涅夫時代的社會經濟也曾經進步，也曾經有一點一滴改良的可能，終究是積重難返，擋不住崩潰的大潮。革命的發生與否，絕不是幾個勸大家回家吃吃飯或夢想權威賜與穩定的學者說了算，也不是他們一廂情願告別得了的。最終，李澤厚們恐怕告別不了革命，革命倒一定會告別李澤厚的。



金融風暴負擔轉嫁

——朱熔基政策的敗筆之二

曾仁全（大陸）

朱熔基在上海自責時坦言說：近七、八年來，金融狀況一直處於崩潰的危機，是給內部官僚侵吞掉，給內部官僚與外界勾結詐騙掉了。金融系統不良資產中有三分之一是被人為有意識犯罪侵吞、詐騙、造假、收賄、外流了。上海市是重災區。有的領導幹部負有瀆職過失責任，有的領導幹部涉及經濟犯罪活動。

然而，這些祇是問題的一方面，七、八年來，中國的金融市場從東南亞的金融風暴到人民幣不貶值，從所謂的經濟「軟著陸」到今天要求人民幣升值，無不顯示出種種病態，而朱熔基當時的金融政策則是這個千孔百瘡的制度的病源體。他個人不遺餘力地保護了泡沫經濟的破滅。

九十年代末，由泰國貨幣泰銖貶值的壓力而引發的東南亞金融風暴席捲全球，中國承諾了人民幣「不貶值」的巨大風險，而且「平穩地」度過了風險，這似乎是一大奇蹟，現在回過頭來看，這個「不貶值」的金融政策是犧牲了千百萬工人、農民的利益而換取的。

當時，中國無論是外匯儲備，還是外債規模、實際利用外資金額，中國都居世界前列，外國債權人如果伸手要債，已將資金早就用的不知去向的官員們祇能乾瞪眼了，同時，中國的金融市場存在著巨大的系統性風險。第一，獨資商業銀行的呆帳、壞帳等不良資金數千億元，儲戶存款佔相當大一部份在借貸中成了借貸出去的死帳，第二，負債資產是個沈重的十字架，在泡沫經濟的漩渦裏滾動，在泰國銖、馬元、菲律賓比索和印尼盾相繼貶值的同時，朱熔基的政策做出了鋌而走險的舉措：人民幣不貶值！

「不貶值」的直接後果是產品出口一路下滑，外資財團老闆將資金抽走。農民是最直接的受害者。九七年下半年開始，市場上大量農副產品積壓和價格下跌，農民種植的糧食、棉花價格在九六年的基礎上下跌了大約二十五個百分點，牲豬、禽類、淡水養魚下

跌了三十個以上的百分點，產 500 克稻穀要 0、5 元的成本，而銷售價達到最低點的 0、43 元（一瓶 500 克的礦泉水 1、5 元，祇有礦泉水一半的價格），產 500 克小麥成本 0、6 元，銷售價祇有 0、55 元；勞動力不算，僅投入的化肥、農藥及苛捐雜稅就高於商品的產價。到處積壓的農副產品不僅阻撓了外銷，也影響了內銷，工人、農民收成不景氣，內需銳減。千百萬的農民收入都是入不敷出。部份農場主高息借貸資金，而糧食價格逐漸下跌，虧損的血本無歸。

受損失最大的是養殖業專業戶，中原平原、華東、華南一帶受地方政府鼓勵養殖甲魚、螃蟹等專業戶更是悲慘的命運，產品從產地到出口一路受阻，價格一步一步狂跌，甲魚從原來的每公斤八百多元的高價下跌到每公斤八十多元，到了九九年下跌到每公斤四十多元，螃蟹從原來的每公斤二百多元下跌到每公斤四十多元，收入僅是投入的一個零頭，他們「望水興嘆」，無力回天，這些養殖戶多數是高息借貸，虧損的傾家蕩產，有的被債務所迫而自殺的事件層出不窮。一些人昨天還是腰纏萬貫的富翁，一夜之間就成了一無所有的窮光蛋。

農民承受了價格下跌的壓力，鄉鎮企業和工人更是承受了巨大的壓力。由廉價勞動力生產的化纖、輕紡產品、手工藝品出品滯銷，價格不斷下跌，加上銀行借貸受到控制，小型企業很難貸到款，大多數鄉鎮企業被迫關閉，據中國《鄉鎮企業報》二 000 年底報道，僅兩三年時間裏，中國鄉鎮企業佔百分之六十的關閉，佔百分之九十五的存在著三角債。

企業形勢不景氣，工人更是最直接的受害者，企業老闆祇有在克扣工人工資上大做文章，從沿海城市到內地工廠，普遍存在著降低工人工資的現象，有的甚至不給工錢，一些背井離鄉的打工仔、打工妹辛苦的工作一年後拿不到工錢空空而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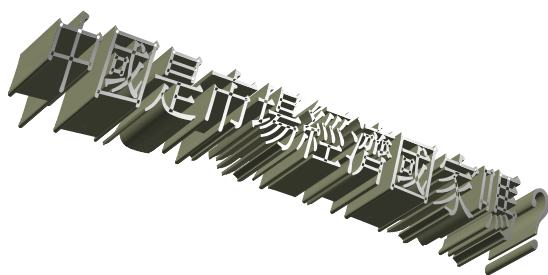
朱熔基的金融政策向世界承諾人民幣「不貶值」，實際上是農民拿錢為國家堵了金融風暴的漏子，是犧牲工人的利益擋住了金融風險的缺口，從九七年到二 00 一年，當權者將經濟負擔通過所謂地「軟著陸」的方法一步一步地轉嫁到工人、農民頭上了。

負擔的轉嫁是多環節多層次的，負擔轉嫁後，牢牢掌握著流動資金的少數大財團和有錢的暴發戶漁翁得利，廉價的產品成了他們進一步發財的渠道。今天

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則是無數的農民、工人損失的利益換來的。

朱熔基在就任時曾信誓旦旦地說：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將義無反顧地跳下去（大意）。實際上他不敢、也不可能跳下去，他的金融政策逼迫無數的工人、農民跳了下去。

2004 年 2 月 3 日於廣州



（大陸） 連 晨

中國是不是市場經濟國家，先要從什麼是市場經濟談起。經濟學家對什麼是市場經濟，一定有一套系統的、科學的說法。我不是經濟學家，也沒有啃過專業的經濟學著作，但由於中國多年來一直在「倡導」市場經濟，且逐漸在向市場經濟「轉軌」，長期的耳濡目染，包括親身經歷的一些事情，使我對市場經濟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下面我就講講我對市場經濟的一點粗淺認識。

一，所謂市場經濟，我認為它首先是指「交易自主，交易自由」的經濟。也就是說，人的交易行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完全出自個人的「自願」，不受任何人或任何組織的「強迫」。人的交易行為為什麼不受任何人或任何組織的「強迫」？主張市場經濟的人認為，每個人都是他自身利益的最優裁判者，一個人對於他本人的需要——他多餘什麼、缺少什麼，他想用哪些自己之「多餘」換取自己之「缺少」，再沒有比他本人更清楚的了。其實我認為這倒不是問題的關鍵。問題的關鍵在於：人是有尊嚴要求的一種生命形態，對事關自身利益的事，「自主」恰是每個生命感覺做人尊嚴的方式，也是人成其為人的內在要件。市場經濟主張「交易自主，交易自由」，正是把人當

做有尊嚴的生命看待的一種體現。在人與人的交易過程中，在任何進行交易的場合，有沒有「強迫」，是衡量市場經濟的一個標準。

二，市場經濟同時必須是「規則經濟」。也就是說，人的交易行為雖然完全是自主的，自願的，是不受任何人或任何組織「強迫」的，但在具體的交易過程中，每個人則需遵守一定的規則，要受一些規章、制度的約束。現實中，就像許多中國人把自由理解為「為所欲為」一樣，也有許多人把「市場經濟」理解為不受任何約束和限制，可以隨心所欲，甚至可以動用坑蒙拐騙欺詐造假等手段進行交易的「自由經濟」，這種理解顯然與真正的市場經濟是格格不入的。市場經濟的運行必須要有一整套嚴格的規則加以規範，這套規則是要求全社會共同遵守的，無論是個人還是企業，無論是政黨還是政府都不能例外。有沒有完善的市場經濟規則，這些規則在現實經濟活動中是不是被嚴格遵守，尤其是它是否得到了執政黨和各級政府的信守和尊重，是衡量市場經濟的另一個標準。

三，市場經濟必須貫徹平等交易的原則。所謂平等交易，其含義我認為有二：一是指交易的當事人沒有社會地位的差別，在市場上無論是買或者賣，身份都是平等的，沒有高低貴賤之分，買一元錢的東西與買一萬元錢的東西，都會受到同樣的尊重，賣針頭線腦與賣珍珠瑪瑙，都會受到同樣的保護；二是指在市場交易過程中，交易雙方必須遵循自願、誠信的原則，任何人不得利用強制手段或欺詐手段變相掠奪他人的財物。這既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要求，也是市場交易的一條不可或缺的「規矩」。市場交易過程中，各方交易者是否懷抱平等待人的精神，是考察市場經濟是否真正“自由經濟”的一個極重要標準。

四，市場經濟還必須體現「公平交易」的原則。說到「公平交易」，具體內容因交易品種交易對象的不同各有側重，但大致應該包括下面一些要素：1，消費者享有充分的知情權，商家要做到童叟無欺。2，合理的價格定位，商品或服務應物有所值。3，正確的計量，不缺斤少兩，不短尺少寸。4，可靠的質量保障，不以次充好，不假冒名優，並確保商品（或服務）的安全。5，平等的起點，市場准入不能厚此薄彼，經營範圍不能無理強行限定。6，相同的權利和義

務，政府不能把企業或個人分為親娘養的和後娘養的、分為需要特別保護的和完全不加保護的兩類，分別實行兩種不同的「政策」。公平交易作為市場交易的基本原則，是衡量市場交易活動是否有序、是否規範的試金石。

五，市場經濟同時是一種「信用經濟」。「信用」是人與人進行公平交易的前提，是市場經濟賴以存在，賴以健康發展的基礎。試想一下，人們在市場上進行交易活動，如果張三的物品質次價虛，李四用的是黑心稱，王五呢，乾脆賣的就是假冒偽劣；或者，張三拿了李四的貨不給錢，李四反過來又去騙王五，王五被騙後，找誰誰都不管，為了「挽回無端的損失」，王五又到處尋找「獵物」，結果是你騙我我騙你，交易中人人設防人人提心吊膽，誰也不敢輕易相信別人了，這樣的「市場」，這樣的「交易」將是怎樣可怕的一種局面？所以市場經濟社會，「信用」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那麼，「信用」從何而來？從世界上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看，除了政府監管，個人及企業嚴格自律，各種法律法規約束外，一個十分有效的方法是，在全社會建立社會信用制度。所謂社會信用制度，簡單地講就是，無論一個人還是一個企業，在社會經濟生活中有失信、欺詐、違反交易規則等諸種行為的，一旦被發現後，其行為將被一個專門的機構記錄在案，這一記錄通過覆蓋全社會的計算機網絡，在全國各地都能很方便地查到。當一個人的個人信用記錄中屢屢出現不良信用記錄時，他的許多社會經濟行為將會受到限制，比如貸款和信用消費；另外，與他打交道的人或企業，由於很容易就能在第一時間瞭解到他以往的信用情況，從而可以迅速做出決斷，是與他繼續交往，還是立即終止合作。這樣一種制度設置，使講信用的人在經濟生活中、在社會上的「路」越走越寬，使不講信用的人，在社會上的「路」越走越窄。中國人愛講「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其實祇有在一個建立了嚴格的社會信用制度的社會，這句話才能真正顯示出它的威力。有沒有完善的社會信用制度，是衡量市場經濟的又一個標準。

六，市場經濟最終必須表現為「法治經濟」。「交易自主，交易自願」，交易不受「強迫」，但有人偏偏要強迫你怎麼辦？交易要遵守一定的規則，交

易要講誠信，但有人不遵守規則，不講誠信怎麼辦？在非市場經濟國家，這些問題相當普遍地存在，但又找不出什麼有效的辦法加以根除或遏制，大多數情況下，人們聽之任之，太過分的事，人們就去找當地的行政長官——鄉長、縣長或市長，求這些「長」來「為民做主」或「伸張正義」。但是如果違規、失信的是政府或是政府官員，人們大多祇有徒歎奈何的份了。然而在市場經濟國家，就不存在這樣的事。第一，市場經濟國家有完備的市場交易規則和維護這些規則的法律，有人不按規則辦事，有人強買強賣，有人在交易中搞欺詐，沒關係，一紙訴狀把他請到法院就行了，市場經濟國家法院的「管轄範圍」異常寬泛，法院自會根據相關法律，對違反規則的人給以制裁，這種制裁往往相當嚴厲，足以讓違規者產生得不償失之感，足以讓失信者有「割肉」之痛。所以在市場經濟國家，有人不遵守交易規則，不講誠信，完全無須勞行政長官的「大駕」，法院及各類監管部門就能把這些問題處理好。第二，由於市場經濟國家的法律不像我們的法律缺乏統一性，對上是一副面孔，對下是另一副面孔，對有錢人是一副面孔，對無錢人又是一副面孔；同時法院也完全獨立於政府之外，不僅不受政府操控，在政府違法時，它還可以依據法律，糾正政府的違法行為，所以政府帶頭破壞市場規則、擾亂市場秩序的情況極為罕見，即使有，也能及時地被糾正或制止。另一方面，市場經濟國家的政府均由民選產生，違反社會共同規則的事，違背民意的事，政府是不敢輕舉妄為的。嚴格的法治，是市場經濟正常運行的保護神。所以市場經濟又被稱作「法治經濟」。有沒有法治，是衡量市場經濟的又一個標準。

市場經濟當然還有許多標準，但在我看來，具備了以上這幾個「要件」，庶幾可稱為市場經濟了。

前一陣子有幾個東南亞國家宣佈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很有一些國人為此而興高采烈。但後來又傳來消息，說歐盟公佈的「初評結果」拒絕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美國也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持保留態度，很多國人因此又憤憤不平起來。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國家，自然有它們衡量這一「地位」的標準，不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國家，自然也有它們拒絕承認的依據。但我總感覺，一個國家搞的是不是市場經濟，不應該是一個見仁見智莫衷一是的問

題，它應該有一些具體的被大多數市場化國家認可的「要件」。歐盟委員會對外貿易委員拉米最近在接受中國《青年參考》記者專訪時就說：「歐盟在對中國市場經濟狀況的技術分析中，要考察的一些因素有：國有行業的規模、國家行政手段介入市場的狀況等等。這裏面最重要的問題是，歐盟要審查在金融信貸及保險領域中受國家干預的程度。另外，歐盟還要審查中國是否謹遵產品成本和價格由市場決定的規則，祇有滿足了上述條件，歐盟才能令人信服地向各成員國表態：好了，中國應該獲得市場經濟地位。」

寫到這裏，我想起國外的一個諺語：如果一個動物它長的像一隻鴨子，走起路來也像一隻鴨子，叫的聲音也像一隻鴨子，那麼它就是隻鴨子。這個諺語反過來說，是不是應該這樣：如果一個動物它長的不像鴨子，走起路來也不像鴨子，叫的聲音也不像鴨子，那麼它就不是鴨子。

好了，囉索了半天，其實是一個經濟學外行的胡言亂語，中國是不是市場經濟國家，明眼人都清楚。但就像強盜不會承認自己是強盜，騙子不會承認自己是騙子一樣，中共當局搞的非驢非馬經濟（有人稱其為權貴資本主義），也需要一件漂亮的外衣，「市場經濟」正是中共當局為了掩蓋自己「黨天下」實質——政治上黨專制、經濟上瘋狂掠奪民脂民膏——所穿的一件漂亮的外衣。不過這件外衣雖然可以迷惑世人於一時，卻不能欺騙天下以久遠。假的就是假的，偽裝應當剝去。

觀看曇花勁放有感

沈源

數載孕育一夕放，
百年運動待商量。
城頭舞旗幾許新？
葫蘆中酒臭與香。
“國情特殊”難求變，
“與時俱進”萬年長。



中國共產黨

是蘇俄製造的侵華工具

艾華民

中國共產黨成立已經八十多年了。經過這八十多年的歲月，人們已經有充分證據，可以說明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和面貌。

中國共產黨不是中國土生土長的政黨，而是由蘇俄培植成立起來的政黨。這個政黨與蘇俄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所以，祇有從中共與蘇俄的密切關係入手，才有可能認清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和面貌。

概括起來：中國共產黨是蘇俄扶植成立的侵華工具；是全心全意為蘇俄服務的政黨；是大量出賣中國領土和主權的政黨；是一個毀國害民的黨。毛澤東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實際上是不僅送來了馬克思主義，還送來了共產黨。

俄國的十月革命，並不是如同俄共所吹噓的，是甚麼「無產階級革命」。實質上祇不過是一種改朝換代；是由舊沙皇換成新沙皇。外表換了新裝，內裏仍然是封建專制制度。列寧也根本算不上是甚麼無產階級革命領袖。

列寧像馬克思一樣都是偽君子、假道學。

馬克思批判資產階級是甚麼「溫情脈脈的面紗」，他自己卻偷偷與保姆通姦。養下私生子，既不敢認，又不敢丟。這是甚麼感情？列寧在法國巴黎闖蕩江湖，混了很長時間，常去三流妓院玩女人，得了一身花柳病。二十年後，潛伏的病菌發作，擴散到腦部，成了植物人，最後不治而死，祇活了五十四歲。

就是這樣的一位列寧，他在十月革命前後，就在策劃著如何征服世界。

一、一九一九年六月，他拋出一本「帝國主義論」，即《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這是一本既為過去沙俄對外侵略進行解脫，又為蘇聯以後

對外擴張進行掩蓋的著作。按列寧所說，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階段，才是帝國主義；沙皇時期尚是農奴社會，不是資本主義，因此沙皇時期的俄羅斯就不是帝國主義。沙皇時期的對外侵略和擴張，就不是帝國主義行爲。而新成立的

蘇俄是「社會主義」，自然也就說不上是帝國主義。因此，蘇聯如何對外擴張，都不是帝國主義侵略；而是「解放」，是「挽救人類」。正是這樣，蘇俄打著「社會主義」招牌，明目張膽，大搖大擺，闖進許多國家。所以，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在實質上是蘇俄社會帝國主義對外擴張的理論工具，是替蘇俄對外擴張服務的。

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另一個用意，就是把被壓迫、被侵略國家求解放的鬥爭目標，一股腦都引向他所說的「帝國主義」，即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美國資本主義最發達，因此，就特別把反對的目標指向「美帝國主義」；把「美帝」列為頭號敵人，煽動反美情緒。

按列寧的理論，是不是反帝、反美帝，是測驗一國共產黨是否真正馬列主義黨的試金石。不論美國是否侵略自己國家，凡是一提美國，就必須反。

實際上，單以中國來說，美國是侵略中國最少的國家，長期以來，是主張維護中國領土和主權完整的國家，是願與中國友好的國家。從中國切身利益來說，中國沒有理由與美國為敵。真正侵略中國最多、最大的，恰恰不是「美帝」，而是「俄帝」，是「蘇帝」。

列寧「帝國主義論」的作用，就是引導各國共產黨把鬥爭目標指向「美帝」，而讓「俄帝」、「蘇帝」順順當當進行侵略。

蘇俄成立不久就向歐洲擴張，攻打波蘭，遭到慘敗，碰了壁。一九二三年三月，列寧拋出一篇《寧可少些，但要好些》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列寧明確指出：「鬥爭的結局歸根到底取決於這一點：俄國、印度、中國等等構成世界人口的大多數。」（大陸出

版《列寧選集》第四卷，第 710 頁）。列寧很快把蘇俄侵略、擴張的矛頭指向東方的中國和印度。

二、列寧的上述言論和著作，是他對外擴張的輿論攻勢。在他製造輿論的同時，還積極對中國進行政治攻勢。

1918 年 7 月 4 日，蘇俄外交部長齊采林（C.V.CHICHERIN），在蘇維埃第五次會議中說：「蘇俄政府將對中國撤銷沙皇政府對中國東北的各種壓迫，及其在中國和蒙古的治外法權，放棄沙皇政府以各種口實對中國人民所加的負擔，撤回沙皇政府對於駐在中國的領事館所設的武裝部隊，並將中國的各種賠款中的對俄國賠款部分交還中國。」

1919 年 7 月 25 日，列寧為討好中國，又令蘇俄代理外交部長加拉罕發表對華宣言。宣言說：「凡從前俄羅斯帝國政府時代，在中國滿洲以及別處用侵略手段而取得的土地，一律放棄，在那塊土地上的人民，願意建成哪樣的國，採取哪樣的政體，一任人民的自由選擇，勞農政府把中東鐵路以及礦產林業等權利，及其他由俄羅斯帝國政府、克倫斯基政府、土匪霍爾瓦特、謝米諾夫和俄國軍人律師資本家所取得的特權，都返回給中國，不受何種報酬，勞農政府並拋棄庚子賠款以及租借地等。」（引自鄭學稼《中共興亡史》第一卷，第 476 頁）

1920 年 9 月 29 日，加拉罕又發表第二次宣言。宣言說：「為了發展前次宣言的原則」，「俄國勞農政府宣明所有昔日俄國各前政府與中國所定各條約為無效。放棄中國領土之侵佔及在中國境內各租界，並將以前俄國帝國政府及中級社會人士所掠奪者，俱以無報酬永久還付中國。」（引自同上書第 623 頁）



以上齊采林的報告和加拉罕的兩次宣言，雖然是虛晃一招，但是還很靈，在當時中國的學界和政界，都引起了很大影響。一部分人認為蘇俄確與沙俄不同。認為蘇俄大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勢。一些人遂對蘇俄仰望、羨慕、讚美不已。這都為俄羅斯在中國成立共產黨做了有力的準備。

三、加緊策劃在中國成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不是偶然的，不是由十幾個人一下子就成立起來的。而是在中共成立之前，蘇俄進行了一系列準備工作。

1919 年 3 月 2 日至 6 日，列寧在莫斯科召開了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

在這個會議上，成立了「共產國際」，也稱第三國際。這個組織被定為世界各國共產黨的聯合組織。同時也是世界各國共產黨的上級領導組織，對各國共產黨實行高度統一的領導。各國共產黨是它的下級組織。

第三國際組織法的第一條規定：「此新國際勞動者聯合會之成立，所以組織各國無產者之共同行動，其目的則在推翻資本主義，設立無產階級專政，並組織國際的蘇維埃共和國，以掃除階級而實現社會主義，此為共產社會之第一步。」

第二條規定：「凡屬於共產國際之黨，應名曰某國共產黨，為共產國際之一部。」

（楊幼炯著：《中國政黨史》第 219 頁）

這個第三國際，實際上是蘇俄對外擴張的指揮機關。它居於各國共產黨之上，對各國共產黨有指揮權。各國共產黨是它的下級組織，要按它的命令行事。它要幹啥，就得幹啥。

1928 年 8 月 29 日，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通過國際章程規定：各國共產黨參加共產國際的首要條

件，就是要接收共產國際的領導。這是共產國際的紀律，非常嚴格。如果不遵守共產國際的紀律，被共產國際開除，那就是極大的處分。後來的南斯拉夫被定為是修正主義，就被開除共產國際。

這個共產國際是以列寧主義為最高行動綱領。列寧主義為各國共產黨的「聖經」。列寧死後，史達林的訓示又接著成為各國共產黨必須遵守的聖旨。

在第三國際的統治下，俄共黨史、俄共組織形態、鬥爭策略，都成為各國奉行的典範。中共一直把《聯共（布）黨史》作為經典，規定為幹部必讀書；在奪得大陸政權後，還把它列為高等學校公共必修課，所有的大學生都必須要學習。不知浪費了青年多少大好的時光！

1919年，俄共（布）在鄂木斯克秘密舉行第二次西伯利亞代表會議，決定成立一個秘密的特務組織，即《俄共（布）西伯利亞區委情報宣傳局》。這個情報宣傳局的任務是為「建立和加強同東方及美國共產主義組織的聯繫」，實際上就是為了對東方各國進行滲透和尋找代理人。

1919年6月，俄共（布）在西伯利亞區委的加蓬，向俄共（布）中央建議，在俄共（布）西伯利亞成立東方局，也叫〈東方民族部〉，專門負責與東方各國的「革命」力量進行聯繫，幫助東方國家成立共產黨。華裔俄共黨員楊明齊被搜羅，參加設在海參威的俄共（布）遠東地區委員會的工作。

1919年11月，在德國柏林成立青年共產國際。

1920年1月，俄共（布）遠東地區委員會負責人庫什納列夫及薩赫揚諾娃聯名向俄共（布）中央報告，說他們已著手與中國革命者聯繫。俄共（布）中央於三月立即批准建立〈俄共（布）遠東局〉，在海參威成立〈俄共（布）海參威分局〉，任命維經斯基為分局負責人，專門從事對中國進行滲透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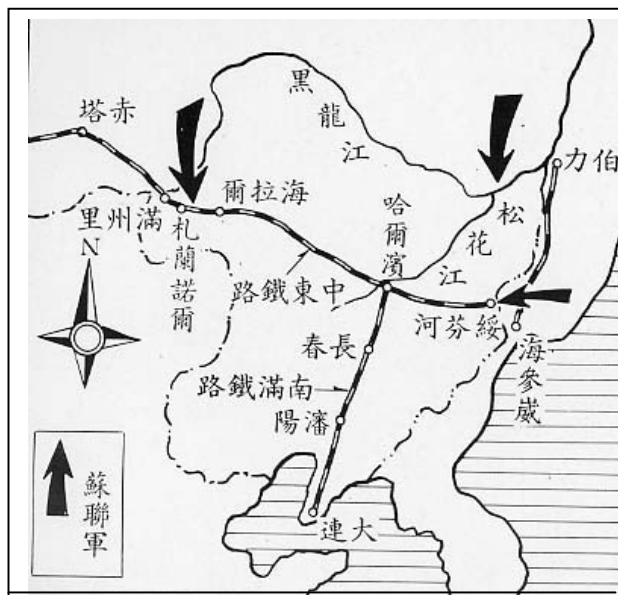
1920年4月6日，由列寧指揮成立〈遠東共和國〉首都設在赤塔，直接窺視中國。

1920年6月25日，成立〈俄國共產黨華員局〉，為俄共領導華僑中俄共黨員的中央機構，以利用華僑中的俄共黨員向中國滲透。

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由列寧主持，舉行共產國際二大。華人俄共黨員劉紹周、安恩學參加了會議。中國社會黨代表江亢虎也出席了會議。這次會議列寧進一步策劃向中國滲透的安排。選荷蘭人馬林、印度人羅易為〈民族和殖民地委員會〉的秘書和委員。後馬林和羅易都被派到中國，參加指導和組織成立中共的工作。

1921年1月，在伊爾庫茨克成立〈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這個機構組織龐大，設有中國部、朝鮮部、日本部、蒙藏部；還設有情報部。專門挑選「中國通」或與中國有聯繫的人任職。

在此期間，俄共先後派出二十幾位各式各樣的間諜、特務，來中國各地進行活動，收買各階層投俄份子，為在



1929年夏蘇聯為拒我收回中東鐵路而大舉侵略我國

中國成立共產黨進行準備。

中國京戲有開台鑼鼓，開戲之前，先來一通鑼鼓。叮叮噹噹一陣之後才開戲。俄羅斯在中國上演共產主義大戲之前，也是先來一套開台鑼鼓。經過一番大造聲勢，緊急籌劃的緊鑼密鼓之後，緊接著就以「替天行道」的架式，把侵略魔掌伸進主權獨立的中國，在中國成立共產黨。

四、蘇俄直接扶植成立中國共產黨。1921年7月1日俄國人出錢直接策劃和指揮成立了中國共產黨。

在中共黨成立之前，俄共遠東局已派出一批特工人員潛入中國，在華活動一年多，取得豐碩成果，在中國一些地方建立起共產主義小組，並已於1920年8

月建立了臨時中共中央。列寧認為在中國正式成立共產黨的條件已經成熟。於是由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派尼柯爾斯基、馬林到中國組織成立中共。尼柯爾斯基對馬林說：伊爾庫茨克共產國際給他的指示是，中共的會議必須要有他參加。

尼柯爾斯基生於一八九八年，曾是赤塔商學院的一位學生，來華時僅二十三歲。就是這樣一個小青年，操縱成立中國共產黨。馬林為荷蘭人，生於一九八三年，來華時三十八歲。這兩個人在上海曾與李達、李漢俊秘密商談，後又到北京與李大釗、張國燾等人秘密會談。

據包惠僧說。在廣州「有一天，陳獨秀召集我們在譚植棠家會見尼柯爾斯基，說接到上海李漢俊的來信，信上說第三國際和赤色職工國際派了兩個代表到上海，要召開中國共產黨的發起會，要陳獨秀回上海，請廣州派兩個人出席；還寄來二百元路費。」（《包惠僧回憶錄》，轉引自葉永烈著：《中共之初》第299頁）。

中共後來說：由於中國工人隊伍壯大，工人覺悟提高，具備了成立共產黨的條件，才成立共產黨。這純是胡說八道。包惠僧的回憶，說得清清楚楚，是共產國際派人來主導成立共產黨；與中國工人階級如何，毫無干系。資本主義社會工人階級更強大，也沒急於成立共產黨啊！而恰恰在成立中共的代表中，一個工人階級的代表也沒有。

俄共用一百五十元現大洋，買一位中共一大代表。

為召開中共「一大」，馬林帶來活動經費，給「一大」每位代表一百五十元現大洋。先發一百元，臨回去時，再發五十元。很可能是怕這些「一大」代表，在上海十裏洋場胡亂花錢，對他們不放心，擔心他們回程時沒有路費，困在大上海。所以沒有把一百五十元，一次全發給他們。

這一百五十元現大洋，對個人來說不算少。現時一百五十元人民幣祇能買幾個漢堡包，還不夠買一條褲子。可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一百五十元現大洋，那就值錢多嘍！例如二、三十年代一小職員每月工資十五元，就可以勉強維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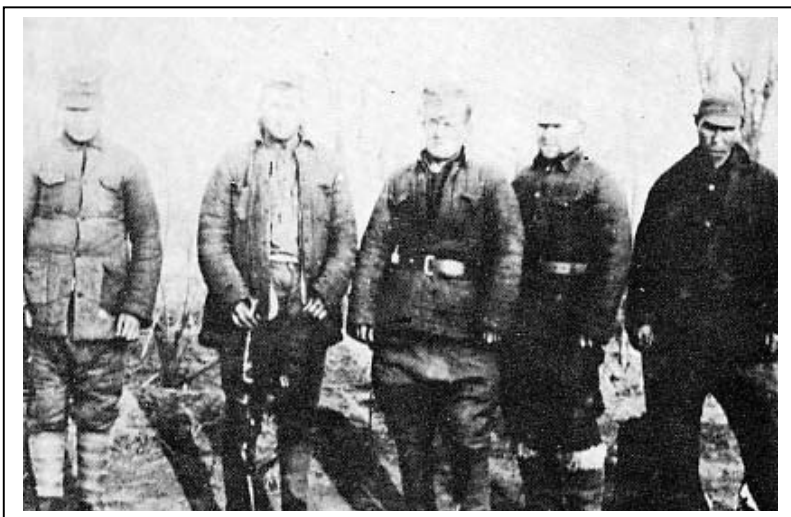
四口之家一個月的生活。不至於饑腸轆轆，衣不蔽體。這也就是說，當時的一百五十元現大洋，可以每餐有四個豐盛菜餚一個湯。大米白飯，花卷饅頭，隨便吃。一百五十元現大洋，可以供應五十個學生吃一個月的伙食；也可以供應一個學生吃五十個月的伙食。這就是當時一百五十元的價值。所以說，一百五十元現大洋，在當時不算少。

但是，從另一方面說，這一百五十元又不算多。曹錕賄選，向豬仔議員買一張選票，就用五千元大洋。而俄國人、列寧僅祇用一百五十元，就收買了中共「一大」代表的良心和靈魂。真是廉價動物，一批賤貨。說明俄國人、列寧也很摳門；很會打算盤，非常唯利是圖，十分吝嗇。俄國人這個小小的投資，以後竟獲得了無法估計的大利，確實是很有眼光，是最划算的投資。祇是中共代表的身價，低得太可憐了！恐怕這些「無產階級的先進份子」中，很可能都是對趙公元帥見錢眼開，沒有一個代表會覺悟到想一想：「俄國人給他們這個錢是爲了甚麼？是要他們幹甚麼？」，「俄國人會隨便花這筆錢嗎？」，「難道俄國人用大把鈔票撒給中華大地，是來替天行道嗎？」

就是這樣，中國共產黨的「一大」代表失去了靈魂，成立了國際共產黨的中國支部——中國共產黨！

據陳獨秀在獄中對人透露：「中共第一次代表大

1946年蘇軍因在東北參加中共打內戰而被國軍所俘



會（據他說，全部代表爲十三人），我因事在廣東，沒有參加。所以叫我當上總書記，是第三國際根據列寧的意見，派一個叫維經斯基的到中國來轉達的。說

是「中國無產階級還沒有走上政治舞台，黨的總書記一職，要找一個有名望的人，號召力要大，因此就找到了我。」（文若：《陳獨秀的獄中生活》，載 1989 年 11 月 21 日《世界日報》）

據美國『世界日報』一九九一年七月三日社論指出：「當時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綱領」也是莫斯科交下來「著令通過」的俄、英兩種文本，後來才由中共譯成中文本。」

中共「一大」通過的黨綱，明確標明要「聯合第三國際」。在大會決議中，還規定每月應向第三國際呈送報告一

份；必要時，應派代表去伊爾庫茨克遠東書記處，與遠東各國共產黨代表，商討聯合階級鬥爭之事。

所以，在中國成立的這個共產黨，實際就是蘇共在中國產下的「怪胎」，或者說是蘇共的「兒子黨」，是馬列子孫的黨，是為俄國侵華服務的工具。

（關於中共是蘇共「兒子黨」的問題，中共自己長期一直是默認的。一九四九年中共進城時，牆上掛領袖像，馬、恩、列、斯的像要掛得高高的；而毛澤東的像則要掛得很低，以示低人一等。直到二十世紀的六十年代，也就是在中共建黨四十多年之後，「兒子黨」才要造「老子黨」的反。這就是中共的所謂「批修」是也。）

怎樣看待成立的這個中國共產黨？

陳獨秀認為是「歷史的誤會」。他認識到，就當時的歷史情況說，中國是患「貧」，而不是患「不均」；中國無產「可共」。如主張要實行共產主義，必先實行資本主義。他認為列寧的十月革命是「走在歷史的前面，背離歷史的軌道」。（石灰：「歷史的誤會」，1991 年 9 月 8 日《世界日報》）

參加中共的「一大」代表周佛海，在一九四一年回憶說：「現在回顧起來，真如做夢一樣。當時萬萬想不到我們幾個年輕的學生，會鬧出這樣的大亂子。二十年來，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燒了多少村莊，損失多少元氣，都是我們幾個青年學生種下的禍

根。我現在想起來，真對不住國家，對不住人民。國家弄到現在這樣危險惡劣的情形，我們不能單責軍閥和官僚，當時在嘉興南湖的小船中的幾個青年，也要負很大的責任。」（葉永烈著《中共之初》第 430 頁）

瞿秋白在臨刑前，知道自己已經必死，他還是說出多餘的話，承認自己參加共產黨是誤入歧途，是歷史的誤會。他認識到：共產主義，「它違背歷史發展的規律性」。

作為共產黨的創始人和領導

人，不管他們後來個人的結局如何，在他們生前能對自己過去的行為做一個交代，這總還算是好的。比那些「死不悔改」的頑固派要好的多。

蔣中正先生在《蘇俄在中國》一書中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不是中國的產物，乃是蘇俄共產帝國的螟蛉。蘇俄的共產主義不適用於人類的生存，更不適用於中國的氣候。」很可惜，那些被鬼摻住的人是聽不進這些教導的。

蘇共在中國成立共產黨是甚麼性質的問題？

應該說，這就是政治侵略。作為一個外國政府和政黨，跑到另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組織政黨，目的就是要推翻這個國家的政權，還要毒化這個國家，這難道還不是侵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的主權和尊嚴？這是最明顯不過的政治侵略。倘若不是如此，中國去俄羅斯組織政黨並推翻他們俄國的政府可以不可以？

在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由外國人組織起來的政黨，這個政黨實際上就是聽外國人指揮，替外國人服務的工具和奴才。以後中共的發展史，就是一部做俄國人工具，為俄國人服務的奴才史。

英國人用鴉片進行侵華，很快被中國人發現，受到中國人的抵制。日本人明火執仗，用飛機大炮侵華，立刻遭到中國人的抵抗。俄國人換了一個手法，從政治侵略入手，麻痺中國人民的思想，使中國人從



中共圍攻四平街時，為國軍所俘虜的北朝鮮共軍

思想上被俘虜。這種馬克思主義政治鴉片，可比英國的真鴉片要高明無數倍啊！

自中共成立之後，一直有代表常駐蘇聯；蘇聯也一直有代表常駐中共黨內。出謀劃策，互通信息，保持聯絡，不斷指揮。

五、史達林鼓動「中國人打中國人」，中共發動南昌暴動。

1927年4月，共產國際開會討論，決定迅速指揮中共，開展武裝鬥爭。要中共在「工人階級先鋒隊」的面目下，展開農民革命。

1927年4月27日，共產國際密令鮑羅廷指使中共完成以下任務：

- 1， 改組武漢政府，增加中共的領導力量。
- 2， 改組國民黨中央，選拔中共的積極份子參加國民黨中央黨部。
- 3， 武裝兩萬中共黨員。
- 4， 選出五萬工農積極份子，參加國民黨軍隊工作，徹底改造國民黨軍隊，排除其中的反動將領，代以中共黨員或徹底的國民黨左派。
- 5， 成立法庭，嚴審右派及反革命份子。
- 6， 實行土地革命，沒收地主豪紳財產。

（引自張玉法：《中共現代史》第413頁）

1927年6月1日，史達林電報指示武漢共產黨：

- 1， 土地革命應從下級沒收土地。
- 2， 以黨部力量制止農民過激行動。
- 3， 清除不可靠的將領，武裝兩萬共產黨員，從兩湖挑選五萬工農份子，組織新軍隊。
- 4， 在國民黨中央委員中，以新的工農份子代替舊份子。
- 5， 以知名的國民黨員，組織革命法庭，審判反動軍官。

（引自黃大受：《中國現代史綱》第108頁）

以上的密令和史達林的電報，說明蘇俄直接指揮和破壞中國內政是如何具體和嚴重。其中僅以「土地革命」來說，就是從根本上破壞中國的農業生產體系，瓦解中國社會的經濟基礎。不明真相的農民，怎能會看出「土改」對中華民族真正損害啊！

1927年8月1日，在共產國際的直接策劃、指揮下中共發動南昌武裝暴動。

史達林在發出上述兩封電報後，仍不放心，於是於七月中旬，再派紐曼(NEINZ NEUMANN)及羅明納茲(BESSD LOMINADZE)來華。紐曼是德國人，二十六歲。羅明納茲是俄國喬治亞人，二十九歲。他們兩人到漢口後，就積極推動暴動政策。他們計劃在湖北、湖南、江西、廣東等地發動暴動。

周恩來、張國燾都是共產國際份子，都無限忠於



共產國際，一切以共產國際馬首是瞻，根本忘記了自己的國家和民族，自然就不去顧及自己國家、民族的安危和痛苦。

七月下旬，政府軍張發奎率第二方面軍進駐江西，共產黨密派周恩來、張國燾隨軍潛往。周、張偷偷摸摸混入南昌。還有瞿秋白、李立三等人，也都混進南昌。他們煽動第二十軍軍長賀龍，及第十一軍第二十師師長葉挺，還有南昌市公安局局長朱德等人，於一九二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深夜暴動。這就是被中共大肆吹噓的所謂「八一」南昌起義。

1927年8月4日，國民革命軍包圍了暴動軍隊。五日，暴動軍隊突圍，逃跑到江西南部，於九月抵達廣東汕頭。後在潮汕被國民革命軍擊潰。葉挺、賀龍殘部由朱德率領向滇軍範石曾部投降。後來，朱德再叛滇軍，搞了廣東暴動後，跑到廣南一帶流竄。周恩來等則潛逃到香港，以後又偷偷溜到上海。

這個時候的賀龍，絕對不會想到：自己出生入死爲「革命」，幾十年後卻被毛澤東生生折磨致死，臨死前連喝一口水，都不可得！當初的「革命」，又是所爲何來？

自南昌暴動後，中共就在中華大地掀起了最殘酷的武裝鬥爭，大打「內戰」。

這場延續數十年的「內戰」，已經十分明確。它根本不是中國人自己內部不同政治派別打的鬥爭，而是由俄國人指揮的，並且是由俄國人供應經費和武器，用中國人打中國人的一場戰爭。把這場延續十年的戰爭，說成是中國的「內戰」，這是不準確的。

俄國人挑動和支持一部分中國人替俄國人去打中國人。這才是實質。俄國人自己坐山觀虎鬥。鷸蚌相爭。漁人得利。

後來日本人武裝侵華，搞了個南京大屠殺，殺害中國數十萬同胞，引起全中國人民的憤慨。這種深仇大恨，數十年過去，中國人始終不能忘卻。

可是，蘇聯人通過毛澤東之手，殺害中國同胞數十萬，數百萬，數千萬，上萬萬，中國人民對蘇聯人不但痛恨，反而把它頌仰爲「解放者」、「大救星」。中國人的民族覺悟哪裡去了？

蘇聯人對日本人一槍沒打，卻把中國東北全部工礦機械設備一掃光，還到處建立「解放碑」、「勝利碑」。長春最好的一條大街給了史達林，命名爲「史達林大街」。中國人的尊嚴、恥辱、是非都到哪裡去了？

在對待侵華政策上，日本人與俄國人比較起來，就太簡單，太笨拙了。日本人興師動眾，大鬧一場，除了給中國人留下無限的仇恨，甚麼也沒撈到。俄國人躲在背後，不聲不響，要中國人去打中國人，最後要中國人把大片土地和財富乖乖地送上手，還要對蘇聯感激涕零，高喊萬歲萬萬歲。比較起來，在侵華的問題上，日本人的智慧比俄國人的智慧差得太遠了！

自俄國十月革命之後，在世界一部分國家，主要是落後國家，陸續吹起「共產主義革命」風。這股「共產主義革命」風，尤以在中國最爲時髦和盛行。

當時，在中國就陸續展開一場大辯論。辯論的中心，就是要不要走俄國人的路？要不要與俄國人聯盟？

起初，這場辯論還是筆桿子對筆桿子。到中共南昌暴動之後，這場辯論就由筆桿子對筆桿子，發展到槍桿子對槍桿子。當然，槍桿子就不講理了，誰是誰非不是以理服人，而是蠻不講理。誰打勝，似乎誰就掌握了真理。

自俄羅斯十月革命，到在中國成立共產黨，到挑起中國人打中國人，這就不得不在中國人面前提出一系列問題。蘇聯是一個甚麼性質的國家？社會主義國家，又是甚麼性質的？它是不是照樣是帝國主義國家？它對中國是那麼具有善心，會拯救中華於水火嗎？

馬克思主義真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嗎？

刮「共產主義革命」風的人，當時對上述問題的回



張惠民與陳東和主動向國民政府交代蘇軍收買他們搜集國軍情報以供給中共，後知工資竟由中共所付。

答，都是毫無疑問的肯定，並且癡迷奉行。但是，中國大多數人對上述問題卻得不出肯定的結論。

自中共在蘇俄指揮下走上打內戰的道路之後，中共與國家矛盾的性質，就起了質的變化。從非對抗性，走上對抗性；具有將自己轉化成爲蘇俄侵華工具的性質；具有從單純的國家內部矛盾，轉變爲具有蘇俄對華侵略與中國人民反對侵略的性質。對於矛盾的這種轉化，由於中共的欺騙性，當時國內的很多人是認識不清的。

六、蘇俄繼承沙俄侵華衣鉢繼續侵華。蘇俄同樣是一個帝國主義國家。蔣中正先生於一九二三年底赴俄考察後即明確指出：「在俄共政權如一旦臻於強固時，其帝俄沙皇時代的政治野心之復活，則其對我們中華民國和國民革命的後患，將不堪設想。」

當時，曾參加戊戌變法的維新革命家梁啟超先生，也曾非常明確指出：蘇俄是帝國主義國家。他說：「問蘇俄是不是帝國主義？我毫不沈吟地答道，他是帝國主義的結晶，他是帝國主義的大魔王！他是帝國主義的……一國的國民性可以換一面招牌就得轉變的嗎？俄國人玩的政治，對內祇是專制，對外祇是侵略，他們非如此不能過癮！不管蘇不蘇，赤不赤，玩來玩去，總是這一套。馬克思便是化身的希臘正教上帝，列寧便是轉輪再生的大彼得！全俄人民從前是「沙」的腳下草，現在便照例承襲充當執行委員的腳底泥；中國從前是「沙」的夢想湯沐邑，現在便是紅旗底下得意的拋球場。」（1925年10月27日，北京「晨報社會週刊」第四號）梁先生這段論述，實在是非常深刻，把一個蘇俄描述得具體生動。就是八十年之後的現在，來看這段對蘇俄的論述也仍然準確。

實際上也確實是，蘇俄在取得政權不久，就接過沙皇衣鉢，開始繼續對華侵略。起初是以剿滅白俄兵為名，把軍隊開進中國外蒙古。白俄兵與紅俄兵好像很有默契。紅俄兵進來，白俄兵交棒，紅俄兵接棒；接棒之後，就佔據不散，武裝侵佔中國外蒙古。

在沙皇尼古拉二世時，就千方百計要分割、侵佔中國外蒙古。雖然沒有正式侵略成，但是沙俄的侵略勢力卻已經佔據外蒙古。蘇俄是完全趁機承襲沙俄侵略勢力進駐中國外蒙古。

1921年2月，白俄軍將領謝米諾夫（Semenoff）由日本人供應軍火，由他的部下恩琴（Rngem）率領白俄軍及原蒙古軍，在日本軍官的協助下，攻佔庫倫（現烏蘭巴托），搶走活佛。同年三月，由白俄軍扶植成立<外蒙獨立政府>，接著這些白俄軍連續攻佔了蒙古很多地方。

1921年7月，正是俄共在中國組織成立「中國共產黨」的同時，蘇共紅軍侵佔外蒙古，打敗白俄軍，佔領庫倫。蘇共軍在赤塔狂殺中國僑民。接著扶植由蘇共訓練的波多（Bodo）任國務總理，組織成立<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到同年十一月，又把這個政府改

為<蒙古獨立國>。在中國之內成立國中之國，嚴重侵害中國領土和主權，明目張膽分割中國。

1921年9月，列寧統治下的蘇聯，出兵侵佔中國領土唐努烏梁海。蘇共拉攏當地青年，組織<土革命黨>。到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在蘇俄導演下，成立<烏梁土文人民共和國>。這個共和國實行蘇聯制度，與蘇聯訂立密約，由俄國人控制軍事、政治和外交。

這是蘇俄侵華，在中國境內建立的第一個傀儡政權。它分裂了中國領土，侵奪了中國主權。

這是在加拉罕幾次聲明之後，在列寧統治下的俄國對中國新的侵略罪行。中華民國政府始終沒有承認蘇俄這種侵略。

1923年1月，蘇俄與外蒙古私下訂立密約，允許蘇俄在外蒙古駐軍，容許俄國人開採一切資源和金礦，容許撥土地給俄國農民耕種。一九二四年，蘇俄進一步與外蒙古訂立協定，要求外蒙允許蘇俄建築從赤塔到庫倫的鐵路，在鐵路兩側一百俄裏內，俄國有伐木、開礦、建屋等權利。一九二四年七月，蘇共將<蒙古人民政府>，改為<蒙古人民共和國>。蘇俄把蒙古完全當作殖民地來對待。

<蒙古人民共和國>是蘇聯在中國領土上建立的第二個偽政權，嚴重侵犯中國領土，破壞中國主權。

七、蘇日串通，合謀侵華。早在八國聯軍侵華以後，俄羅斯長期霸佔中國東北，勾引和助長了日本人的侵華欲望，造成日本人與俄羅斯相互爭奪侵華權益，以致在中國的領土上大打惡仗。俄羅斯慘敗，吐出南滿地區，退到北滿。日本佔據南滿。

蘇俄成立之後，加緊侵略中國外蒙古，又再一次勾引和助長日本人的侵華野心。如果蘇聯不侵華，日本人也不敢輕易侵華。

俄日大戰之後，俄羅斯在侵華戰略上有個大轉變。這就是從過去與日本人戰爭爭奪，改為與日本人合夥、合謀爭奪。共同侵略和瓜分中國。蘇俄成立之後也延續沙皇時期定下的這種策略，就是與日本不用對抗形式爭奪，而是用合謀形式，共同侵華。

1927年4月，日本軍閥田中義一成立內閣。這位田中，野心極大。八月，田中派森格去大連，與關東軍頭目舉行<大連會議>，接著就制定出野心勃勃的「田中奏摺」，提出：「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

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洲。」田中的計劃，實際上是與俄羅斯互相爭奪和侵華的一個計劃。

1928年5月，日本人在濟南用割舌的殘酷手法，殺害中國駐山東外交特派交涉員蔡公時，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五三慘案」。

接著，田中計劃把中國東北及朝鮮的一部分，與貝加爾湖以南的西伯利亞地區合併在一起，設立一個自治區。田中派前日本駐美大使高藤博及內閣閣員久原房之助等人，帶著田中的計劃去蘇俄，與蘇俄協商。史達林欣然接收這個計劃。他認為，這樣既可以與日本人和好，又可以刺激中國人反日。蘇俄可趁機坐收漁人之利。（黃大受：《中國現代史綱》第128頁）

史達林這個狐狸精，一生一世就是千方百計侵略和陷害中國。他比老沙更陰險狡詐。

史達林在鼓勵日本侵華的同時，自己也加緊進行侵華。

1929年5月27日，俄國駐哈爾濱總領事館召集遠東各地重要共產黨幹部舉行共產國際會議，討論對華侵略事宜。被哈爾濱地方當局發現，經搜查捉到蘇共、中共黨員數十人，查收到擾亂中國秩序、企圖分化中國的文件等共數萬冊。（黃大受：《中國現代史綱》第126頁）從搜查出的文件證明，蘇俄駐哈爾濱的一些機構，都是蘇俄的特務組織，是蘇俄顛覆中國的活動中心。

1929年7月10日，我國東北軍政長官張學良，命令中東鐵路督辦呂榮寰，按照中俄協定，免除俄人局長職務，並解除蘇籍共產黨份子高級職員五十九人的職務；另派華人繼任。收回一切路政。同時搜查俄人用作間諜活動的職工聯合會、國營貿易局等機構。有效地打擊了蘇俄深入中國的侵略勢力。（同上書第126頁）

1929年8月11日，蘇俄急不可耐，調動大軍，發動侵華。

蘇俄在遠東原駐三萬人的軍隊，爲了入侵中國，又在西伯利亞徵召十萬人入伍。同時還從俄羅斯內地派來七千人的秘密警察，派加侖（GALENS）爲蘇俄遠東特別軍總軍團長。由他指揮俄軍對東自綏芬河西到滿州裏，中國沿邊重要城鎮和地區，全面侵犯。中國政府爲了自衛，命張學良負責國境邊防。東北軍分東西兩路，進行阻擊和抵抗。

1929年9月19日，俄軍炮毀我國吉林綏濱城。同時，在三江口、同江、富錦、樺川、滿洲里、紮蘭諾爾、密山、綏芬河等地都進行激烈的戰鬥。

1929年11月17日，蘇俄軍出動飛機、大炮、坦克，猛襲紮蘭諾爾。中國軍隊奮勇抵抗。激戰中，旅長韓光第及全旅十之八九光榮犧牲。

這時，與蘇俄明目張膽武裝侵華相配合，中共竟在南方各省大搞武裝暴動，牽制政府軍難以北調抗蘇。當時的形勢就是，蘇俄在北部進攻，中共在南部「造反」。雙方緊密配合，共同謀害中國。



這個時候，賣身投靠的中共，已經墮落爲沒有中國國家概念和沒有民族意識的漢奸和走狗。在俄國人公開武裝侵華，中華民族處在生死存亡的階段，中共卻叫嚷：「擁護蘇聯」、「武裝保衛蘇聯」、「打倒國民政府」等口號，周恩來、劉伯誠、葉劍英等人，由俄國人每月供應三千萬盧布，從俄國到中國東三省，召集中國、日本、朝鮮的共產黨徒，組織義勇隊，參加俄國人侵華的戰爭。中國人幫助俄國人侵略中國。中國人與俄國人一起殺害中國人。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人的「革命」。

1931年9月18日，當日本人看到蘇俄正向中國武裝侵略時，他們著急了，再也忍耐不住了，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佔領瀋陽。接著很快佔領全東北。

日本人作爲一個旁觀者，他們對蘇俄自然看得很清楚，甚麼馬克思主義、國際主義、世界革命等等，在他們看來都不過是騙人的鬼話。在這些詞句下，掩蓋著的是對外的侵略和擴張，這才是真的。日本人發動

「九一八」事變，就是來和蘇俄爭奪東北，阻止蘇俄向東北擴張。

這個時候的蘇俄，由於過去有被日本人打敗的教訓，早已轉變策略，不與日本人對抗；並想把侵華目標轉向蒙古和新疆，所以也就從東北縮了回去。

日本人侵佔中國東北後，蘇俄的加拉罕明確告訴日本外相廣田弘毅，說蘇俄無意干涉東三省事件，使日本人更加放心地侵華。蘇俄這種表示，並不是它不想侵華，而是它的侵華熱點早已轉移的緣故。

日本人是武裝進攻，燒殺搶掠，很容易遭到中國人的反抗。俄國是政治侵略先行，先從思想上麻醉中國，很容易迷惑人，不使中國人感到它是侵略。

世界上的事情，並不都是孤立的，偶然的。很多事情是相互聯繫的，互相影響的。任何孤立的，片面的看問題，都是不可能看清楚的。實際上日本人侵華的禍源，恰恰就是蘇俄。如果沒有蘇俄先入侵東北，日本人也未必敢侵略中國。八國聯軍之後，俄羅斯招來日俄大戰。一九三一年蘇俄侵華，又惹來「九一八」事變。這就是事實。

有的不明當時事件真相的人，對日本人發動「九一八」事變，大肆責怪蔣中正、張學良不抵抗，而根本不看蘇俄也正在大軍壓境，加緊侵華。當時中共在蘇俄指揮下，最盼挑起中日戰爭，以便讓俄國人趁機侵華。所以，當時中共的「抗日」叫囂，完全不是為中華民族著想，不是為了維護中華民族的利益；而純是為俄國人的侵華服務。

由於日本人發動「九一八」事變，蘇俄又進一步策劃在中國的心臟地區，在中國的南方成立第三個國中之國，進一步分裂中華。

1931年11月7日，中共在江西瑞金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當時，在瑞金召開所謂「第一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會上宣佈成立「臨時中央工農民主政府」選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六十三人為中央執行委員。毛澤東為主席。還制定了憲法大綱、土地法、勞動法、婚姻法等。確定這個政權的性質，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的人民民主專政。

後來這個工農政府改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

如果說中共搞武裝暴動，發動武裝鬥爭，中共與國家和人民的矛盾已經發生變化；那麼，中共在中國境內成立「蘇維埃共和國」政權，這就使矛盾進一步變化。在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會允許成立另一個國家。這既是常識，更是國際法的通例。

而尤其嚴重的是，中共這個政權是以蘇俄政權為背景。從名稱到制度，到性質全部執行蘇俄的一套，並且按照蘇俄的指示行事，隨時向蘇俄請示彙報。這樣一個政權，實質上是蘇俄的傀儡，成了人家的走狗。這個傀儡政權是搶在日本人在東北成立「滿洲國」傀儡政權之前成立的。

毛澤東成立的這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是繼<烏梁土文人民共和國>及<蒙古人民共和國>之後，蘇俄在中國成立的第三個傀儡政權。

日本人是在一九三二年二月，才在中國東北成立<滿洲國>。比蘇俄在中國江西成立「蘇維埃共和國」晚三個月。也可說是日本人看到蘇俄搶先在江西成立「蘇維埃共和國」，他們才跟進成立「滿洲國」。中共現在時常叫嚷：「不許分裂祖國」，「不承認兩個中國」。實際上分裂祖國的不是別人，恰恰是中共自己。搞「兩個中國」的也不是別人，首先就是中共自己。

毛澤東這個人是個野心家、陰謀家。他在閩西時，曾經臨陣脫逃，被周恩來等人批評為「逃跑主義」、「諸葛亮式的學究<錦囊妙計>」。一九三一年初，他被罷免了總前委書記及總政委的職務。（賀貞明：《七十年骯髒史話說從前》，1991年《爭鳴》七月號）。但是毛澤東這個人是不甘於被冷落的。他到瑞金之後，就千方百計清除異己。他所遵循的原則就是以我為核心，以我為準繩。誰反對我，誰就是反革命，必欲殺之而後快。

據披露，在瑞金，萬人坑就有十幾處。（見李忠道《毛酋秘聞》1976年6月版）

是時的鄧小平參加了毛澤東的小幫派。在一九三三年圍剿中臨陣逃跑，躲到香港避難。結果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受嚴重警告處分。他的第二任妻子金維映（李鐵映之母），因此與他離婚。改嫁給當時的中共中央組織部長李維漢。（賀貞明：《七十年骯髒史話說從前》，《爭鳴》1991年七月號）

自中共發動南昌暴動，到成立「蘇維埃共和國」之後，毛澤東在內地，瘋狂進行大屠殺。俄國、日本人從外部對華大屠殺，毛澤東則與他們同步，密切配合，從內部開展大屠殺。

據當時上海《申報》報導，僅鄂、豫皖邊區，二十三縣的人民遭到的禍害計有：

屠殺人數 1,563,500 人；
流亡人數 1,183,530 人；
燒毀房屋 2,433,343 間；
牲畜損失 2,725,075 頭；
財產損失 1,330,423,500 元。

據中國國民黨江西省黨部整理委員會公佈，自民國十七年至二十一年（1928-1932），江西全省六十一個縣人民受到共產黨禍害：

屠殺人數 431,750 人；
流亡人數 1,688,532 人；
燒毀房屋 349,743 間；
財產損失 442,529,110 元。

（李進請：《中共匪黨真面目》第 183 頁，另參見大陸學者貝聿所著《中國左禍》一書。）

這些罪行是俄羅斯最願意看到的。他們難以用他們的手，屠殺中國人；而通過中共卻很好地達到了屠殺中國人的目的。他們對中共「一大」代表，僅僅一百五十元的投資，卻換來這麼多毀華的成績，該是多麼划算哪！

「九一八」日本侵華之後，蘇俄採取的策略是，一方面不斷鼓勵日本向中共南部擴張；一方面指示中共宣揚「抗日」。當時正是德、意、日三國聯合，準備發動世界大戰時期。蘇俄鼓動日本向南方侵略，就可減去其對蘇聯的威脅。倘若日本向北，向蘇進攻；而德國從西部進攻蘇聯，蘇聯西、東兩面受敵，必然會被打得慘敗，在地球上早就沒有蘇聯這個名字了。所以，日本沒有進攻蘇聯，是蘇俄在戰略上的極大勝利。而日本則是最大的失策。因為倘若日本當年不是聽蘇俄的，不向南部擴張，而是向西伯利亞進攻，與德國一起對付蘇俄，日本一定會戰勝蘇俄。甚至有可能像當年中國蒙族英雄成吉思汗一樣，一直打到莫斯科。日本不但不會失去北方四島，還會佔據整個西伯利亞廣大地區。

日本人的失誤就在於亞洲人打亞洲人；而不是聯合亞洲人共同打敗斯拉夫人，把斯拉夫人從哪裡來趕回哪裡去。這個歷史教訓，很值得日本人深省。

八、共產國際命令中共宣揚「抗日」口號

由於德、意、日勾結，加緊世界緊張局勢。蘇聯受到德、日夾擊的威脅，異常恐懼。因此蘇聯想方設法擺脫自己的困境。

1935 年 7 月 25 日至 8 月 24 日，在莫斯科舉行了共產國際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會。這次會議進行了一個月的時間，就是討論蘇聯怎樣擺脫困境，以及各國共產黨如何為幫助蘇聯擺脫困境效勞。

會上，提出在各國要建立「人民統一戰線」，共同進行「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這是共產黨需要人民的時候，就講究統一戰線。不需要人民的時候，就拼命打壓人民。

中共代表陳紹禹（王明）在會上強調，中共應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在會議進行期間，八月一日，陳紹禹以中共中央及中國蘇維埃政府名義，發表宣言，號召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就是後來毛澤東叫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由來。

在這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周恩來被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陳紹禹被選為共產國際主席團主席之一；康生被選為共產國際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候補委員、共產國際候補執行委員。（黃大受：《中國現代史綱》第 144 頁）

會上，共產國際特別指示中共宣揚「抗日」，完全是一箭雙雕。一是中國抗日，就可牢牢牽制住日本，使日本泥坑深陷，根本不會去威脅蘇俄。二是，中國抗日，中共就可免去被徹底消滅的危險。當時中共正處在大逃亡時期。

所以，蘇俄指示中共「抗日」的這個主張，站在中國國家和中國人民的立場來看，是對中國非常不利的，是極其惡毒的。

中國抗日，或不抗日，或何時抗日，這是中國的內政。這需要中國根據中國自己的實際情況，進行分析研究和決定的事情，根本無需他國進行干涉和鼓勵。

然而中共不是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不是考慮國家的實際情況和各種利害關係，而是祇從自身利益出發，接過蘇俄的聖旨，奉若神明，在中國各處大炒「抗日」風潮，惡毒攻擊蔣中正先生「不抗日」，「賣國」，等等，無所不用其極。直至今日，中共仍然自命為自己是抗日的，攻擊國民黨是不抗日的。極盡歪曲歷史之能事。

在抗日戰爭真正打起來的時候，中共卻躲在大後方不斷搗亂和破壞，從來沒有過認真抗日。

九、中共與日本勾結，蘇俄與日本勾結，共同侵華、毀華。據宋賓（Peter Vladimirov）日記指出：「延安與日敵南京派遣軍總部有協定，『互不開火』」。（中共文化學院編：《中國近代史》，第172—173頁。華崗出版社，1977年9月版。宋賓為中國抗日期間，共產國際派駐延安的聯絡代表）。

蘇日勾結。一九三八年八月，俄國與德國簽訂秘密協定，促使德國希特勒發動歐洲戰爭。這時，蘇聯駐中國上海領事館領事與日本軍部特務機關密切往來。蘇聯領事對日本人表示，如汪精衛在南京成立政府，蘇聯將於適當時間給予承認。當時，蘇聯與日本達成秘密諒解：由日本佔據中國的華北、華東、華中、華南；而中國的外蒙、新疆、西藏以及潼關以西的大西北，為蘇聯的勢力範圍。（黃大受：《中國現代史綱》第199頁）。中國抗日期間，日本人對中國大後方狂轟亂炸，唯獨就沒炸延安。日本人進攻湖北、湖南、廣西，唯獨就不打陝西。你看怪也不怪！

由於蘇日密謀瓜分侵華範圍，中共在延安受到保護。全國人民浴血抗戰時，毛澤東躲在窯洞裏花天酒地，與江青鬼混。這個時候的江澤民，則在大漢奸汪精衛的庇護下，過著大闊少的生活。一個受蘇聯保護。一個受日本人保護。一孫一爺，各安其所。

1941年4月13日，蘇日簽訂《中立友好條約》，雙方沆瀣一氣，共同侵犯中國的領土和主權。蘇聯承認「滿洲國」，換取日本人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兩國互拿中國的領土和主權作交易。蘇聯用這筆交易，鼓動日本南進。斯達林對日本談判大使松岡洋右說：「這樣，日本可以安心南進了！」

蘇日這份條約簽訂後，史達林眉飛色舞。當松岡洋右離開莫斯科時，史達林故意要列車遲開。他親自跑到車站，去給松岡送行。兩個人熱烈擁抱，久久不肯分手。並在車站留下親密攜手的倩影，以示不忘。

史達林接待日本一位大使，遠比九年後接待中國國家元首毛澤東要熱烈無數倍，可以與數十年後，葉利欽與江澤民無比熱烈的擁抱相媲美。

在《蘇日中立友好條約》中，蘇聯把自己擺在了與日本同樣的侵略國的地位。日本侵華。蘇聯也照樣侵華。兩國同步進行。唯一令人驚訝的是，中共一方面不認真抗日，一方面又歡迎蘇聯侵華。豈不怪哉！

1943—1944年，中共軍透過日軍特務機關，將國民政府軍部署和作戰計劃密告日軍，希圖引誘日軍攻打政府軍，並深入華西地區。以便中共向西北擴張，及與日軍一起夾擊四川和貴州。這就是中共在抗日戰爭中的表現。與日本人站在一起，共同攻打中國政府軍。

直至今日，中共還在自命為自己是抗日的，攻擊國民政府是不抗日的。極盡顛倒黑白，混淆是非之能事。靠欺騙人民混日子。

不過，歷史事實，是非曲直，是無法抹煞的。中共封了那麼多的元帥、將軍，可有幾個是因為抗日而立下豐功偉績的？中共在抗日戰爭時期，直接與日本人打過幾次硬仗？除了地道戰和李向陽之類小把戲式的戰爭，還有甚麼？中共極端炫耀中國人打中國人的三大戰役那種殘酷的戰爭場面，可是中共在抗日時期，可出現過跟日本侵略者如此“大打、狠打”、直到要將日寇“徹底乾淨全部消滅之”這樣一種場面？

俄國人利用中共進行「中國人打中國人」。俄國人利用日本人進行「亞洲人打亞洲人」。這就是斯拉夫人在二次大戰時期策略的運用。中共、日本人都是斯拉夫人在亞洲運用的工具。

中國人在「中國人打中國人」中受苦；在日本人「亞洲人打亞洲人」中受難。這就是中國人在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遭遇和命運。

中共在奪得大陸政權後，更是公開「一邊倒」，徹底為蘇俄服務，大肆出賣中華民族的領土和主權，更暴露出它是蘇俄侵華的工具。

蘇軍暴虐瀋陽記實

蘇軍暴虐瀋陽記實

詢名

對日抗戰勝利後，俄軍利用中國局勢尚未穩定之際，強行佔領東北地區。事後國民政府雖與俄軍多方交涉，都因其意圖扶植共軍，拒不撤軍而未能成功。俄軍所到之處，姦淫擄掠，恣意屠殺，並強行拆運東北地區的重工業設備，工廠僅剩頹壁圯瓦，而民眾則人心惶惶。作者以其親身見聞，略述當時瀋陽的概況。

一九四六年的春天，南國一片翠綠，正是鳥語花香的時刻，大地上生意盎然，令人充滿了朝氣。我因工作上的需要，獨自在廣州市越秀山上遠眺，看到珠江中的船影、林立羊城的酒樓，一片歌舞昇平，大家都陶醉在歡樂中，享受光復後在國軍保護下的第一春節。

誰知舊曆年一過，我們部隊（新一軍三十師）又有了新的任務，隊員立刻集結香港待命，每人都發了一袋子的禦寒服裝，連夜登上英艦北上，於是，大家猜想是前往日本當佔領軍、還是去東北接收國土？

幾天海上的航行，大家把新發的冬季裝備都穿上，仍冷得無法維持正常的體溫。但為完成任務，從蘇聯紅軍的手裡收回我們東北所有的城市，軍人必須以服從命令為天職，排除萬難，咬緊牙關堅持下去。

我們這些先遣部隊，就是在當時東北長官公署所在地的錦州集結待命。雖是三月，但整個東北仍然是一片銀色的世界，官兵們穿著厚重膠靴，踩在冰雪堅硬的街道上，發出“咯吱、咯吱”的聲音。有人不畏寒風，堆雪人、打雪仗，玩得不亦樂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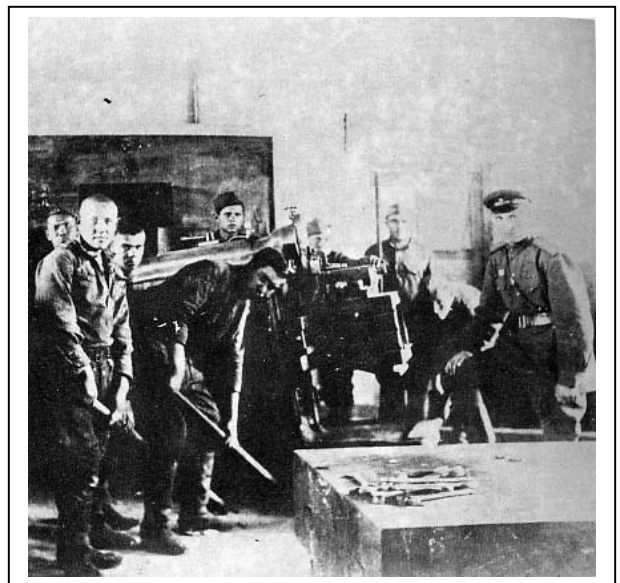
一週的居留，使我們對這新環境產生了興趣。同時，關外的待遇較高，國民政府在東北發行了一種流通券，換法幣為一比十三。大家領餉之後，便鑽進那些待遣日僑所開設的“清酒屋”裡，品嚐日本清酒和談心，似乎忘記了戰爭的仇恨，如同家人一般。然而抗戰勝利，並沒有為老百姓帶來和平、安靜的太平日子，新的戰鬥馬上就要開始了！我們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換取國土的完整。

俄軍藉詞拖延撤軍

瀋陽市又稱奉天，當時仍在蘇聯紅軍控制之下，因此，所有公家機關均為俄軍所把持。街頭上到處飄揚著鐮刀斧頭的紅旗，令人氣憤不已。蘇聯紅軍比國軍先來，經過好些日子的交涉，總左推右扯地藉故阻止，不讓國軍進城。

的確，日本人之前在東北的經營，是費過一番心血的，差不多每一個城市，都將舊的街道拆除，重新建起一個新的城市來。而且每個車站軌道很多，向外延伸，看不到邊際，寬敞的柏油路，幅射到遠方。而今街頭巷尾，都貼滿俄文的標語，且車站裡特別多，南來北往的旅客們都擁擠在站內，大家都想早點回家，祇能那些穿著紅邊黑呢制服的俄國職員，在站內進進出出。因為此站中長鐵路是中俄共管的，在紅軍的刺刀之下，祇好任他們趾高氣揚了。

國軍部隊進不了城，祇好在郊外等。可是上級為了加速完成接收工作，認為各部隊必須充分瞭解戰情，就令情報人員去看個究竟。在這騷動混亂不安的情況下，諜員很容易混進城裡。當時天寒地凍的人們穿得厚厚地，像個大皮球，行動自然有些不便，可是為了生活都到處忙碌著；軌道上停著一列列的貨車廂，都由日本降俘在裝貨。那都是咱們中國的工業設備及糧食等，一袋袋的大豆高粱，為何要給俄國人運走？為此，我們心中滿腔的不滿油然而生。



1945年蘇軍在我國東北撤裝機器運往蘇聯

誰也沒有料到，當年壓迫我們作“勤勞奉仕”的日本人，今天也替俄軍做勞工、搬運東西，這報應真快啊！但也有人心中在抱怨著：“爲什麼國軍不早點來……多可惜！這都是我們東北人的血汗結晶。”

車站內的女廁所是沒有人敢去的，駐站的紅軍士兵常在那裡徘徊，找機會蹂躪女同胞。在蘇聯紅軍士兵的獸欲狂下，東北各地不知多少婦女同胞遭他們姦污了。

當時，瀋陽外圍的村落，都是蘇聯紅軍的據點，嚴格管制老百姓進城；如果國軍任意接近，就開槍射殺。雖然東北行轅的先遣人員，在市內曾與俄軍城防司令部交涉，都無法得到確切撤離日期，總說上級沒有指示，藉故拖延搪塞，就是不讓國軍部隊進城。

大街上，除了一隊隊的俄國巡邏兵之外，很少見到有行人。呼呼的北風，颳得人連手腳都不敢伸出來，祇好用口頻頻地哈著熱氣，跑跑步來暖和一下身子。因此，沒事誰都不願意出來的。

今非昔比 人人自危

往日煙囪林立的鐵西區，如今已沒有半縷上升的濃煙，廠內被拆一空，連倉庫裡的東西也被盜走，雜物滿地，零亂不堪。寧靜的北陵，像座古老廟宇，幾代清朝皇帝，就埋在這裡，若他們地下有知，也會爲我們嘆息。北市場，是一個熱鬧嘈雜的地方，店棚、小攤滿街都是，東西便宜，價廉物美，是人們在戰亂後掙扎謀生的場所。什麼東西都有賣，多少人靠它生活。尤其是投降後的日本人，多半靠典賣來過日子。電車，是這裡最忙的交通工具，好車都被蘇聯紅軍徵用去了，留下破舊的車廂，勉強維持市內的交通。那些恬不知恥的商人，高掛著俄文招牌，討好蘇軍以圖暴利，忘記了國家民族的仇恨。

據聞蘇聯遠東軍是將該國所有集中營的囚犯們加以編組變成的軍隊，沒有經過嚴格的訓練，祇是讓他

們打頭陣當炮灰而已，如未死，即可免除所判的徒刑，並且可以自由搶奪自己所要的東西，毫無紀律可言，爲了求生存，一切都亂來，沒有人管。

再說那時陸路交通、鐵路完全爲俄國人所把持，連機場也是由蘇聯紅軍負責的。中國空軍飛機，如果

想來此降落，須先得到俄軍司令部的許可才行。僅管土地人民是我們的，可是瀋陽街頭，到處懸掛著刺眼的鐮刀斧頭紅旗，如同到了國外一樣，看到真是難過萬分。偶爾還看到許多服裝不整的蘇聯兵，其中還有若干女兵，他們在路上三三兩兩，沒有隊形，就像散兵一樣。可是他們是勝利的佔領者，如果



沈陽被蘇軍搶劫一空的工廠

國際交涉不成功，那就很難攆走他們了。

當時，蘇聯佔領軍統帥部是設在長春市以前的日本關東軍司令部內，其首領爲馬林諾夫斯基元帥，而瀋陽市的防衛，則是由俄國城防司令卡爾可夫少將負責的。然而，社會秩序很亂，因爲蘇聯士兵會在光天化日之下洗劫來往行人，誰見到不怕呢？就是市內，一入黃昏，便人人自危。因爲俄軍會隨意用卡車搬走老百姓的東西，再怎麼喊叫、呼救都沒有用，反而會被一腳踢倒在地上，撞得頭破血流。年輕的婦女們，早把頭剃得光光的，胸部也緊束起來，穿上男人裝，以求自保。

那些可憐的日本僑民，整天畏畏縮縮地，像一群老鼠，面帶菜色地蹲在馬路旁擺地攤，出售自己的衣服用品。價格非常便宜。若被蘇軍看上眼，拿了東西

就走，也不給錢，他們吭都不敢吭一聲，眼望著蘇軍大搖大擺而去，祇好自認倒楣。

我們姑息所造成的。在我們自己的領土上，我們還作不了主，豈不可悲！

偷天換日 軍備盡失

淪陷了十年的東北同胞，每天都盼望著中央政府的軍隊早日到達，但祇來了少數行政接收人員，是無法展開接收工作的，於是，有些年輕人即將重慶所廣播出來的記錄新聞，用油印來分送親友，告知戰事近況。他們也知道武力是一切工作的後盾，國軍進不了城，什麼都談不上。況且報紙完全控制在蘇聯紅軍手裡，必須經過紅軍司令部核準才可刊出，根本就不採用中央社的發稿。所以，報紙上千篇一律都是歌頌蘇聯的消息。而對蘇軍在東北各地的胡作非為、暴行，一概不得報導。

東北行轅主任熊式輝將軍和蘇軍統帥馬林諾夫基的會談，一直都談不出一個具體的行動方案。一拖再拖，主要是蘇聯要扶植中共，等待中共部隊出關來接收日軍投降後的武器裝備，好進行內戰。而中共首領高崗、呂正操也都大肆活動，到處接洽以進行接收工作。

另外，蘇軍一再拖延撤離的日期，還有別的陰謀，就是想從容掠運東北所有的工業設備和資源。

在瀋陽市中，車站和機場的人群最多。不管任何時間，祇要一打開收音機，即可聽到一種呼叫聲：“格瓦雷，瀋陽”，“格瓦雷，瀋陽”。這都是蘇聯空軍塔臺導航的呼號，意思是說這裡是瀋陽。因為這時蘇俄空軍的飛機，把東北貴重的工業設備搶運走，所以，飛機一架接一架的起落著，以補陸上運輸的不足。中長路上的火車，也一列列地裝滿了東西，一個勁地往北急駛而去。老百姓都知道，我們的物資和工業設備，正被他們偷偷地劫運走了，心中無不忿恨入骨。

他們這種搶劫、暴虐、姦淫的行爲，當時因受到蘇聯紅軍嚴格的管制而傳不出去。國民政府的政策，也不準拍發影響“中蘇友誼”的任何新聞。因此，他們在東北的各種暴行，外界自然不會知道了，這都是

赤裸裸的歷史見證——歷史上的兩個

“中蘇友好條約”

(大陸) 癡情老人

這兩天，「黑瞎子島」在網上鬧得沸沸揚揚，且眾說紛紜，先是說全部劃給了俄羅斯，後來說是中俄雙方各一半，再後來又說是中方祇得到了六分之一，且還是使用權。我鬧不清這黑瞎子島是怎麼回事，但卻由此想起了去年還是前年在網上查資料時無意中看到的歷史上的兩個中蘇友好條約。一個是當年的中華民國政府和蘇維埃政府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時間為 1945 年；一個是後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友邦蘇聯政府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時間為 1950 年。這兩個相隔僅五年的中蘇友好條約看得我熱血沸騰，看得我拍案而起，看得我感慨萬端，看得我長吁短歎，好幾天還不能從中自拔。當時我真想寫一篇文章，題目都想好了：啊！我的海參威。可後來終究沒有寫成。

大概是四十幾年前了，還是小學生的我和同樣是小學生的二弟一起翻看一本大版本的黑白連環畫，那上面畫著一隻北極熊正在吞噬中國的海棠形版圖，還配著我們從沒學過的繁體字說明。兩個小學生跳了起來，啊！原來東北外面的那一塊都是我們中國的，是被俄國霸佔去了的。二弟隨之英姿勃發地宣告，他將來要是當了國家領導人，一定要把這一大塊土地拿回來。當時的我很欽佩二弟的這種雄心壯志。可是後來我們學歷史，小學學，初中學，高中學，好像都沒有學到過這連環畫上提到的事。從那豎排著的繁體字說明推測，這連環畫當是前朝遺物。一直到好幾年以後，發生了珍寶島自衛反擊戰，才從以人民日報為首

的大小報刊上連篇累牘發表的文章（還配有地圖）中看到了當年那本連環畫上的內容，當然是更詳細更具體了。還知道了偉大的列寧曾宣佈過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將所有侵佔去的土地全部歸還中國；還知道了敬愛的周總理說過將尊重現實（一百多年來偉大的蘇聯人民在這塊土地上居住、開發），為了兩國人民之間的傳統友好關係，不向蘇聯索回這塊土地。當時我和二弟既歡欣鼓舞，又遺憾萬分，被強盜搶去的東西怎麼說不要就不要了呢？當時我們兩個初中生哪裡知道，報紙上天天登載的許多文章中竟然缺少了很重要的兩份歷史文件。幾十年後的今天，我終於在網上看到了這兩份從來沒有看到過的文件。

為了便於對照，我現在將這兩份文件拆開，將相同的條文排在一起，前一份，即中華民國政府簽訂的那份以■標註，後一份，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簽訂的那份以★標註。

一、有關外蒙古：

■蘇聯承認中國對蒙古的宗主國地位；蘇聯必須在 1950 年內撤走在外蒙古境內的所有駐軍。蘇聯同意中國政府對蒙古的駐軍，但其駐軍不能用來反對蘇聯。蘇聯強烈要求 25 年以內中國政府同意外蒙古舉行公民表決，由聯合國監督表決的公平性。

■中華民國政府聲明對外蒙古有不可爭辯的主權，中國政府 1950 年 10 月 10 日恢復對外蒙古駐軍，用於保護領土完整，不用於反對蘇聯，在同一時間實行蒙古高度自治。中華民國政府同意 100 年以內讓外蒙古人民舉行公民表決，由聯合國監督表決的公平性。公民表決的先決條件是 1911 年被蘇聯用武力驅逐出去的原外蒙各族居民遷回原地，參於投票。中國政府認為，公民表決是決定自治，不是決定獨立。

■雙方同意就蒙古問題繼續進行談判。雙方同意就東蒙問題繼續進行談判。

★中華人民共和國無條件承認外蒙古獨立，取消國民政府關於外蒙的不平等條約並願意根據聯合國民族居住權原則把南京政府用武力霸佔的外蒙領土還給外蒙。

二、有關海參威與江北六十四屯等：

■蘇聯同意無條件撤走蘇聯駐東三省所有武裝力量。同意中國政府恢復原殖民地大連主權。

■蘇聯承認中國對海參威的主權，蘇聯同意在 50 年以內撤走蘇聯駐海參威所有武裝力量。

■中國政府將在 1995 年恢復對海參威的主權，對蘇聯免稅。

■雙方同意就海參威問題繼續進行談判。

■蘇聯承認江北六十四屯為中國領土。

■蘇聯承認圖門江出海口是中國主權。

■中國聲明圖門江出海口是中國主權，為了中蘇友好，圖門江對蘇聯開放。

★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認海參威（包括海參威所轄的郊區）是蘇聯固有領土。

★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認江北六十四屯為蘇聯領土。

★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認圖門江出海口是蘇聯主權；「新疆北郊」是蘇聯領土。

★承認清政府關於大連的協定，承認蘇聯在大連地區的特權。

★中華人民共和國歡迎蘇聯在新疆，東北，內蒙駐軍，兄弟互助關係。

三、有關烏蘇里江流域：

■中蘇兩國一致同意江面主權中蘇各二分之一。

★烏蘇里江流域靠蘇方三分之二屬於蘇聯主權，靠中方三分之一屬中國主權。

三、其它：

■中國政府保留繼續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權力。

■蘇聯拒絕中國對科葉島的主權要求，但願意同中國政府就所有領土糾紛進行談判。

★中華人民共和國停止 1945 年以來南京政府所有領土要求；承認清朝政府代表 1850 年以來所有領土條約。

★蘇聯政府歡迎中華人民共和國關於領土的聲明。

寫完以上的部分，我卻無法再繼續寫下去了，而且一擱就是好幾天。因為我為了便於對照，將兩個中蘇條約拆開，將相同的條文排在一起時，心中升起了一個疑團。隨著兩兩對照，這個疑團越來越大。因為這些條文實在是太針鋒相對了，實在是太赤裸裸了，赤裸裸得令人可怕，赤裸裸得實在是讓一個神經正常的人都無法相信。雖然我已見慣了這些赤裸裸，以前發生的赤裸裸，現在正在進行的赤裸裸，將來還會繼續的赤裸裸。我不得不對這兩個條約的真實性發生疑問。現在還是先讓我們來看看這種赤裸裸吧。



毛澤東和周恩來親赴莫斯科簽訂繼續賣國的中蘇友好條約

一個說，蘇聯承認中國對蒙古的宗主國地位，中華民國政府聲明對外蒙古有不可爭辯的主權；一個卻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無條件承認外蒙古獨立。一個說，蘇聯承認江北六十四屯為中國領土，承認圖們江出海口是中國主權；一個卻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認江北六十四屯為蘇聯領土，承認圖們江出海口是蘇聯主權。一個說，中蘇兩國一致同意江面主權中蘇各二分之一；一個卻說，烏蘇里江流域靠蘇方三分之二屬於蘇聯主權，靠中方三分之一屬中國主權。一個說，中國政府保留繼續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權力；一個卻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停止 1945 年以來南京政府所有索土要求，承認清朝政府代表 1850 年以來所有領土條約。尤其是關於海參威的條約更是赤裸裸得讓人無法卒讀。一個說，蘇聯承認中國對海參威的主權，中國政府將在 1995 年恢復對海參威的主權；一個卻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認海參威（包括海參威所轄的郊區）是蘇聯固有領土。

讓我們展開想像的翅膀暫時浪漫一下吧。1995 年，蘇聯撤走了在海參威的所有武裝力量，中國軍隊威武雄壯地開進了海參威，伴隨著中國國歌的奏響，中國國旗徐徐在海參威上空升起。展眼望去，江北六十四屯、圖們江及其出海口，中國國旗連成一片，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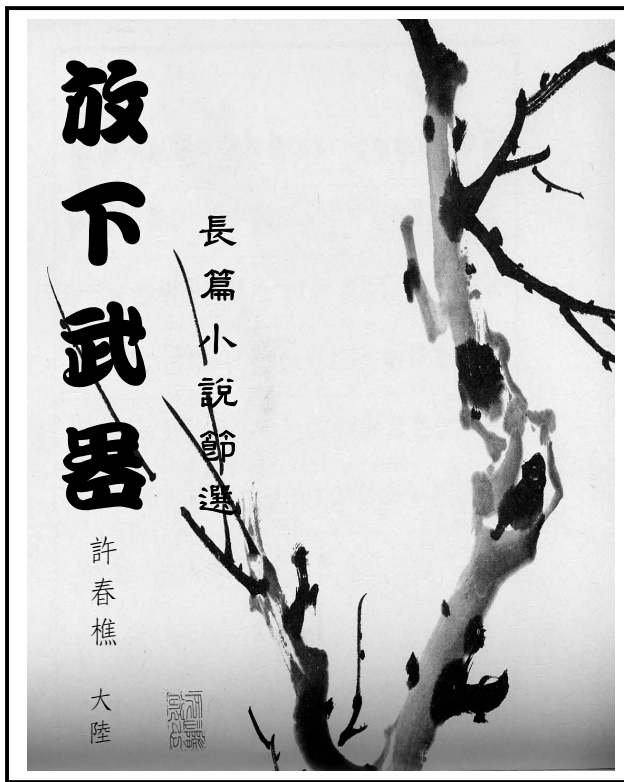
風招展，中國國歌此伏彼起，響徹雲霄。這是多麼激動人心的場面啊！這比 1997 年香港回歸還要早兩年哪！哪還輪得到黑瞎子島在現在來瞎嚷嚷。

可是，此情此景現已成為空想，不禁令人唏噓不已，扼腕歎息。相信哪一個中國人看了這兩個條約不義憤填膺，拍案而起。可是……

赤裸裸啊！赤裸裸得可怕，赤裸裸得令一個神經正常的人無法置信。我上網繼續搜索，我發電子郵件向行家請教，可是都無結果。沒有一個人能告訴我，這兩個條約的真偽。我也找不到這兩個條約的原件。但願這是別有用心的人捏造出來以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的。現在我將在網上搜索來的有關鏈接提供給大家，請這方面的專家指教，以釋我心中的疑團。

轉自《搜狐論壇》

<p>自體</p> <h1 style="font-size: 2em;">滿江紅</h1> <p>（一首）</p> <p>張育明</p>	<p>自由，還我家鄉。民主自由，還我家鄉！</p>	<p>大業在肩上。同胞們，同胞們，奮發精神，堅定立場，民主</p>	<p>死道旁。頭抬起，莫健忘。中華多義士，壯士出四方，復興</p>	<p>盡，家破人亡已倍嘗。人相食，血淚淌，父兄遭殘害，兒女</p>	<p>五嶽暗淡，江河淒涼，馬列入侵，神州淪亡。山河破碎話不</p>
<p>筆。寒夜初冬，草書自體滿江紅一首，謹此誌之。</p>					
<p>二零零四年四月凌晨一時許，被靈感喚醒，遂披衣命</p>					



第一章 我舅舅這一年秋天被槍斃了

城市的煩躁不安從早晨就開始了。瑣碎的自行車鈴聲灌滿了大街小巷，密集的汽車擁擠著爬行在舉步維艱的道路上，尾部冒出了斷斷續續的黑煙，一些暗藏的煙囪以固定的姿勢繼續噴吐著由來已久的工業灰燼，煙囪下面是灰燼一樣稠密的人群蠕動在稀薄的光線裏，他們來去匆匆，去向不明。

太陽早就升起來了，是個晴天，但天空灰濛濛的，感覺到四處瀰漫著渾沌的陽光，抬起頭卻怎麼也看不出陽光是從哪裡鋪到地面來的，這種彘扭的感覺很像是一個窮人無緣無故地接受了一筆來路不明的捐款。於是我的目光開始關注路面上揚起的灰塵和匆匆經過的形形色色的鞋子，當人們走在路上時，鞋子裏就裝滿了思想和動機。

這個早晨，我的鼻子裏充滿了新鮮的脂粉的氣息和鞋油的味道，我無法想像與我擦肩而過的人們懷揣著怎樣的思想開始他們一天的生活，但我卻不由自主

地想到這些人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衣冠楚楚的強盜、騙子、小偷、妓女、越獄逃犯、殺手，還有「三八紅旗手」、勞動模範、優秀黨員、義務獻血者，他們的服裝和表情掩蓋起了全部的真相，所有的人都在這個早晨公平地享受著平坦的路面和含糊不清的陽光。當然，除了我自己，也沒有人知道我正在忙於離婚。

我去找律師希望在離婚訴訟中將兒子判給我，一路上不少形跡可疑的人在巷口或僻靜處拽住我的袖子向我兜售走私的香煙、手機、仿真男女生殖器，還有一些用來作案的藏刀和麻醉藥粉，他們動作敏捷神情詭秘，手插在褲子口袋裏眼睛警惕地東張西望著，然後從每個迎面而來的人臉上尋找商機。我對他們說：「我沒錢！」經過市政府門前時，發現五六百名下崗工人在靜坐示威，他們衣衫樸素面色青黃，一些標語穿插其間，標語上寫著「共產黨萬歲」、「社會主義好」、「紡織工人要上班要吃飯」等，警察們穿著嶄新的黑制服手裏拎著棍子，卻沒有人動手。一位牙齒殘缺的老工人伸出青筋暴跳的手指著市政府大樓說：「把裏面的腐敗份子拉出來統統槍斃掉！」身邊靜坐的下崗工人們頓時快活了起來，他們咳嗽著隨地吐痰，七嘴八舌地說：「都槍斃了誰來幹市長。」許多人不自量力地搶著說：「我來幹！」

這個秋天來臨的日子裏，我又一次聽到了「槍斃」兩個字。「槍斃」其實也就是「處決」的意思，但「槍斃」比「處決」聽起來更過癮，它讓人聯想到黑洞洞的槍口和血淋淋的槍煙，這種聯想可以滿足人們潛伏在內心深處的暴力意志和惡毒的念頭。

一個被離婚拖得焦頭爛額的人，很難以吃冰淇淋般清涼而平靜的心情去面對日益糟糕的陽光，一貧如洗地走在沒有方向的風中，你可以在這座城市裏很容易找到一個乾淨的垃圾筒，但卻難以找到一個乾淨的靈魂，城市越來越美麗，城市的行為越來越醜陋，你可以發現公交車上老弱病殘專位上坐的全是身體健康的人或頭髮染得發綠發黃發紫的俊男靚女們，人們在酒桌上茶樓裏公開交流開後門行賄受賄的經驗，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地打假球、買假文憑，抄假論文，編假檔案，造假處女膜。沒有一個人臉紅，沒有一個人懺悔，沒有一個人覺得可恥。拍賣文物和拍賣官位拍賣小姐同時開始，美麗的服裝與可恥的欲望和諧統一，道德的面具和嫖娼的避孕套放在同一個櫃檯上銷售，

莊嚴的口號成爲強盜們鮮豔的旗幟。

這種尖銳的感覺使我變得越來越刻薄，然而我在抽象的刻薄中更多地是將刀尖對準了自己的胸口，妻子的離婚宣言使我最初否定的是自己，而不是別人。十五年前我從省化工學校畢業分回到老家縣城的農藥廠，幹了兩年多，沒拿到一分錢工資，祇分了兩百二十多瓶農藥，農藥質量相當糟糕，廠子倒閉後一個老職工自殺，喝了大半斤都沒死，搶救過來後他說的第一句話是還不如喝白酒。後來我就卷著鋪蓋來到了現在居住的這座省會城市謀生，做過建築工地的保安兼打手，當過純淨水、壯陽藥推銷員，在一家報社拉過三年廣告，由於忍受不了屈辱和辛苦，還當了幾年自由撰稿人，專門寫殺人放火、攔路搶劫、強姦賣淫、吸毒販黃方面的稿子。那段日子裏，我的心理非常陰暗，希望這城市裏多一點殺人放火強姦搶劫，就像壽衣店花圈店希望人死得越多越好一樣。賺了十幾萬後，我壓抑了多年的貪婪的欲望和野心開始膨脹，要知道我這個農民出身的窮小子受夠了富人們嘲弄的目光和蔑視的表情，於是，我頂住妻子的壓力，堅決不買房子，將掙來的血汗錢用來開了一個「陽光小酒館」，由於資金少，小酒館祇好開在一個窮人很多的舊街巷裏，擠在一大串賣燒餅的、炸油條的、租影碟的、修車補鞋的、開美容院的小鋪子中間，生意很清淡。陽光小酒館籠罩在城市的陰影之下，終日不見陽光，像一個潛伏在雜亂無章的人群中的小偷或一個臉上塗抹了許多脂粉隨時準備賣淫的妓女，產生這種感覺的時候，我就特別的灰心和絕望，每天守著小酒館望著城市的天空發呆，繁華的城市以及高樓裏面每一扇窗口都在拒絕著我的妄想，我是這個城市隨地吐出一口痰。我在無法拯救自己又不願正視現實的時候，就祇好用一種極端的方式來反抗這種生活，這就是我跟隔壁美容院的小姐張秋影在去年冬天一個下雪的夜裏終於滾到了一張床上，我知道美容院基本上不是用來美容的，所以就讓她到我店裏來當服務員，每月開 800 塊錢工資，可慘淡的生意使她無法堅守我們之間性質可恥的愛情，臉上的脂粉一敗塗地，偶爾來幾個客人吃飯，她動作懶散地將筷子和酒杯很馬虎地丟在客人的面前，像面對著借錢不還又不好當面發作的窮親戚一樣冷若冰霜。當我決定跟她分手的時候，她卻提前將我一腳踹了，她跟一個做白粉生意的小夥

子走了，一聲招呼都不打。這短命的不切實際的愛情毀掉了我和妻子十年夫妻情分。隔壁美容院小老闆反復找到我妻子說我挖美容院牆角，妻子終於忍無可忍地跟我鬧起了離婚，我真心誠意地向妻子認罪：「能不能給我悔過自新的機會？」妻子韋秀在即將破產的紡織廠當女工，她不參加靜坐示威，卻對我義正辭嚴地說：「如果你真的找一個本分的女人，我也許能夠原諒，可你找一個妓女來侮辱我。」

小酒館在一個春暖花開的日子裏倒閉了，韋秀不願寬恕我。離婚的焦點是五歲的兒子判給誰，我要兒子歸我，她對我的律師說：「誰都不會相信一個嫖客能培養出品質優秀的兒子來。」

我簡直憤怒到了極點，我跟張秋影是由認識而後才上床的，是有感情的，而且我除了張秋影外從來沒嫖過娼，怎麼能說我是嫖客呢？

這半年來，我一直在反省自己的罪惡，並企圖讓時間沖淡和磨洗掉妻子的仇恨。我現在租住在城郊結合部的一間民房裏，重新開始當自由撰稿人，寫一些殺人放火的稿子，掙一點小錢維持生計。心裏空虛時，就鑽進網吧上網打遊戲，或找一些無聊的人聊更爲無聊的話題，諸如是否賣一些兵馬俑到國外換錢給下崗工人買飯吃，還有法輪功是否能把人帶到另外一個天堂等，反正不聊女人也不跟女人聊。我作爲一個生理上的男人已經基本上報廢了。

世紀末的人們，大都是不計後果地活著。因此，祇有想不到的事，沒有不敢幹的事。

窮人的心理中有一種殺富復仇的欲望，他們都希望富人被謀殺或出車禍死於非命，巷口裏光著胳膊就著花生米喝劣質酒的窮人們在談到某有錢人或某領導幹部被殺被槍斃的新聞時，臉興奮得通紅，舉起酒杯一飲而盡，好像喝進去的是富人和貪官的血，很有營養。我在無所事事的時候就拎半瓶酒擠在巷口跟他們一起說一些無政府主義的話，同時把聽到的一些殺人放火的傳說編成紀實拿到報紙雜誌上去換錢。賣魚的胡四時常拍著我肩膀說：「你也該槍斃，抽阿詩瑪煙，喝的酒也值十幾塊一瓶。」我給他們每人倒上一杯，爭辯說：「抽阿詩瑪就要槍斃，全國還不殺得屍橫遍野。」其實我抽的是兩塊五一包的「天堂」煙，因爲想跟他們套近乎，才咬著牙買一包好煙的，畢竟以前我有過錢，我時常總是想起孔乙己是穿著長衫喝

酒的。

最近的稿子不好賣，各刊物和報紙都有了自己的法制記者，我這個沒身份的人去案發現場常常被警察轟出去，有時候，他們還在我面前晃動著手銬警告我。聽來的故事報紙雜誌由於怕吃官司也不敢輕易採用。《紅裙子》雜誌社要我深入到暗娼中寫一個長篇紀實文學《女大學生走進夜總會》，千字三百。想起自己三十多歲的人還要做小偷一樣去勾引女大學生窺探少女的隱私，我感到無比窩囊。我對《紅裙子》編輯部主任王娟說：「如果我再年輕十歲，也許還能勾引到女大學生，更何況我現在一貧如洗。」王娟在光線很充足的辦公室裏對我說：「沒有錢，我們可以預支一部分稿費給你。」那神情很像一個恐怖組織領導人在向手下佈置一件隻許成功不許失敗的暗殺任務。我說：「即使我有錢，也不能勾引女大學生。」王娟用純技術性的語言對我說：「我們要的是夜總會裏女大學生勾引你，而不是你去勾引女大學生，你必須拿出第一手材料。」

陽光從窗口漸漸撤退，我看到一截雪白的少女的大腿懸掛在編輯部的牆上，是一個女性絲襪的廣告。我說我不幹。

城郊結合部居住著大多數是從鄉下來城裏拾破爛的、販菜的、殺豬的、賣魚的、逃避計劃生育的、拐賣婦女的、賣淫嫖娼的、造假證件的、賣假醬油的等各類社會閒雜人員，這裏房租便宜，治安管理漏洞大，是無政府主義者的天堂，我混跡其中，並不是想違法亂紀，而是想省一點房租買一碗麵條吃。這種朝不保夕的生活已使我越來越接近於一個無處藏身的盲流，我已沒有自信和尊嚴，這個秋天嚴重打擊著我活下去的信心。這時候，我心裏就會對在家鄉合安縣當副縣長的舅舅鄭天良滋生出雙倍的怨恨和敵意。如果不是當年舅舅絕情，我母親就不會死得那麼早，如果舅舅當年將我從即將倒閉的農藥廠調換一個單位，我也不會落到今天這種背井離鄉居無定所的地步。十二年過去了，我再也沒見過這位當副縣長的舅舅，母親死後，我一直無法寬恕舅舅以原則和廉潔的名義對自己的親姐姐見死不救。

秋天微涼的風灌進巷子裏，黃昏一點一點地來臨了。胡四搬了一張開了縫的小木桌，擺上一盤燒得通紅的死魚，這時，收了攤子的房客們就陸續聚集到有

風的巷口，有的帶一碟花生米，有的端一盆炒辣椒，還有人在菜市場撿了瘟雞放辣椒紅燒後送到小桌上，香味深入肺腑，沒有一個人表示不滿，大夥吃得滿嘴油光燦爛渾身熱血沸騰，我終於理解了窮人活著的全部意義就是爲了吃飯。菜混著吃，酒每人自帶，這天我也拎了一瓶「火燒刀」子混在其中大吃死魚、瘟雞，兩條饑餓的狗爭著搶我們吐出的骨頭，它們的尾巴在黃昏的風中極不耐煩地搖晃著。酒精燃燒著潛伏的情緒，大夥又開始議論關於「槍斃」的事情，去年胡長青被槍斃的時候，大夥都說斃得好，等到成克傑被槍斃的時候，巷口裏群情高漲，每人破例買了包好煙「阿詩瑪」，很奢侈地喝了十四斤「柳河大麪」，熱烈慶祝槍斃了大官，當場喝倒六個，他們硬著舌頭說殺得越多越好越大越好，我說成克傑已經很大了，殺的官不能再大了。殺豬的楊漢攔住我的袖子：「還得往上殺，讓我用殺豬刀捅，省下子彈錢換花生米喝酒。」今天大夥的情緒不高，因爲已經很長時間沒有槍斃大官了，於是酒也喝得有些索然寡味，先是賣老鼠藥的高老樹說清源市公安局長被情婦用局長的手槍崩了腦袋，胡四總結說這叫自掘墳墓。後來又陸續有人說起了幾起發生在全國各地的汽車爆炸事件，大夥都說這些人都是他媽的王八蛋，要炸就炸有錢人炸貪官污吏。他們似是而非地說著一些道聽途說半真半假的社會新聞，我覺得對我來說幾乎沒有什麼寫作價值。喝酒接近尾聲的時候，在城隍廟給人看相算命的劉半仙說他下午給一個腐敗的縣委書記看相並威脅他說「氣數已盡，當迅即解劫除災，化凶歸吉，若不懸崖勒馬，家破人亡。」劉半仙的自吹自擂引起了巨大的嘲笑聲，都說縣委書記怎麼能輕易上你的當。劉半仙賭咒發誓說，他下午拉住一個過路的胖子，估計他是領導幹部，就蒙了他幾句，誰知那個肚子很大的領導幹部當場臉色就灰了，悄悄地將他拽到賓館裏求劉半仙細說原委並爲他解劫除災，劉半仙到賓館後胡說八道一通，竟騙了三百塊錢，抽了有半包「中華」煙還在賓館洗了個熱水澡，他說他確實聽到在場的一個年輕人喊肚子大的人吳書記。胡四說也許是鄉里的書記或村書記，劉半仙覺得大家有點蔑視他，很惱火，他說鄉書記村書記是不可能抽「中華」的，也不可能掏三百塊錢給他。爲了表明他確實賺了一筆後的慷慨和有福同享，他當即起身跑到巷口的小鋪子裏買來了

三斤「柳河大麵」二斤鹵豬蹄四小袋花生米給大夥盡興。大夥也就高興了起來。劉半仙說看來縣裏書記縣長「先槍斃，後審判，沒有一個是冤案」是可以成立的，他說合安縣的一個副縣長鄭天良已經被判了死刑，受賄索賄五百多萬，比胡長青還多一百萬，情婦就養了七八個。大夥覺得這條消息很沒意思，槍斃副省長還有點刺激，副縣長等於是小魚小蝦，殺副縣長就像殺雞，沒有懸念，不好玩。

我聽得骨頭裏風聲鶴唳。我放下手中有些冰涼的酒瓶，對劉半仙說：「這不可能！」劉半仙根本不想睬我，他說他有一個表侄在省城當律師，正在為鄭天良辯護，我說能不能讓我見一見你這位表侄，的士費我來付，劉半仙說槍斃一個副縣長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

我沒有看到報紙上關於我舅舅鄭天良判處死刑的消息，去年冬天我在省報上看到我舅舅是全省「人民滿意十佳公僕」，十二年前我還在報紙上看到過我舅舅是「全國優秀共產黨員」。

風越來越涼，天黑了下來，巷口電線桿上一盞路燈很勉強地亮了。

我從牙縫裏擠出一百三十塊錢，請我認識的省法制報記者李成品到「楓林假日酒店」三十二樓旋轉餐廳喝了一晚上啤酒，向他打聽鄭天良案件的真假。

李成品對我說：「這個案子現在當然不能報道，縣處級幹部要等到槍斃後才能見報。省高院終審判決前天才下來，『十一』前要槍斃一批迎國慶，大多是搶劫強姦殺人的，領導幹部好像祇有鄭天良一個副縣長。」

李成品平靜地敘述這件事就像敘述一個毫無意義的陳年往事一樣，沒有一點情緒，他警告我不要亂寫，不是什麼錢都能掙的。我連連稱是。

旋轉餐廳下的城市裏萬家燈火，我看到城市的霓虹燈川流不息地閃爍著物質的光輝，那些我看不見的乞丐、小偷、妓女、強盜、盲流們正在夜色的掩蓋下傾巢出動，整個城市被欲望折磨得口吐鮮血，一片絢爛的粉碎。

等到我回到老家合安縣調查瞭解我舅舅鄭天良案件內幕時，我舅舅鄭天良已經被槍斃了。時間是二〇〇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大陸) 楊春光

紅色正在餐巾上走動
正在餐桌上復活——

剛烹好端上來的豬血、雞血
還有各種扣肉、燜肉、炒肉
還沒等人們把它們夾起送入嘴裏
它們就吱吱地站立起來
從餐桌上朝每個人的血管裏奔去
從餐桌上向每個人的頭腦裏走去

紅色正在餐巾上走動
正在餐桌上復活——

我的身體裏立刻發出一片被屠宰的號啕聲
再仔細聽去，裏面不僅有它們被宰的哭喊
似乎還有人類被它們屠宰的罵娘的呼救聲

紅色正在餐巾上走動
正在餐桌上復活——

它們說，它們反正早晚都是來送死的
不如趁早殺個痛快、死個明白
它們自發地掀起了史無前例的
討伐人類殘殺禽獸的起義運動
它們在我的中樞神經上鑑發了一道
捉拿殺害它們兇手的通緝令

(命令寧可錯殺所有也不放過一個人子)
它們狂笑著，殺紅了眼睛，洪水一樣撲來
就這樣殺向了人類，殺進了我的腸胃裏



紅色正在餐巾上走動
正在餐桌上復活——

我們的孩子、婦女、老人
大批而成噸成噸地被它們殺死了
那突遭毒手的慘叫，在我的體內蔓延
我的所有呼吸系統和骨骼的關節，每個
細胞、每根毛孔，每絲痙攣全都被這
肉餅、血漿淹沒、扼制、擊穿、碾碎
我的四肢被這巨大的引擎而牽動顫抖起來
牙齒陷入渺茫，耳朵是一片廢墟，腦門上
有報廢的工廠，頭髮墜入樓群的倒塌之中
我無力去解救自己的父老鄉親兄弟姐妹
我祇想把這一切都嘔出來、吐出來

紅色正在餐巾上走動
正在餐桌上復活——

面對這一席肉宴，我厭惡
（我不僅拒吃平時就忌諱的豬肉，此時
連我最喜歡的牛肉之類也一概厭惡）
我難以像另一些人那樣
照樣去夾、去吃、去喝、去樂、去飽
我無法不讓大家掃興，我再也不能理智
我一腔嘔過去，嘔出了肉粒、皮屑、毛骨
嘔出了泥湯、水鏽、尿域、再生細胞、刀
嘔出了它們復活的身體、翅膀、尾巴、槍
像吐出了一灘新的國家、新的世界和民族
公開向人們吐出了一支反人類的復仇大軍
它們帶著從我胃腸裏綁架來的許多人質
當眾要向我討個公道，要我交出殺它們的
兇手（最好是元兇），如果不交出來
它們就要把人質一個個絞刑、割肉、殺頭

紅色正在餐巾上走動
正在餐桌上復活起來——

究竟誰是兇手？說！快說
我知道這裏的人（包括整個人類）都是
連我也是（我不吃豬肉

可我以前也沒少吃別的肉類）
我說是我！真的是我
它們卻不願意接受這是事實，不敢相信是我
（因為是我把它們嘔吐出來的
是我把它們一口救活、解放了他們……）

紅色正在餐巾上走動
正在餐桌上復活起來——

另一些親人和朋友看我這樣嘔吐不止
有的也做出不同程度的條件反應
甚至有的比我嘔吐出的禽獸還多、還狂妄
它們復活之後喊著震天的殺聲，冒著硝煙
向人類射出準確的子彈，砸下鋒利的大刀
它們潛伏於人們的思想中長期地殺人放火
出沒在人們的靈魂裏全面地實行法西斯政策
它們要把人類趕盡殺絕
從根本上消滅人類的祖國

紅色正在餐巾上腐爛
正在餐桌上走向虛無——

我從這次嘔吐事件之後
我不僅不敢再吃任何一種肉食之類
而且不敢再聞一點葷味的東西
更不敢再看別人吃肉
我由厭肉到厭油到厭食
由厭食到厭酒厭菜
最近祇是喝一點點水來充饑
有時從空氣中吸收略微的維生素
現在又突然覺得水也不乾淨
空氣也不乾淨
世上能乾淨食用的、呼吸的
已經沒有了
我完全絕望
醫生給我的診斷也是
我祇能等死了
那種腐爛之後才是真正的乾淨
剩下骨頭才乾淨
連骨頭都爛掉了

唯有虛無才是真正的乾淨者

我以為殺人者
是從吃肉開始的

紅色正在餐巾上腐化
正在餐桌上走向墮落——

離開餐巾和餐桌，離開食肉和嘔吐
紅色從我們的思想、靈魂、精神、肉體中
得到的仍是全新的死亡和全新的復活！

1995年1月8日於盤錦空房子

徐沛

主攻魯迅

1

一篇介紹王友琴和她開闢的網上文革受難者紀念園的文章透露這位「歷史的義工」在大陸中國社科院當研究生時曾「主攻魯迅」。目睹這四字時，我樂了，一來找到可以請教的行家了，二來這也適合我，不過我不是攻讀過魯迅，而是正在攻擊魯迅。

我03年上網獲知王友琴後就十分敬重她的作為，就像我88年出國後獲知特莉莎修女而自愧不如一樣。無論是因上帝專門護理貧病交加的活人還是為良知紀錄受難屈死的故人都需要極大的承受力，非大器者不能勝任。我屬易盈的小器，一枝煙的臭味就足以把我熏得逃離現場，也因此我對魯迅等人在仇恨的怒火中散發的毒氣十分敏感。

我02年在大陸巧遇法輪功學員以前，寄生德語文壇，難得用母語寫作，感謝法輪功讓我有精力和耐心把腦袋裏積攢的想法先用拼音再選號碼一字一句地敲進電腦。我也不再樂於遊外國山水，而是有空就上

中文網絡。互聯網讓散佈世界各地的華人能便利地互通信息、交流思想。「金盾工程」也好、網絡共特也罷，豈能阻擋眾志成城？雖然中共國和中文網的現狀不令人樂觀，但我通過修煉能處之泰然，尤其是明白了天下興旺匹夫有責的深層含義。

作為六四屠殺發生後為了追根溯源而在馬克思的故國就讀哲學系的中國女人，上網後我意識到我早該把在自由天地裏採摘的思想果實與讀者分享。共產黨顛覆了中華民國後對其獨裁下的大陸人民實行謊言轟炸、暴力威脅，國民猶如井底之蛙，既難突破信息封鎖，也難打破思想枷鎖，而誰對其騙局有所醒悟，誰就難逃殘酷迫害。簡言之，祇要身在大陸就不可能自

由地探索人生真諦、中國文化（儒釋道），當然也不可能獲知「新文化運動」實為反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的旗手陳獨秀、胡適和魯迅等堪稱中華民族的不肖子孫。

由陳獨秀創辦於1915年的《新青年》和鼓吹的共產主義都是

在用美麗的謊言唆使幼稚的讀者無視起碼的道德規範「仁義禮智信」（儒教），為爭權奪利而，謀財害命。就是說馬列主義是在五四運動時打著民主和科學的幌子誘騙了熱血青年的追隨，從而破壞了中國社會的道德根基和健康發展。陳獨秀誨盜誨淫，自食惡果，他倒是被共產國際從監獄裏收買出來，並因此為其效勞直到被開除，但卻誤導兩個兒子為革人命而喪自身。中共奪取政權後，大肆篡改歷史，陳獨秀們被掩埋，但祇要睜眼看看共產黨給中華民族帶來的禍害，就不難得出陳獨秀作為禍根應該被埋葬的結論。胡適高呼「打倒孔家店」，鼓吹自由主義，也因此招來惡報，不僅被迫離鄉背井，還被得意門生毛澤東和親生兒子反戈一擊。不知他是否知道教導詩、禮的孔丘深得學生和兒子的敬愛！

魯迅則不然。死前他淪落為共產國際的筆桿子，屍體則被中共用「民族魂」的紅旗覆蓋，偽造成了「中華民族的脊梁」，從而影響了新青年，紅衛兵，

還繼續影響著大陸人。好在看透魯迅的人越來越多。自視魯迅天敵的我和好些人交換過意見，其中一位瞭解大陸知識界的流亡記者說49年以後大陸有不少人靠魯迅吃飯，而他們中早有人不再歌頌魯迅。記者本人上高中時就對魯迅有負面看法，但因為是黑五類子女不敢亂說亂動。見一位流亡學者把五四運動看成小資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就想與其說五四造反派是財產不多的小資產階級，還不如說他們是欠缺智慧的小知識份子。否則，他們就不會把在國外學到的一點皮毛拿回祖國當上方寶劍，扼殺中華文化的命脈。所以，我很高興一位流亡名士收讀我倒魯批胡的文章後來信表示：

所言極是。

據說，民國初年，國小廢讀經，由胡適倡；之後，中共、魯迅更甚之，斷了我中華的香火。中華經典有普世的價值，中國之不國，根由於廢經；未來欲興國，必由倡經始。

當我出生那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爆發時的紅衛兵則祇能算作無知識份子。北大紅衛兵在抄了章士釗家後把「痛打落水狗」的魯迅口號貼在了大門上，清華附中的紅衛兵把同學鄭義斥為鄭狗打得扒在地上，差點就和別的老師和同學一樣成了王友琴筆下的冤魂，好在他大難不死並成為「尋根」揭底的名家。我問過，這位流亡作家對魯迅沒有好感。高舉魯迅大旗的是余秋雨，魯迅也不如他罵胡適惡毒，他在文革後期出手的聲討胡適的專文曾把一位有良知的老人活活氣死！

如此魯迅禍害，能不著手清算？

2

獲知王友琴曾主攻魯迅後，我趕緊找上門去，希望她能拔筆相助，畢竟中共國成立17年後我才出生，17歲後主要以外文為業，而離開中共國也17個年頭了。

我攻讀過的作者不少，恰巧沒有魯迅，但這些作者我都無暇顧及，因為沒有人像魯迅那樣明明自己有病無知，卻謾罵先賢和他人，還要吶喊「救救孩子」。比如在德語文壇以「醜聞作家」著稱的葉莉內克就自己承認：她思維方式不按常理，幾乎祇接受負面訊息，充滿仇恨。所以今年諾獎獲得者公佈後，她

和別人一樣對自己中獎感到驚奇，以致愁多於喜，不敢去挪威領獎。對這位我做學士論文時涉及的共產黨員我雖然也反感，但更同情，她知道自己有病，我怎麼好再攻擊？

沒想到王友琴在我發給她的倒魯系列中祇注意到我的二舅，而我正是因為她才想起我們家也有位在文革中「自殺」的教育工作者。出身富農的二舅13歲時中共奪取政權，長他兩歲的我媽在父亡家破的情況下初中畢業就為了養家糊口而參加「革命工作」，資助二舅讀完中學並考上師專。

15歲起就接受中共「思想改造」的我媽堅信共產黨偉大光榮正確，她聽我提起「自殺」的二舅，似乎新仇舊恨湧上心頭。在她看來二舅「讀書讀傻了」！我爸在文革時也挨打，但忍辱負重，帶著被打聾的耳朵活了下來，如果二舅能像我爸這個「大老粗」一樣堅強，不也被「平反」了嗎？我讀的書比我二舅還多，當然也就更傻，黨的知識份子政策比過去好多了，電視上能說會道的不都是知識份子嗎？我居然不知好歹……在我為了回答王友琴的問題打電話給我媽時，討來一陣罵聲。無奈我祇好把我媽的電話號碼發給王友琴，希望她直接向我媽打聽想要的史料，或許還能順便治療我媽這位文革間接受害者扭曲的心理。

無論挨誰的罵，我都把賬算在周樹人頭上，因為是他樹立了罵人的榜樣，帶壞了包括我媽在內的中華兒女，更何況我媽不僅姓魯，也像他媽一樣試圖包辦兒女的婚姻。而我對神靈、孔子和母親的態度與魯迅截然相反。

留日學生周樹人專程回國尊母命娶了一位不愛的女人為妻，因為這是他媽「送的禮物」，迫使對方守了一輩子活寡不說，最終還被拋棄。而魯迅這個他因母姓而取的名字壓倒了原名和他罵人所需的一百幾十個匿名。於是周樹人便因魯迅之罵名而被與他一樣慣於罵人和整人的毛澤東封為「聖人」，取代了孔子，成為49年後全體大陸學生必念的課本。毛澤東能發動和利用紅衛兵搞「無知份子文化大革命」，不就因為這批中共國的同齡人從小就被赤化、毛化和魯化。

我在中共國也曾頌毛學魯批孔，受到同樣的毒害，但卻有幸讀古書學外文，並在22歲時出國避婚。現在想來我擺脫母親控制與清除「共毒魯害」同

時進行，因為我媽沾染的正是中共或曰魯迅作風，就是說她既不懂敬天畏神，也不知尊重他人。如果魯迅有戀母情節的話，我則有畏母情節。我大學還沒畢業，我媽就忙著替我選夫。出國後我寫了數封家信想讓我媽明白人命天定的道理，但毫無成效，她至今企圖為我做主，我也只好躲著她。不過我發現畏母者，非我一人也！公開承認的有李銳之女李南央，林彪之女甚至因畏母曾自殺不遂。

49年以後的中國社會男不忠女不貞父不仁母不愛似乎是常態，與李南央、清水君相比，我的父母還算好的。李南央和清水君受到的簡直就是虐待，以致清水君15歲時曾被父親傷害得去泰山自殺。這一切與在陳獨秀、魯迅和胡適的示範作用下「神聖被踐踏、下賤被美化」密切相關。謀財害命被說成是為了實現共產主義。亂搞男女關係被說成是反「封建禮教」，和第三者亂來則被說成是為了偉大的愛情。埋伏在魯迅身邊的中共地下黨員說白了就是為了爭權奪利而不擇手段的騙子。

每次看見有人把中共的罪惡算在祖宗頭上，把共產專制與「封建專制」混為一談時，我就想孔子所描述的大同社會比共產主義理想早了兩千多年，為了實現大同社會孔子言傳身教的是仁義道德，而「五四」人卻崇洋媚外，要打倒孔子，後繼者更要號召青年暴力革命，以實現共產主義理想，如此大的區別難道不是祇有在魯迅的陰影下才會被人忽視嗎？東方智慧和魯迅思想背道而馳，為了弘揚中國文化，我祇好回過頭來主攻魯迅！

曾主攻魯迅的王友琴忙於記錄在文革時發生的中國自有學校以後兩千年來未有的暴行，而無暇顧及魯迅，依我之見，這何嘗不是對魯迅的間接批判？

2004年金秋於科隆大教堂邊

啟事

本刊於十月中旬曾向所有組成人員和新聘人員發出征求意见書，至十一月中，絕大部份都已回信，其言語、意見等均十分令人感動（下期摘發）。目前尚有極少數人員沒有回信，其中若有因地址變遷、工作調動或出差旅行而未及時收到征求意见書者，或請投書本刊索取意見書，或在接到後仍可回信提意見和回答本刊的問題。

黃花崗雜誌社



柳如是 你在哪裡？

劉國凱

近年來，清宮戲、辮子戲在中國大陸的銀幕熒屏上呈排山倒海之勢。滿清的皇帝們被挨個兒奉上雲端，一個個都被讚頌為勵精圖治、勤政愛民、才華橫溢的好君王。在從順治到乾隆四朝皇帝都歌頌遍了後，編導們興致仍濃、意猶未盡，除正在籌劃歌頌滿清帝國的開國者、虐殺漢民不眨眼的屠夫努爾哈赤外，還著力歌頌一位滿清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博爾濟吉特。這位出自科爾沁草原的蒙族女子、皇太極的宮妃、順治的生母、康熙的祖母被描繪得絕色天姿、賢淑聰慧、足智多謀。當代中國大陸領尖級的幾位女星——斯琴高娃、潘鴻、寧靜都在幾個不同的劇本中奮力鋪陳「孝莊皇后」的丰采。寧靜演繹其活潑美豔、潘虹演繹其機警智慧、斯琴高娃演繹其深沈威嚴。於是，熒屏前的觀眾無不被「孝莊皇后」的動人形象所傾倒。

在當今排山倒海而來的辮子戲中，由於「孝莊秘史」所讚美的是一滿清皇族女性，尚使之不似歌頌屠夫努爾哈赤、文字獄的瘋狂實行者玄燁、雍正、弘歷等那麼令人神傷，但這卻使我想起另外一個漢族女子。相比之下，這位漢族女子是否更值得讚美呢？她的名字叫柳如是。

明朝萬曆四十六年，後金天命三年，亦即公元1618年，一個女嬰降生於浙江嘉興某個赤貧之家。就如已故國寶級歌手鄧麗君所唱的那句催人淚下的哀怨歌詞所陳：「爹娘生下了我就沒有照管，為祇為家貧寒才賣了小奴身」，這女嬰就是柳如是。

幼年悽惶的柳如是家世已不可考。由於她甚幼已被輾轉販賣，以至其真實姓氏也無從得知。崇禎元年

(1618年)柳如是10歲時江南名妓徐佛收養了她。從此她的生平才有了確實的記錄。

徐佛非同尋常。她除了豔壓群芳外，還甚具文學藝術素養。能成為她座上賓的閨中客者當非一般市井之輩，均為不凡之文人雅士。被賣作徐佛家婢的柳如是能來到這樣的環境中亦算是不幸之中的有幸。令人無限驚異的是，生身父母極端貧困，文化素養亦會極為低下，換言之，胚胎期間既十分缺乏營養，又無先天優良因子接受，可是，柳如是竟生得極為秀美和聰慧異常。在徐佛處幾年之間柳如是就甚通文墨、善彈曉吹了。

這時，致仕歸籍的前內閣大學士周道登看中了柳如是，並納她為小妾。由於她才貌實遠非周的群妾可比，故深受周的寵愛。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周的群妾誣柳如是與男僕私通，柳如是遂被逐出周家。時年僅十四、五歲。這段遭遇雖然辛酸，但在藏書極為豐富的周府裏，又兼周道登常把她「抱置膝上，教以文墨」，使柳如是的文才有了進一步的提高。

離開周家後，柳如是步向廣闊的天地。她「扁舟一葉，放江湖山間，與高才名輩相遊處」。絕色與奇才使柳如是名聲鵲起。複社、幾社的青年學子們都爭相一睹風采、一和詩韻、一親芳澤。詩酒歡會之上，柳如是與之即席唱酬、和韻步詩，絕色天麗與敏捷詩才相疊，更加傾倒了眾生。

柳如是雖為妓，但「凡所敘述，感慨激昂，絕不類閨房語」。她除了感憤地陳述自己不幸的身世遭遇外，還「豪宕自負，有巾幗鬚眉之論」。這既使她與青年學子們憂國憂民的理念情懷有了交集與共鳴，又使她從他們那裏得到了更多的信息、開闊了視野，還使她與他們之間建立了完全異於通常妓與客之間的關係和感情。

名妓花魁的生涯雖終日為琴曲醇酒所擁抱，但柳如是並不迷醉其中。她嚮往正常的良家生活，即便清貧也罷。幾年之間柳如是與李待問、宋徵輿、陳子龍等都發展過一段戀情，但迫於封建禮教所阻皆花開無果。尤其是與陳子龍的一段情，雙方情切意篤，共築愛巢於松江南樓。期間，柳如是為人校書取酬維持生活，陳子龍埋頭攻讀以備科試。有時兩人賦詩作對，互相唱和。清茶淡飯滋潤著恩愛美滿、纏綿悱惻的生活。可是，美景不長。半年後陳子龍妻帶著一桿人鬧

上南樓。柳如是不甘受辱，悲切而毅然地離去。但她終身都忘不了與陳子龍的這番刻骨銘心之情。

幾年後柳如是認識了東林巨子、文壇領袖錢謙益。時年五十七歲的錢謙益被奸臣溫體仁等陷害丟官歸籍。柳如是早聞錢氏才華蓋世，為一代之宗。而錢氏也風聞轟動吳越、名滿金陵的柳如是。經過一些交往後，柳如是決定擇錢從良。崇禎十三年(1640年)，二十二歲的柳如是不施粉黛、方巾儒帽地晤見錢謙益，言願以終身相托。錢謙益大喜過望，儘管元配尚在，但仍於次年以大禮迎娶柳如是，以繼室論之。此舉驚世駭俗而致非議四起。舉行婚禮的船被人扔進了許多瓦石。然而世人沒有想到的是，這段深受非議不被看好的婚姻卻能始終不逾生死相隨。身份和年齡的極大差異沒有成為他們感情的障礙。康熙三年五月二十四日(1664年6月17日)錢謙益病故。得年八十二歲。三十四天後，柳如是自縊身亡，年僅四十六歲。

柳如是下嫁錢謙益，對錢謙益的思想行為影響甚大。錢謙益才華橫溢卻醉心功名。雖為東林巨子卻缺東林風骨。生平多介入官場權勢爭鬥。宦海失意後，為求東山再起不惜投靠馬士英之流。清軍南陷金陵後，為再續仕途竟出降滿清。柳如是對錢謙益的這種做法極為不滿。本來在清軍破城之時，柳如是就勸錢謙益赴水殉國、以全名節。見錢猶豫不決便率先奮身赴水，不期被錢死死拉住。而更沒想到的是後續事態更加不堪，平素吟詩作賦滿紙氣節風骨的錢謙益竟異裝辯發地北上燕都去獻媚清庭以求封授。柳如是悲憤之餘堅拒與之同行北上。雖然幾個月後錢謙益就因封授太薄——僅得禮部侍郎——快快稱病謝職而歸，但夫妻感情由此已產生巨大裂痕。柳如是以「秦淮八艷」之首的絕色天姿嫁與年近花甲、官場失意的錢謙益為妾，仰慕的是他的才華和氣質。一旦錢變節事清，這一切都化為烏有。夫妻感情的基礎也就隨之抽掉。

所幸在柳如是的責備和勸說下，在眾多故舊門生抗清事蹟的感染下，錢謙益終究斷絕了仕清的念頭，而且非但如此，還走上了秘密抗清之路。夫妻倆拿出錢財支持許多抗清活動，如黃宗羲、黃毓祺、姚志卓等人的組軍反清活動，錢謙益柳如是都給予過資助。柳如是還親自「至海上犒師」，慰問激勵抗清義軍。錢謙益則不顧古稀之軀四處奔走聯絡抗清起義活動。

策反降清的原大明將領。如順治七年(1650年)和順治十六年(1659年)錢謙益曾兩次親自到清軍金華總兵馬逢知的大營策反。其中一次爲了給錢謙益壯膽，柳如是伴送錢謙益到蘇州等候。他們還救援撫恤抗清死難義士遺屬，如出資救援系獄多年的張煌言的妻與子出獄。

然而山崩地裂之勢終非少數義士之力可以扭轉。反清復明的願望終成泡影。錢謙益不禁仰天長歎：「敗局真成萬古悲」，「苦恨孤臣一死遲」。不過錢謙益可引以爲慰的是，在這抗清復明的秘密活動中，在民族大義的旗幟之下，他們夫婦的感情始終堅如磐石。順治五年(1648年)錢謙益因秘密抗清活動事泄被捕，生命危在旦夕。錢的髮妻及其子女皆噤聲自保，臥病中的柳如是掙扎起來四處奔走，上下打點說項，終於救出了錢謙益。錢對此感慨萬千，道：「慟哭臨江無孝子，從行赴難有賢妻」。

當今中國大陸的影視編導們當然有權利去製造大量劇目歌頌滿清帝和皇后，但我們同樣有權利對此加以評說。他們有他們的編導權，我們有我們的評說權，互相不可剝奪。評說之一可以是孝莊文皇后與柳如是誰更值得讚美？

在此我們不妨暫時撇開人文因素，而祇從演藝角度去考量。因爲從人文因素的角度出發，我斷然拒絕所有歌頌滿清皇帝的劇目。康熙、雍正再勤政理財也是建立在殘酷屠殺漢族人民和嚴厲實行民族歧視、民族壓迫以及文字獄的基礎上。孝莊皇后再好也是在維護那個壓迫漢民族的滿清政權。對他們都不值得作社會層面上的讚美(至於學術界、政治人物們去總結借鑑他們的治國經驗則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我們能接受對滿清皇帝的歌頌，那也就能夠接受台獨份子歌頌日本的說詞。台獨份子親日的理由之一，就是當年台灣的日據政權要比國民黨政權勤政、廉潔、高效率得多(是否當真如此，還要有待於台灣或日本的良心學者去潛心研究和論證)。

演藝界的賣點之一是美。影視劇目中的年青女主角大多以美取勝。故「孝莊秘史」由當今影視大美人寧靜擔綱。孝莊與柳如是誰更美？孝莊被譽爲「滿蒙第一美女」，柳如是則居「秦淮八豔」之首。沒有相片爲據確難比較。但可作這樣的分析。

蒙古利亞人種分北、中、南三個亞支。北支以操阿爾泰語系的中國長城以北的遊牧民族爲主。南支爲中南半島和南洋群島上的土著。中支主要就是華夏族。北支雖膚色白皙可人但圓臉細眼，美女不可多得。南支膚黑身矮、眼深鼻扁、嘴闊唇厚，故美女寥若晨星。(南支又稱馬來人種)中支華夏，膚色白裏透紅、秀眉美目、鼻直唇潤。無論是在燕京形勝之地，抑或在蘇杭田園湖畔；也無論是在成都天府之國，抑或在桂林山水之間，都是三步之內必有芳草。以數學概率論推繹之，孝莊之美如何美得過柳如是？何況柳如是並不單具五官之美。她的文學功底、詩才琴曲、書法畫作，樣樣堪稱上乘。這連「秦淮八豔」中的其它七位都望塵莫及，遑論生長於粗獷的科爾沁草原、十二歲就嫁給三十三歲的皇太極爲妃，繼而生兒育女的博爾濟吉特。儘管她也聰明伶俐，但與柳如是才氣縱橫相較，想必一定是要黯然失色的。

不過，外在美並不具決定意義，內在美有時更能震撼人心。孝莊皇后的內在美編導們已鋪陳得夠多了。柳如是的心靈如何呢？

杜牧詩云：「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柳如是曾陷青樓，當然是杜牧詩中的「商女」。但這個「商女」竟是如此地不同凡響。她關注天下，心憂時局。她欲身殉國難，她責夫君失節。夫君轉變後，她鼓勵、協同夫君聯絡、策動、資助各地的反清活動。夫君有難，她冒死相救。她甚至還親自去犒賞義軍，就差沒像梁紅玉那樣上陣拼殺了。最後在社會惡勢力的逼迫下，她抱著絕不受辱，絕不苟且偷生的信念懸樑自盡。這既是在以死抗爭，也是爲國盡忠、爲夫殉情。這哪裡是什麼「商女」，這明明白白是義薄雲天的慷慨悲歌之士，是可歌可泣的民族女英雄。

以柳如是的身世經歷爲線索可以編導出一巨部連續劇。它的賣點極多。社會上各個不同年齡層次、各種不同地位處境的人們都可被其中某個或某些內容激起劇烈的心靈碰撞。柳如是之美是賣點。柳如是的詩才琴藝是賣點。柳如是與李待問、宋徵輿、陳子龍等的愛情糾葛更是賣點。而猶具震撼意義的，卻是柳如是和錢謙益的危險抗清活動，就不說錢的抗清活動乃爲其美婦所激勵。

作為藝術的真實還可對歷史事實稍作加工和安排。譬如把陳子龍的起義殉難從順治四年(1647年)往後稍延，從而加進柳如是對陳子龍起義的幫助，而這必然滲透著昔日情愛的成份，使之更加纏綿而又悲壯。陳子龍罹難後柳如是當痛不欲生，那揉合著國破家亡、情人長逝的雙重悲痛的美人之慟，通過演技高超的影星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再加上緊配劇情激動人心的音響效果，真不知會催出多少觀眾的一鞠熱淚。

此外還可安排幾個候朝宗式的人物。這些人物既受李香君的責備，也受柳如是的譴責或勸喻。他們有的彷徨；有的沈淪；有的幡然省悟、重新振作；有的在功名利祿的吸引下堅持走向賣國求榮、賣友求官的邪路。在柳如是的主線之下可作橫向鋪開。「秦淮八艷」其它幾位，李香君、陳圓圓、董小宛、顧橫波、馬湘蘭、寇白門、卞玉京等都可排上戲份。南明的忠貞之士將有舞台表現出他們的忠肝義膽，那一桿無恥奸妄之徒也都能上台亮出其真面目。整整一個時代的巨幅畫面將如此地展現在觀眾面前。這其中有民族大義；有人間正氣；也有兒女情長和個人間的愛恨情仇。觀眾們將從中瞭解歷史，洞悉社會、體驗人生，受到啓迪，得到教益。

多麼好的題材，多麼好的劇目，怎麼沒有人去寫，沒有人去編導呢？眼下當紅的「第四代」、「第五代」編導們，他們知道中國歷史上有柳如是其人嗎？也許他們會知道有個李香君。因為孔尚任寫了個「桃花扇」。這在電影戲劇學院的本科教材中會提及。而且六十年代大陸電影界還拍攝了影片「桃花扇」。主角是著名演員王丹鳳。然而對於柳如是，他們會知曉嗎？

其實要編寫一部歷史大劇<柳如是>並非難事，因為現代史學泰斗陳寅恪先生早已撰有八十萬字的巨著<柳如是別傳>。時下的編劇者祇要進行加工改制便成。我不敢說這些大腕編導們的歷史知識缺乏得不知柳如是系何人，但我擔心的是，他們會有興趣去加工瓊瑤的辮子鬧劇、清宮劇<還珠格格>，而沒有興趣去鑽研一下陳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別傳>。

從更深層的社會原因去考察，這種現象與中國大陸當局的民族政策有關。當局在所謂「維護民族團結」的旗號下，不鼓勵、不主張、實則禁止演藝界製

作表現歷史上漢族人民反抗北方少數民族南侵題材的劇目。在這種社會生態下，非但少為人知的柳如是上不了銀幕熒屏，就連家喻戶曉的岳飛、文天祥都要被冷藏。至於衛青、霍去病、蘇武、班超等人的事蹟更是被一概抹去。甚至連岳飛都不能稱之為民族英雄。

但是鬧劇<還珠格格>可以連篇累牘地拍下去，歌頌滿清皇帝的辮子戲可以大行其道，甚至動輒成千上萬地屠殺無辜漢族民眾的努爾哈赤都要被奉上舞台讚頌一番。而這一切卻又不損害民族團結了。看來中國大陸當局是不把漢族人尚殘存的一點民族意識都消蝕盡是不會罷手的。

那充斥清宮戲的熒屏，恍然間使人感覺時光倒流，以為張勳復辟已經成功。從孝莊到慈禧，還有那成群的格格們在銀幕熒屏上神采飛揚、輕歌曼舞，構成了一幅多姿多采、五光十色的畫面，可是我們的柳如是啊，妳在哪裡？

德國諺語



國寶於民，民寶於信——

假使這個人對你說，世界上根本沒有忠實人，那麼你可以斷定他一定是個惡徒。——伯克萊

當一個人承受眾人的信託時，他應該視自己為眾人的份財產。——傑佛遜

一顆誠實心的唯一缺憾是輕信。——毛姆

你可以在所有的時間中欺騙某些人，你也可以在某些時間中欺騙所有的人，但你卻不能在所有的時間中欺騙所有的人。——林肯

外表往往與事實本身不符，世人卻容易被表面的裝飾所欺騙。——莎士比亞

天才是做它需要作的事，能力是做它能夠作的事。——李頓

常識是本能，而豐富的常識卻是天才。——蕭伯納

有一種東西比才能更罕見，更優美，更珍奇，那就是知人之明。——巴頓

思想可以使天堂變成地獄，也可以使地獄變成天堂。——米爾頓

具有高貴思想的人，永遠不會感到寂寞。——西格尼

鄭貽春 (大陸)

五十五年共產統治

何功之有？

網上文選

從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到二零零四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走過了五十五個年頭。從"解放區的天是晴朗的天"到"帶領我們走進新時代"的胡溫政權，五十五年來的共產統治，哪一天不是歌舞升平、紅旗招展、鑼鼓喧天、捷報頻傳、喜慶洋洋？哪一天不是禍國殃民、災難連綿、淚水滔滔、冤獄縱橫、生靈塗炭？請問，五十五年共產統治，何慶之有？何功之有？

回過頭來，人們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這個已成歷史的五十五年，是極權專制主義剝奪中國人民自由的五十五年，是社會主義制度以黨權及其派生的政權壓迫人權、殘害人權、屠戮人權的五十五年，是紅色王朝肆意濫權、胡作非為且橫行霸道的五十五年，是中共及其黨魁滅絕人類文明普世價值的五十五年。

一個依靠暴力、恐怖與謊言建立起來的革人命政權，恐怕同樣也得需要用野蠻、殘忍與暴虐的方式維持其殘民以逞且草菅人命的苟延殘喘；五十五年的共產罪惡之所以如此地其勢洶洶、如此地兇神惡煞、如此地讓人不可理喻，究其根源，乃是共產極權先天不足的非非法性所必然導致的慘烈之結果！正如史學家辛灝年在其史學著作《誰是新中國》一書中明確指出的那樣，中共執掌中國大陸的統治權，是封建專制主義的現代復辟，是對孫中山先生確立的三民主義的背叛，是對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的非法顛覆。辛灝年的這個分析是言之成理的、也是精闢的，其所做出的結論無疑也是正確的。中共實際上是一個依靠武裝割據、武裝叛亂、武裝暴動發達起來的暴力集團。中共黨史對此也同樣地供認不諱。中共所搞的那一套挾槍自重、不斷擴張勢力，並最終成王稱霸的豐功偉績，不過就是中國歷史上無數次農民起義的現代翻版

而已。中共及其領袖毛澤東通過長期的武裝割據，尤其利用日軍侵華的民族危難之機，採取一系列消耗國軍力量、坐山觀虎鬥、不斷發展自己的陰謀詭計，以逸待勞，大搞兄弟相殘、民族內耗的國共內戰，終於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成功地分裂中華民國，建立了人類歷史上最殘忍、最暴虐、最無恥的法西斯主義共產政權——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一個與中國歷史上歷朝歷代的封建王朝別無二致的新的社會主義紅色王朝！祇是其殘暴與專橫為“史無前例”罷了。

建政之後，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黨馬不停蹄地立即對所有異見者、中華民國工作人員、農村富人(地主、富農)和城市富人(資本家、工商業主)大規模地展開了連綿不絕的迫害、鎮壓與屠殺。各種政治運動此起彼伏，身心倍受摧殘，人頭滾滾落地！在被中共稱作偉大領袖的毛澤東統治之下，中國人民竟有八千多萬人死於非命。如果說二千多年前曾經坑埋過四十萬趙國兵士的秦朝大將白起是個十惡不赦的殺人魔王，那麼，我還真不知道管這個比白起還要兇殘千百倍的毛澤東應該叫做什麼東西？！難道說，我們還要像中共第四代黨魁胡錦濤所講的那樣，「繼續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嗎」？

無論從哪一個方面看，無論從哪一個角度講，毛澤東統治中國大陸的前二十七年，是沒有什麼可以慶祝的。完全是王朝復辟的歷史，完全是極權專制主義禍國殃民的歷史，完全是自吹自擂偉光正的中國共產黨及其黨魁毛澤東殺人放火、橫行無忌、罪惡累累、罄竹難書的歷史。毛澤東之罪，恐怕遠遠超過自秦始皇以降二千多年君主統治所造罪孽之總和！如今，毛澤東的罪惡仍然未有得到任何清算，相反倒是一如既往地成為現任黨國要人頂禮膜拜的牌位，實乃中華民族的奇恥大辱！實乃人類文明的奇恥大辱！

毛澤東於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死於任上之後，由其生前親自選定的接班人華國鋒繼承中共中央主席之大統。英明領袖華主席搞了兩個「凡是」，又搞了個「洋躍進」，經過相當激烈的宮廷內鬥，終於敗給三起三落的鄧小平。鄧小平堂而皇之地掌握了社會主義封建朝廷……中共中央的最高權力。由於對毛式人民公社等集體所有制的強烈不滿，中國廣大農民自發地搞起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由於廣大知識份子對迫害知識份子的統治極為不滿，由於廣大工人對自身處境

表現出極大不滿，由於中國人民對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對於社會主義制度的強烈不滿，鄧小平不能不順勢而為，不得不採取某些尊重民意的政策措施：在農村破除人民公社集體所有制，在城市提倡商品的自由生產和自由流通，對知識份子採取懷柔政策等等。尤其提出了解放思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實事求是等一系列被稱之為撥亂返正的方針政策，以鄧小平為最高統治者的中共終於維持了搖搖欲墜的統治地位。即便其後所搞的改革開放，也絲毫沒有什麼新鮮之處，因為本來就應該開放，根本就不應該封閉。以往的閉關鎖國，完全是由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共一手造成的罪惡。並不是因為改革開放有多麼好，而是因為改革開放之前的狀況實在是非常之糟糕！

改革開放的最大失誤是：在政治方面仍然像毛時代一樣的一黨專政法西斯、一樣的黨控媒體、一樣的社會主義王朝制、一樣的總書記皇帝、軍委主席太上皇，總之一樣的「偉光正」，一樣的無德、無道、無恥的「三個代表」！

改革開放二十五年來，中國人民何曾有過歡欣鼓舞的政治自由？在中共的極權專制主義統治下，中國人民的思想不允許有任何自由。有那麼多的陳規戒律在束縛，如，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這些提倡暴力革命的共產理論形成了範圍廣大的思想禁區，誰都觸碰不得；中國人民的言論不允許有任何自由。一切都必須堅持所謂正確輿論導向。如果不堅持唯一真理的共產理論，中共就要說你是錯誤，就要說你是反動。反而言之，中共極權專制主義的法西斯主義言行卻是永遠地「偉光正」、永遠地英明無比。五十五年來，中共從來都是執行毛澤東所再三強調的輿論一律，總是搞「祇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尤其成問題的是，很多直言進諫者竟被毫無道理地關押進社會主義黑暗而潮濕的文字獄，根本就不能繼續表達他們憂國憂民的好意見、好建議；中國人民的行動自由遭到了全面徹底的取締。請願不行，遊行示威不可以，上訪被指斥為擾亂社會治安。誰要是捍衛自己的基本權利，不是說你犯錯誤，就是把人給弄進局子裏去。似乎什麼事情不幹，倒可能正好；祇要是想幹一點事情，那就要成為大問題！

在鄧小平讓一小部分人首先富裕起來的政策主導下，共產黨的貪官污吏們通過權錢交易、權力尋租、賣官鬻爵、內幕分贓等方式的確是首先富裕起來了。尤其在八九年六四大屠殺之後，在沒有任何制約與監督的情況下，共產官僚們濫用權力，肆意妄為地欺壓人民、巧取豪奪，無所不用其極地使自己賺得個腦滿腸肥。中國社會由此進入了全面腐敗墮落的王朝末世。實踐證明，不搞政治體制改革、沒有政制變革的經濟改革，到頭來恐怕不得不付出相當昂貴的乃至極其巨大的社會成本，並極大地遲滯了中國大陸的社會發展與歷史進步。

一九八九年江澤民登上社會主義皇位之後，獨裁戲子的荒唐表演更是無可遏制地加劇了腐敗、專制、無能的共產統治對中國大陸的進一步毒害。江澤民執政中國大陸長達十五年之久。在江澤民的罪惡統治下，正義不彰、邪惡橫行、人性墮落、良知匱乏、道義崩潰、信仰皆無。無論中國大陸的政治生態，還是經濟生態，抑或是文化生態等，都均已徹底地粗鄙化、劣質化，且是滿目瘡痍的潰爛！

五十五年的共產統治已把勤勞善良的中國人民都給推入到萬劫不復的極權專制主義深淵裏去。中國人民不但沒有被賦予任何自由、民主、人權、法治，不但沒有任何物質富足與精神富足，相反，直到如今，中國人民仍然不得不面對觸目可見的貧窮、落後、愚昧，不得不面對一代又一代公權私授的權力交接之野蠻、一黨專政的自吹自擂、無產階級專政的暴虐，還有社會主義王朝的厚顏無恥！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五十五年，何慶之有？中國共產黨及其黨魁無能、腐敗、專制、流氓的罪惡統治，何功之有？

二零零四年十月一日

黑暗的社會腐敗的黨

（大陸） 汪達林

存在決定意識，這個世界上從來就沒有無緣無故的愛和無緣無故的恨，中國社會制度禍國殃民的現實，中共腐敗的現實決定了我的思想情感！

我是武漢市華麗家具裝飾配套公司的一名工人，1994 年「華麗」被武漢富豪（集團）有限公司兼併至今，「富豪」一直勾結中共黨委領導負責的一些單位，採取先剝奪「華麗」職工知情權的方法，然後大肆侵害「華麗」職工的合法權益，10 年來每月祇發給我和幾百名「華麗」職工每人不超過 100 元的生活費，共非法侵吞了「華麗」職工幾千萬元血汗錢。「富豪」還存在利用兼併「華麗」之機勾結國家官員和「華麗」領導，採取低估「華麗」資產，減免「富豪」幾年稅費，幾十畝土地批租費配套費等手段非法侵吞幾千萬元國有資產的嫌疑。

10 年來我爲了維護自己和「華麗」職工的合法權益，學習相關法律知識，反復去法院起訴「富豪」，可是法院先是幾年都不受理，後來受理了區市法院又都進行非法判決，我依法向省市法院申請再審，省市法院全都非法拒絕再審，我向中國的各級黨政機關，各級人大，各級檢察院，各級法院和幾十家新聞媒體等單位反映和申訴，可是至今根本沒有一家單位進行管理和報道，而我卻耗費了 10 光陰。

由於「富豪」長期嚴重的侵害「華麗」職工的合法權益，導致「華麗」職工的生活極其貧困，10 年來估計直接或間接導致「華麗」職工及家屬死亡的人數在 300 人以上，「富豪」的老闆郭連方應判死刑，可是郭連方及其勾結者至今不但全都逍遙法外，而且還在繼續侵吞「華麗」職工的血汗錢和生命。導致這種惡劣現象的根本原因是中國沒有民主自由，中國的各級官員深知他們的職位和權力，不由中國人民直接選舉決定，中國也沒有新聞媒體自由，人民沒有途徑揭露他們的罪行，所以他們有了權力就官商勾結，欺壓人民，完全不顧中國人民的死活。

我現在活著除了痛苦，惟一能讓我內心感到安慰和愉快的事，就是跟中共這一腐敗的政黨鬥，跟中國現在黑暗的社會制度鬥。2000 年 6 月我到北京去上訪，遭到了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人民來訪接待室的推託不管後，我坐在從北京回武漢的火車上，內心的悲憤達到了頂點，在火車上我創造發明了愛國文化衫運動。發起愛國文化衫運動的倡議書就附在後面。今後我如果遇害了，盼望有人幫助我繼續發起愛國文化衫運動。謝謝！

附：倡議書——發起愛國文化衫運動

中華同胞們：

在世界各國都進入民主社會，人民都過上了幸福自由生活的 21 世紀裏，在中國官員腐敗道德淪喪的今天，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新中國的神聖使命已更加突出的擺在了我們面前，我們不僅要爲我們自己負責還應該爲我們的國家負責。今天我再一次倡議發起一場愛國文化衫運動，盼望全中國人民都能積極參入到這場偉大的愛國運動中來。

我認爲真理必須經常反復的宣傳，因爲謬誤也有大批的人在反復的宣傳，然而在中國沒有新聞媒體自由的今天，中國人民祇有用文化衫來宣傳真理。愛國文化衫運動就是主要以自己的衣裳爲傳媒，用在衣裳上寫字，繪畫和戴上有象徵意義的標誌的方式來宣傳真理的一項愛國運動，這項愛國運動不限制宣傳內容，祇要你認爲什麼事對你自己重要，對我們的社會我們的國家重要，你就可以參加宣傳什麼，愛國文化衫運動是以每年 6 月爲愛國文化衫運動月，以北京天安門廣場爲每年愛國文化衫運動月的運動中心的一項愛國運動。從今年起今後每年的 6 月 1 日，我都穿著胸前印有「民主自由」背後印有「愛國文化衫運動」的文化衫，到北京天安門廣場來宣傳民主自由，宣傳愛國文化衫運動和結交志同道合的朋友，去年 6 月我在武漢生活工作的每一天，我都穿著這種文化衫在武漢宣傳真理和結交朋友，今年和今後每年的 6 月，我在武漢生活工作的每一天，我都還會這樣做。

我號召全中國人民都積極參入到這場偉大的愛國運動中來，爲我們的社會我們的國家貢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歷史一向是人民創造的，愛國文化衫運動最終必然會喚起民眾，並會集一切正義的力量行成任何人任何勢力也阻擋不了的歷史潮流，摧毀一切舊制度！

2004 年 10 月 30 日

附註：今年 5 月 28 日，因爲我倡議發起愛國文化衫運動，並於 6 月 1 日要穿著文化衫到北京天安門廣場去，被中國當局非法關押 16 天和抄家，出獄後又遭到 24 小時的監視和軟禁。

從中國政治思想看兩岸現況及未來

美中區三民主義大同盟祕書長 郭自生

成台灣經濟起飛的世界奇跡，拉大了台灣領先大陸的差距。兩岸基本上是在各自統治的基礎上良性競爭，沒有軍事衝突，而台灣正加速朝向（禮運大同篇）

在長篇歷史電視連續劇《走向共和》中，醫學博士孫文說：「大清國人人有病」，也就是說「愚昧之病」。他開的處方就是《走向共和》。宗教家強調世界上最大的病就是無明，也就是沒有開悟，缺少智慧。我們通常說：「要努力才會成功」但是努力的方向不對還是不會成功的。有了智慧才能把握住方向，作事才會成功。有許多人很聰明，考試得第一名，但是做事卻不一定比智商差的人行。古今中外有許多有智慧的人留下很多話語，有關政治思想方面，還是以中國的最為完善。

《禮運大同篇》所描繪的大同社會到今天還被公認是政治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治國、平天下最大的道理就是天下為公的「公」字。沒有公平無私的心，如何做到「選賢與能」。一國的興衰與當權者心中所想的「大公無私」還是「以私害公」有絕對的關係。

毛澤東因為私心太重，才會實施「一黨專政」、「文化大革命」、搞鬥爭、把人分為紅五類造成外行領導內行，人民沒有言論思想自由，這是共產黨統治大陸後最黑暗的一個時期。而當時的蔣中正奉行國父思想推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把建國分為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以《禮運大同篇》所描繪的大同社會為目標認真在做，以為反攻大陸做準備。一來一往，台灣開始領先大陸。

到了鄧小平時代憑著他的智慧基本上修正了共產主義錯誤路線，強調不管黑貓白貓只要會抓老鼠的就是好貓的改革開放政策，才建立了今日大陸經濟起飛的基礎。當時的蔣經國嚴格要求部署的品格、開放兩岸探親、以「大公無私」的智慧開放黨禁、報禁、大力提拔台籍青年，「選賢與能」及品德第一的結果，造就多位優秀的閣員，繼續以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來建設台灣，推動十大建設，並進入憲政時期，造

的境界邁進。

江澤民時代繼續執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經濟政策，因此經濟持續進步，但是「一黨專政」私心還在，政治上還是沒有言論自由，「六、四天安門事件」導致海外民運之興起。收回了香港後積極推動「一國兩制」，對當時的李登輝總統所推行的「明統暗獨」的台獨政策給予多次的文攻武嚇。沒想到反而變成李登輝競選總統連任的最佳助選員。李登輝在總統任內，不認同中華民國、中華文化、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以日本人為榮，暗中支持民進黨、分化國民黨造成新黨及親民黨的成立，打壓外省籍人士，製造族群對立以達政治利益，再加上江澤民的文攻武嚇助選終於讓民進黨的陳水扁選上了總統，造成中華民國第一次政黨輪替。李登輝的「以私害公」用人以綠色為考量不管品德，這和共產黨把人分為紅五類、黑五類的心態是一樣的，所以他不但做不到「選賢與能」，反而把蔣經國留下的許多優秀官員打入冷宮，所以他能把國民黨政權弄垮就一點也不奇怪了。

由於陳水扁選上了總統後發表「四不一沒有」以安撫美國及中共對台獨的疑慮，由於私心太重言行不一，民進黨本來就缺治國人才，但用人繼續以培養綠色為考量「選賢與能」完全做不到，四年後由於治國無能，總統競選連任無望，為了轉移焦點強力推銷三月廿日把「歷史性公投」和總統大選綁起來，並強力介入中選會執行有利他的規定，再加上疑雲重重的選前槍擊事件，及國親律師團向高等法院提出包括數十冊附件的證據與調查方法，列出十二大類的選務違法型態共廿多萬筆，把此次大選的公正性弄得蕩然無存。當權者心中只有私利，不管嘴巴說的多好聽，所做的和說的不一樣，還是不得人心的。

中共國台辦在今年五月十七日以接受中共中央授權的方式發表正式聲明，批評陳水扁過去四年任期當

中自食「四不一沒有」承諾，將兩岸關係推到危險邊緣。聲明中並提出了「五個決不」的立場，強調中共對「台獨」決不容忍；但同時也提出了七項主張，包括呼應陳水扁曾提出的兩岸建立軍事互信機制，以及共同構造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的框架等，前提是「承認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最後並強調「在中國人民面前，沒有任何事情比捍衛自己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更為重要、更加神聖。我們將以最大的誠意、盡最大的努力爭取祖國和平統一的前景。但是，如果台灣當權者鋌而走險，膽敢製造「台獨」重大事變，中國人民將不惜一切代價，堅決徹底地粉碎「台獨」分裂圖謀。」由於陳水扁不可能改變他的去中國化即台獨路線，因此兩岸的現況是朝向戰爭的方向進行，這是大多數中國人所不願看到的。今天台灣的「台獨」問題其實是中共造成的。中共說，「在中國人民面前，沒有任何事情比捍衛自己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更為重要、更加神聖。」將心比心，中共以任何方式對中華民國在國際上的打壓，難道不是助長台獨勢力的原因嗎？一心想要統一，做的事卻是助長獨立，顯然智慧被「我執」與私心蒙蔽了。然而今天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在歷史上才是推翻滿清的正統，正統的中華民國可以讓叛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獨立，這已經是很不容易了，哪有叛亂的不讓正統獨立的問題。然而今天中共領導人卻利用大多數中國人反台獨的思想，一步步製造戰爭氣氛，以為有了大多數人民反台獨的支持，攻打台灣就有了正當性，這是完全沒有智慧又不負責任的做法。這就像下圍棋一樣，一百個段數低的人不一定能贏一個段數高的人。大多數的人只能看到目前狀況的下一、二步，有智慧的人卻能看到目前狀況的下一二十步，甚至更多。因此打著大多數人民支持的政策，也不一定正確及有智慧。因為大多數人民經常被政客們所左右。別忘了希特勒也是受到當時德國全國上下的支持的，因此太迷信民主而不注重個人的品德及智慧是今天很多人的毛病。所以不管是民主還是集權，「選賢與能」才是所有政治思想最基本的道理。而能否做到「選賢與能」，當權者心裡到底是為「公」還是為「私」則決定了一切。國父孫中山看到了這一點，他除了講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而外，特別強調「博愛」。宗教家所強調的「愛」和政治家所強調的

「公」，走到最高處其實是一回事。因此開放宗教自由，其實不但能治療大陸改革開放後一切向錢看這種社會道德沉淪的病，也能夠一併解決貪官污吏的問題。今天的中共領導人不僅做不到還要繼續打壓「法輪功」，說別人是「邪教」，還不是私心而已，怕宗教勢力起來後威脅到中共政權。這是和當時的統治者將耶穌基督釘到十字架時的心態是一樣的。

今天中共的領導人應該會發現，經過百年實際的運作，兩岸執行的政策只要愈接近國父所創的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則國勢愈強，反之愈弱。因此如能放下一黨之私心拿出大智慧，接受國父所創的三民主義、開放黨禁、實行民主、開放宗教自由、在沒有任何先決條件下，馬上就做到「五一七對台聲明」的下面七點：

- 1、恢復兩岸對話與談判，平等協商，正式結束敵對狀態，建立軍事互信機制，共同構造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的框架。
- 2、以適當方式保持兩岸密切聯繫，及時磋商解決兩岸關係中衍生的問題。
- 3、實現全面、直接、雙向「三通」，以利兩岸同胞便捷地進行經貿、交流、旅行、觀光等活動。
- 4、建立緊密的兩岸經濟合作安排，互惠互惠。台灣經濟在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優化產業結構，提升企業競爭力，同大陸一起應對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的挑戰。台灣農產品也可以在大陸獲得廣闊的銷售市場。
- 5、進一步密切兩岸同胞各種交流，消弭隔閡，增進互信，累積共識。
- 6、在兩岸關係的祥和氣氛中，台灣同胞追求兩岸和平、渴望社會穩定、謀求經濟發展的願望將得以實現。
- 7、通過協商，妥善解決台灣地區在國際上與其身分相適應的活動空間問題，共享中華民族的尊嚴。

如此兩岸要想不統一都很難。這才是孫子兵法所說的「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的最高境界。這不但解決了「台獨」問題、海外民運問題、「法輪功」問題，更解決了中國在歷史上統一的大問題。當然，這等大事非得有大智慧的人才能做得到。

人的智慧是可以修練的。《大學》在開宗明義中就說而『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並強調在『齊家、治國、平天下』以前必須要『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書中更進一步提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六個修養程序。這與許多佛教修行者藉著打坐而開悟的道理是一樣的。《大學》從內在的德智的修養，到外發的建立功業，將一切做人的道理，闡發得詳明透徹。大學就是熔儒家道德哲學與政治哲學於一爐的博大學問。中國政治思想是強調個人修身為主，此修身非一般人所認為拿個博士學位就可以治國、平天下。而是從「止」、「定」、「靜」、「安」、「慮」、「得」的方法修得智慧。有了智慧做事方向才不會錯，努力才會成功。而一般大學卻無法教「智慧」，還好有智慧的在世名師從不缺，只要下決心求智慧，自修或拜師都好。

由於智慧經常被“我執”及私心所蒙蔽，但是可以從打坐而開悟。因此當權者只要心中有一個「公」而做到「選賢與能」，天大的問題都能解決。我們看看現在的國民黨就知道，雖然繼承國父思想、三民主義實施五權憲法，但是自從李登輝當權到現在連戰當家，由於私心太重，每一次選舉時都是「本土」考量，黑金實力為主，一切為勝選的考量，「選賢與能」從來不是最高原則，因此在選舉時總是出現能力差的當正，能力強的當副的配對如林洋港(正)配郝柏村(副)，連戰(正)配宋楚瑜(副)，現在正孕釀著王金平(正)配馬英九(副)。選舉輸了並未抓到問題的核心，以為只要推出本土人士，提出執政論述就能勝選。看看今天國民黨的人才，沒有一個是李登輝及連戰所培養的。今天的馬英九還是蔣經國所培養的。去不了私心，做不到「選賢與能」，再好的國父思想、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到了手上一樣失去政權。

因此兩岸的未來的發展很大一部份取決于當權者的智慧。尤其是中共領導人的智慧。如能除去私心，放棄一黨專政，改走民主制度，則中國的統一必將完成。即使以後出現一個不會治國的當權者，也只是一個政黨輪替而已，中國還是統一的。否則繼續一黨專

政，只要出現一個像陳水扁不會治國的當權者，國父推翻滿清的例子將再度出現。

郭平

大道無術 方為正道

的，台灣不享有主權國家地位。這是美國的政策，美國的堅定政策」。鮑爾這番歷史性宣示，打破了以往的模糊策略，充分地凸顯了美國對台灣海峽兩岸中國人的善意，同意兩岸最終的和平統一，儘管這可能需要30年或甚至50年。美國的善意，為促進台海的和平繁榮，亞洲以及世界的和平繁榮，都創造了一個嶄新的新契機。

台獨夢囂勢力從李登輝1987年起執政12年，陳水扁4年，已有16年之多，不斷茁壯，由1990年代只佔選民三分之一，到2004年已佔選民二分之一。為達成2006年「制憲」，2008年「台獨建國」的目標，他們不擇手段，違憲違法公投綁總統大選，炮製319槍擊陳呂事件，以求勝選。軍購公投失敗後，又甘冒踐踏公投之大不韙，強迫國會通過6108億台幣（160億美元）的軍購預算案。如今台灣社會族群撕裂，南北分裂，天災人禍接連不斷，彷彿應驗了先哲「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的警語。這許多反民主、假民主之匪夷所思的發展，表面上都是打著「台獨建國」「去中國化」的旗號。事實上，多是為了爭權奪利，愚弄台灣人民，罔顧台灣同胞福祉。島內台獨運動長期以來，強詞奪理，硬拗蠻幹，直可媲美大陸的文化大革命，批鬥口水，無日無之。連一個區區考試院典試長，都可以違憲決定「本國史地」的範圍只限台灣本島。

戰國策楚一，記載著家喻戶曉的「狐假虎威」的故事。過去多年來，「台灣地位未定論」「台灣民族自決論」「美國同情支持論」，都在激勵鼓舞著台獨勢力的茁壯成長，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美國老虎的影

美國國務卿鮑爾 10月25日在北京接受CNN和鳳凰衛視訪問中，強調「台灣不是獨立的

響。雖然美國老虎說不支持台獨，但是它的策略，卻讓台獨勢力平添無限的想像空間。譬如說，主張台獨的「台灣人公共事務委員會」(FAPA)做了不少遊說美國國會的工作，就誤判美國支持同情台獨。就算明的沒有，暗的也一定有。早期說，一旦宣告台獨，中共不敢打，也不會打。現在則說，美軍一定會馳援，只要先撐 12 天。事實上，台獨勢力誤解了美國支持台灣的民主自由立場，與是否支持台獨並無任何必然的關連。現在好了，美國老虎明講不支持台獨，也不認同台灣是主權國家，這隻台獨之狐，轉眼之間就成了孤家寡人，眾叛親離，勢必日益憔悴衰落。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必是台獨勢力發展過程的寫照。

鮑爾雖說了「台灣」不享有主權國家地位，但並沒有說中華民國不享有。世界上現在尚有 26 個國家承認中華民國，但沒有任何國家承認台灣。因為中華民國是中國國父、也是中共歷來在表面上推崇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締造的。須知大道無術，方為正道。

「救星石」的



子日 (大陸)

大千世界，無奇不有。大陸有一奇聞不脛而走，被包括央視在內的 100 多家報紙、電視、電台、網站等各類媒體廣為傳播，神乎其神。說的是貴州平塘縣掌布鄉桃坡村有一巨石，石壁上清晰可見「中國共產黨」幾個大字，字體列成一排，大小相當，分佈勻稱，而發現者恰恰是黨的兒子（傳人）、村支書王國富。有人隨即命名「天書」「藏字石」「太陽石」「神石」，說是神韻天成，為世界奇觀、國之瑰寶。當地政府如獲至寶，趕緊冠以「救星石」，製造轟動效應，一箭雙雕，一則開發旅遊、招財進寶，賺取經濟效益，二則獻媚邀功、取悅高層，撈取政治資本。「救星石峽谷風景區」應運而生，增設紅色文化旅游主題，大做黨文章，準備申報國家級風景名勝區。

關於此怪石奇字的形成，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主要觀點如下：一、造假或者說是人造的，憑國人造假的膽量和技術，現在什麼假不敢造？哪種假造不出？何況造這種假正好投其所好，不用冒絲毫風險，有多位學者從地質化學專業角度論述造這樣的假並不十分困難，完全可做到天衣無縫；動機嘛，不用說是為了經濟利益，兼帶社會效益；二、半個多世紀前的革命標語，經風吹雨打、化學反應和剝蝕等逐漸形成；三、外星人所為；四、經過數億年天然形成的地質奇觀，聲稱「這一地質奇觀是一個藝術極品，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相結合的結果」。

每種觀點的持有者都能找到足夠的證據，說出幾乎足以讓人信服的科學道理，並能指出其它觀點的嚴重不足，真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然而，對於中國普通老百姓來說，搞不懂、摸不透，大概不會輕易相信上述任何一種觀點。中國是個受封建迷信思想影響很深的國度，絕大多數人寧可相信這是石破天驚、天造地設，這是上蒼的旨意和安排——這太可怕了！雖說對照現在的科學文明，這顯得荒誕不經、滑稽可笑，可對極少數人而言，或許正中下懷，他們說不定正在偷著樂呢。

值得一提的是，「數億年天然形成的地質奇觀」這一結論似乎具有不可動搖的權威性，因為這是省級、國家級的考察隊、考察團經科學鑑定的結果。特別是國家級考察團，名為「貴州平塘地質奇觀中國名家科學文化考察團」，由 15 位大名鼎鼎的專家組成，內含多名院士，金口玉言、一言九鼎。細細咀嚼，此「科學」結論與「石破天驚、天造地設」以及「上蒼的旨意和安排」並無太大的區別，祇不過前者披上了厚厚的科學外衣罷了。身為科學家，當然不好意思直接得出「上蒼的旨意和安排」這種荒謬的結論，何況執政黨是唯物主義者和無神論者，拍馬屁要不輕不重、恰到好處，伴君如伴虎，千萬別弄巧成拙。

許多有獨立思考能力和科學素養的網民並不相信這個權威結論。有的高度懷疑現在專家、教授的科學專業水平；有的認為考察團的專業結構不合理，沒有地球化學家，有些還是文化社會科學者，其中居然還有「著名演員」，不可能得出正確結論；有的認為這裏面存在腐敗，當今腐敗無處不在，考察團是受當地政府邀請去的，受人錢財，為人說話，當地想提高知

名度、打造著名旅遊景點，要的就是「數億年天然形成的地質奇觀」這一結論。更有一位名叫「京城孤魂」的網民，通過周密計算得出，「救星石」斷面上出現「中國共產黨」的概率最大也祇有「4.9 乘 10 的負 21 次方」，並宣稱「就算全中國都是像『救星石』一樣的帶有漢字的沈積斷面，也要 600 多萬個中國才能有一個『救星石』」。由此可見，專家們科學結論的可靠性要打個大大的疑問號。

如果不能直接證明專家們的權威結論是否正確，我們不妨來個佐證法或反證法。一、怪石上的奇字可不是隨隨便便的幾個字，而是漢字中分量最重的五個字，猶如泰山壓頂，專家們誰吃了豹子膽？敢對這幾個字胡說八道、搬弄是非？即便懷疑有假或有科學依據證明有假，他們敢抗氣吱聲嗎？專家自稱「考察團成員中很多人本是為了『打假』才去的」，乃自欺欺人也。背著這麼大的壓力考察，如何能得出正確結論？在巨大社會壓力面前，再高深的科學學術也會顯得蒼白無力，難免墮落成政治的附庸。這種無形政治壓力也許並沒有專家們感覺的那麼大，但在中國大陸是的的確確存在的。二、如果「救星石」上是別的什麼字，特別是執政黨惱火和痛恨的字眼，筆者可大膽斷言，專家們的火眼金睛一眼就能識破是假，是妖言惑眾，無論如何也不會得出「數億年天然形成的地質奇觀」這樣的結論；話又說回來，假若是這種情況，專家們連考察的機會都沒有，因為這樣的消息絕不會擴散，世人和專家皆無從知曉。

也有不少網民斥責「救星石」是一場帶有迷信色彩的政治鬧劇。現摘錄幾條如下：「連這招兒都用上了」，「執政的合法性還要從外星人找」，「《史記·陳涉世家》：狐鳴曰：『大楚興，陳勝王』，這是什麼朝代的事！怎麼現在還在用這麼拙劣的方法？」，「古代是狐狸說話，現代社會是石頭說話，不是越來越神了？」，「祥瑞最多的是王莽新政時（隨之而來的卻是篡位和起義）」，等等。鑑於「救星石」事件本身並無太多太大的官方政治背景，筆者認為主要是衝著經濟錢財來的，與政治關係不太大。

要想真正揭開「救星石」之謎，其實也不難。聯合國不是有個科教文組織嗎？要該組織派遣一個獨立的考察團，進行公正、客觀、不受干擾的科學鑑定，奧秘不就揭開了！如果確系「數億年天然形成的地質

奇觀」，結論將擁有國際權威性，當地政府正好可乘機申報「世界文化與自然雙重遺產」，旅遊錢財滾滾而來，還可賺取外匯，豈不更美！



中國現代史研究中心 黃花崗雜誌社董事會 第 11 次財務報告

(8/1/04 - 10/31/04)

總收入 (雜誌銷售回收、訂閱及捐款) **\$2822.68**

總開支 **\$26008.19**

雜誌印刷、打字、郵寄、稿酬、運輸開支、郵政信箱等	\$11252.62
研究中心及雜誌社房租	\$4800.00
電話費 (含寬頻上網)	\$453.33
電腦打印設備更新、辦公室用品及雜費	\$5671.35
購買資料書籍	\$514.00
雜誌社差旅費 (包括邀請人員)	\$1173.38
雜誌創刊三周年紀念餐會 (兼與印刷廠聯歡) 及招待費 (包括招待邀請人員)	\$2143.51

說明：

- 1、主編第八期稿酬 \$864 美元已經全部回捐雜誌社專款專用。
- 2、千小駒先生捐款尚未及計算在內。
- 3、本期財務報告由董事長周光亞核定 (11/14/04)。



敬請訂閱歷史文化季刊 — 《黃花崗》雜誌

一年四期

榮譽訂戶 (包括寄費) 為 \$100.00

普通訂戶 (包括寄費): 美國為 \$ 22.00; 加拿大為 \$ 44.00; 其它地區為 \$ 55.00

___ 是的, 我願意作為《黃花崗》雜誌的榮譽訂戶

___ 是的, 我願意作為《黃花崗》雜誌的普通訂戶

附上支票 \$ _____

我的郵寄地址是 →

(姓名)

(中文名字)

支票抬頭請寫: ↓

(街名)

**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INC.**

(縮寫: MCHS)

(城市)

(州名)

(郵編)

(電話)

(email)

《黃花崗》雜誌 地址是:

P. O. Box 425

New York, NY 10163 U.S.A

本刊新電話: 718-898-9100

本刊電子信箱: hfgang2001@hotmail.com

編 後

2004 年的最後一期出版了。本期的文章, 已經越來越趨向於對中國現代歷史的澄清和對我們民族優秀文化的重新識別。如果說大陸學者撰寫的“李宗仁回憶錄批判”, 將中華民國一些若大的歷史公案痛心地向了讀者的眼前, 為清掃歷史的塵封作出了重要貢獻; 那麼, 海外著名華裔學者丘宏達教授論及中華文化傳統與三民主義及共產主義之歷史文化關係的文章, 就更應該令我們的後輩讀者作深切的反思。在本期, 我們發表了旅美台灣華僑陳繼強先生“今日中國政治革命的導向”一文, 這顯然是一篇具有很高政治見地的文章, 它不禁證明, 台灣豈但是人心未死, 而且智者仁者仍然不乏其人, 而大陸留學生曉黑博士的文章“告別不了的革命”, 竟象是與他的台灣同胞“心有靈犀一點通”。本期以艾華民先生之“中國共產黨是蘇俄製造的侵華工具”為首的幾篇文章, 集中地揭露了蘇俄和中共狼狽為奸出賣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利益的史實, 猶將歷史的痛苦與現實的悲憤攤開在所有尚存起碼愛國心的讀者面前。這些文章, 雖然令我們夫復何言, 卻更能夠讓我們敵愾同仇。惟路漫漫其修遠兮, 《黃花崗》必將繼續上下而求索……

辛灝年先生的《誰是新中國》一書, 第一版第二次印刷本即將告罄, 藍天出版社敬告讀者, 欲購從速:

- 1、《誰是新中國》定價: \$38.00 美元; 美國銷售稅為 \$ 2.66 美元, 其它地區免稅。
- 2、郵資自付: 美國為 2.81 美元; 歐洲空運為 \$9.00 美元, 海運為 \$3.31 美元; 亞洲空運為 \$9.00 美元, 海運為 \$4.46 美元。
- 3、美國藍天出版社 (BLUE SKY PUBLISHING HOUSE) 英文縮寫: BSPH 信箱: P.O.BOX 2468 NEW YORK, NY 10163
- 4、郵購者請寫明地址、電話和要求, 支票抬頭請寫明 BSPH.

誰是新中國
訂閱



黃花崗雜誌創刊三周年暨與林口印刷廠聯歡餐會主持人姚鑫華副董事長

(左圖)黃花崗雜誌前代社長鄭文英先生向遵父囑將一批重要圖書捐贈黃花崗雜誌的周光亞董事長頒發感謝狀



董事長周光亞(右)與林口印刷廠廠長合影



在餐會上黃花崗雜誌部份成員和部份著名僑領合影

著名報人李勇夫婦(中)與廠長夫婦(右)在餐會上



置於黃花崗雜誌社辦公室一角的部份圖書





窗內的世界是否也隱含著如此強烈的對比？

作者
文雨

油
畫

2002 年紐約畫展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P.O. Box 425
New York, NY 10163

NON - PROFIT
U.S. POSTAGE
PAID
FLUSHING, NY
PERMIT NO. 619